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美国普利策奖金内幕



内容简介

美国报业大王普利策设立的“普利策奖金”，自 1917 年开始颁发以来到 1991 年已有 75 年的历史。授奖对象包括：美国小说、戏剧、诗歌、音乐、历史、传记、非小说类纪实文学著作和新闻；其中新闻类包括：公共服务、一般性报道、通讯、特写、调查性报道、专题报道、解释性新闻、国际报道、社论、漫画、现场新闻摄影、特写摄影、评论和批评等。

普利策奖金的授奖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文化、特别是反映了美国新闻界的情况。

1991 年出版的《美国普利策奖金内幕》（原文直译为《普利策奖金——美国最有威望的奖金的内幕》）是一部全面介绍普利策奖金的最新著作。作者道格拉斯·贝茨以散文的笔法，夹叙夹议、情景交融地介绍了普利策传奇般的一生、他设立普利策奖金的前后经过、普利策奖金的评选办法和组织机构、颁奖情况和在美国文化、新闻事业中所起的作用。作者特别详细地介绍了普利策新闻奖的方方面面，并以 1990 年专题报道奖的三名最终候选人为例，生动地描述了他们的新闻生涯、其参赛作品的采写经过和甘苦。

作者透露了许多内幕情况，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美国社会。书后附有 1917—1991 普利策奖金获得者的全部记录，更是了解美国文化和新闻业发展状况的珍贵资料。

此书文笔流畅，不啻是一部专题报告文学。新闻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研究人员和一般读者都可以从此书得到所需要的知识和启发。

——译者 1992.8.

美国普利策奖金内幕

1. “新闻学术奖”

1990年4月12日下午2:45

当记者在哥伦比亚大学等待一年一度的新闻奖消息时，他们显得有点烦躁不安。其中一些人三五成群忸怩地闲聊；另一些人则透过肮脏的窗户张望着百老汇形形色色的东西。还有一些记者正一个一个地陆续到达，带着笔记本、录音机和采访部的指示。现在，万事俱备，只等新闻发布；一得到消息，他们就可以奔向玻璃电话间给报社打电话；编辑们正焦急地等待着——在某些情况下是愉快地期待着——1990年普利策奖获得者的名单。

正象新闻界所说，这可是一项轻松的任务。这些记者将坐等新闻。他们所要做的，只是给得奖人打电话。但是，天已这么晚了，发稿时限沉甸甸地压在人们的心头，新闻编辑室的编辑们比平常更加紧张地望着钟表。每年的这个关头，美国报刊的负责人可不象平常那么客观了；如果他们自己的报纸——而不是竞争对手——赢得了普利策奖的话，他是要大肆自我吹嘘一番的。所以，人们的神经绷得越来越紧。前来采访的一个人——那个站在房间前厅、穿着卡其裤和仿旅行茄克的记者——走到铜像前，揪住他的大鼻子。

“揪下来行不行，先生？”

他假装用力，猛揪约瑟夫·普利策的铜嘴。

“哼！”

这一下子气氛活跃了一些。目睹此君憨态，有几个人莞尔一笑，有一位记者竟捧腹不已。落满灰尘的普利策铜像，两眼仍然略带凶气地凝视着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世界”大厅即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总共有32名记者聚集在这里，参加为十九世纪的报刊发行人普利策增添光彩的仪式。在无休止的取笑逗乐中，有些记者犯了一个常见的错误，把这位伟人的名字的发音搞错，结果普利策成了飘利策。那个香蕉国装束的家伙用鼻音哼出了普利策的名字。这种令人气恼的发音玩笑可以追溯到内战时期。当时联邦军的战士们把年轻的普利策作叫“犹太人乔耶”和“犹瑟夫”。普利策在青年时代不得不忍受这种反犹太人的做法。

普利策逝世80年后，他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美国出版界最有影响的人物。在过去和现在的所有出版家中，只有他能够把新闻界的人士吸引到这里的“世界”大厅里。他死后象生前一样，仍然是操纵舆论和自我宣传的能手。阳光明媚的1990年4月12日星期四下午在曼哈顿举行的这个集会就是这位天才的绝招：普利策奖宣布日。专栏作家杰克·安德逊在获奖以后发表的讲话中称一年一度宣布的普利策奖是“新闻学术奖”。

安德逊本来可以把他的话再加以发挥。普利策奖实际上是包括小说、戏剧、传记、历史、非小说类著作、诗歌以及音乐在内的几乎全部美国著作的学术奖。普利策奖的宣布使普利策的影响通过20多位美国作家和记者的平

生和事业而不断扩大。觥筹交错，情绪高昂，得意洋洋；那些刚刚得到毫无表情、冷漠的普利策金属铸像的聪明男女们象好莱坞名流一样，大叫大笑，忘乎所以。

不过，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却一点也不象奥斯卡之夜。普利策奖宣布日象举行记者招待会的那座死气沉沉的建筑物一样，毫无生气。这座被风吹雨打得陈旧不堪的灰色建筑物是在普利策死后的 1912 年用他的钱建造起来的。他留下的维修费多年以前已经用完了。虽然最近对内部进行了一些粉刷装修，但这座七层楼宇仍然显得破旧寒碜，给人一种威望下降的感觉。

入口的台阶上乱丢着杂物，昏暗的走廊上也是如此。一块粉红色的冰淇淋——这可能是什么人在百老汇买的一杯冰淇淋上掉下来的——正在绿色大理石地板上融化着。管理人员是会把它擦掉的。但此刻他正在楼下男厕所收拾，一个在那里过夜的男人把它糟践得一塌糊涂。

“人们有时藏在里面，”看门人说，“他们宁愿睡在厕所，也不愿去给他们提供的住处。”

这座建筑物是破旧不堪的，但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那就是甘尼特传媒研究中心。这个新闻界的思想库是用甘尼特基金会捐赠的 1500 万美元于 1985 年在这座建筑物的第一层开办的。根据一项住宿学者计划，每年有 12 位至 14 位高级新闻工作者和教学人员来这里研究传播学。这个中心在行政上和财务上独立于哥伦比亚大学。处处可以看出它与众不同之处。在参观了建筑物的上面几层房间后，进入装饰豪华、家具讲究的甘尼特中心，恍若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你应该一年以前来看看楼上的情景，”甘尼特中心的一位研究人员、华盛顿州埃弗雷特《先驱报》总编辑琼·伯德说，“那里实际上已经略加整修，以前，简直象第三世界国家的样子。”

甘尼特中心严加封闭，无家可归的人是无法偷偷进入这个思想库的洗手间的。它各处都安装了电子锁，只有用特殊的钥匙或内部遥控开启装置才能打开这些锁。

甘尼特中心同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完全隔绝。伯德和在那里搞研究工作的其他报纸负责人那天下午听说是普利策奖宣布日时，大感意外。

这时，在第七层楼上，罗伯特·克里斯托弗正准备下楼去会见新闻界。克里斯托弗是一位 66 岁的副教授，以前曾担任过杂志的主编，现在负责管理普利策奖金事宜。他每年的部分工作就是负责宣布得奖人名单。他使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保持低姿态。

“哥伦比亚大学竭力避免造成奥斯卡那样的轰动，”他对一位来访者说。

克里斯托弗的紧张可能是有道理的。从这里下去四层楼，代表着西半球一些最有影响的新闻单位的 32 名记者正在那里等待他散发新闻稿和回答问题。这项任务看起来似乎是轻而易举的，实际上却是克里斯托弗工作中最棘

手的一部分。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每年的决定总有那么一两项引起争议，这几乎成为常事。不过，大部分争议是小问题，报界以外是不大注意的。但也有一些争议成为全国性新闻。最臭名远扬的一个例子是，《华盛顿邮报》的珍妮特·库克捏造一个八岁吸毒者而瞎写了一篇特稿，竟获得 1981 年新闻奖。在碰到这类危机时，克里斯托弗负责减少损失，尽量不影响普利策奖的声誉。

“几乎每年都有人要求不要给某人颁奖，”克里斯托弗说，“从来没有撤回过某人的普利策奖金。不过，如果《华盛顿邮报》不退回库克的奖金，对她倒是会采取这种手段的。”

克里斯托弗，彬彬有礼，受人尊敬，以前曾担任过《时代》周刊的高级编辑和《新闻周刊》的总编辑。他是在发生珍妮特·库克丑闻之后不久，负责普利策奖金的管理工作的。在他负责的八年中，迄今还没有发生过那么严重的、涉及公共关系的难题。不过，当他去拿桌上的另一个纸夹时，他的手微微颤抖。

在楼下，人们很清楚，为什么校方避免任何“奥斯卡轰动”。实际上，也不需要那么做。《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新闻日报》、《乡村之声》周刊和《每日新闻》都派来了记者。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加拿大通讯社、路透社、美国电视网、几家纽约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美国之音电台、美国一些大的报业托拉斯和包括《编者与出版者》周刊（它是报界的圣经）在内的一些产业报刊也都派来了记者。在冷战以后的日子里，普利策奖的宣布甚至也吸引了苏联报纸的记者——《消息报》驻纽约记者亚历山大·沙利涅夫。

他们聚会的“世界”大厅是这个新闻学府的最大的礼堂，它是依照普利策的已经停办的纽约《世界报》的名字命名的。几十年以前，这个大厅的精美的木制品、高高的天花板和直达屋顶的大玻璃窗可能使它显得雅致大方。而今天，大厅则是深蓝色的，装着廉价的黄铜枝形吊灯，铺着米色地毯，使它看起来颇象一个在伍尔沃思美容店化妆打扮了一番的年迈的家庭主妇。

手头象第三世界那么穷，却硬要象欧洲那样讲究排场。

焦急等待着的记者们，有些人透过“世界”大厅西侧被煤烟弄脏的窗口眺望着百老汇的街头。普利策式的新闻报刊在报摊上奄奄一息。那些以“出租汽车司机被杀！”和“出租汽车匪徒杀害 5 号”的大字标题吸引读者的小报一摞一摞堆得老高，慢慢地卖给了闲逛的学生。早春的太阳已经暖融融的，他们脱掉厚衣服，只穿着 T 恤衫和游泳衣式的上衣。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要瞥一眼那些醒目的大字标题。谁能不看一眼用 3 英寸黑体字排印的“出租汽车上的杀人凶手”大字标题呢？百老汇人行道上过往的行人整个下午都在议论着一系列出租汽车司机被杀事件。

纽约的一周犯罪事件显然吸引着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但还不足以使他们解囊买报。今天，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把多余的零钱掏给百老汇的乞丐和

推着车卖椒盐卷饼的小商贩。冰淇淋店的生意也颇兴隆。今年这个城市冬天严寒，现在突然转暖，冰淇淋自然吃香起来，至少是比报纸吃香。

这些年轻人，象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同辈一样，是不看报的，至少是不经常看。这是一个深刻的、强有力的、极其重要的趋势。这个趋势，报纸是不报道的。它同广告下降和成本上升结合在一起，正使美国报纸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些悲观的分析家认为，美国报界正在走向美国铁路客车同样的下场。另一些人则坚决不同意这样的看法，特别是报纸的老板更是如此。不过，对下列事实，大家都无异议：这个趋势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刊登耸人听闻消息的纽约主要报纸《邮报》和《每日新闻》在为生存而进行的生死搏斗中越来越亏损。

在“世界”大厅的走廊里，两份不同的报纸打入学生休息处的年轻读者手中。一份是《纽约时报》，它把出租汽车司机被杀的消息放在靠后的版面上，头版刊登的是关于美国人口普查问题的严肃报道。

另一份报纸是《哥伦比亚旁观者报》四月愚人节出版的大学生专刊，它把这个引人入胜的专刊叫作《哥伦比亚空谈家》。它的版面上充斥着少数民族的含糊不清的拼写和无穷无尽的下流话（它是由蹩脚主任安吉利克·迪克斯同卡伦·霍尔德米罗德、尼尔·托沃迪特和菲尔米·法因鲍尔斯一起编辑的）。《空谈家》把骗人的“体育版”叫作“Spurts”（正确的拼法是Sports——译注）。人们知道什么意思。男女青年们也都懂得，所以他们愉快地读着它，他们似乎发现它很有趣，但是很难想象普利策会有什么别的感觉，恐怕只会对1990年他的学院的某些未来的年轻记者的敏感性感到失望吧。

不过，普利策奖金则是另一码事。正如《时代》周刊记者托马斯·格里菲思所说，普利策奖已经成为“美国现在最高奖励”。他指的不是每个获奖者所得到的微不足道的3000美元支票，而是指由此而获得的荣誉。

在报界，普利策奖所具有的魔力简直难以解释。报界至少有300种名目繁多的奖励，但是都比不上普利策奖那么高的威望。它的令人陶醉的力量使报刊老板也感受到，他们认为普利策奖的获得大有好处。荣获此奖，有助于促进报纸的销路，在读者群中树立良好的形象，还有助于加强报纸同股东和董事们之间的关系。它可以提高这个单位在同行业中的声望，吸引更多的高档人才到报纸的编辑部来。

例如，对文学记者、摄影记者、专栏作者、社论撰稿人或漫画工作者来说，获得普利策奖有助于自己的提升。在工资较低、名声较差的小报工作的人得奖后，会突然发现，他们可以到待遇较高、名气较大的大报工作了。那些已经在在大报供职的人发现自己更容易得到提升、获得同事们不可企及的特殊工作照顾或更好的安排。此外，还有许多额外的好处：出版社预约写书、报刊约请写稿、有偿讲演、公开露面提高知名度。

负责处理得奖人稿件的主编也会得到好处。普利策奖会使有关编辑名扬本单位以外，而在内部则得到“发行人的保护”。特别是对那些由于酝酿变

革使发行人和职工感到不安而引起争议的主编来说，普利策奖可以起一种使这种变革合法化的作用，使董事会和编辑部的动荡至少暂时安定下来。

说实在的，整个报社都对获得此奖有着利害关系。人们积极谋求获奖，得奖后大肆宣传，以致“普利策奖获得者”一词在美国已经家喻户晓。普利策图书戏剧奖也沾了新闻界自我宣传的光。如果不是新闻界对新闻奖感兴趣的话，图书戏剧奖也许仍然默默无闻。

对图书出版商来说，获得普利策奖，可以使一本书及其作者大大提高知名度，往往导致销路增加。及时获得普利策奖，可以使一本书的畅销时间大为延长。由于事关经济利益，一些大的出版商每年拿出许多书参加普利策奖的角逐。例如，艾尔弗雷德·诺夫出版公司拿出 58 本书参加 1990 年的竞争，在所有出版商参与竞争的 590 本书中几乎占 10%。由于它积极争取，同时也由于其著作的质量较高，在 80 年代诺夫出版公司比任何其他出版社得到的普利策奖都多，共得 11 项奖，这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即使得奖未能大大促进销路，也可以有助于作者今后出书较容易签订新的合同。得奖人可以获得社会承认。这个奖往往可以使作者一夜之间从默默无闻登上《纽约时报书评副刊》的头版。实际上，今天宣布获奖名单以后发生的事就是如此。1990 年小说奖为一个不大知名的纽约作家奥斯卡·希于洛斯的第二部小说《马姆博国王们演奏爱情之歌》所得，这是法拉尔—斯特劳斯—吉鲁出版公司为 1990 年普利策奖提出的 20 部候选作品之一。

对一部戏剧来说，能否获得普利策奖，关系到票房的成败。由于这个缘故，百老汇的演出商在同剧作家签订合同时增加了鼓励条款，如果他们的戏剧获得普利策奖（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安托万内特·佩里奖），则向他们提供额外的利润分红。普利策奖可以给不景气的演出注入活力，使已经停演的戏剧起死回生。它还可以促使一部戏剧改编为电影，理查德和利利·扎纳克就承认这一点，他们把艾尔弗雷德·乌里的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品《为戴西小姐开车》改编为电影。

对剧作家来说，象对著作家一样，获得普利策奖可能是名利双收的捷径。1990 年的角逐就是这样，奥古斯特·威尔逊第二次获得普利策奖，这次他的获奖作品是《钢琴课》。获奖时机非常之好，在今天宣布得奖人名单两周后它将在百老汇上演。届时将场场爆满。某些比较慷慨的评论家会开始把威尔逊同尤金·奥尼尔等量齐观，后者被普遍地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剧作家，曾四次获得普利策奖，他的业绩只有罗伯特·弗罗斯特堪与媲美，后者的诗作也曾四次获得普利策奖。

在美国的作家队伍中，诗人是名利最少的了。但即使对苦苦挣扎的诗人来说，获得普利策奖也会意味着经济上大捞一笔。诗歌奖往往会使作者意外地得到一笔到各地朗诵其作品的旅差费和酬金，他今后发表诗作时稿酬也会增加。

在文学方面，普利策奖已经成为美国的诺贝尔奖了。

两者的相似之处并非是巧合的。实际上，普利策是从人家那里得到了启发。

瑞典化学家诺贝尔 1867 年在他的实验室发现了一种影响深远的物质。他把硝化甘油同一种溶解剂混合在一起，第一次创造了一种可以安全生产和运输的烈性炸药。他把他的发明叫作“甘油炸药”。它很快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富的人之一。但它也导致他晚年得了严重的神经错乱。他产生心理变态，总是感到自己靠这种炸药发财而深深有罪，因为这种炸药造成许多人的死亡，包括他的弟弟埃米尔和另外四名在他的炸药厂爆炸时丧生的人。经历了这些试验之后，他的发明才趋于完善。他的甘油炸药和后来发明的爆破胶本来是用和平目的的，但却被用于战争。每念及此，他总是痛心疾首。他于 1896 年逝世，比普利策早 15 年。他在遗嘱中指示：把他的 900 万元财产的利息每年用于奖励 5 个方面的得奖人。这 5 个方面包括：化学，物理，医学或生理学，文学，以及为国际和平而作出的努力。

诺贝尔奖金的设立是一位敏感的、被犯罪内疚折磨的人的悔悟行动。

普利策奖金的设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不过，这位美国出版家大概主要是为了操纵历史，而不是为了减轻内疚。

象诺贝尔一样，普利策也是一位发明家，很快挣得家财万贯。他的发明就是耸人听闻的新闻。他还创办了第一家连环漫画报，这种销路很广的报纸被称为“黄色小报”。“黄色新闻”的叫法，盖源于此，用来形容普利策办报的风格，也就是街头兜售的《出租汽车上的杀手》之类的货色。他在增加自己财富的过程中，经常夸大新闻，用一些吓人的大标题，有倾向性地进行政治报道，刊登一些无中生有的消息。他象他的竞争对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一样，用一些应当受到谴责的手法，煽动全国进行西（班牙）美（国）战争。这场战争在 1898 年使近 5000 名美国人丧生，死于战火的西班牙人和古巴人不计其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同赫斯特进行的发行战中多销售一些自己的报纸。

虽然普利策有这些弱点，但他也有其伟大之处。他是现代调查性新闻的创始人。他的报刊不知疲倦地鼓吹社会改革，同政府和巨商的贪污腐化行为作斗争。他是一个复杂的、自相矛盾的人物，他晚年对新闻界和国家所作的崇高贡献肯定超过了他过去贪财的生涯。

普利策最聪明的一招也许是，使历史学家记住他的积极面。他 1911 年逝世时，通过两个极其有远见的行动，做到了这一点拿出 150 万美元创办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又拿出 50 万美元作为奖励图书、戏剧、音乐、新闻优秀作品的基金——这是首次建立的全国性奖。

象诺贝尔一样，普利策在晚年也患有耗人精力的神经紊乱症。从未确诊的这种病几乎使他致盲，对噪音极为敏感。随着体质的恶化，他的内疚感也日益加深。到 20 世纪初，他的晨报《世界报》放弃了使他发财的黄色新闻。

“我们的共和国和它的报业共兴衰，”在 20 世纪开始后不久，这位悔

悟的出版家写道，“能干的、无私的、关心公共利益的报界是能够维护公共美德的，训练有素的报业人员有权利、也有勇气做到这一点。而没有公共美德，民治政府便是一场骗局、一种嘲弄。如果报界寡廉鲜耻、唯利是图、蛊惑人心、贪污腐化，那势必使人民也变得象它一样卑劣。”

这些崇高的话刻在新闻学院大厅的大理石上，有助于使普利策成为报业史上的英雄。但是，应当指出的是，他的《世界报》只是在不再盈利，并开始感受到另一劲敌的竞争之后，才放弃耸人听闻的手法。出版界一位年轻的暴发户阿道夫·奥克斯接管了当时奄奄一息的《纽约时报》。奥克斯抛弃了刊登连环漫画和道听途说的做法，开始发表明智的、合乎道德的、认真严肃的文章和报道。《纽约时报》很快就开始占领普利策的《世界报》的市场。奥克斯把《世界报》讥讽为“荒诞的新闻”。还应指出的是，普利策只是在他的主要报纸上不再刊登耸人听闻的新闻。他的以下层阶级为对象的晚报继续兜售诸如《爱情和香烟使他疯狂》之类的头号标题。

建立普利策奖，即使说不上新奇，也是一个聪明的做法。而开办新闻学院，更是卓越之举。

普利策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是全国第二所这样的专业学府，以前只有密苏里大学的新闻学院。普利策的学院的奥妙之处在于：他使它成为纽约市的一所最有声望的大学的一部分，而纽约市过去是，在一定程度上现在仍然是美国的新闻首府。他的学院开拓了一个新的学术活动领域，使新闻教学人员永远把他铭记在心。此后，在他们争取学术地位和克服报界根深蒂固的反理性做法的斗争中，他们总是把普利策奉为“现代新闻之父”，而他的死对头赫斯特则永远获得一个不那个光彩的“公民凯恩”（注）的形象。

普利策的新闻学院和每年颁发的奖金为他树立了一个纯洁的历史形象。他用200万美元——按1990年币值计算约为2,650万美元——给自己买了一个永远受人尊敬的名声。

今天宣布的获奖名单将引起新闻界的普遍重视。全国1,600家日报上几乎全都会出现普利策的大名，这些报纸的总发行量超过6,000万份，拥有的读者至少有1.2亿。广播界也将不得不报道这件事。各种新闻杂志和所有的专业报刊也将予以报道。西方世界的许多新闻媒介也会报道。今年，苏联的《消息报》也会发表这个消息。

（注）“公民凯恩”，是美国的一部同名著名影片的主角，这部影片描写了一个报业巨头的一生。——译者

如果普利策还活着，他该多么高兴啊。他的奖金使他名扬四海，其知名度超过了本世纪任何一个人的想象——即使对他这样一个有远见的人来说，也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还活着，他该多么懊丧，为什么他就没有想到抢先设立奖金啊。今天，诚然也有赫斯特基金奖。然而，公众却不大知道它。

这两位出版家生前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竞争，可是在争夺身后名声方面却没有对手。

约瑟夫·普利策胜利了！

2. 三名最终候选人 等待着自己的命运

东部标准时间下午 3:00

当记者们在哥伦比亚大学议论纷纷的时候，在曼哈顿的华盛盛高地区，朝北走过十来个街区的一套公寓里，蝴蝶正在飞舞。所谓蝴蝶，当然只是打个比喻而已。这种想象中的蝴蝶正在 33 岁的吉姆·德怀尔的上消化道周围扑腾。他知道，他的大名现在随时会出现在报刊上。今天哥伦比亚大学透露了普利策奖的最终候选人，其中有的人是实际得奖者。

吉姆在《纽约新闻日报》供职。4 年来，他一直为一个以 350 万每天乘坐城市地铁的读者为对象的专栏撰稿，这个专栏每周出现三次。该报编辑对吉姆的工作评价很高，他们把他的一批以揭露地铁忽视安全为主的专栏文章提出来竞争普利策奖。

36 天以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秘密会议上，吉姆被推选为角逐新闻报道奖的最终候选人。这种选拔本来是绝密的，但是吉姆知道了。大约一个月以前，他的编辑唐纳德·弗罗斯特向他泄露了此事。而弗罗斯特则是从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成员戴维·拉文索尔那里听到风声的。拉文索尔是拥有《新闻日报》的时代明镜公司的总裁。

普利策奖要经过复杂的双层秘密评审，才能定案宣布。在这个过程中，有 86 名男女“评审员”参加评审委员会，提出各种奖的最终候选人名单。另有 16 位男女人士是普利策奖最高委员会的评判员，决定哪些最终候选人可以得奖。委员会的政策规定，参与评判的 102 人，在正式宣布得奖人名单以前，都要严守秘密。不过，实际上，许多评审员——特别是新闻奖的评审员——都偷偷地把评奖情况泄露给本单位。一些最慷慨泄密的人往往是高层的实权人物，如拉文索尔那样的委员会成员。

怎样来解释，为什么吉姆·德怀尔知道他是最终候选人呢？问题是：他能获胜吗？

不管怎么样，在某种意义上说，他获胜了，虽然他仅仅被提名最终候选人。成为普利策奖的最终候选人，是不小的胜利。今年角逐新闻奖的有 1,770 人，吉姆是其中的一人，而角逐 14 项新闻奖的最终候选人只有 45 人。

吉姆上了最终候选人名单，他知道这一点。当他盯着自己家里的计算机上的监视器时，他有点焦急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在华盛顿堡大街的同一幢大楼里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室，安装了计算机，而他同妻子卡西和 4 岁的女儿莫拉则住在那里的一套有两间卧室的平常公寓里。吉姆向报社请假，在这套住宿办公两用的房间里工作已经差不多有 3 个月了。《新闻日报》给了他 90 天假期，让他写一部关于地铁的书，这是纽约一家出版社预约的。

但是现在，当吉姆按他的计算机的键盘时，他却不是在写书。他的计算机通过调解器与曼哈顿《纽约每日新闻》办公室联结在一起。他正在看美联

社和其他通讯社的电讯，看看有没有关于普利策奖的报道。虽然已经是下午 3 点预定宣布得奖名单的时候，但是到此刻为止仍然是杳无音讯。

吉姆想象着，获得普利策奖后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对他的关于地铁的著作来说，那肯定是一个促销的良机。更不用说他的记者生涯了。此奖会使他跻身于纽约名记者之列。他会成为第二个布雷斯林。

吉姆是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在纽约长大的，他是两位互相竞争的小报专栏作家吉米·布雷斯林（他当时在《每日新闻》工作）和皮特·哈米尔（在《邮报》工作）的热心读者。

“我喜欢他们的写作风格，”吉姆说，“特别是，皮特·哈米尔每天都写散文诗，我非常爱读这些诗。我知道，这正是我的志向之所在。”

吉姆既有决心，又受到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鼓励，这位青年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今天，吉姆同布雷斯林一起在《纽约新闻日报》工作，同目前在《老爷》月刊工作的哈米尔成了朋友。吉姆自己也成为诗人，诗情满怀地抒写着纽约地铁的生活。英国记者和作家伯纳德·莱文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纽约的文章中，说吉姆是“地铁的记者、哲学家、诗人”。吉姆的作品中充满了幽默、敏感和对社会贫穷阶层的同情。他的专栏文章有时痛斥权势阶层，一位普利策奖评审员带着敬意地说这是“牛仔新闻”。读者不难想象这位专栏作家持枪跃马，把官僚主义者拉向审判台的气概。

不过，当吉姆漫步在社区的街头时，他却毫无牛仔的英姿，倒象是一个码头装卸工人。他个子不高，但很壮实，宽阔的脸上常带笑容，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面色红润。他的胡子浓黑，但头发稀疏，粗粗的腰围显示他爱喝啤酒，星期一晚上还要来一场足球。

他的祖籍是爱尔兰，后来移居美国，父亲是学校的看门人，母亲是护士。吉姆在社会经济地位的阶梯上爬了很长一段路程，他在西班牙人聚居区度过了童年，后来进了哥伦比亚大学，然后在第二花园街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职业。他在《新闻日报》上的专栏文章总是为社会最底层的人民说话，表明他这个地位日益上升的记者没有忘本。

但是，吉姆并不满足于他已取得的成就。他感到，在地铁问题上，他的文章已经作完了。当他假满重新回到报社后，他将承担新的任务，扩大专栏文章的写作面。对一个报纸撰稿人来说，他的薪俸是可观的，去年约为 65,000 美元，但他希望更多一些。在纽约居住，花销太大。他和妻子希望生第二胎。他们希望给他们的丰田牌汽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以免丢失，而现在则停在大街上。他们的街区相对来说还是安全的，最常见的罪行是闯入汽车内。但这个地区仍然是纽约凶杀最多的第 34 区的一部分。他们公寓东头的窗户面对的是哈莱姆贫民区。吉姆最终是想离开这里。

他想，普利策奖也许有助于那一天的早日到来。

象大多数杰出的记者一样，吉姆已经获得过一些奖。他的关于地铁的专栏文章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 1988 年迈耶·伯杰奖。这种奖每年颁发，表彰

关于纽约的出色报道。那是一种引人注目的荣誉，但是在报界以外，很少有人知道它。

由于美国人迷恋于光闪闪、响亮的奖，如普利策奖、奥斯卡奖、埃米奖、格拉米奖、托尼奖等，大家对其余的各种奖已经麻木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盖尔研究所出版的奖金名录列举的美国各种奖金达 12,500 种以上，光新闻奖就有 271 种。其中有的奖，如吉姆获得的迈耶·伯杰奖，是享有声望的。然而也有许多奖、特别是新闻奖，是骗人的玩艺儿，它们被某些人的特殊利益玷污了，这些人借奖金之名来推销他们的产品和劳务，或促进他们的事业和政治偏见。在过去的岁月里，人们最爱玩的花招包括烟草业每月对“最杰出的”新闻摄影颁发的现金奖，拍摄的对象是抽香烟的人。在 90 年代，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一家链锯生产厂每年对“杰出的环境报道”提供 1,000 美元奖金。讲道德的新闻工作者既不寻求，也不接受这样差劲的奖金。

普利策奖则不同了。虽然以往至少也有两位作家——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在 1926 年和剧作家威廉·萨罗扬在 1940 年——拒绝此奖，但是，新闻工作者则从来没有拒绝过。

吉姆·德怀尔眨眨眼睛，笑着说，他不打算成为拒绝此奖的第一位新闻记者。

当吉姆在他的计算机上翻阅电讯，希望找到关于普利策奖的新闻公报时，他并没有考虑此奖可能给他带来多大的经济上的好处和职务上的提升机会。但他在思考，如果他得奖，他要感谢谁。他认为，他首先要感谢新泽西一家小城市报纸的编辑理查德·维扎，因为维扎帮助他开始了记者生涯。吉姆意识到，对一个堂堂纽约报人来说，这是愚蠢的，但他流露自己的内心想法，并没有感到不好意思。

他承认，他是罗曼蒂克的和重感情的。

今天新闻界的多种模式，都不适合吉姆：他既不是老油条文人、玩世不恭的颓废派、落落寡合的雅皮士，也不是野心勃勃的政客。如果你在地铁看到他穿一身斜纹粗棉布工作服和风雨衣，你大概会以为他是从码头或工厂下班匆匆回家的蓝领工人。然而，当他掏出笔记本，写点什么东西，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时，你可能改变看法，认为他是一个充满幻想的诗人，正在捕捉突然涌上心头的灵感。

在某种程度上，你的两种看法都对。

太平洋标准时间中午

越过三个时区，到了美国遥远的西部，那里也有一个曼哈顿。清晨的云彩沿着南加利福尼亚海岸低低飘荡，在旭日的照射下慢慢退去。沿着曼哈顿海滨的望海大道，建有许多造价为 50 万美元上下的别墅，院子里栽着芙蓉、叶子花、茉莉，全都盛开，四月的微风徐徐吹来，花香四溢。天气和煦晴朗，最适宜于打网球；到四个街区以外的太平洋淌水，也蛮好。但是，克莱尔·施

皮格尔却没有外出，而是在室内看电视，焦急地调换着频道。

这位 37 岁的女人身材苗条、体格结实，皮肤晒得黑黑的。她通常在白天是不看电视的，实际上大部分电视，她都不看。但今天，她却盯着电视，找新闻。电视台不帮忙，除了日间广播剧和体育比赛外，什么都没有。她把频道重新拨到有线新闻电视台，也许它会有点什么新闻吧。

象东海岸的吉姆·德怀尔一样，克莱尔·施皮格尔也是角逐普利策新闻奖的最终候选人。象吉姆一样，她也知道了这个消息。这是《洛杉矶时报》的编辑谢尔比·科菲告诉她的，她在该报当记者。象吉姆在《新闻日报》的编辑一样，科菲也是从普利策奖金委员会委员戴维·拉文索尔那里听到这个信息的。拉文索尔的时代明镜公司既拥有《新闻日报》，也拥有《洛杉矶时报》。

克莱尔清楚地知道，今天是普利策奖金日，宣布最终候选人和得奖人名字的时间就要到了。事有巧合，克莱尔也同吉姆一样在度假，但她是产假。

4 个月前，她生了一个女孩，名叫莱斯莉。婴儿同保姆住在这幢两层小楼的另一间房子里。这座别墅是当地的一位建筑师为克莱尔和她的律师丈夫布雷德·布赖恩设计的，小巧玲珑、雅致大方，堪称一景。从记者的标准来看，这算是上乘居住条件了：上有拱状天花板，下有精致大钢琴；还有一个亚热带后花园，橘树杂陈，芳香扑鼻，克莱尔的大女儿、四岁的艾利森正拖着浇花的胶皮管在那里玩耍。

聪明早熟的艾利森来到门口，想引起妈妈的注意。她说她要带着胶皮管进来。“小宝贝儿，不行！”克莱尔吼着，一面看着有线新闻电视，一边制止这场小危机。然而艾利森拖着汩汩冒水的胶皮管走了进来。妈妈赶忙跳起来拦截住她，才使硬木地板避免了一次大洗劫。克莱尔满怀希望的目光最后扫了一眼电视机，同小家伙一起走出门去关水管了。

这就是克莱尔最近几年的情况：掌握既当妈妈、又做事业的传统技术。即使经济上很宽裕，也够克莱尔操劳的。她，家庭幸福和事业成功两不误，干得多么巧妙、多么出色啊。再过几分钟，普利策奖就要揭晓了，即使她不能成为得奖人，至少也是个最终候选人。

但是克莱尔对一身挑两副担子的角色并不完全满意。她不禁想，如果得了普利策奖，在多大程度上会有助于解决问题呢。她一直鼓起勇气，要求报社给她一些照顾：把她的产假延长到今年全年，重新工作时每周只干 3 天。这的确是很大的照顾。需要对雇员的关系有一点灵活性，而许多报纸还没有这么做，因为报界是美国最保守的行业之一。

“就我的工作而言，我可能被糟践，”她说，“我的意思是，他们可能说：‘我们对你当然可以实行三天工作周制，但我们要取消你的医疗保险，换换你的工作，让你上夜班。’他们可能很不愿意那么做。”

克莱尔特别操心的是，要保持她报道保健事业的新闻工作，这是报社最近安排的一项任务。她喜欢它，而且变得非常熟练了。象吉姆一样，克莱尔

也是多次得奖的记者。在她获得的荣誉中，包括《洛杉矶时报》的深度专题报道编辑奖和大洛杉矶新闻俱乐部的调查性报道一等奖，这两项奖都是在1985年获得的。她最近的一些文章——揭露一家公立医院医疗渎职行为的系列报道鞭辟入里，使她走到了获得普利策奖的边缘。她的工作被认为是《洛杉矶时报》的美差之一。克莱尔虽然出生于名门富有之家，却也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得到这份儿差事。

象吉姆一样，克莱尔上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普利策新闻学院，并在纽约街头锻炼了新闻报道的能力。不过，除此之外，他们两人的巧合之处就不多了。克莱尔在伯克利出生，长大成人；父亲是一位事业兴旺的公司律师，操持家务的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克莱尔的童年是在父母的疼爱保护下度过的，她是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而吉姆则是天主教徒，小时无人管束。

当吉姆12岁在地铁苦读时，克莱尔已经十五岁，每天乘公共汽车去女子学校读书。当他学习如何掌握篮球的跳投篮技术和在运动场上避免被攻击时，克莱尔则在上网球和芭蕾舞课。当他办初中的校刊，已经立志要成为一个新闻记者时，克莱尔则作为一名交流学生，去印度尼西亚上中学，并考虑当一名人类学家。

长大成人之后，吉姆言谈举止粗犷质朴，而她则文质彬彬，言谈慎审。他，宽阔的脸上有一种饱经忧患、老于世故的神色，完全可以扮演一个秘密警察的角色；而她，做事干脆利落，一头浅黄色的头发，煞有介事地一副职业妇女的梳妆打扮，扮演律师，最为合适。

他们俩人在职业上的目标也是不同的。吉姆说他希望在报社得到提拔，并改善他家的生活条件；而她则安于现状，希望通过解决工作和家务之间的矛盾而保持目前的地位。

不过，这两位完全不同的人在价值观上则有些相似，这反映在他们参加普利策奖竞选的作品上。吉姆调查了地铁系统不遵守安全规程，使许多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克莱尔则揭发了瓦茨区创伤中心管理不善，危及病人健康的事例。这两位记者的报道流露出对政府的深刻不信任和对受其害的人民群众的真诚关心。

这些价值观推动着吉姆和克莱尔沿着一条漫长的曲折道路，走到了今天这个普利策奖宣布日。他们在这个大奖的边缘等待着，不知道它会给他们的生活和职业带来什么变化。就克莱尔来说，当她思绪翻滚的时候，又想到作一个妈妈的责任，不让小艾利森拖着冒水的软管走进家门。

山区标准时间下午一时

当吉姆·德怀尔在他家里的计算机上搜寻新闻电讯，而克莱尔·施皮格尔则在电视机上找新闻时，塔马尔·斯蒂贝尔却在新墨西哥州圣菲城她的不大的房间里吃午餐中的填馅炖鱼和未发酵的面包。外面，羽毛似的卷云笼罩天空，使今天成为一个灰蒙蒙的日子。寒风嗖嗖，冷气逼人，冬天在这个海

拔七千英尺的山城持续的时间更长，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上仍然是白雪皑皑。

塔马尔看了看手表，再过 30 分钟，她就得去《阿尔伯克基日报》圣菲办事处上班了。她要休息一会儿。幸而她不知道她已是普利策奖的最终候选人，哥伦比亚大学就要宣布得奖人名单了。

她的编辑蒂姆·科德尔知道她已经在 36 天前举行的秘密评审中被提名为最终候选人。他听到了风声，正象吉姆和克莱尔的编辑得到消息一样。科德尔是《阿尔伯克基日报》圣菲办事处的主任。他的消息来自该报助理编辑罗德·德克尔特，而后者则是从他的上司、助理主编肯特·沃尔兹那里得知此事的。沃尔兹在普利策奖宣布日一周以前从另一家报纸的主编口里听到这个信息，当时他们两人都在华盛顿市参加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年会。沃尔兹说，这位主编（沃尔兹不肯透露他的姓名）没有参加评审工作，但他从另一位参与评审的主编那里听到这个消息。

不过，《阿尔伯克基日报》的编辑们没有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塔马尔。这倒也好，免除了她的情绪七上八下。而吉姆和克莱尔在过去一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了等待普利策奖宣布日而一直忐忑不安。

塔马尔的脑海里此时此刻仍然浮现着她最近在圣菲和阿尔伯克基之间的高速公路上同死神的一次碰头。四天以前，在逾越节的前夕，在一次可怕的车祸中，她的汽车报废，她也险些丧命。

“死神饶了我一条命，”她对同事说，“看看那辆被毁的汽车，谁也不会相信我会活着回来。”

塔马尔不是个信教的人，但她决定今年要过逾越节，所以今天的午餐不吃发酵的面包，只有填馅炖鱼和死面包。犹太人的传统给了她十分需要的安慰。这是一个灾难之年。

如果获得普利策奖，也许会多少减轻塔马尔的苦难。除了此奖有助于职业上的提升外，与之俱来的 3000 美元奖金也是受人欢迎的。塔马尔现在身无分文。她的信用卡上的钱已经用完了。她现在欠债 25,000 美元，大部分是学业深造的贷款。她每周工资 484 美元，靠这点钱是很难维持生计的。

她的工资还不到吉姆和克莱尔在他们报社所挣的一半。虽然这三位记者都已经三十多岁了，但塔马尔还是个新手。她很晚才参加新闻工作。她在纽约度过了自己动荡不安的童年，上学是时续时断，又碰到离婚的不幸，干了多年没有前途的工作，浪迹世界各地，然后才在近年来踏入报界。

象吉姆一样，她也是纽约市人，生于布鲁克林。象吉姆的父母一样，她的父母也是中下层阶级移民。在她的童年时代，父亲拼命工作，才使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提高到——用她的话来说——“中中”水平。不过，她的父母同吉姆的双亲不同，不是爱尔兰天主教徒，而是东欧犹太人。

她称自己是父母的“爱好文艺的女儿”，悠悠荡荡过了许多年，才认真考虑搞个职业。她到报社工作，刚刚是第二年。她供职的《阿尔伯克基日报》

发行额只有 118,000 份,比吉姆的《新闻日报》(发行 700,000 份)或克莱尔的《洛杉矶时报》(1,113,000 份)要少得多。一个通行的原则是:报纸发行量越少,工资越低。

塔马尔是一个初来乍到的记者,只能得到新手的工资,而且该报又不属于那种在给职工定工资标准方面比较慷慨大方的单位。她的经济状况反映在她的住房条件上,连她自己也承认住的地方太狭窄了。它有点象她在大学住过的宿舍;在 8 英尺宽的一间住房兼厨房的房间里,到处堆放着书籍、磁带盒和纸张;由这里通向一间小卧室,由于没有床架,弹簧床垫就放在地板上。但是,就这样一块地方“每月也要 325 美元”,她说。目前,在圣菲很难找空房子。房租不到 600 美元,就算是便宜的了。刚到这个城市时,塔马尔头 4 个月不得不住在盛情好客的同事家里,睡在儿童床上、甚至地板上。在离办公室只有几个街区路程的地方能找到一间小住房,这是她的一大胜利,使她两个大目标之一得以实现。另一个大目标就是摆脱债务。

如果获得普利策奖,她就可以朝着那个目标前进一大步。假如这笔奖金在它设立以来的 80 年中随着通货膨胀而加以调整的话,那么,对象塔马尔这样一些苦苦挣扎着的作家和记者来说,就会更是一笔意外的巨大财富了。1911 年,普利策设立的新闻报道奖金是 1,000 美元。据美国劳工局的统计,按照 1990 年美元价值计算,那相当于 13,290 美元。这样一来,这笔奖金同原先的币值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

而当初使普利策得到启示的诺贝尔奖金几十年来则不断增加。1901 年——颁发诺贝尔奖的第一年,得奖人可以得到 150,800 瑞典克朗,当时约合 40,000 美元,如果按 1990 年美元币值计算,约为 530,000 美元。今天,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可以拿到大约 400 万克朗,约合 70 万美元。

由此可见,从纯金钱的角度讲,获得诺贝尔奖金好象中了彩票一样,而获得普利策奖金只不过象得了一笔意外的、数额不大的公司红利而已。

塔马尔细嚼慢咽地吃着午饭,偶尔看看时间,她这时根本没有想到奖金的事。她一点也不知道今天是普利策奖金日。当然,5 个月前她也得知编辑们把她的一些作品送去参赛——这些报道揭示了一种稀有的血紊乱症和一种普通的食物附加剂氨基丙酸之间的关系。她的上司这么做,她简直受宠若惊。虽然她已经 34 岁了,但她知道她仍是新手,不象吉姆和克莱尔已经当了多年记者。塔马尔从来没有得过什么新闻奖。对她来说,忘掉普利策奖这回事,是很容易的。她知道,她赛不过那些更有经验的记者,得奖总是人家的事。

另外,她还想,象那样的好事不会落在她塔马尔·施皮格尔的头上。那该别人得。

3. 没有提出的问题

纽约时间下午 3:01，在普利策奖预定宣布时间一分钟后，两个强壮结实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仍然拖着几个硬纸板箱，穿过校园，箱子里装着精心排印的新闻材料。

与这两个年轻人同行的是大学公关处办公室主任南希·卡莫迪。洛氏纪念图书馆的生产车间在严格的安全保卫措施下排印了这批材料，卡莫迪在过去 24 小时内监督印刷和装箱工作。她负责最终候选人和得奖人名单的保密工作，她以军人般的严格有效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她每年都训练她手下的工作人员，在处理同普利策奖有关的材料时要绝对保密。任何人未经批准，不能进入生产车间。在向记者宣布得奖人名单以前，生产车间的任何东西——包括废纸——都不能拿出去。只有在她的监督下，才允许这两个大学生运送她的重要材料。

75 包新闻材料，各重 1.5 磅，内有 42 页排印的资料，包括 1990 年普利策奖的 45 名最终候选人名单。其中有一页是新闻报道奖名单，1990 年三位最终候选人是吉姆·德怀尔、克莱尔·施皮格尔和塔马尔·斯蒂贝尔，其中一人是普利策奖获得者，另外两人是亚军。

每包新闻材料中还有吉姆、克莱尔和塔马尔的黑白照片，以及其他得奖的 23 名最终候选人照片。2 月份参赛时，每人就附上照片和简历，以便在宣布名单之日可以立即向新闻界提供这方面的材料。

当卡莫迪和她的两位助手向新闻大厅匆匆走去时，普利策奖负责人罗伯特·克里斯托弗在“世界”大厅把焦急不安的记者们扫了一眼。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现在是下午 3:02。五分钟以前他从办公室走下楼来，身穿合身的灰色礼服，仪表堂堂。现在，他阔步走向大厅的门口，在紧挨着普利策半身雕像前站住，敲敲木桌。

闲聊的声音仍然没有停下来。他又敲敲桌子。

这回大厅安静下来。大家的目光都转向克里斯托弗。他开始讲话。

“再过几分钟，大学公关处的工作人员就会送来宣布 1990 年普利策奖获得者名单的新闻材料。”

他解释说，材料有限，将首先分发给“要发稿的记者”。如果还有剩余，大家可以自己去拿。他说了这些话后，大厅又人声嘈杂起来。

克里斯托弗的助手巴德·克利门特发现忽略了一个小插曲。他走到大厅门口电源板那里，启动了一个开关。许多日光灯一下子照亮了前厅的一件精美雕塑品——巨大的彩色玻璃的自由女神像，它的两侧是地球的两个半球。当普利策的位于花园路的“世界”大厦拆除的时候，这尊彩色塑像被迁移到这座新闻大厅。

把这件彩色玻璃艺术品搬到“世界”大厅，是明智之举，因为自由女神像是普利策最著名的促进报纸销路的手段——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促销

活动吧。不过，今天很少人知道，如果不是由于普利策的努力，美国最著名的自由女神也许永远不会到达美国的海岸。1884年，法国赠给美国的这尊巨大的、尚未组装的塑像装在柳条箱里，任其在巴黎风吹日晒；美国私人机构正想募集资金，以便把它运抵美国，竖立在纽约港，但募捐运动不成功。在美国，对此塑像感兴趣的人不多。他们想象不到它可能产生的影响。但普利策想到了这一点，他聪明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承担运输费用，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只要大笔一挥就行了。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抓过了募捐运动。他利用自己报纸的力量和影响，鼓动大家的爱国热忱，他的成千上万的读者慷慨解囊，从几分钱到250美元不等，终于凑够了所需要的钱。

普利策的募捐活动是非常成功的，借此大力自我宣传了一番，他的《世界报》的发行量大增，而最后的高潮是在1886年举行自由女神像的落成典礼。这的确是一个“世界性”的促销活动。从此以后，普利策绝不让他读者忘记该报在把这位女神请到美国方面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他在该报头版报名旁边印上了地球的两个半球簇拥着的自由女神像，从而使读者每天都想起这件事。这还不够，他又在他的报纸大楼里竖立了这个彩色玻璃塑像，让人们欣赏和羡慕。

在克利门特把日光灯打开以后，记者中间有一些人转过身来，观看这件陈列品。其中的一位女记者显然知道自由女神像同这位已故的出版家之间的关系，她向其他人作讲解。可惜她不知道这位伟人名字的正确发音，竟把他称为飘利策。

然而，谁能责怪她呢？把普利策名字的发音拼错，已成为美国流行方言的一部分。谁要是怀疑这一点，只要看看电影《蝙蝠人》就行了。这部电影打破票房记录，1989年在全世界拥有的观众超过任何其他一部电影。它描写的是一名雄心勃勃的自由投稿的摄影师维基·维尔，她试图说服纽约市一家报纸的记者同她合作，去报道一位蝙蝠似的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人。由萨姆·哈姆和沃伦·斯卡伦写的这部电影剧本包括下面这样一句话，维基·维尔娇滴滴地对这位迟疑不决的记者说：

“我拍照片，你写文字——准是获得普利策奖的材料！”

在电影里，这句台词是由女演员金·贝辛杰说的，成了“飘利策奖”。在这部喜剧电影结束以前，她把这个问题又重复了一次。

下午3:08，“世界”大厅里的人头突然转向门口，南希·卡莫迪走了进来，紧跟着她的是两名自愿服务人员，他们拖着沉重的纸箱。

罗伯特·克里斯托弗又敲了敲桌子。大厅立刻安静下来。他说，大厅里的所有电话可供记者使用，他将呆在这里回答大家的提问。他再没有说什么，只是朝卡莫迪点点头，她便开始散发新闻材料。大厅一下子炸了窝。记者们纷纷向卡莫迪和她的两个助手抢新闻袋，然后奔向电话。那些发稿时限不那么紧或者不太着急的记者则比较耐心地等着分发材料，然后拿着新闻袋

到椅子上或者安静的角落里去仔细阅读。

卡莫迪的上司、哥伦比亚大学公关处处长弗雷德·努贝尔满意地观看这个场面。不错，宣布的时间比原定的计划晚了几分钟，从硬纸板箱里散发新闻袋，多少有点狼狈。努贝尔和蔼可亲，以前也干过新闻这一行，他帮助普利策奖宣布事宜，已有二十五年了。他说，校方对不讲排场、不搞仪式的做法很满意。

“我想大家会说，我们对此有点自豪，”他说。“这个奖不需要那么张扬。”

在校园对面的洛氏纪念图书馆里，努贝尔公关处的工作人员正忙碌地把获奖名单电传给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

在百老汇以南相距八十多个街区的时代广场上，人们正用比较传统的电信方式通知所有的获奖人。西方联合电报公司正给他们发出电报。普利策奖办公室助理克劳迪娅·斯通中午时分到了时代广场，她拿了一摞打印整齐的电报，准备在三时整发出。这个做法，普利策奖管理处已经沿用了几十年，然而今天，斯通却碰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由于某种原因，”她说，“西方联合电报公司拒绝接受这些电文。他们现在只接收发电报人的钱。他们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去询问有关的情况。我提出了抗议，因为我们一向是自己撰写电文，亲自拿到时代广场的。这样，电文中如果出了错，我们就知道这是西方联合电报公司的疏忽，责任不在我们身上。但是，他们对我说，现在不能再这么做了。”

斯通满腔怒气地回到了大学。她拨通了指定的电话，花了几乎一个小时的时间，吃力地向西方联合电报公司的报务员口授得奖通知书。

现在，下午三时刚过，西方联合电报公司正把电报发向几乎全国的所有角落，那里的信使开始把它们传递给报馆编辑室、办公室或得奖人的家里。斯通最担心的事果然出现了：西方联合电报公司的报务员在抄写用电话口授的电文时，果然弄错了一个地方。查尔斯·西米克是诗歌奖得奖人，然而发给他的电报却祝贺他荣获1990年普利策传记奖。

几分钟以后，记者们开始向克里斯托弗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的许多问题暴露了记者是缺乏准备的。

“评审工作是怎么进行的？”一位年轻记者问，他显然没有事先看点背景材料。克里斯托弗满有风度地耐心解释了评审员三月份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这间房子里开会确定新闻奖最终候选人名单的前后经过。他讲述了文学艺术奖评审员是如何通过电话进行商讨的。他继续说，普利策奖金委员会4月份——3天以前，也是在这个房间里——开会，从各类最终候选人（被称为“被提名者”）名单中选出得奖人。

这是一个复杂的、神秘的过程。在克里斯托弗作冗长细致的解释时，这位年轻记者傻瞪着眼。克里斯托弗虽然颇有耐心，却也不免露出腻味的神气。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作这样的解释已经有多少次了。

另一位不大了解情况的记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总共颁发了多少金奖？”克里斯托弗又耐心地解释说，每年只颁发一枚金质奖章，不是奖给个人，而是奖给那些为公众服务有功的报纸。其他各类奖的获得者可以得到3,000美元奖金。他说，1990年金质奖章由《费城问询报》和北卡罗来纳州小报《华盛顿每日新闻》共同获得；前者调查了美国的血液工业，后者揭露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华盛顿市在八年之久的时间内未能发现饮水受到致癌物质的严重污染。

还有一个记者问：“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是不是否决过今年评审员的任何提名？”

克里斯托弗以眼神示意，有这么回事。一位了解内情的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她显然知道，委员会几乎每年都要抛弃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评委提出的最终候选人名单，而把奖金给了别的人。这使评委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他们有时公开地表示强烈抗议，在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给普利策奖造成不良影响。克里斯托弗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所谓委员会“否决”评委的提名，用词欠准确。他说，在今年“一两项新闻奖的提名中有些不当”，但没有任何评委遭到否决。

第二个了解情况的提问是：“这回委员会是否拒绝了某类奖的颁发？”

“没有，”克里斯托弗回答说。他似乎预料到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显然是每年常有的事。他让这位记者看看新闻袋里的材料，那里有一整页列举了哪些年份在哪些类别上委员会曾经决定不颁奖。这页材料表明，最近一次这样的年份是1986年，当时委员会决定不颁发戏剧奖。象那样不颁奖的情况总是引起不良的宣传效果。但今年不会有这样的事。克里斯托弗松了一口气，表明他是内行的。

“今年的某些奖似乎涉及到天灾人祸，”另一位记者说。“你是否也认为这是1990年普利策奖的共同主题？”

“是的，当然是这样，”克里斯托弗回答说。他指出，在今年的1,770项新闻奖提名中，有许多是涉及各种灾害，如：加利福尼亚地震、飓风和“埃克森·瓦尔德兹”号油轮漏油事件。在今年的提名中还有环境保护主题，如：北卡罗来纳州一家报纸关于饮水污染的报道获得金质奖章。

克里斯托弗微笑着。记者的所有问题都类似这样，纯粹是挑刺儿。他轻松愉快，显得很喜欢他的工作。今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往年每到四月份，克里斯托弗几乎总是至少由于一项奖而处于风暴的中心，有些年代简直是象刮台风。

1988年就是这样。当时三项不同的新闻奖引起了摧毁性的批评。《国民新闻报》和《哈泼斯》月刊要求撤销给予《费城问询报》蒂33姆·韦纳的新闻报道奖，因为韦纳关于五角大楼“黑预算”的系列报道所依据的信息和图表都是这两家刊物以前刊登过的。与此同时，一个新闻监督组织——里德·欧文新闻准确性调查所则要求撤回给予《华盛顿邮报》电视记

者汤姆·谢勒斯的新闻奖，因为据说他同他的消息来源有不道德的关系。一些新闻批评家，包括《华盛顿新闻评论》，坚决反对把普利策奖授予《劳伦斯鹰论坛报》，因为《华盛顿新闻评论》认为该报关于威利·霍顿和监狱假期的系列报道是“片面的、不扎实的”。

以克里斯托弗打头阵的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拒绝了关于剥夺头两位有争议者获奖权利的要求，而对最后一名获奖者受到的批评则置之不理。

九十年代看来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开端，因为记者们不断对克里斯托弗提出的问题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事。

“看来，许多获奖者是来自美国西部，”一位记者一面翻阅新闻材料，一面说。“是这样吗？”

“是这样，”克里斯托弗微笑着回答说。他似乎很高兴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今年半数新闻奖为西部各州的报刊所得。我认为，这还是第一次。”

有些记者记下了这段话。不过，有一个记者没有记，他就是苏联《消息报》记者亚历山大·沙利涅夫。他只是从旁观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沙利涅夫特别感兴趣的是美国新闻界对过去一年中共产主义世界剧变的报道，不知道其中是否有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品。另一个超脱的观察家走到他的旁边，问他有何观感。

“是指普利策奖吗？”沙利涅夫反问道，他也扮成“飘利策”。“我认为这是自我祝贺之举。”

这位苏联记者的评语可能有点不客气，但倒是有几分真理。很少有哪家报纸比这种表面的报道更进一步，就普利策奖金的管理提出问题。看来，在涉及到普利策奖金时，在职的记者们似乎有一个盲点。

但有一个明显的例外，那就是《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戴维·肖。肖可能是新闻行业最受人尊敬的、被报纸雇佣的新闻批评家。他在1980年该报发表的他的长篇系列报道中，对普利策奖作了不留情面的调查研究。他的调研成果在补充新的材料后，浓缩为一章，收入他在1985年发表的《新闻界剖析》一书中，其中用统计数字证实了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个抱怨：普利策奖偏向东部报刊。

“这是一个自我完成的循环，”肖写道，“东部成员占主要地位的委员会挑选东部人占主要地位的评审员，后者把东部人占主要地位的奖金候选名单交给东部人占主要地位的委员会，委员会又选定东部人占主要地位的获奖人选。”

由此可见，克里斯托弗的话是大有深意的，他说：1990年第一次有半数新闻奖的获得者是来自西部各州。

肖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发现，他认为，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曾以互相吹捧和玩弄其他政治花招而闻名，但这在三十年前也许确有其事，但现在再也没有此种情况了。他还发现，在得奖人的构成中小报所占的比例要比一般的想象大，委员会的一些决定是“相当快的和直截了当的”，在委员会中占主要地

位的是“新闻界的一些年长的有政治家风度的人士”，主要是反对变革的男性白人，平均年龄为五十六岁。

肖以其关于普利策奖的报道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他当时可能还不知道这一点，但他最重要的透露是，委员会每年至少否决评委的一项建议。他发现，每年都发生这样的事。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成员肯定看到了肖 1985 年著作中的这段话。自那时以来，已经有两年委员会忠于评委的选择。不难看出，肖的报道使委员会谦虚多了。

甚至这位尊敬的肖先生也难免受普利策奖的诱惑。他承认，1985 年他很高兴地发现他是普利策奖的最终候选人，但失望的是，未能成为获奖人。不过，1991 他很高兴终于获得普利策批评奖。

与此同时，象肖这样的有头脑的记者在普利策奖方面仍然可能有一些问题要问。例如，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成员在处理他们之间的个人冲突方面是否有章可循？在讨论自己的报纸获奖问题时，委员会成员要回避。那么，为什么在讨论其对手的问题时不也回避一下呢？委员会成员在为自己的出版公司出版的著作投票时，怎能做到公道呢？这岂不等于照顾一个同委员会成员有经济关系的公司吗？

有些问题把道德同经济掺和在一起：普利策奖的费用远远超过了普利策基金的岁入，是谁为这项活动提供资助的？为什么奖金委员会接受公司的赞助而不公布其名称呢？记者是否应该接受一个来源保密的金钱奖励呢？

普利策的基金是否管理得很好？普利策奖金的实际价值在过去几十年为什么下降？

还有一些问题涉及到信誉：为什么象 F·斯通这样一些出色的记者或者象伦纳德·伯恩斯坦这样一些才华出众的作曲家生前始终没有得过普利策奖呢？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成员对自己承担的任务是否认真负责？这些地位都很高、工作十分繁忙的负责人是否扎扎实实地读了每年被提名为最终候选者的十五本书？他们是否认真地聆听了被提名获音乐奖的冗长的录音带？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多数是既没有写过乐曲，也没有发表过诗歌或戏剧的记者，那么，这个委员会怎么会有资格决定文学艺术奖呢？

为什么委员会坚持要进行秘密讨论，不让别人旁听，也没有委员们投票情况的正式记录呢？

对新闻这个行业来说，这种严守秘密的做法是否适当？因为新闻就是要抓住真实、报道真实的，不仅要报道政府的真实，而且要报道商业、教育、科学、医学、艺术、社会其他一切方面的（公众的和个人的）真实。

记者常常必须英勇地进行斗争，打破秘密的障壁，才能写出获奖的报道。普利策奖竞选的这种神秘性岂不贬低了记者的努力？

甚至设立这种新闻奖和文学奖，究竟有无必要？对它们强调得是否过分了？它们究竟是有益的，还是产生腐化影响？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的《阿罗史密斯》于 1926 年获得普利策奖，但遭到他的拒绝，他说：“所有的奖

金，象所有的头衔一样，都是危险的。”他的这句话也许接近真理的边缘。

哥伦比亚大学“世界”大厅的普利策奖宣布日那一天，记者们没有提出这些问题。

他们或者派他们去报道这个活动的主编们也许根本没有想到这些问题。遗憾的是，他们的盲点，如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秘密做法，正不知不觉地嘲笑着、贬低着吉姆·德怀尔、克莱尔·施皮格尔、塔马尔、斯蒂贝尔这样一些人的成就。这些记者从最初的采访念头，到在纽约的这一天扬名全国，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凡是了解其中甘苦的人，都可以对许多这样的没有提出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这场角逐导致一个准确无误的结论：正象普利策奖使这些记者扬名一样，他们也为普利策奖增光。

4. 吉姆·德怀尔：不要乘 A 列车

8 月份的曼哈顿，天气可能非常炎热，有时热得路面都泡。

在地铁里，人们本来指望那里会象山洞一样，凉爽宜人，然而由于数以百计的空调列车排放的废气，空气反而更加闷热。在战略性的交汇点安装的巨大通风扇每分钟可以给地铁涵洞里送 5 万立方英尺的新鲜空气。但这些通风扇由复杂的电子装置控制，机械经常出毛病。纽约地铁通风扇往往有 25% 在同一时间内停止运转。进入地铁，有时象钻进火炉一样。

1987 年 8 月 1 日就是这样。由于钱伯斯大街正在施工，南来北往的 A 列车运行在同一条轨道，那天下午热得够呛。列车上巨大的排气扇照转不误，而钱伯斯大街地铁塔上的空调设备则不运转了。塔上操作员艾什顿·克拉克后来估计，当他疏忽大意地让两列载满上班、旅游、购物的乘客的 A 列车相向疾驶时，他的操作间的温度大概有 100 度。

这次可怕的地铁事故如果真的发生，那将是举国震惊的惨剧，这不仅是因为它会造成许多人的死亡，而且还因为纽约的 A 列车具有传奇色彩。爵士音乐大师杜克·埃林顿通过摇摆舞歌曲《乘 A 列车吧》而使这条地铁路线名闻遐迩。勃鲁斯爵士乐创作者比利·斯特雷霍恩在 30 年代写了这首曲子，作为对地铁的颂歌，当时地铁是通向哈莱姆的快车。但是，使这首曲子（以及 A 列车）出名，则要归功于埃林顿，他的乐队于 1941 年在好莱坞把它录制下来。《乘 A 列车吧》，成为埃林顿的标志和永恒的主题，而同名的曲子也永远渗入美国人的意识之中。

A 列车在昆士半岛的法尔·罗卡威开始它的 35 英里的行程，它向北越过牙买加湾，经过机场，直抵霍华德海滩，然后向东，直奔布鲁克林，穿过东河底部，到达曼哈顿闹市区的金融区。接着，它又向北，驶向世界贸易中心，经过格林威治村、切尔西、哥伦布圆形广场、中央公园、哥伦比亚大学和哈莱姆，然后在吉姆·德怀尔住地——华盛顿高地到达终点站。

吉姆每天去曼哈顿商业区和住宅区交接处的《纽约新闻日报》上下班，都要乘坐 A 列车。他的妻子卡西上下班，也乘这趟车。她在一家广告公司做非全日制工作，为该公司及其客户编制计算机软件。这对夫妇外出时，常常结伴同行，有时还拖着他们 4 岁的女儿莫拉。

乘坐这条著名的地铁，已经成为德怀尔家庭生活每日不可缺少的内容，所以当他得知 1987 年 8 月那个闷热的下午两点钟以前发生的事故时，大为吃惊。这一对 400 吨的 A 列车由于失误，正相向急驶，在相距不到 200 英尺时才嘎吱停了下来。这场灾祸之所以得以避免，是因为一个列车上的司机看见安全灯变红了。他急忙刹车，疯狂地打无线电话，这时，他死死盯着对面那列发出尖叫声的、紧急刹车的列车的前灯正在逼近。

简直是奇迹，竟安然无恙。但是，吉姆不难想象这场险情。如果出事，那将死伤乘客数十名，他可能是其中之一，他的妻子和女儿也不能幸免。他

自问道，为什么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竟险些发生？

都市交通局很快查明这个事故是人为造成的。责任人是调度塔操作员艾什顿·克拉克。对他的尿进行了化验，排除了饮酒或吸毒的可能性，但他因“渎职”而被暂停工作。

这一切，纽约新闻界都没有立即加以报道。实际上，吉姆也是在这场险情发生一周以后，新闻变成旧闻时，才知道的。他发现这件事，还是因为他改变了他对其专栏的写作态度。

“在早期，”他解释说，“我作为地铁专栏撰稿人并不涉及到写硬性新闻。我有点象是凭印象写作的记者。起初我认为我的工作使我有机会练习写作才能，而不是报道才能。自从我搞新闻这一行以来，我做了大量的非常详细的调查性报道，我认为我的天性乐此不疲。但这项工作室息了我的另一种爱好，即坐在地铁车厢里，听听人们的道听途说，写成有趣的东西。我最初认为地铁专栏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作为专栏作者，连续几个小时坐地铁，慢慢地对交通局的官僚主义作风深有体会，便开始写这方面的问题。

例如，他写了这样一件事：强盗在南布朗克斯街区肆虐时烧了一个地铁站，交通局不是去加以修理，而是干脆关闭。他把此举称为卑鄙的决定。吉姆的专栏报道说，当局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对修复的费用估计得太大了。他指出，这个一度被人遗忘的贫穷街区正在复兴，而交通局的这个决定会使复兴夭折。在吉姆和他的报纸的压力下，交通局的官员同布朗克斯区的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制定了拯救该站的协议。

他还揭露了一件事：都市交通局局长罗伯待·基利每天上下班都是由公家出钱派专车接送，而他还要求把他的15万元年薪进一步提高。（吉姆的专栏建议：基利不要再增加工资，并开始乘坐离他家只有两个街区的列克星顿地铁去上班。）

吉姆还有一篇专栏文章，揭露了交通局官员的谎言：在夏天最热的一天，数千名乘客在一辆受阻的列车上受困达数小时之久，交通局说这是因为一位乘客拉了紧急线。吉姆报道了实情，原来是列车下面的一个电子元件爆炸。他的报道迫使当局承认了真实情况。

在调查这些情况时，吉姆开始研究这个系统的每周报告。

他说：“我发现，这个官僚机构每周搞出100页至150页的报告，讲述列车损坏、事故、险情、违章，从车门卡死到有人在车内放了一只金丝雀，无奇不有。我设法使人们每周向我提供一次所有这些材料，我坐下来仔细翻阅。”

1987年8月中旬，吉姆在翻阅一份标题为《控制列车事故报告》的文件时，发现了那次两辆列车差点儿相撞的事故。此事当然使他不安，对责任的查处也使他不满意。

官方以“渎职”来解释，他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不够，不能说服人。

它拨响了每一个优秀的调查性记者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小警铃。他决心作进一步的深入调查。

当他同交通局的官员接触时，他们坚持“渎职”的结论。交通局总裁戴维·冈恩对吉姆坚决地说，这次险情完全是由调度塔的操作员造成的，他的工作就是按电钮来移动轨道转辙器。吉姆在后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援引了冈恩的下列解释：

“按电钮的动作是重复性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重复不止，是很单调的。这就是我对你说的。我想，这就是‘渎职’的意思。”

但吉姆对这个解释不满意。他决定去同停职的操作员艾什顿·克拉克谈话。

“我找他，花了很长时间，”吉姆回忆说，“我得不到他的电话号码，但我在布朗克斯找到了他的住址。我向那座奇怪的公寓走去，他家里没有人。左右邻居似乎都有点神经质，不肯帮我的忙。我只能把我的名片塞到门缝里。”

克拉克终于到《新闻日报》找了吉姆。但克拉克这个在交通局干了20来年的老职工不想谈这件事。他采取守势，“对我的问题感到有点意外”，吉姆说，“但他极为气忿的是，他竟被停职。我从这里打开缺口，我打心眼里同情他的处境。”

克拉克对那次险情作了另一种解释：疲倦。那天地铁调度塔里热得人没精打彩，克拉克又是上两个班次的第二班，因此昏昏欲睡。吉姆后来在《新闻日报》的专栏中写道：

“下午2点钟的时候，克拉克已经连续工作了14个小时，这时接到另一个调度塔的通知：由于施工的关系，改变过去一直使用的双向调度方式，改为两辆列车同时向住宅区行驶。即住宅区——商业区——住宅区的行车方式改为住宅区——住宅区。”

“但克拉克没有记录下来。他还按以前14个小时的常规发车，他把驶向商业区的列车调到靠近车站的轨道上，而一辆驶向住宅区的列车已经在那里行驶。”

“克拉克把两辆列车调到相向行驶的轨道上……”

吉姆在同这位停职的操作员谈话时，发现克拉克的疲倦不单是他连续工作两个班次的结果。这位工人已连续工作了12天，而这12天中每天都是上两个班次。

吉姆非常吃惊。当克拉克未能按“住宅区——住宅区”的方式调车时，他不是一般的疲劳，而是疲劳得要命，疲劳到危险的程度。而在事故报告中，只字未提这一情况。

吉姆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发现使他自己像400吨重的地铁列车一样同世界上最大的公共交通机构的权力结构相撞。他也不会意识到，这个发现使他成为获得普利策奖的候选人。

“吉姆·德怀尔是在乘坐纽约地铁、站在列车的头一节车厢、看着车前的灯光在黑暗的隧道墙壁上舞动、听着钢轮压在铁轨上的嘎嘎声中长大的……”

《新闻日报》的主编安东尼·马罗在正式提出吉姆的作品参加 1990 年普利策奖竞争的推荐信中这样写道。不过，这封富有文采的信并非出自马罗之手。像许多写给奖金评委的、具有说服力的、并由单位高级负责人签名的推荐信一样，这封信实际上是由下面的职员、《新闻日报》的调查性新闻编辑托姆·柯伦写的。在一般情况下，总是请像柯伦这样的低级人员代写这样的信，因为首长们，委婉地说吧，实在“太忙”了。不过，编辑部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许多职员比首长写得更好一些。旨在引起评委们注意的推荐信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只能由报社的最佳手笔来写。

但由柯伦撰写、以马罗的名义发出的推荐信在介绍其普利策奖候选人时是完全实实在在的。吉姆·德怀尔的确是乘纽约地铁长大的。他出生于曼哈顿，整个童年时代是在东区工人阶级聚居地区度过的。他的父母菲尔·德怀尔和玛丽·莫洛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分别从爱尔兰移居美国的。他来自爱尔兰克里郡肯马尔湾，她来自高尔韦郡奥韦。他们是在爱尔兰舞厅相

遇

43

后结婚的。他们在一座无电梯的公寓的第三层租了一套房间，一直住到今天。他们生了 4 个孩子，全是男的，吉姆生于 1957 年，排行老二。

对吉姆和他的兄弟来说，第 95 街就是他们的运动场。“我们在那里一直玩耍到夜里 11 点钟，足球呀、棒球呀、橡皮球呀、吊球呀，全都是可以在街头玩的，”他说。地铁成了他们到各处畅游的工具，相当于邻区青年的自行车。他们哥儿们乘坐地铁到处游逛，常常是单枪匹马的，很少碰到什么麻烦。60 年代的纽约市和它的地铁是比较安全的。他在地铁只碰到一次被抢的事，那是在 1969 年，当时他在扬基体育场看“扬基式帽日”球赛后回家的途中，12 岁的吉姆被一群大孩子抢走他的崭新扬基式帽和太阳镜。不过，他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未能抢走我的棒球手套，我戴着棒球手套去体育场，是为了接飞球，”他说。

英国作家伯纳德·莱文把吉姆称为“地铁诗人”。他在许多年以后谈到吉姆童年的这个事件时，改变了一些内容。他对吉姆说，英国读者不懂“扬基式帽日”，所以他写成一群恶棍抢走了吉姆的钓鱼竿。新闻写作上的这个破格使吉姆大笑不已。但他后悔不该谈及这个球帽事件。“这算不了什么，”他说，“人家也没有伤害我。许多更坏的事情发生在比我更弱小的人的身上。”

一些在城区同吉姆·德怀尔一起长大的孩子后来遇到了麻烦，而吉姆兄弟则没有。“我的兄弟们和我比一些孩子的处境要好一些，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基本上是白种人，而别的大多数孩子则不是。”

吉姆兄弟还有其他一些优越之处。最主要的是，他们的双亲艰苦奋斗，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要求严格的天主教学校，用吉姆的话来说，就是“为聪明的穷孩子办的学校”。

“我们的初级中学叫凯利阁下学校，在那里，鼓励每个人写作，写作得很多。”

吉姆早期的写作，受他在家阅读的书，特别是报纸的影响。他父母带回家里的出版物没有包括有影响的《纽约时报》。他们买的是小报、工人阶级的报纸——《邮报》，特别是与之竞争的《每日新闻》。

“我们总是尽早地得到《每日新闻》，”吉姆回忆说。“我们的左邻右舍习以为常，总是等着报纸的到来。”

吉姆一家人等这份报纸，完全是为了看新闻和体育消息。而他们的邻居晚上则主要等着看同赌博有关的消息。《每日新闻》晚七点的早报登载有按赌金分享法计算的马赛赌博结果——这是非法的数字赌博的基础。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该报当时每天的发行份数达400万之多，那时还没有国家经营的合法的彩票。

年轻的吉姆读着这些小报，接触了布雷斯林和哈密尔在报上发表的清新的散文。他对所谓第四等级（新闻界的别称）的理想主义概念着迷了。

“我觉得，新闻业在为这个世界做好事，”他说，“自那时以来，我稍微纠正了一些对它的错误观念，但我喜欢它，我对它产生了兴趣。”

后来，吉姆在耶稣会开办的洛约拉中学积极参与创办了一份学生报纸。在那里，他第一次尝到了新闻自由的令人陶醉的滋味。

“那份中学报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第一修正案’的真正纪念碑，”吉姆回忆说。“它从来没有拿到印刷厂去印，而是用油印机印。一位朋友和我当天刻蜡纸，当天油印，把我们要写的东西全都塞进去。”

不知为什么，耶稣会容忍了这种做法。他们显然从这位体格结实的爱尔兰裔美国小伙子身上看到了某种大有希望的好精神，他对出这份报纸充满了兴趣。他们不想给他的热情泼冷水。

才华出众、但经济拮据的吉姆在福德姆大学领取整整四年的奖学金。在那里，他也办了一份校刊，名叫《撞槌》。这回，他可尝到了新闻自由阴暗面的苦丸。他和他的同事多次冒犯校方。福德姆大学的负责人终于查封这份校刊。

“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弄了几百块钱，到下曼哈顿的一家排印所，租用了他们的机器。”吉姆回忆说。“由于我们不再能出版《撞槌》，我们便另出一份报纸，叫作《羔羊》。校方挑不出刺来。我们十分高兴。”

当吉姆从福德姆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开始认真地考虑投身于新闻事业。他的几位抱负不凡的兄弟分别在律师界和工程界谋职，吉姆便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读研究生课程。

“我到哥伦比亚大学后，在纽约各处采访，为新闻学院写稿，这时我才

意识到，我真正找到了我想要做的工作，”吉姆说。“我记得，有许多次，我为校方采访归来，不禁莞尔一笑。我自己也可以感觉到脸上的傻笑。”

“如果你看过爱尔兰的踢踏舞，同一种步法重复几千次，你会看到他们的脚终于运用自如。当他们学会了这种舞，一分钟踢踏几千次时，他们便突然傻笑起来。当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就有一种好象学会了踢踏舞的感觉。我在从事着我喜爱的工作。我现在仍然有那样的感觉。”

“有时，我乘坐地铁到处走走，一篇好的专栏文章便在我口袋里的笔记本上形成了。它使我微笑，使我感到幸福。”

他的话表明，新闻业能够把如此才华横溢的新人吸引到自己的行列里，是多么幸运。美国的吉姆们投身于新闻事业不是为了钱。他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最初参加工作时，每周的工资才 147.50 美元！那是在新泽西州赫德森县的《电讯报》，他 1980 年 6 月 16 日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

这家资金短缺的小报的发行人理查德·维扎在回忆吉姆时说了一些热情的话。

“他立志作一名编辑，专心致志地、顽强地投身于事业和新闻工作。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喜欢学习，愿意勤奋工作，全力以赴。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出，他将成为第一流的记者和作家。”

吉姆和其他 7 位为维扎工作的低薪记者发表了一些令人惊讶的调查性报道。在两年中，该报的揭发使两名市长、一名警察局长、一名教育局长和一位房管局长下台。

“这简直是大砍大杀，”吉姆回忆说。“这全是这家小报在这个风气不正的小城市进行调查性报道的结果。”

维扎说，年轻的吉姆是该报的调查性报道取得成功的主要推动力。他说：

“例如，有一次，吉姆得到一个信息：县职业学校正在从当地的市政委员拥有的一家公司购买一批化学品、地板蜡、岩盐、雪铲等。看来，这是一批已经成交的买卖，但是，我们担心，如果我们去那里，一次只查一笔记录的话，他们会把档案转移出去。所以我们集合了报社的所有记者，星期一上午进行突然袭击。吉姆把他们组织起来，告诉他们查对哪些帐目，记录什么材料，查找哪些公司的名字。”

“他们的确发现那里有花招。这个学校设立了三四家假公司，同当地的那家公司做生意，后者总是按十分高的价格卖给它们一些东西。有一回，据我们计算，它售出的大桶（一桶 55 加仑）氨水的价格比当地氨水汽油公司的瓶装氨水要贵一倍。因此，当地的一些官员受到控告而入狱。”

“吉姆处理了许多这样的报道，揭发了很多事情。”

吉姆很佩服维扎敢于向市政当局开刀。

“维扎走到街上时，每个人都认得他，向他大喊大叫，哄赶他，”吉姆

回忆说。“他照样昂首挺胸地走着。事实上，这份报纸过去是很腐败的。它接受政客官僚的钱。维扎改变了这一切。他基本上是等于搞了一次政变。他首先清除了报社内部的流氓，然后又搞垮了政府中的流氓。他真了不起。”

吉姆初步开展了上述工作的两年后，维扎接管了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的《每日新闻》，吉姆也跟他去了。

虽然吉姆很乐意为维扎工作，但他“在处于新泽西州北部化学污染地区心脏的这个污秽不堪的小城市”只能呆六个月”。他转到新泽西州哈肯萨克的《记录报》，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半，然后他的新闻生涯出现了第一次重大的转机。这来自时代明镜公司的一项决定：纽约长岛的《新闻日报》需要扩展。长岛位于纽约的海岸，深入大西洋中。正如吉姆所说，“如果他们向东走，下一站就是葡萄牙了。”

所以，《新闻日报》向西发展，这意味着要打入昆斯、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美国竞争最激烈的报纸市场。时代明镜公司认识到，要把这个市场啃下来，光靠增办《新闻日报》的纽约版，是不行的。公司决定创办一份全新的报纸，叫作《纽约新闻日报》。这笔巨大的投资，在纽约市增加了250个新闻编辑职务。当这份报纸在1984年创刊问世时，吉姆成为它的编辑人员之一。

吉姆在新泽西新闻战壕里的战斗，使他经受了很好的锻炼，来迎接这份努力成为亦庄亦谐的新小报的任务。他在一段时期内采访了法庭，作了一些调查性报道，还承担了一些一般性的零星任务。

据他的主编唐纳德·福斯特说，这持续了大约两年，在此期间，吉姆表现出了进取精神和出众的才华，《新闻日报》对他非常器重。福斯特在这个落拓不羁的小伙子身上看到了某种特殊的东西——也许就是洛约拉中学的耶稣会在他身上看到的那种东西吧。

“我们的编辑们知道，当吉姆出去采访什么的时候，他是会搞出些名堂的，”福斯特说。“十之八九他是要写出惊人的佳作的。每一段时间他也会有一两篇失败之作，这是每个人都免不了的。但是吉姆的平均成绩是很高的。他精力过人。他不仅是一匹勤劳的马，而且是一匹千里马。”

像吉姆以前的老板理查德·维扎一样，福斯特也认为这个积极肯干的爱尔兰人聪明有趣、快速敏捷，但有点不修边幅，桌子上乱七八糟，汽车破旧肮脏。

“他的桌子乱糟糟的，但头脑却井然有序”，福斯特说。“他是一个出色的文人，有广阔的视野。他的才智出众。像任何优秀的专栏作家一样，他有自己的观点。”

1986年，福斯特决定奖励吉姆，给他压一副重担：把新设立的、一周出三次的地铁专栏交给他。

在局外人看来，写地铁算不上什么奖励。但是在《纽约新闻日报》，这个安排可是个美差。

这个做法是独一无二的。别的报纸都没有这样做。

这是有远见卓识的栏目，这份新生的小报正大力经营它。

对纽约众多的读者来说，它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乘坐地铁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

这个专栏对老板尤为重要，因为福斯特也乘坐地铁。这个专栏是他设计的。这个主意仿佛是《新闻日报》母报雇佣他，灵感一动蹦出来的。他是 1985 年挑起《纽约新闻日报》的担子的。在此之前，他先后在波士顿和洛杉矶挽救过几家日报。《新闻日报》社正需要象福斯特这样机灵、有创造性、坚决、习惯于在竞争的环境中工作的人来在曼哈顿创办一份新报。

福斯特还有一个优点；他是纽约人，对这个城市有一种本能的敏感。所以，他提出像地铁专栏这样新颖的设想，是很自然的。

“这个设想在纽约行得通，因为地铁是这个五花八门的城市的真正公分母，”他说。“在纽约，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像地铁那样触及每个人的利益。”

福斯特把这个专栏交给另一个也是在纽约土生土长的、跟他具有同样观点的人，是符合逻辑的。吉姆不需再加考虑。这正是他在第 95 街玩橡皮球以来梦寐以求的工作。

1986 年 6 月，吉姆的妻子卡西为他生了一个女儿的三个月之后，他走马上任。他很难相信他会走好运。现在他已 29 岁，当上了爸爸，又有了一份儿颇有发展前途的好差事，地位有所提升，但他仍坐地铁，不过是由报社付钱的。

在吉姆就任新职的一年半后，他就 A 列车几乎相撞的事件写了一篇专栏文章。五个月以后，他就另一次同疲劳有关事故写了第二篇专栏文章，这次事故是：一辆价值 110 万美元的新车厢，在它投入使用的第一天就被撞坏。“两个司机开着工作列车撞到新车厢的侧面，像开罐头一样把这个新车厢劈开了，”吉姆回忆说。“他们已连续工作了 14 个小时，其中一人前天也工作了 14 个小时。”

吉姆说，发生这两次事故的工人都是被交通局命令做双班工作，他们欣然同意，因为可以领到丰厚的加班工资。两个工人承认，他们尽量多工作一些小时，因为他们退休的日子临近了，退休金是根据他们最后几年的收入来计算的。

“这些人一年赚 5 万美元，对此，我并不生气，”吉姆说。“在纽约靠这些钱生活，不算多。许多交通工人住公房，因为他们只挣 3 万美元或 3.5 万美元。靠这点钱，在别的地方可以过上不错的日子，但在纽约却不足以搞到一套房子。这些人基本上是勤奋工作的，他们对这项需要极其注意安全问题的工作投入了许多时间，也许投入的时间太多了。”

这是吉姆在 1988 年 2 月份写的。“这个专栏是关系重大的，我知道这一点，”他说。“然而，编辑们对我说，我并不得。这刺痛了我。”

福斯特和其他编辑们对吉姆说，他的专栏提出的问题多，而解决的问题少。这两次同疲劳有关的事件究竟是孤立的问题呢，还是某种制度造成的呢？在地铁工人中，加班加点和双班工作的情况如何？是否违反了某种安全法？

“我认识到，我的专栏写得很差，报道缺乏深度。我感到很糟糕，”吉姆回忆说。“我下决心要把专栏办得尽可能好一些。”

要了解吉姆企图要做的事，那就需要对纽约地铁系统的规模有一个概念。纽约的地铁，庞大得惊人。每天的乘客多达 350 万人，超过美国所有其他公共交通系统的乘客总人数。纽约地铁拥有 5 万多人的职工队伍。他们的工作连轴转，每天出车 6,800 趟，单单是高峰时间就有 550 趟。纽约地铁有 26 条路线，每条路线的本身就是庞然大物。单单是 A 列车线每天就有 300 趟车，运载乘客达 20 万人。

从交通局获得这些关于乘客人数的基本数字，是颇费周折的。就拿打电话来说，从一个部门踢到另一个部门，最后碰到了交通局公共信息处的一位粗暴无礼的接待人员。她拒绝提供任何统计数字，要求打电话的人首先说明要这些数字干什么。起初，她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后来只说叫“梅尔维娜”。她断然拒绝让她的上级来接电话。她蛮横地命令打电话的人再次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接着，她叹了一口气，说声“稍等”，无礼地让打电话的人白白等了几分钟，最终挂了电话。

交通局不像有的政府部门那样愿意提供关于本单位的情况。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公仆”，吉姆不得不与之打交道，来调查地铁的安全问题。他调查的不是像线路和乘客人数这样一些简单的事实，而是要查阅领取工资的职工档案，包括他们的工时卡，并拿这些材料与事故报告作一比较，因为后者始终没有谈到工人的工时问题以及在地铁的事故中疲劳是否是一个因素。

吉姆知道，工资名单是公开档案，他以及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有权查阅。但他同官僚机构打交道也有经验了，所以后来发生的事，并没有使他感到意外。交通局的官员看过了吉姆就地铁工人的疲劳问题写的专栏文章。他们知道他要搜集什么材料。他们不仅不让他查阅工资和工时档案，而且也不让他再看他以前一直可以翻阅的事故报告。

吉姆作出的反应是，根据联邦新闻自由法提出正式要求。于是，展开了一场斗争。

如果一个官僚机构硬是顽固不化的话，那么，围绕公开档案展开的法律之争可能是旷日持久的。有时，那种手法还真有效。傲慢的政府官员软磨硬顶，是不会有损失的。在许多情况下，不把那些可能使人尴尬的材料公之于众，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同新闻单位合作，不会引起公众的不良反应，因为美国人像不信任政府那样，不信任新闻界。如果把官司打到法院那里，官员们请律师，是花公家的钱，而不是自己的钱。

而报纸发行人则要花自己的钱来打这种长期不决的官司。有些发行人舍

不得花这份儿钱，可能决心不大而退让或者妥协了事。有时，政府机构的手法可能奏效，因为要求调阅公开档案的记者缺乏必要的顽强精神，对他们的发行人也不那么有信心。

《新闻日报》或者吉姆，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光看这份报纸的表面，可能使人产生错觉。它是一份小报，头版往往也充斥着耸人听闻的和庸俗的消息，像街头叫卖的其他小报一样。然而在其他版面上，《新闻日报》则是严肃的，它曾三次获得普利策为公众服务金质奖章（1954年、1970年和1974年）。其他报纸很少有如此的光荣记录。纽约其他小报从来没有得过金质奖章。

纽约的职工把在长岛纳索县出版的最早的《新闻日报》称作母亲《新闻日报》，它已有50年发挥新闻工作者的战斗精神、不屈不挠地进行调查性报道的丰富多彩的传统，包括最近在纽约市街头进行的发行之战。《新闻日报》为公开档案而进行斗争，已经习以为常。像所有优秀的报纸一样，它是不会在政府机构的顽固态度面前妥协的。作为一项原则，公开档案非阅读不行，即使花多少钱和时间，也在所不惜；即便是当得到这种资料时，它已无用，也得干到底。如果一个新闻单位不这么干，那只会鼓励官员们下次仍然拒绝提供公开档案。

这个公司才办了六年的《纽约新闻日报》象母亲《新闻日报》一样，也坚持这种战斗性和原则。它们加在一起的发行量已超过70万份，从而使《新闻日报》成为美国的第八大报纸。不像其他一些耸人听闻的内容较多的小报，《新闻日报》总的来说，经济实力是雄厚的。新办的纽约版据说仍然亏损，但看来那种情况是会改变的，而曼哈顿的其他小报则正在为生存而斗争。《纽约新闻日报》很快就成为纽约市新闻界的一支巨大力量，所以人们认为，交通局的官员由于不了解《新闻日报》的传统，可能对它作了错误的判断。更可能的是，交通局的官员低估了吉姆的力量。这就是他的妻子卡西的看法。她说：

“吉姆为人，不拘小节，大大咧咧。他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我觉得，这可能使人产生误解。例如，他的桌子总是杂乱无章。但是他完成的工作量是惊人的。他干什么事，总是全力以赴。”

交通局对吉姆调阅材料的要求，没有断然拒绝，否则，会马上打官司，交通局肯定是要输的。它采取了拖延战术。官员对吉姆说，“正在考虑”他的要求。但是，一周一周，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杳无音信。现在，吉姆看得很清楚，交通局是指望他慢慢丧失这方面的兴趣或者被调作其他新闻工作。有时，随着时间的消逝，像这样的问题可能不了了之。

然而，吉姆却不断提出他的要求。对方置之不理。他失望之余，想起了律师罗伯特·弗里曼。吉姆在哥伦比亚大学上新闻课时，他讲过公开档案方面的法律问题。弗里曼曾担任过纽约新闻自由委员会的常务董事。吉姆给他打了电话。

“此君非常之好，”吉姆说，“这位律师大力支持政府的公开性。应该给他颁发普利策奖。他是美国信息公开的最大支持者。”

根据弗里曼的建议，吉姆控告说，对他的要求迟迟不作答复，已超过一年之久，乃是“事实上的拒绝”。不幸的是，根据纽约州的档案法，这种控告不应向中立的机构提出，而应直接诉诸拒交档案的机构的首长。所以吉姆不得不向交通局局长罗伯特·基利投诉。吉姆在他的专栏文章中曾经挖苦过这位大人物，说他习惯于坐司机开的专车上班，而不乘地铁。

吉姆的投诉是天衣无缝的，因为它是根据弗里曼这位“天使长”的周密建议写成的。

“在所有这些法律步骤中，我一直得到他的建议和指导，他告诉我有哪些先例，可供我援引。我们是据理力争，为打官司奠定了基础。”

吉姆和他的报纸还没有上法院，1988年底档案就交给了他。

但是，有些东西不对头。

“在对我的要求采取拖延做法的时候，交通局的官员们改变了填写事故报告的程序。他们删去了真实姓名，把列车乘务员说成‘售票员A’和‘司机B’，所以我无法核对他们的时间记录。”

吉姆又投诉说，根据法律，不能从档案中删去姓名。交通局的官员回答说，事故报告尚未“定稿”，州档案法只适用于最后定稿的报告。

“吉姆再次投诉说，报告基本上已是定稿，只等董事会的例行批准了。他抱怨说，董事会之所以迟迟不予批准，就是为了给删去工人姓名提供根据。”

与此同时，都市交通局董事会通过了该局1989年的立法议程。在董事会想要在奥尔巴尼实行的法案中就包括这样一项：在事故报告中删去交通职工的姓名。

“这令人震惊，糟糕极了，”吉姆说。

吉姆是常胜将军，不习惯于任何失败，卡西说。他总是有所成就，超过别人对他的预料。这就是她1981年与之结婚的吉姆。他们经过了5年的交往，才结合在一起。他们在福德姆大学上学的时候，常去哈里活动中心这个专供大学生社交活动的场地。他们在那里经一位共同的朋友介绍而相识。她是长岛姑娘，比较严肃，学习音乐和计算机。而他则完全相反，性格外向，是在街头长大的孩子，他玩起来不要命，学习起来则很专心。

1988年年底，她发现吉姆心事重重。当时吉姆同交通局的公开档案之争处于上法院的边缘。如果是那样，那就会进一步拖延他所需要的材料。但是，在弗里曼和编辑们的建议下，他决定先警告一下交通局，他手中“握有核弹”。

“我对交通局的官员说，如果他们不交出档案，我就要在头版报道，他们不愿说出是哪个司机开着列车差点儿同另一辆列车相撞。结果他们交出了档案。”

在这场斗争斗了 16 个月之后，突然结束了。吉姆要看什么东西，他们就给什么东西。但是，许多时间白白浪费了，他必须要求看一些在此期间积累起来的新的事故报告和工资档案。到 1989 年 2 月底，他的这些要求也都被应允。

2 月份的最后一周，吉姆正在仔细阅读这些新材料，这时，该报星期日版编辑巴巴拉·斯特劳奇走来对他说，竞争对手《邮报》3 月 5 日要开始出新的星期日版，《纽约新闻日报》的编辑们希望在那一天拿出“绝招儿”压倒对方。

“你口袋里有什么东西吗？”她问他。

吉姆在编辑部久已闻名，他几乎总有写不完的好东西。他对她讲了地铁事故报道，他认为原因是工人太疲劳了。

“赶得上 3 月 5 日的版面吗？”她问道。

他咽了一口气。他斗争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得到这些档案，现在他刚刚开始进行分析，便要他在一周之内写出来。根据常识，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他却回答说：“可以。”

“那你就写吧，”她说。

在以后的 7 天中，吉姆干劲冲天，连习惯于他的工作狂的妻子都感到惊讶。卡西那时又怀孕，丈夫担心她又小产，她觉得这个写作任务也许可以帮助他分心。当然，另一方面，他这么拚命地写，也可能是发泄他一年半以来为得到地铁材料而郁积的一肚子怨气。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他“像着了魔似的投入写作，”卡西回忆说。

吉姆研究档案材料，找人谈，马不停蹄地写作，他几乎不大睡觉，打个盹，解解乏，便接着干。他写的不是一篇报道，而是系列报道，3 月 5 日星期天开始在《纽约新闻日报》发表，连续登载了 3 天。他用公开档案为自己的结论提供根据，他就纽约地铁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为了安全起见，地铁工人是不准吸毒和饮酒的，然而在这里工作的工人每周工时通常长达 80 个小时，当局用高工资刺激人们超时工作，过度的疲劳使人昏昏沉沉，其后果与酗酒无异。”

他的系列报道有根有据地逐一分析了地铁撞车、脱轨以及其他险情，这些都是由于工人疲倦造成的。他们在安全问题极其重要的岗位上工作的时间太长了。他列举了 5 名列车操作员，他们全都年逾半百，通过平均每周加班加点 38 个小时，每人每年可挣 7 万美元。他列举了 5 名列车员，每人每周平均加班加点 29 个小时。他算了一笔细帐，由于工人疲劳而造成的地铁事故，使公共财产受到的损失数以百万美元计。所有这些事故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倒是个奇迹。不过，这个系列报道清楚地表明，过度的疲劳是要造成灾祸的。

不管是工人，还是经理部门，都没有对这种危险的情况发出警告，因为这对双方都有利。

“双方都很乐意这么做，”吉姆说。“工人，特别是老工人，拚命干活，多赚点养老金。年轻的工人则有点勉强。从经理部门的观点来看，雇一个人，给点加班费，比雇两个人，给福利金，要便宜。在这样的安全问题极为重要的工作岗位上，交通局实际上是减少了人手。”

吉姆援引了一位退休司机欧内斯特·赖特的话，他对这组系列报道作了恰当的总结：

“在地铁问题上我有点发言权，将来会出大乱子。我唯一希望的是，我不会牵连进去，我所认识的人也不会卷进去丧命。”

人们对这组系列报道迅速作出了适度的反应。都市交通局的总监进行的调查证实了系列报道的真实性。纽约市议会交通委员会主席制定了一项法案，对安全至关重要的地铁工人的工时作了规定。

后来，在党派政治斗争中这项法案搁置起来，未能获得通过，这使吉姆大为懊丧。但是在一段时间内，这位地铁诗人情绪高昂，喜气洋洋。卡西怀孕，使这对年轻夫妇充满了希望，此外，他们高兴地刚在华盛顿高地购得一套住房，第一次拥有自己的住所。

吉姆前途无量。他的同事、编辑和读者都称赞他工作出色。《新闻日报》大力宣传他的专栏，在地铁列车和车站的招贴画上、在全市各地的广告栏和公共汽车站上，到处都贴有他的照片。他被拍成了《新闻日报》系列广告电视。他很快发现自己在纽约市其他报纸（包括有影响的《纽约时报》）的主编们举行的鸡尾酒会和午宴上被拉拢。他自己的报社向他提出了薪俸优厚的聘请合同，并答应在不久的将来为他开辟一个新的、内容更广泛的专栏。

这一切使吉姆眼花缭乱。他接受了《新闻日报》的合同。这位诞生于看门人之家的32岁的年轻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已时来运转。

5月份，在他的系列报道发表还不到10周的时候，吉姆才知道，他的好运气是多么脆弱。

卡西第三次流产，他们失去了尚未诞生的孩子。

5 . 普利策奖的创建者

约瑟夫·普利策肯定是会赞赏吉姆·德怀尔和他给《纽约新闻日报》写的报道的。揭露地铁问题的报道正是普利策所主张的那种有力的写作和讨伐性新闻，而吉姆正是他最称赞的那种具有顽强精神的记者。

“我相信自我奋斗的人，”普利策在设立奖金的遗嘱中写道。吉姆符合这个条件，普利策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这个条件。他是 1864 年乘坐一艘挤满了处境绝望的欧洲难民的肮脏轮船来到美国的。刚到时，他不大会讲英语，身无分文，在他新选择的这个国土上举目无亲，也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但是，在 7 年之内他出版了自己的报纸，走上变为巨富的道路。

他是自我奋斗出来的人吗？按照常规的定义来说，是这样。但是，坦率地研究一下普利策在美国早期的情况，就可以看出，他不完全符合从一个穷移民变为大富翁的罗曼蒂克的英雄形象。

普利策并非从零开始。他来到新大陆时拥有一些值得其他大多数移民羡慕的优势。

普利策 1847 年 4 月 10 日诞生于匈牙利。他在布达佩斯的富裕的贵族特权环境中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个生意兴隆的马扎尔—犹太裔粮食商；母亲是奥地利日尔曼人，笃信天主教，她把普利策的弟弟艾伯特培养为传教士。

普利策年轻时代经历的艰辛完全是他自己大胆冒险的结果。他在布达佩斯学费最昂贵的学校读书，并且接受了家庭教师的广泛教导。他会讲完美无瑕的德语和法语。童年时代，他就开始培养对欧洲文学艺术和音乐的兴趣。知识分子的业余爱好，他样样精通，比如，棋艺就不止一次使他在美国大出风头。

普利策十来岁的时候，父亲逝世，母亲改嫁。他看不起新来的继父，所以他 17 岁时便离家出走。他试图参加奥地利军队、在墨西哥的法国外籍军团和在印度的英国军队，但都没有成功，每次都遭到拒绝，原因是：他的视力不好，身体孱弱和年纪太轻。但他下决心当兵。他发现，美国正在法国招兵，凡是在美国内战中愿意为联邦军打仗的人都可参加。所以普利策到汉堡报了名，很快就乘坐轮船，前往马萨诸塞。

抵达波士顿时，普利策采取了一个同他自己的道德标准相反的行动。他是免费乘船到美国的，而且征兵人员还给了他一笔奖金。但他决定把这笔钱用于自己。他趁夜色，跳进波士顿港的水中，游泳到岸边，登上去纽约的火车，参加了林肯的骑兵，把那笔入伍奖金塞进了自己的腰包。

普利策传记的主要撰写人把这个情节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用它说明他年轻时多么勇敢。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个跳船事件表明普利策在他一生中如何将如何行动。他给别人定下了非常高的道德标准，但当涉及他个人的利益时，他会毫不犹豫地置道德标准于不顾。

普利策没有参加任何战斗，就度过了内战的最后几个月。他碰到的一次

最危险的事件是：他打了一名低级军官，因为他挖苦普利策的鼻子，说了一些侮辱犹太人的话。一位上尉军官搭救了他，使他免受严惩。这位军官欣赏这个脾气暴躁的小伙子的棋艺，他正需要这样一个好对手。

内战结束，普利策到处漂泊，寻找职业，最后定居于圣路易斯。当时该市是美国第四大城市，那里有很多日尔曼人。他做了几个月的各种杂活，还在骡马店干了一阵子。他花了许多时间在公共图书馆学习法律和英语。在那里，他成了两个圣路易斯人喜爱的棋伴儿。这两人是德语报纸《西部邮报》的老板。21岁的普利策的惊人的智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终于让他当该报的记者。

普利策由于他的棋艺，在这个“机会之邦”得到了第一个大好机遇，没有多久就开花结果了。他通常工作16个小时，很快就显示出他是一个精力异常充沛、有毅力的实干家。不久，这两位欣喜若狂的发行人就让普利策当了杰斐逊城的首席记者。

在那里，普利策干了两件引人注目的事。他当选为密苏里议会议员；他开枪打了人。

当时，担任公职和当记者是可以兼容的，并没有被认为是互相冲突的职业。普利策以同样的干劲，既当好共和党议员，又做好首席记者工作。他经常在议会的演说中和在《邮报》的报道里谴责贪污腐化和弄虚作假的行为。后来，他跳槽，成为正式的民主党人。

有一次，他同一个贪污腐化的承包商爱德华·奥古斯丁干起仗来。此君乃是一个彪形大汉，他在杰斐逊市旅馆的走廊里碰到了普利策，破口大骂他是“该死的骗子”。普利策气得满脸通红，二话没说，就冲出旅馆，去几个街区以外的他的公寓房间，带了一支四管手枪回来，见了奥古斯丁，也骂他“骗子”。奥古斯丁骂普利策“狗杂种”，便向他冲去。普利策掏出手枪，打了两枪，一发子弹射向别处，另一发子弹击中奥古斯丁的小腿。

普利策在《邮报》上谈及这个事件时，对开枪一事含糊其词，反而极力说奥古斯丁挥动着枪支。事实上，奥古斯丁手无寸铁。普利策显然犯了严重的人身伤害罪。但由于有势力的朋友的帮助，普利策最终只以扰乱治安的罪名罚款一百美元了事。

自那次违法事件以后，普利策再没有开枪打过人，但他那暴躁的脾气则终其生而未改。与他共事的人从来不必猜想普利策是否生气。因为他通常总是面带怒容：两颊绯红，一双蓝眼睛射出凶狠的目光，他的六英尺二的瘦削身躯绷得很紧，前额上的青筋跳动着，干瘦的下巴微微发抖（他30岁以后下巴就长满了胡子）。他随时会破口大骂。至少有一位历史学家认为，普利策可能患有托氏并发症——这种神经官能症的部分征兆就是无法控制地口出秽语。

1872年，即普利策从事新闻工作的第四年，他发财的路程开始了。经济拮据的《邮报》老板们认为这个年轻人已经成为该报不可缺少的人物，所以

他们让他入股。他究竟出了多少钱，这些钱是从哪里弄来的，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为他立传的人们认为，他可能是赊股。但似乎也可能是他从欧洲他富有的家庭弄到了一笔钱。如果考虑到《邮报》老板们急需现金，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他们让普利策入股，这也许是他们的主要动机。

不管是什么原因，也不管通过什么方法，反正普利策 25 岁的时候，已经成为美国一家报纸的发行人了。他很快使该报起死回生，牺牲了一点儿尊严，用耸人听闻的新闻捞了不少钱，一年之内就把大部分股权重新卖给原发行人，获得了 3 万美元。

普利策精明地、大刀阔斧地用这笔意外之财去赚取更大的财富。他先是用几千美元购买了圣路易斯另一家苦苦挣扎的德语报纸《国家报》，该报的老板估计他会继续经营下去。然而他只办了一天，就把十分珍贵的美联社经营权卖给了《圣路易斯环球报》，对售价有各种不同的估计，从 2.7 万美元到 4 万美元不等。接着，他又把该报的机器卖给了一个开办另一家德语报纸的集团，这份报纸开办不久就停办了。普利策拍卖《国家报》，转手之间便获暴利。他对该报职工或该市的德国移民却没有做任何好事。但他自己当然大发横财，如果他愿意退休的话，足够他享用终生。

他把钱投入多种非报纸行业的事业中去获取利润。他脱离出版业 5 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到世界各地旅游，研究法律，后来获准进入华盛顿市的律师界。

有一次他访问华盛顿，同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的一个远方亲戚凯特·戴维斯相遇。他们俩 1878 年在华盛顿英国国教教堂举行了结婚仪式。普利策去教堂，有案可查的只有这一次。此外，他儿子拉尔夫在弗蒙特的舍尔伯恩教堂举行婚礼时，他去过一次。再就是他自己的葬礼是在纽约的托马斯教堂举行的。即使普利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至少也是不信宗教的。他不许任何人当着他的面谈论宗教。直到他同凯特结婚以后，他才告诉她：他的部分血统是犹太人。普利策传的作者斯旺伯格写道，“在戴维斯家族这样狭隘的、重视社会门第的家人的眼中，犹太人实际上是不可能有任何地位的。”斯旺伯格认为，普利策之所以把他的家世对凯特保密，“无疑是害怕他会立即遭到拒绝。”

后来，当她知道这些情况后，“她深感不安，”不过，她倒也接受了丈夫的血统。据斯旺伯格说，“然而，反犹情绪毕竟是一个因素，他们俩不得不为此终生伤脑筋。”

这对新婚夫妇到欧洲度了 10 周的蜜月后，在圣路易斯定居下来。普利策开始考虑，究竟是开始律师的新职业呢，还是重操新闻旧业。

1878 年年底，他立即下了决心。他获悉，《圣路易斯电讯报》这家奄奄一息的晚报面临破产和强制出售的局面。普利策派了一名密使去拍卖现场。这位秘密代理人是圣路易斯的任何人都认不出来的。他只花了 2500 美元便买下了这家濒临破产的报纸。而普利策则在大厅的后面饶有趣味地观看着这

笔交易。他本来没有必要采取这种鬼鬼祟祟的做法，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一生是如何喜欢秘密行动。

在他把《电讯报》弄到手之后不久，另一家日子不好过的英语日报——温文尔雅的《圣路易斯邮报》的发行人认为兼并是一条生存之路，便向普利策提出这个想法，后者表示接受。

普利策成为这两家报纸合并而成的《圣路易斯邮报》的联合发行人，但他很快就占了主导地位，排挤了他的合伙人约翰·狄龙。他独揽大权之后，以同样的手法对付他的竞争对手。他由于迅速扩大了报纸的销路而取得成功。他的手段就是登载耸人听闻的新闻和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他发现，这两种做法可以增加报纸的销路。普利策的本性擅长于这两种手法，特别是揭露社会阴暗面。此人天生是个空想家和改革家。他是个情不自禁的批评家。如果他不选择新闻，而选择法律或政治的话，他仍然会为社会改革而奋斗。在他领导报纸的第一年，他先后鞭挞了煤气公司的欺诈行为、彩票的骚乱、运马车的垄断和保险公司的欺骗。

对这位年轻的发行人来说，鞭挞丑恶现象是一种多么令人惊奇的发现啊！他很快懂得了，通过使《邮报》成为反对特权、维护民众利益的舆论工具，他就可以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同时，促进自己的利益。

报纸讨伐丑恶现象，并非普利策的发明创造，但他使之趋于完善。当时的任何主编都比不上他对问题理解的深度，也比不上他揭发问题时的那股劲头，尽管这带有很大的风险性。

关于耸人听闻的新闻，也是这样。采取这种有争议的做法，他并非第一人，但是他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当时任何其他报纸都没有普利策的胆量。例如，一个著名的商人在旅馆的房间里死在情妇的身旁，《邮报》详细报道了这桩见不得人的桃色新闻，它用的大标题是：《一位名人丧命于姘头的怀抱》。

有时，普利策把耸人听闻和鞭挞丑恶两种手法结合起来。例如，他曾搞了这样一条轰动一时的新闻，他从大陪审团的报告中搜集材料，列举了圣路易斯的许多富翁把他们的房子供嫖娼之用。

有些人把这称之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新闻报道，但是读者却趋之若鹜。普利策为自己辩解说，他是先钓住读者，然后再进行教育。此外，他象成千上万的读者一样，也喜欢有滋有味的报道。有时，他为了搞出惊人的新闻，竟不惜夸大和捏造新闻。例如，他的报纸曾发表一条假消息，说阿富汗发生了革命，目的是引《星报》上钩，因为这家与它竞争的报纸经常偷它的消息。果然如此，第二天《星报》也发表了一条这样的假消息。普利策乘机在《邮报》上揭露了《星报》的偷窃行为。

那个时代人们习惯于道听途说，言不及义，因此，普利策早期夸张、甚至伪造新闻的做法可能显得有趣，甚至有点幽默感。但是，若干年以后，当他已经成为全国性的舆论制造者以后，他的这些错误的新闻手法则把全国推

入了一场不光彩的新闻战。

在圣路易斯，普利策式的新闻树敌太多，以至他感到必须随身携带一支手枪。不过，他的做法确实吸引了读者，两年之间，《邮报》的发行额便从2,000份增加到近9,000份。除了读者之外，还有广告。到1880年，普利策夫妇便成了圣路易斯的富户之一。他们建造了三层楼的宅第，雇了一些佣人，还购置了一辆豪华的马车。他们的第二个（他们共有子女七人）、最有前途的女儿露西尔出生了。这对夫妇象初来乍到的重要人物一样，经常出入于圣路易斯的社交场合。

在这样幸福的日子，他们是无法知道：普利策绷得很紧的弦正在损害他的健康；他们的两个孩子，包括露西尔，将夭折；即将到来的事业上的灾难将破坏他们在圣路易斯的好日子。

到1882年，《邮报》的发行量超过22,000份。普利策几乎完全控制了该市的报刊市场。该报在4年之间取得这样的成绩，堪称报业的奇迹，但这并非普利策一人之功。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他千方百计地聘请他能够找到的最能干的人，付之以高薪，使其死心塌地为他卖命。出于这个战略，普利策到全国各地物色最好的编辑，终于找到了约翰·科克里尔。此君34岁，乃《巴尔的摩日报》的主编，干事泼辣，咄咄逼人。

普利策把同他具有相同观点的科克里尔拉拢到圣路易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英明之举。科克里尔是一位出色的编辑人才，对于如何办好《邮报》，完全同意发行人的看法。他们同心协力，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很快就吸引了更多的读者，与此同时，也得罪了不少人。

1882年年底，科克里尔在一篇社论中，对律师兼政客的阿朗索·斯莱巴克进行了攻击，得罪了他，此人火性子脾气，冲进科克里尔的办公室，对他威胁恫吓。这位主编从抽屉掏出手枪，把他打死了。当警察来到时，他们发现死者手中有一支枪。人们怀疑，枪是在警察来到之前塞到死人手中的。真相如何，不得而知。斯莱巴克遭枪杀一事引起轩然大波，轰动全国。正在休假的普利策不得不中途而返，回到圣路易斯为科克里尔撑腰。

虽然斯莱巴克和他的妻子是普利策社交对象的一部分，甚至是他家中的座上客，但普利策为他的主编大力辩护。在7个星期中普利策多方游说，并写社论辩护，大陪审团终于说，当斯莱巴克闯入科克里尔的办公室时，他带有武器，因而没有对科克里尔提出起诉。

然而公众对此案忿忿不平，情绪继续高涨。对立的报纸仍然猛攻《邮报》。与此同时，斯莱巴克的遗孀告发了科克里尔。圣路易斯社会各界纷纷指责普利策一家子。《邮报》的订户和广告客户突然大幅度减少。普利策懊恼之余，感到别无他法，只好把科克里尔解雇。他对科克里尔保证说，以后将设法弥补。

可是，该报的发行量继续下降，普利策的社会地位也日益低落。普利策夫妇意识到，他们在圣路易斯不再受欢迎了。这件事给普利策的压力太大

了。他的身体本来就on不好，现在健康情况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劝告下，这对夫妇计划到欧洲旅游休息六个月。

旅途中，他们在纽约逗留。在同其他报刊的发行人交谈中，普利策偶尔听到一个传闻，使他的旅游计划搁置起来：金融家杰伊·古尔德正在考虑把他的一份赔钱的小报《纽约世界报》卖出去。普利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大好机遇。纽约的报纸似乎已经多得不得了：有些赚钱，如《先驱报》、《纽约时报》、《太阳报》和《论坛报》；有些赔钱，如《世界报》；有些凑合着过日子，如《晨报》。《晨报》乃普利策的弟弟艾伯特所办，他没有去当传教士，却效法乃兄投身报业。

虽然报纸很多，竞争激烈，但普利策敏锐地注意到，它们大多数是共和党色彩的或者是无党无派的，还没有一家象他的《邮报》那样强有力的民主党报纸。他这样盘算道：既然他的编辑方针能够在圣路易斯赚钱，那么，它也应当使他在纽约发财。

普利策同古尔德晤谈后，商定以 360,000 美元买下《纽约世界报》。对一家名声不大、设备陈旧、发行量只有 15,000 份的报纸，这个数字相当可观的了。在达成协议后，普利策又认真考虑了一番，决定打退堂鼓。凯特嘲笑了他的疑虑不定，鼓励他按最初的想法办事。

他们的欧洲之行，也就作罢。如果他们飘洋过海的话，普利策也许可以避免一场正在到来的他神经垮台的灾难。不过，那么一来，历史可就会在许多方面改写：没有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没有了西（班牙）美（国）战争，没有了自由女神像在美国落户，没有了“黄色新闻”词语，也没有了普利策奖。

1883 年 5 月 11 日，在《世界报》——普利策删去了“纽约”两个字——的创刊号上，他发表了以下的告读者书：

“在这个日益发展的大都市里，这样的一份报纸是有用武之地的：它不仅便宜，而且明白易懂；它不仅明白易懂，而且容量巨大；它不仅容量巨大，而且真正具有民主精神——忠于人民的事业，而不当有钱有势者的奴仆；主要是报道新大陆的新闻，而不是旧大陆的消息；揭露欺诈、无耻的丑恶现象，鞭挞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真挚地、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 and 战斗。”

《世界报》忠于他的诺言，它在新老板的主持下的确很“便宜”，一份只要两分钱；的确“明白易懂”，它采用这样一些标题，如《财产浪费于酗酒、为兄弟的罪行而坐牢》，《当丈夫不在的时候》等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普利策的这份报纸的确“真正具有民主精神”，勇于为了他所认为的“人民”的最大利益而斗争。在《世界报》发表上述诺言 6 天后，它又宣布了这样一些新的主张；

1. 对奢侈品征税，
2. 对遗产征税，
3. 对高收入征税，

4. 对垄断征税，
5. 对有特权的公司征税，
6. 征收岁入税，
7. 改革公务员制度，
8. 惩办贪官污吏，
9. 惩办贿选，
10. 对强迫职工参加选举的雇主予以惩罚。

关于岁入税，普利策后来改变了主意，从该报的主张中删去。但他继续坚持其他 9 项主张。这些主张在他生前都已体现在美国的法律中。

与此同时，在圣路易斯，普利策把他以前的合伙人约翰·狄龙找回来主持《邮报》。普利策和凯特则永远离开了密苏里。此后，圣路易斯的这家报纸继续兴旺发达，逐渐成熟，成为美国最有威望的日报之一，也给普利策家增添了财富。

纽约成为普利策的新的用武之地。这里的市场巨大，竞争异常激烈，比圣路易斯要复杂得多。但普利策立即采用了他在那个边境城市形成的编辑方针。他雇佣了他能够找到的最优秀的人才。他信守对以前被解雇的主编科克里尔许下的诺言，把他请到纽约，主编《世界报》。普利策实行高工资、高标准。在他的编辑室墙上写着这样的口号：“准确！简练！准确！”他把手下的人驱使得团团转。他拼命工作，他要求职工也这么做。

《世界报》一夜之间改头换面，采取耸人听闻、鞭挞丑恶的编辑方针，很快收到了效果。一周之内，普利策就收到了许多群众的意见，他们——特别是新近涌到纽约的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抱怨买不到《世界报》。3 个月之后，发行额就从最初的 15,000 份增加到 39,000 份。

在以后的 10 年中，它在美国报业史上取得了最惊人的成就。到 19 世纪 90 年代初，《世界报》有日报、晚报、星期日刊等几种版本，总发行量达 62.5 万份，为全国之冠。到 1890 年，它搬到自己新盖的 20 层高楼里工作。这在当时是纽约最高的建筑物，它位于布鲁克林桥和市政厅附近的公园街。

在这些年代里，普利策成功地发动捐款运动，把自由女神像运到纽约，竖立起来，从而巩固了他作为自由战士的地位。他同石油托拉斯作斗争，直到国会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止。他自己当选为国会议员，并成功地推动纽约民主党州长格罗弗·克利夫兰登上美国总统宝座。

普利策在国会感到乏味无聊，不到 4 个月，就甩手不干了。他更有兴趣的（也颇为有效的），是办好自己的报纸，让别人当选为议员去贯彻他想象的民主政治。他在其余生中，用舆论力量，设法使与他具有相同观点的人当选为总统，在这方面有成有败。

普利策在社论中经常攻击超级富豪及其矫揉造作的贵族作风。有一次，他写道：“新的《世界报》认为，这种贵族在共和国应当是没有地位的，这

个词应当从美国的字典中删去。”他有一篇社论痛斥纽约市的富豪阶级故作没落贵族之态，乘坐豪华马车，招摇过市，去戏院看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许是虚伪吧），普利策夫妇在东 73 街过着皇室般的生活，他们 4 层楼的深宅大院拥有仆役 17 人之多。他们还在缅因州的巴尔港、乔治岛和法属里维埃拉等地拥有多处豪华的度假别墅。他们在纽约的社交活动中，从来不接触普利策在报纸上捍卫的工人阶级，倒是同他不断鞭挞的富豪厮混得火热。

这就是此君自相矛盾的性格。他对政府和公司的保密做法气得要命，然而在自己的事务中他的保密达到了不合理的程度。他宣传新闻要高尚，然而当他的利润受到威胁时，他卑鄙得不择手段。他一会儿温情脉脉、慷慨大方、乐观自信、欢欣鼓舞，一会儿又狂妄、残忍、吝啬、悲观、绝望和自我怀疑。

许多传记学家对普利策有各种描写，说他是“病态的人”、“不可救药的自大狂”、“报界的拿破仑”；说他是“神经过敏”、“强迫症患者”、“缺乏幽默感”、“狂郁症患者”、“过分紧张”、“褻渎”、“自怜”和“敏感易怒”。

普利策的神经一天天变得越来越脆弱，使他更加难以接近。正如科克里尔所说，“在上午的一小时中，他是世上最好的报人。而在一天其余的时间里，他却令人讨厌死了。”

普利策对病痛全然不顾，在报馆从清早一直工作到深夜。他心力交瘁，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1886 年家庭不幸又接踵而来。他的两岁的女儿凯瑟琳·埃塞尔死于肺炎，这个打击使普利策更加埋头于工作以解愁。7 岁的拉尔夫和 6 岁的露西尔也患病，有伤寒的征兆。普利策为克利夫兰当选为总统出过大力，但他的政绩不佳，使普利策深感失望，进一步加重了抑郁感。

普利策感到怒不可遏，有时直接对职工发泄。有一次，一个强壮的记者竟然在编辑室中间同他的这位上司扭打在一起。普利策有时甚至对凯特发脾气，她在日记里曾写到这种事。有一回，普利策狠狠地揍了她一顿，骂她不配当他的妻子，把她赶出房间。她在日记中写道：“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啥时候才能安宁啊？”

这个答案在 1887 年形成了，那时一场最后危机把普利策拖垮了，在很大的程度上使他离开了她的生活圈子。

那是纽约报纸之间的笔战打得特别激烈的一年。自从年轻的暴发户普利策发动攻势，要把《太阳报》作为纽约的主要日报的地位打掉以来，共和党《太阳报》年迈的发行人查尔斯·达纳就同民主党《世界报》交恶。普利策报纸的发行量扶摇直上，而达纳报纸的销路却直线下降。这位老人亲自抓这件事。从 1883 年至 1887 年，达纳在社论中频频出击，取笑普利策的斗争经历屈指可数和他早年在圣路易斯的败绩，然而并未能搞臭普利策。他又挖出斯莱巴克开枪打死人的老底，还经常批评普利策不参加犹太人的活动。

1887 年 3 月，达纳创办了晚报，其销路很快达到 4 万份。普利策针锋相

对，也出版了自己的《世界晚报》，这份以耸人听闻的新闻为特点的报纸，每份售价只要一分钱。它的销路很快超过《太阳晚报》，几周之内就达到日销 75,000 份。

达纳未能击败普利策的《世界报》，显然感到闷闷不乐。这位老报人的失望情绪在 1887 年年底流露报端，当时这两家报纸围绕纽约市区检察长候选人问题展开了论战。达纳考虑到纽约市犹太人选民很多，便攻击普利策是“犹太人的叛徒”，称他为“不愿当犹太人的犹太人，要选民们拒绝《世界报》提出的区检察长候选人。

狠毒的达纳击中了他的对手的要害。对此异常敏感的普利策似乎很不愿意谈及他的犹太人出身。对于达纳的攻击，他感到好象被抽了一鞭子。幸而普利策没有在自己的报纸上对《太阳报》的恶毒攻击作出反应。但这些攻击使他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他神经方面的许多病症和焦急不安的情绪失去控制了。传记作家斯旺伯格对普利策的弱点作了这样的分析：

“在圣路易斯，有人把普利策叫作‘犹太人乔耶’并且嘲笑他的鼻子，这些挖苦很可能给他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他不对凯特谈自己的出身，可能是害怕失去她的爱情。这就使他承担了一个难以置信的义务，保证她不受反犹太主义的伤害。她是忠实的圣公会教徒，这就使得犹太人有可能把他对宗教的怀疑误解为对他的民族的否认。……虽然他从来不反犹太人，而且在他的朋友和职员中有不少犹太人，但他却不愿意谈论宗教或民族问题。……在他的晚年，他捐钱赈济民族大屠杀的受害者，但是据说他要求朋友们不要议论犹太人或任何同犹太人有关的事情。”

达纳残酷无情地反复在这个题目上大作文章。在整个竞选运动中，《太阳报》竭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把普利策称作“犹瑟夫·普利策”、“流浪的犹太人”和“犹大·普利策”（注）。

这个手法果然奏效。达纳的这些社论除了折磨得普利策死去活来、忧郁症频频发作之外，还把许多犹太人团结起来，斥责普利策为异端。在选举前夕，达纳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击，把反普利策的情绪推向高潮：

（注）流浪的犹太人：据传说因他嘲笑了受难的耶稣，被罚永世流浪。
犹大：耶稣门徒，出卖耶稣者。——译注

“既然犹大·普利策已经否定自己的民族和宗教，那么，纽约的犹太人就不必为他而感到耻辱了。……耻辱完全落在他一人身上。阻挡他社会地位提高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倒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而是由于他的某些令人讨厌的个人品质。……他面目可憎，倒不是因为他长得象希伯来人，而是因为它充满了普利策本人的特点……狡猾、恶毒、虚伪、背叛、不诚实、贪婪、爱财忘义等在他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明显烙印。……

“击败普利策和受他愚弄的年轻人，这是犹太公民和其他一切明智的、

自尊自爱和安分守法的人的利益之所在。……犹太人的投票将在这方面作出非常巨大的贡献。”

情况的确是如此。普利策支持的检察长候选人在选举中大败。达纳在《太阳报》的头版欢庆他的胜利，在选举结果下面配了一张雄鸡啼鸣的图片。他在社论中再一次称普利策为“流浪的犹太人”，并且对他说，现在该是他滚出纽约的时候了，正象他当年离开圣路易斯一样。

一个意志坚强的真正大亨对这些攻击本来会一笑置之，然而普利策不是这样。他象他的对手一样，把选举结果视为同个人有关系的事。达纳的无耻大骂刺痛了这位年轻发行人的自尊心。

在普利策受辱的两周之内，他的身体上的灾难就降临了。一天上午他到办公室要求看社论，当他拿到长条校样时，他惊讶地发现，他看不清校样，更不用说阅读了。他对同事们没说任何话，穿上大衣，乘马车回家了。到家后，经他的医生诊断，他的一只眼球的血管破裂了，另一只眼睛的视力也严重恶化。普利策刚到 40 岁，就很快变成盲人。医生对他的病人的另一些病状也大为吃惊：慢性消化不良、失眠、哮喘、过度疲劳和抑郁症。而潜伏在所有这些病症后面的心病则从来没有被诊断出来。医生嘱咐病人在黑暗的房间卧床休息六个星期。

在普利策卧床休息期间，达纳继续以狡猾的方式在《太阳报》上发动犹太人攻势，每周重印 3 次以《不愿当犹太人的犹太人》为题的社论，每次都冠以同样的大标题：《滚，普利策！——他的民族谴责道》。《太阳报》每天都发表“读者来信”（显然是该报自己写的），要求普利策滚出纽约。

当普利策的确离开纽约时，达纳大概很高兴吧。这位生病的发行人卧床休息 6 周以后，离开纽约去寻找名医，以便恢复他的健康。被病魔折磨的他不得不在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伦敦、巴黎、尼斯、威斯巴登、那不勒斯、君士坦丁堡、圣莫里茨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疗养地转来转去，寻医治病。

他从未找到治疗之方。他的病日益严重，以致他不能容忍任何噪音。甚至一点点令人不悦的声音，如同事吃烤面包的声响，都会使他的神经整天紊乱。所以他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离开凯特和子女们、远离家庭喧闹生活的情况下度过的。他再也没有在他心爱的《世界报》的编辑部工作过了。

不过，普利策的病倒并不意味着达纳和《太阳报》的胜利。在达纳围绕犹太人问题大作文章之后不久，普利策就在病床上进行了报复：他在富兰克林街买了一块地皮，就在《太阳报》不显眼的 4 层楼房的对面要建设《世界报》的新的摩天大楼。达纳拚命阻挠这笔地皮交易，但普利策胜利了。他为这块地皮、建筑工程和购置新的印刷机共花了 200 万美元。自此以后的许多月，在建筑大楼期间，每吊一根钢梁，都使大街对过的达纳感到明显的羞辱。这座大楼完工后，雄伟壮观，一个镀金圆顶冠其上，这在纽约是独一无二的，从欧洲来的轮船远远就可以望见。此情此景一定使达纳每天恼怒不已，直到

他 7 年以后逝世为止，终年 78 岁。

新的《世界报》大楼上的圆顶房内有一间专供普利策用的巨大的半圆形办公室，极目远眺，“州长”岛、布鲁克林、东河上游和长岛的景色尽收眼底。痛心的是，普利策已经不可能从他的办公室欣赏这些景物了，他的紊乱的神经不允许他在那里工作。1890 年这座建筑物落成的时候，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市长、州长以及其他许多名流莅临祝贺。普利策则因为病情严重而未能亲临庆典。

给他治病的乔治·华盛顿·霍斯默大夫在陪病人到各地休养时写的日记中，认为他的病人已无法可治了：

“他病得十分严重，已经无法走动。他整天在沙发上度日。……从房间这一头走到对面的桌旁坐下，都十分困难。……他的身体的垮台采取了神经崩溃的形式。”

同他疏远的弟弟的命运加重了他的病情。他的弟弟艾伯特曾经极力反对普利策打入纽约的报业市场。艾伯特此刻远在维也纳，遥控着他的《晨报》。他的神经不正常，最终会导致自杀。艾伯特患严重的失眠症和强迫性多食症，以致使他病态地发胖到可怕的程度。

尽管普利策病得气息奄奄，但他的天才、勇气和意志创造了另一件杰作，象他取得巨大的财富和权势一样使人惊讶。他想出了一种维持生命的办法，世界上任何名医都不曾设想：他一方面保持多病虚弱之躯不死，另一方面则继续控制着他的报纸。他的解决之方有点离奇，然而却使用了二十多年。

最主要的是，普利策从他的生活中排除了任何噪音。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是在三个地方度过的：欧洲一些最安静的疗养地；他的私人游艇上一间象子宫一样的静谧专舱；他在缅因州巴尔港的别墅专门建造的花岗石“静塔”中的隔音拱顶室。拱顶室的窗户有三层玻璃，其双层墙的中间填塞着绝缘材料。通向主室的不大的过厅有三道门，过厅的地板下面安装着滚珠，以减少震动。

到 1890 年，普利策和凯特活着的子女有 5 人：拉尔夫 11 岁，露西尔 9 岁，约瑟夫 6 岁，伊迪丝 4 岁，康斯坦斯 1 岁。但普利策大部分时间不同家人生活在一起。

他还研究出了一种周密巧妙的控制系统，不管他病得多么厉害，不论他在地球的什么地方，他都牢牢地掌握着他的报纸。这个系统的关键部分是始终陪伴着他的一批男性随员。他们给他朗读信件、报纸和文学著作，抄写他口授给纽约和圣路易斯的职工和家人大批电报和信件。

为了使这种远距离通讯保密，这个妄想狂症日益严重的病人设计了自己的密码。其中一些密码是有一定的含义的：上午版的《世界报》叫“老大”，后来出版的晚间版《世界报》叫“老二”。有些密码有点古怪：西奥多·罗

斯福叫“粘质”，伍德罗·威尔逊叫“甜瓜”。还有一些密码是很离奇的：竞争对手《纽约时报》叫“地理学”，民主党叫“小鹅”。普利策全部记住了两万个密码，而他的工作人员则使用一本有 250 页的密码索引。

普利策在外地过日子的時候，给他的公司安排了大批密探。由于他无法监督他的职工，他便秘密安排职工互相监视。差不多每一个负有重大责任的经理都受到另一个经理的监视，他们全都给远在游艇、拱顶室或欧洲疗养地的老板打小报告。

在一定的程度上，普利策也让职工监视竞争对手。他不只一次向与他竞争的报纸派密探，其办法就是，故意让自己的职工投奔对手那里工作，而同时却继续领取普利策的工资。

虽然普利策不再能够指导《世界报》的日常报道工作，但他仍确定报道的大政方针，决定员工的任免，口授社论，调整报纸的版面。内容上一些最重要的革新是在他病倒以后作出的。

他引进了“人造”新闻。最著名的就是，雇佣记者内利·布莱去打破凡尔纳科幻小说人物福格用 80 天时间遨游世界一圈的记录。布莱在《世界报》上每天绘声绘影地报道她与时间赛跑的经历，这纯粹是人为的“新闻”。但这一招儿确实吸引了纽约和全国的读者追踪她用 72 天时间周游地球一圈的足迹。

他首创了报纸“滑稽连环画栏”：雇佣奥特考尔特画贫民区顽童“黄孩子”恶作剧的漫画。这组连环画在读者中间引起轰动，所以人们很快就把普利策轻松活泼的办报风格称之为“黄色报纸”和“黄色新闻”。《世界报》在一些年中大力推广这个叫法，后来因为这个词成为同耸人听闻新闻一样的贬义词，才不再使用了。

除了连环画栏以外，普利策设计的其他许多做法也成为美国日报的常见栏目：体育版、妇女版、要闻版、插图、促销竞争。

由于他的竞争对手竞相模仿，以便迎头赶上，所以美国报纸的面貌迅速改观，形成了所谓现代美国都市日报和“新型新闻”，比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的所谓新型新闻要早得多。

他的一个对手模仿他的做法十分成功，结果导致一场发行战，最终还造成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这个对手的密码叫“进出”，他就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这个傲慢的加利福尼亚人比普利策小 16 岁，他用其已故父亲的矿业财产购买了《旧金山考察家报》，经营得很成功，1895 年又决定打入纽约，正象普利策 12 年以前所做的那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赫斯特所购买的那家赔本报纸就是普利策的弟弟、神经错乱日益严重的艾伯特所放弃的《晨报》。

赫斯特同《世界报》展开了竞争，任何其他对手还从来没有如此做过。他成功地仿效了普利策的报道战略，并有所发展。他以工人阶级为对象，使用简明的语言，刊登大量耸人听闻的、娱乐性的和鞭挞社会丑恶的新闻。赫

斯特把其报纸在报摊上的售价压得低于普利策报纸的价格，不惜为《晨报》赔进几百万美元。他认为，当广告客户转到他的报纸时，他是会捞回这笔钱的。他还用前所未有的高工资挖普利策的人，一度曾把《星期日世界报》的全部编辑人马（包括“黄孩子”漫画家奥特考尔特）都争取过去。普利策用更多的预付工资的办法把全班人手重新拉回。他们只呆了一天，又被赫斯特用更高的工资挖走，这回他们一去不复返了。只有一个秘书仍然忠于普利策，留了下来。

《晨报》的发行量开始猛增，迅速超过了相形见绌的《先驱报》、《太阳报》、《论坛报》和《纽约时报》，并开始接近《世界报》的数字，后者已经停滞不前。

普利策开始反击。他聘请了一位新的漫画家来接替奥特考尔特留下的职位。这两家报纸的“黄孩子”漫画专栏互相争雄。普利策也把他的上午版报纸的零售价格削减一半，象赫斯特一样只卖一份一分钱，指望这样便宜的价格会把读者从《晨报》那里拉过来，搞垮它。然而事与愿违，这个策略并未奏效，两家报纸的发行量都未受很大影响，但《世界报》的广告客户却大批离开它了，因为普利策为了弥补报纸零售价减少一半的损失大大调高了广告收费标准。

收入大幅度下降，使普利策大为震惊。他让他的报纸同赫斯特的《晨报》展开疯狂的竞争。从1896年至1898年，纽约的读者目睹了美国报业史上最卑鄙的发行战。两家的发行人为了争夺街头的销售量，鼓励其职工不择手段地去竞争；不准确的、有倾向性的、夸大其词的、捏造的新闻，丑态百出。

最不光彩的是他们对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古巴起义的报道。两家的发行人都抓住这个新闻，派了一船又一船的记者去加勒比海制造耸人听闻的报道，以便打赢在纽约街头的争夺读者之战。这种新闻报道上的疯狂做法造成了数百万字的错误消息和假新闻。两家报纸竞相采用吓人的大字标题、捏造的消息和虚假的新闻，它们的无耻的煽动使群众对西班牙极为愤慨。席卷美国的民族主义狂热对报纸的销售是有好处的，所以它们指示自己的战地记者制造更多的那样的报道。这些记者发回了许许多多报道（大部分是无根据的），说西班牙出卖朋友，对古巴人犯下了滔天暴行。两家的报纸都发表社论，要求美国进行军事干涉，以解放古巴。

西班牙方面无力同美国一战，显然不想打仗。美国战舰“缅因号”于1898年2月15日在哈瓦那港不知什么原因发生爆炸，360名官兵中有260人被炸死。当时马德里正向古巴提出某种形式的自治。《世界报》和《晨报》都抓住这个灾难，要求立即对西班牙开战。其实，西班牙并无意炸毁美国军舰。但是，在几周之内，普利策和赫斯特都力图在发表社论、要求开战方面超过对方。普利策在1898年4月10日亲自发表署名社论，要求立即进攻西班牙的殖民地。“那将很难说是战争，”他写道，“但它将是壮观的。”

麦金莱总统知道西班牙希望和谈。他对普利策的要求置之不理。但是 9

天以后，参众两院通过了开战的决议。普利策的社论是导火线，他得到了他的战争。

西美战争持续了4个月。它象煽起战争的新闻界一样，是可悲的。死亡的美军人大约有5,000人，但在战斗中阵亡的不到400人，其余的则死于疾病。关于西班牙的伤亡情况，没有正式的统计，但死亡人数估计要比美国多得多。这场战争使美国耗资2.5亿美元，按1990年币值计算，超过40亿美元。美国得到了西班牙的属地波多黎多、关岛和菲律宾，并获得了帝国主义的名声，这个臭名一直到今天仍然戴在美国头上。

赫斯特是一个野心勃勃、而又浅薄的机会主义者，他个人没有多少有意义的信念，因此，对他的可耻的新闻行径是不难理解的。而普利策则不同了，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也有许多过火的行为，但他毕竟真诚地相信报纸应当准确和公正。他很快滑入不负责的新闻泥沼，就比较难以理解了。

这方面的部分解释当然在于他的体质衰弱和神经多病。赫斯特对《世界报》发动全面攻势之日，正是普利策为女儿露西尔愁肠百结、心身特别脆弱之时。他已经有一个孩子凯瑟琳死于肺炎。当古巴危机出现时，露西尔正病得很厉害。在普利策的所有子女中（包括1895年出生的男孩赫伯特），露西尔最象乃父：精力充沛、聪明、有事业心。毫无疑问，露西尔是普利策最喜爱的孩子。但是，在1897年岁末，她刚度过17岁生日不久，就被伤寒夺去了生命。当她病逝的时候，普利策同她一起在查特沃尔德别墅，老父悲恸欲绝。

普利策作为出版家的这段最不光彩的历史，可能还有别的解释，这就是他的自相矛盾的性格。诚然，他重视负责任的新闻，但他同样重视利润。在赫斯特对他发动进攻以前，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他总是能够把它们加以协调。可是，在赫斯特进攻的面前，利润占了上风。在三年时间内，普利策违反了他倡导多年的大部分新闻原则。

在这次不长的西美战争期间，普利策和赫斯特之间的斗争一直继续不断。战争结束以后，许多有教养的美国人对“黄色新闻”感到厌倦和腻味了。普利策也是如此。所以他指示他的主要报纸——上午版《世界报》不要再搞耸人听闻的新闻了。

普利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他的责任感。不过，利润动机可能仍然隐藏在他的指示的背后。虽然他的令人作呕的战争报道使他的报纸发行量达到空前的高度，可是，《世界报》第一次开始赔本。报道战争，耗费太大；一分钱一份报纸的价格太低。尤其重要的是，许多广告客户转向比较负责的报纸，认为它们的读者才具有购买力。

实际上，当普利策发现“黄色新闻”不能带来利润时，他才摒弃它。虽然上午版《世界报》迅速恢复名声，重新赢得广告客户，但晚间版《世界报》则继续向城市工人阶级兜售耸人听闻的新闻。

总的来说，普利策对美国是功大于过。他不屈不挠地鞭挞政治上的贪污

腐化和商业上的卑劣行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政府的清廉和社会的改革。对反托拉斯法的制定，他比任何其他人的贡献都大。这项法律约束了放任自流的美商界的放肆行为。在他的其他重大贡献中，还包括《世界报》1905年对保险业一项巨大丑闻的揭露，这导致纽约制定一系列法律，把保险公司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

普利策最勇敢的一次胜利是1909年《世界报》对一项欺骗案的揭发，它涉及到美国付给法属巴拿马运河公司的4,000万美元的处置问题。联邦政府控告了普利策，说他诬告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金融家摩根、政治家伊莱休·鲁特和其他一些人。但普利策没有被吓倒而封嘴，他的报纸继续报道此事。后来，法院把这些控告一一驳倒，普利策为新闻自由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

对普利策忠心耿耿的主编约翰·科克里尔有一次称普利策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新闻工作者”。对这个提法也许值得商榷，但是，把普利策视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新闻工作者，则是没有问题的。不管怎么说，在影响现代报纸的性质方面，他比任何人的贡献都大。

他是一位巨人，他也按巨人的形象期望于他人。毫不奇怪，没有人能够达到那个标准，最后他免不了要失望的。不管是总统还是政治家，不管是编辑还是记者，不管是他的子女们，都不符合他的要求。他家里最聪明的孩子露西尔如果活着的话，也许可以得到他的信任。普利策认为他的两个年纪较大的儿子拉尔夫和小约瑟夫是低能儿，对待他们很残忍。而对年纪最小的儿子赫伯特则倍加照顾和宠爱，他毫无根据地相信这个儿子有能力将来接管他的出版王朝，其实他并没有看到这个儿子长大成人。这位老人当然是自欺欺人。他之所以相信小赫伯特，只因为他尚年幼，没有自己的主见；一旦他形成自己的观点，很可能同父亲发生矛盾，而使他失望。

当普利策1911年在停泊于查尔斯顿的269英尺长的“自由号”游艇上逝世时，赫伯特才11岁。虽然赫伯特从来没有在他家的事业中工作过，也从来没有对之表现出任何兴趣，然而普利策却把报业公司股票60%的收入遗赠给这个孩子，他把这些钱存在一家信托公司。拉尔夫得到了20%。在这个家庭最没有地位的小约瑟夫获得10%。剩余的钱分别遗赠给公司的经理们。普利策没有给他的两个活着的女儿留下任何股票。这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大男子主义，因为他担心，如果给女儿遗赠财产，那些贪财的男子可能为了得到这些股票而娶其女。

小约瑟夫去圣路易斯接管《邮报》。虽然他的父亲看不起他，但他勤奋工作，干得满不错。在出色的编辑们的帮助下，他领导这份报纸发展成为全国最受人尊敬、有影响和有盈利的报纸之一。

与此同时，拉尔夫竭尽全力来经营《世界报》，但是，由于没有他的隐居的父亲在背后撑腰，它很快走下滑路。人们本以为赫伯特继承了乃父智慧，其实他毫不管用。当他191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时，他对新闻事业显然

不感兴趣，倒是陶醉于坐享清福、放纵自己。在以后的十年中，他大部分时间用于吃喝玩乐，到国外旅游。1923年，他终于搬进了《世界报》大厦圆屋顶办公室，说他准备致力于事业。然而到那时，报纸的境况迅速下降，不断亏损。赫伯特半心半意地表示要当一个出版家，但是3年以后，他和他的兄弟们决定放弃报业，把《世界报》的3个版本以500万美元的代价卖给了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新老板砍掉了《世界报》上午版和星期日版，只保留了低质量的晚间版，作为新合并起来的《世界电讯报》的一部分。后来，它也寿终正寝。

赫伯特对普利策世家的主要贡献是生了小赫伯特·普利策。这位少爷长大以后，成为棕榈滩上的花花公子，吸毒、乱搞女人，丑闻迭出，轰动一时，全国报纸屡次以大字标题刊登此君的新闻，直到1982年为止。小赫伯特控告他的妻子罗克珊，要求离婚，两人唇枪舌剑，互相指责对方私通、集体奸淫、同性恋和吸毒。全国的新闻媒介，不惜笔墨，大肆渲染，刊登了这样离奇的指控，说罗克珊搂着性玩具睡觉。

小赫伯特·普利策的离婚案引起普遍的注意，本来是小事一桩，但也并非完全无益。它大大有助于美国公众更加了解约瑟夫·普利策和他的奖金的历史。这桩丑闻导致一家小报采用典型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与性玩具通奸！”

约瑟夫·普利策也许并不需要这样的注意。然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类新闻使他成为富翁。

6. 克莱尔·施皮格尔： 令人痛心的医院

当克莱尔·施皮格尔绝望地看着那个躺在医院推床上的孩子时，她的头脑里形成了一篇性质不同的报道。这篇报道会使上个世纪的约瑟夫·普利策也为之心酸的。这个孩子只有五岁，他痛苦地呻吟着，用西班牙语呼喊着他的妈妈，而他的妈妈此刻并不在他的身边，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他的家在洛杉矶中南部，他显然无人照管。当他正与一些小朋友玩耍时，家里的暖气片爆炸，滚热的水烫伤了他。他的胸膛、生殖器和双手都烫得很严重。但在那夜新送进“杀人魔王”的人中间，他算是比较幸运的，他也许可以活下来。

“杀人魔王”是小马丁·路德·金——德鲁医疗中心的绰号，1988年初洛杉矶的许多人，特别是执法的人仍然这样称呼它。位于瓦茨中心南威尔明顿大街的这座庞大的建筑群只是显得有些单调，并不可怕，然而这家医院当时却背着“杀人魔王”这样一个坏名声。任何一个护理人员都能背诵洛杉矶警察局的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当警察在这个地区被枪打伤的时候，不要往“杀人魔王”那里送。

克莱尔回忆说，医疗界都知道，这家县营医院是一家“净给病人干坏事的坏医院”。

这就是为什么《洛杉矶时报》保健问题记者克莱尔那天晚上去那家医院的急诊室的原因，她要去安慰那个拉丁美洲小孩子。

那孩子身边没有亲属，也没有医生护士照料他。克莱尔用她仅懂的一点点西班牙语安慰他。当他啜泣的时候，克莱尔满腔怨气。忙得团团转的急诊室人员似乎根本不理会他。克莱尔努力克制自己，保持新闻工作者的客观性。

“我是记者，”她告诫自己，“我在这里只冷静地观察，而不要掺和进去。”

又过了一些时间，仍然没人管这个孩子。他的疼痛使克莱尔揪心难忍。“我再也不能冷眼旁观了，”她对自己说。她冲到两个实习医生那里。

“看看这个小家伙吧，”她要求说。“他不会说英语。他的妈妈也不在这里。你们能否去看看他？”

克莱尔挨了一顿训斥。他们对她说，急诊室人手不够，领导人也不够，那天夜里病人太多了，他们忙着照料那些伤势更重的人，如，有个女人的面部挨了一枪，有个孩子被公牛戳得很厉害。

克莱尔很惊讶。她重新回到推床旁边，又陪那个烫伤的孩子过了两个小时。她观察着周围混乱的情况，使她越来越吃惊。她认识到，詹姆斯·霍顿的看法是对的。

霍顿大夫是金氏医疗中心新上任的医疗主任。克莱尔那天晚上之所以去那里，就是因为他苦苦乞求她去亲自观察一番。他是在看了克莱尔的报道以

后要求她去的。克莱尔在《洛杉矶时报》报道说，洛杉矶医院面临着一场危机：一些大私立医院扬言要关闭急诊室，因为负担太重了。

“那样一来，就会使整个医疗保健系统陷入混乱，”克莱尔说，“现在有许多急诊室营业，情况还那么糟。如果大医院的急诊室关闭，那就会引起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反应。已经超负荷工作的公立医院将不得不承担私立医院原先担负的许多任务。”

金氏医疗中心就是那些忧心忡忡的公立医院中的一个。担任这个医院的医疗主任还不到6个月的霍顿大夫到报社访问克莱尔，对她直率地说：

“如果所有这些私立医院都关闭它们的急诊室，我们可应付不了啊。我们已经对不起病人了，”他对她说，“我们只有一台超声波机器。脑显显微镜在作外科手术时损坏了。我们的设备是50年代的。在那儿行医，糟透了。”

克莱尔援引他的话发表了一条消息，刊登在头版。后来，她一直想到他的邀请。“我们现在无法工作了，”他对她说，“去我们那儿亲自看看吧。”

起初，她并不想去。有什么必要呢？她已经在《洛杉矶时报》头版正式报道了此人讲的情况。她相信他的话全是真的。因此，她去金氏医院，还能采访些什么呢？

“但是，”她回忆说，“我开始考虑，象这样重要的事，我怎能随便放过呢？访问我的是医疗主任，而不是他的顶头上司。他说，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别无他法，只好诉诸报端。他说，这家医院真是地狱。在这种情况下，我有责任去亲自观察一下。”

也许可以写篇专稿吧，她想。或许什么也写不出来。但至少对人家的要求，没有置之不理。

就这样，她接受了霍顿的邀请，但附有一些条件：她要不受限制地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去急诊室看看，那里通常是不让记者去的。她要在夜间最紧张的时候去那里观察。她要求事先得到许可，必要时带一个摄影记者去。

“没有问题，”霍顿回答说。

过后不久，在5月份一个宜人的春天晚上，克莱尔给困乏的小女儿艾利森读了一篇催眠的故事，安顿她就寝，然后同她的丈夫布雷德告别。她坐进停在他们美丽的海滨别墅公路上的沃尔沃240SL轿车里，沿着两侧栽种着棕榈树的滨海大道向南疾驶而去，经过了许多更漂亮的房子，然后向东驶上曼哈顿的海滩林荫大道，穿过沿途的小商店和咖啡店，奔向高速公路，直达那个地狱般的医院。

从曼哈顿海滩到金氏医院，必须经过洛杉矶的一个最危险的地区。甚至在大白天人们也不敢站在洛杉矶中南部的街头，否则，会被杀死的。打冷枪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以致人们不再把它当作新闻。金氏医院不得不在病房安装金属探测器，以防对立的流氓集团成员溜进来，继续干他们未能在街头得手的杀人勾当。金氏医院的护士们劝告克莱尔：夜晚通过这个地方，最好见红灯也不要停车，因为如果停下来的话，一个孤零零的妇女乘坐如此崭

新的沃尔沃汽车，是会挨枪子的。

克莱尔已不是天真无知的姑娘了。她那天晚上丝毫不胆怯。快近午夜时分，她到了金氏医院的停车场，找了一个灯光最明亮的地方，把汽车锁起来，匆匆走向医院。

4年来，她在纽约不安宁的街道上已经走惯了，对此习以为常。

或者这仅仅是她自己的想法。

“我这个记者脸皮厚，我对此多少有点自豪呢，”她说。“我的意思是，我见过的多啦。我知道，在我和我要报道的事情之间可以拉上一层帷幕。”

她到过许多医院的创伤中心，所以她知道她今晚要去的地方可不是好玩儿的。她曾多年报道可怕的犯罪行为 and 事故以及人们的其他种种苦难，然而这位久经考验的坚强记者却没有想到她会在小马丁·路德·金——德鲁医疗中心的急诊室看到那么骇人的情景。

使克莱尔揪心的，倒不是那些被刀刺、被枪击、被殴打、被虐待的人们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的场面，也不是那里的混乱。因为最好的创伤中心似乎也有点混乱。使克莱尔震惊的是，这个医疗中心的工作人员没精打采，群龙无首，对病人的痛苦漠不关心。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说的那些话：‘没有任何人指点我们。被认为管事的、负责训练我们的值班医生此刻在哪里呢？他在休息室睡大觉呢。’”

他们的话是对的。克莱尔半夜两点钟在那里找到他，敲门叫醒了他。他走到门口，伸着懒腰，打着呵欠。“过会儿再来吧，”他拒绝见她。

“很明显，”她说，“实际上没有人管这些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他们面临着十分复杂、十分困难的医疗局面。病人太多了。”

当克莱尔那天晚上在那里观察的时候，医护人员推进一个11岁的男孩和他的18岁的朋友，前者头部被枪打伤，后者的手臂被枪部分地打掉了。拂晓以前，又来了几个重伤员。她看到一个被发动机砍断腿的男人几个小时都没人管。不过，使克莱尔终于忍耐不住的，还是那个被烫伤的小孩子的凄厉呼喊声。

“他疼得死去活来，我的心都碎了。我仿佛觉得躺在推床上的是我自己的小女儿。”

正象吉姆对A列车差点儿相撞的险情深感不安一样，克莱尔在金氏医院看到的种种苦难也如同她亲身感受的一样。

她的观察证实了霍顿所说的话：这家医院的确人手不够。“但我也注意到那里的值班医生严重地缺乏责任感，”她说。

克莱尔知道那里大有文章可作，其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了该院医疗主任试图探讨的。到天亮的时候，她已下决心追踪下去。

克莱尔认为金氏医院存在严重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在以后的一年中，她将揭发医院的渎职行为，有一位专家称之为“医疗不负责任的暴行”。

次日早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克莱尔驱车离开了瓦茨。她心里想着，碰到红灯，千万别完全停下来。这时，她很难想到，她的调查会落得怎样的结局。她也不会想到，这将使她同吉姆争夺普利策奖。

当然，她更不会知道，这次报道将对她个人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给她自己和她的小女儿带来痛苦。

当克莱尔·施皮格尔 1952 年 7 月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诞生的时候，约瑟夫·普利策一度引以自豪的《世界报》大厦已经成为曼哈顿破烂不堪的仓库，又过了三年便拆除了。从她的早年生活中一点也看不出她会象吉姆·德怀尔一样，变成普利策所称赞的那种深入生活、鞭挞丑恶的记者。

克莱尔的父亲是旧金山的税务律师，母亲是教师。她在童年过着田园般的生活。她平日在私立女子学校读书，学习芭蕾舞和网球，星期天则去公理会教堂作礼拜。

同吉姆的祖先不同，克莱尔的祖先很早就来到了新大陆，在克莱尔诞生以前，他们已在这里生活了六代。他们是来自德国和爱尔兰的移民，工人阶级出身，其中有农民、矿工和工人，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受过大学教育、在堪萨斯州托皮卡当了土木工程的后代，他叫施皮格尔。这个工程师生了一个聪明的儿子，他获得耶鲁大学的奖学金，接受了名牌学府的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海军陆战队士兵转战于冲绳岛，在战斗中负伤，但活了下来，复原回家后在加利福尼亚开业当律师，颇为成功。他名叫哈特·施皮格尔，即克莱尔的父亲。她的母亲吉纳维夫原是爱达荷的农家姑娘，后来获得教学资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作为美国陆军妇女队员在夏威夷服役，在那里同哈特结婚。

这位年轻的教师和她的律师丈夫在战争结束后定居于伯克利，开始了战后美国梦的追求。他们使其子女享受到了他们的祖先无法想象的优越条件。

“少女时期，我酷爱读书，”克莱尔回忆说。“我勤奋努力，喜欢上学。我爱书，读了很多。”

哈特的所有 3 个子女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克莱尔的妹妹詹尼弗后来担任了“改善形象”推销公司的营销副总裁。她的哥哥约翰继承父业，当了律师。

约翰对克莱尔的生活始终有很大影响。他在斯坦福大学是网球明星，在一段时间内是该校的第一流运动员。这对她“有一定影响”，她说。她也努力在中学的网球队争雄，后来长大成人后始终保持了对这项运动的爱好。

但是，她将来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作为一个喜爱读书、严肃认真的少女，她对此考虑得很多。她在中学读书时，故乡受到了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言论自由运动的震撼，她的社会意识由此扎下了根，而她对职业考虑的回答也逐渐形成。克莱尔很容易观察到大学校园的风云。她上的是安娜·黑德女子中学，该校同人民公园只有一街之隔。她多次看到大学生游行示威，

发生暴力行动。不止一次，她放学回家时，校方的公共汽车从催泪瓦斯的烟雾中驶过。

在那个时期，广播中、报刊上、餐桌上的议论中，人们各抒己见，思想纷呈，互不相让。克莱尔对这种气氛着了迷。这种大动荡把她惊醒，使她走出了少女的象牙之塔，如果说不是变得激进化，至少也是更加理想化了。她认识到，她要从事这样一种职业：能够促进人们彼此之间的理解。

17岁的时候，克莱尔碰到一个机会，参加了同外国交换学生的项目。她去印度尼西亚学习3个月，对“这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迥然不同的文化极感兴趣”。

她返回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她知道了此生她要做什么。或者至少是她认为她知道了。“我要研究婆罗洲割取敌人之头作为战利品的历史，”她说。“我要研究庙宇墙壁上的象形文字。”

她打算要成为一个人类学家，周游世界。不久，她便继乃兄之后，考入斯坦福大学。但是她的哥哥认为她作了一个很差的选择，她说。

“他纠正了我的想法。他对我说，当一个人人类学家，听起来满不错，但实际上那是一种非常单调寂寞的生活。他说服了我。我必须重新考虑我的职业。我不愿去银行当一个出纳员，象他认识的许多人那样。所以我开始考虑别的职业。我知道，我不想当律师或医生。我们家当律师的人已经够多的了。我也不愿意同血打交道。”

最后，她想出一种办法，既能够广见世面，观察人类的生活情况，“又不致于过一种象人类学家那样单调寂寞的生活”。她要成为一名驻外记者。

在生活道路上作出这个关键性的决定之后，克莱尔便改为主修新闻，并开始参加斯坦福学生报纸的工作。她象大陆彼岸的吉姆一样，发现了任何一个成功的记者所发现的东西：这项工作使她感到愉快。

“我发现，新闻工作使你有权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同形形色色的人交往，”她说。“它使你有独特的机会去洞察世界，不管是外国还是我们本国。”

如果这听起来有点象大吹大擂的学生在新闻工作日听到的那些话，那她则表示遗憾。但这确实就是她对这个新领域的看法。她以其一贯的书呆子式的严肃认真态度致力于这项工作。

作为一名优秀的学生，克莱尔在大学暑假实习中两次获得高度评价——1973年在博伊西的《爱达荷政治家报》和1974年在《波士顿环球报》。克莱尔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又去约瑟夫·普利策在哥伦比亚大学资助创办的新闻研究生院读硕士学位（她比吉姆早四年，此时吉姆正在福德姆大学读研究生课程）。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在七十年代中期仍然享有巨大的威望。克莱尔认为，研究生课程是值得一读的。

“哥伦比亚是我进入纽约的前奏，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要走，”她说。“我讨厌从加利福尼亚出发，直接去报道布鲁克林。你甚至不知道如何找地铁。”

“对年轻的记者来说，哥伦比亚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研究生课程要求学生去实地做一做记者工作，到纽约市各处去逛逛，实际体会一下这个都市的生活。一年以前，我曾在哥伦比亚实习过，所以我的这次工作经历就成了上次实习的自然延伸。”

她在哥伦比亚的导师之一是迪克·奥利弗，他当时担任《纽约每日新闻》的地方新闻编辑主任。通过导师的指导，她在学习上取得很好的成绩。导师对她的硕士论文给予了很多指点。这篇论文深入地分析论述了一项有争议的计划，即把液化天然气运入纽约、储存于斯塔腾岛、然后沿东河输送出去。她的导师作为自由投稿购买了这篇论文，发表在该报的星期日专刊上。

克莱尔就这样巧妙地踏入了《每日新闻》的门坎，接着便登堂入室，于1975年夏季受聘为该报的记者。当时这家小报是全国第三大都市报纸，发行量超过一百万份。

“我一开始就在地区版工作，对象是布鲁克林，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大贫民区，”她说。“那里可以报道的东西太多了，什么住宅计划呀、暴徒谋杀呀、火灾呀、地铁犯罪呀，等等。”

克莱尔对布鲁克林的街头新闻跑了八个月以后，报社把她调到商业区，去报道曼哈顿的同类新闻。接着，她又被调往纽约州的首府奥尔巴尼，去协助报道州议会几个月。

当《每日新闻》把克莱尔调回曼哈顿的编辑部时，她已经是一个经过锻炼的、坚强的、报道技术娴熟的记者了。编辑们交给她一些调查性工作。她曾揭露了联邦破产法官的政治庇护行为，多年以后她还以此自豪。这个法官任命一个朋友担任一家公司的收款员，而这位朋友则指定法官弟弟的会计公司承担全部会计工作，这是一种过分亲密的关系。克莱尔发现，支票上写的地址根本不存在，如田纳西某某胡同。

这个报道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就象把棒球扔进了蜂窝”，克莱尔回忆说。不出所料，公众十分愤慨，政界人士纷纷表态，随后人们又要求改组破产法院。

这是使年轻的克莱尔陶醉的时期。报社的工作使她兴奋。回顾往事，她感到她幸运的是，她在《每日新闻》工作的那些日子里，正是该报处于鼎盛之时。她回忆说：“当时，鲁珀特·默多克还没有购买对于报纸《邮报》，这两家小报还没有在刊登黄色新闻方面展开竞争。”

克莱尔热爱她在《每日新闻》的工作，也热爱纽约。但同时她又爱上了一个男人。布雷德·布赖恩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克莱尔同他相识是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的介绍。她很快发现，他们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布雷德象克莱尔的父亲和哥哥一样，对公司法感兴趣。布雷德也是来自湾区——在旧金山南部出生和长大的。当她在斯坦福大学上学时，他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念书。他们必须越过2,500英里的路程才能联系起来。

“我们想结婚，可是，他不想来纽约当律师，他喜欢洛杉矶，”她回忆

说。“我则喜欢纽约，不愿离开它。当然，我认为我是放弃了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如果我离开这里去条条地带的活。”所谓“条条地带”，是许多纽约人对西海岸的看法。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曾经做过的最美的差事，因为后来《每日新闻》碰到了许多困难和许多劳资纠纷。”

克莱尔可能对她以前的老板太仁慈了。《每日新闻》为了自己的生存后来同充满刺激性的《邮报》和更年轻的小报对手《纽约新闻日报》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使发行战更加复杂化的，是《每日新闻》的合同纠纷。90年代开始的这项争端谋求工会作出让步，以便扭转该报所说的在过去10年中一亿多美元的亏损。该报进入1991年的时候，陷进了它的10个工会中有9个罢工的泥潭中。

所以克莱尔没有继续呆下去卷入那个悲剧中，而是西行，跟随布雷德去了“条条地带”。他们1978年8月在旧金山结婚后，定居于洛杉矶，在那里，布雷德参加美国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而克莱尔则去《洛杉矶时报》担任记者，负责报道县政府的事务。

克莱尔承认，她对纽约充满刺激性的生活仍然有点怀念。不过，事后思之，她认识到，她决定让她的职业跟随布雷德走，是很幸运的。在洛杉矶，她加入了一家非常出色的报纸的职工队伍，它当时刚刚完成了向大报的过渡。在以后的12年中，《纽约每日新闻》只得了一次普利策奖（得奖作品出自专栏作家吉米·布雷斯林之手，他不久便转到《纽约新闻日报》工作）。而同一时期，克莱尔的新老板的单位则得了8项普利策奖。

她大概不会想到，在这八项奖中，有一项把她的大名赫然冠于其上。

曼哈顿海滩同其名字毫不相干。加利福尼亚海滩区离洛杉矶商业区13英里，它的这个名字是1912年按照纽约市一个区的名字起的，因为这个市的创建者斯图尔特·梅里尔比另一个创建者乔治·佩克的运气好。梅里尔是纽约人，他希望把这个小小旅游城命名为“曼哈顿海滩”。而佩克是中西部人，他倾向于命名为“海滨”。争执不下，便诉诸抓阄儿，结果梅里尔赢了。

自那时以来，曼哈顿海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游览观光、休憩娱乐的风雅之地。这里有一片清洁宜人的海滩，有几家美味餐厅、两家优雅的咖啡店、十几家高档商品店，如丽贝卡绢花店。这个镇子大约有三万五千家住户，大都为富有的洛杉矶人，他们买月票或季票来往于城郊之间。

其中有一位月票乘客，就是克莱尔·施皮格尔。1988年年初，她也置身于夜晚车水马龙的人流之中，回到了没有绢花店的市内。自从那天夜里她在小马丁·路德·金—德鲁医疗中心的急诊室大开眼界以后，她就连续去采访，还带了报社的一位摄影记者。她在金氏医院上了整整一个星期的大夜班。

以后几个夜晚的观察证实了她在金氏医院第一个晚上所形成的看法。除

了她亲眼目睹医院所存在的问题外，她还采访了许多职工，不少医生和护士冒着很大风险，对她慷慨陈词，他们对如此无人负责的情况极为气愤。

次周，克莱尔向报社都市版编辑克雷格·特纳汇报了金氏医院的情况。他同意她在作好日常的保健报道工作之余，对这家医院投入更多的时间。

象吉姆在决定一项值得进行深入调查的报道任务之后一样，克莱尔的下一步也是要求调查档案。

“当我在写作中要求调阅档案的时候，我一下子成了金氏医院不受欢迎的人，”她说。“我想，他们原先以为我在医院采访一周，报道一下急诊室的混乱情况，也就算了。”

医疗主任霍顿继续对克莱尔开诚布公地直抒胸臆，尽管他也看到她已超过了他所希望报道的范围。但他的上司——医院院长则兜圈子。克莱尔通过正式手续成功地得到了许多报告和档案，但其中不少文件是没有用处的。她所要求的真正有用的资料，如关于病人医疗情况的档案，则以保密为由，大部分拒绝提供。在遭到拒绝以后，最初她希望能在向当地政府提出的关于医疗事故的控制中找到一些材料。但她发现，几乎没有这样的控制，很显然，这是因为在金氏医院看病的很多低收入的人“请不起律师打官司”。

不过，她也发现了一些医疗事故，然而县里的官员拒绝提供档案，理由是：这些档案不对外公开。

“我们不得不控告他们，”克莱尔回忆说。“我们在最高法院胜诉。他们又上诉。我们在上诉法院也打赢了。他们又起诉到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后者同意受理这个案子。我提出这些要求后大概过了6个月。最后，县里说：‘好吧，我们把档案给你。’不过，到这个时候，这些档案不象当初那么对我有用了。”

这是因为她在6个月中采用别的办法，搜集了一些类似的病人档案。她成了医院花店的最好顾客。

“如果你拿一束花，就会比拿个笔记本，大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拿着花束去访问病人，让他们填表，把病历给我。”

这个策略非常有效。

“我从来没有见任何病人讨厌过我。他们很高兴有人关心他们。有时只要有个伴儿，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我找到病人，便作自我介绍。我认为他们是相信我的。他们认为我是不会给他们干坏事的。我的确也是如此。”

克莱尔用这种办法在金氏医院得到了近50个病人的病历。她还弄到了在该院逝世的一些病人的病历，办法就是：追踪死者的亲属，让他们在调阅病历的表格上签字。

“死者的许多亲属，住的很分散。他们不会讲英语。我不得不在晚上去洛杉矶中南部，因为只有那个时候他们才在家，”她说。“有时候挺麻烦，得当心守门的狗，需要找个会说西班牙语的伴儿，以便解释我是干什么的。”

克莱尔感到极大欣慰的是，她访问的人家，在明白来意后，立即开门迎

客。他们普遍地感到惊讶和高兴，竟然会有一位“手捧花束的白人妇女”关心他们死去的亲人。

克莱尔弄到病人的病历后，便去请教医疗专家，他们同意核查一下，但不让公布他们的姓名。后来，当他们知道她的用意后，有几位医疗专家竟主动要求她指名道姓地引用他们的话。克莱尔把一些严重的医疗事故记录给这些专家看，他们惊呆了：

被枪打伤的一个 18 岁的孩子在金氏医院就诊时，创伤科大夫错误地割掉了他的喉头。

一位 37 岁的妇女在进行普通的手术时，她的结肠被错误地切除，修复时又接错了，结果导致死亡。

一个妇女的脾被错误地切除。

一个妇女脑部有病，到金氏医院急诊，可是找不到神经外科医生，病人痛苦地挣扎了几小时后，被宣布大脑死亡，如果及时治疗，本来是可以有救的。

.....

克莱尔继续提供了许许多多这类情况。

除了不负责任的医疗事故外，克莱尔还发现，金氏医院的一些高级大夫还旷工，他们的工资很高，但却没有给这家县级医院提供应有的服务。许多人私下行医很多，按照县里的规定，私下行医是应该报告的，但他们却秘而不宣。有些医生置法律于不顾，竟在工作时间上耍花招骗人。

“所以我花了大量时间不仅追踪病人，而且追踪医生，”克莱尔说。

例如，她和报社的一位摄影记者分别开着汽车花了一天时间尾随一名旷工的医生。这个医生在金氏医院的实习医生中特别臭。她和这位摄影记者在一天清晨把车停在这个医生家的附近，全天一直小心翼翼地追着他。他在医疗中心呆了不到四小时，中午过后不久便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他另谋差事，到别的医院私下为病人看病去了。后来，他在金氏医院的工资卡上则写着全勤八小时。

她还记录了其他一些医生的情况。按规定，他们应该作为值班医生到金氏医院急诊室上班，但他们经常不露面，而是忙着干私活儿。

她发现一个值班医生让该院的住院医生去一家私人医疗中心做流产手术，捞取外快。由于这占了正常的工作时间，所以她到金氏医院的办公室查询此事。

她说：“我没有约时间，因为我认为，如果约时间，他是不会同我谈的。我觉得，必须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对我要报道的事作出反应。接待我的人员说，他不在办公室。她不知道他什么时间回来。所以我便坐下来等。等了好长时间，他终于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了。”

这位个头很高的医生对克莱尔怒目而视。

“我不想跟你谈。我不愿跟你发生任何关系，”他对她说。

“先生，”克莱尔说。“我是记者，有责任告诉你，我打算如何写你。”

他扭身便走，克莱尔赶了一步，追上这位医生。她打开了她的录音机，问他为什么那样使用住院医生，至少要录下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医生在过道疾步前进，克莱尔在后面穷追不舍。她对着录音机一个劲儿对他说，她要录下他拒绝谈话的情况。

“当我们走进楼梯井的时候，”她回忆说，“他揪住我的胳膊，从我手里抢走了录音机，沿着楼梯往下跑，录音机仍然开着。我也跟在他后面噔噔地下楼梯。”

她把他一直追到医院院长办公室。这个狼狈逃窜的医生把录音机放在目瞪口呆的院长的桌子上。

在关于金氏医院的报道中，克莱尔并没有把这位医生的狼狈相写进去，但她仍然保留着有关的录音带。那可是绝妙的记录啊。你可以听到她追赶他下楼时她在楼梯上咯噔、咯噔的声音和她的咆哮声：“把我的录音机给我！”你还可以听到这个医生闯进院长办公室时说的话：“这个女人要录我的音！”

在追踪金氏医院的一年半时间里，克莱尔从来没有完全脱离日常报道。”在这个时期，我既抓了金氏医院的调查，又没有放弃日常工作。我有我每天的任务。我曾多次想，如果不搞这个调查，我将轻松得多。你知道，要在报上发表这个报道，内容要大大压缩，所提出的问题也不会象我想象的那样得到解决。”

不放下这项调查，会给她的生活增加很大的压力。她的家庭也是这样。

到 1989 年年中，医院调查和日常报道业务两头抓，克莱尔已经度过了一年的紧张生活。但是，她白天黑夜经常不在家，并没有影响夫妻关系。布雷德的律师业务也繁忙兴旺，忙得不可开交，这对夫妇各自埋头自己的业务，没有时间感到自己被疏远。克莱尔得到了布雷德的大力支持。他生动地回忆了那段时期的情景：

“她往往深夜驾车驶过城区，到那边去进行访问、尾随什么人，不管时间多晚。但我对她并不担心。她的许多消息，往往就是那样搞到的。嗨，这个女人呀，为了弄到新闻，她甚至敢到地狱闯进安琪儿的婚礼。”

他们俩的忙碌的职业不仅没有发生矛盾，而且相得益彰，他说。“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结合。她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而我则帮助她提高了组织能力。”

到 1989 年中期，克莱尔又怀孕了，但她和腹中胎儿都非常健康，并没有增加她的负担。

问题出在艾利森身上，她那时已经 3 岁了。

“我们经历了一段可怕的分离思念的痛苦，”克莱尔说。“她很不愿意我去上班，丢下她不管。她不愿去幼儿园。每天早上醒来，她就问：‘到周末了吗？’当我从事报道工作的时候，我不断问自己：这值得吗？我是在毁我的小宝贝儿？如果她需要我在家，我完全可以呆在家里，没有必要去

工作。我这是为了什么呀？”

答案当然是，克莱尔喜欢记者工作。所以她继续去上班，每天早上要碰到不可避免的危机：当她开车送艾利森去幼儿园时，女儿眼泪汪汪，使劲儿呼喊着妈妈，让人揪心。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艾利森的保姆患了眼病，没法继续工作了。

“这太糟糕了，”克莱尔说。“她象艾利森的代理妈妈一样，已经相处三年之久。失去一个保姆，几乎就象离婚一样。好象丈夫死去，不得不还没有谈恋爱，就马上重新结婚一样。甚至没有时间适应她离开的痛苦，就得会见另外一些人，在大约3天的时间里决定是否雇佣她们。”

由于工作的压力太大，克莱尔没有时间去刊登物色新保姆的广告。她对前来求职者的审查是不够充分的。

“我是一个调查性记者能手，然而我挑选的这个女人却不怎么的。”

克莱尔很快发现，关于她的这个新保姆的主要推荐材料是这个女人的男朋友提供的，他在过去四年雇佣了她，把她吹得天花乱坠。这使她长期感到懊恼。

克莱尔立即解雇了这个年轻妇女，又开始寻找新保姆的困难历程。克莱尔高兴的是，她终于雇到了一个满意的年轻妇女，她“对孩子好得了不得，很有才气，还承担了儿童发育的课程。”

但克莱尔对艾利森的操心又有了新的变化，她说。“我这孩子，人人夸，都说她是最聪明伶俐、秀美可爱的小姑娘，然而她却口吃。”

起初，克莱尔简直被吓懵了。

艾利森心理上有压力，她离不开我。这种不安的情绪袭击了她。她说：“妈妈，我有话说不出来。”她净说些这类话。”

凡能找到的关于口吃的书，克莱尔都读了。她询问了儿童心理学家。她得悉，口吃在儿童中间并非罕见，但到八九岁几乎都可以克服。她这才松了一口气。

1989年8月份，是克莱尔拼命的一个月，她把18个月的调查所得，写成了共三部分的系列报道，于1989年9月3日开始在《洛杉矶时报》连载。她的导语——报道的开头几段——生动地描写了血淋淋的情景：

一个18岁的姑娘在9月份被急忙送进这家医院，一辆急驶而过的汽车里射出的子弹击中了她的颈部、穿透了她的牙床骨、打伤了舌头、打瞎了一只眼。

但是，当她到瓦茨的小马丁·路德·金——德鲁医疗中心时，她的苦难并没有结束。在动手术时，创伤科医生错误地割断了她的喉头。

两根颈部静脉被切断，造成大量出血。后来一位医生复查这个事故时，认为大概是主刀医生“笨拙地”企图给她开一个小小的呼吸道。

克莱尔的报道占了报纸专栏的一百英寸篇幅，有根有据地揭发了这家医

院的医疗事故。她指名道姓地引用了大批医疗专家的话，他们复查了她得来不易的病人病历。

次日，她的系列报道中的第二篇文章揭发了该院高级医生未能履行其应负的监督职责。

第三天，她的最后一篇文章分析了与金氏医院隔街相望的查尔斯·德鲁医科大学的财务和管理不善的问题。

帮助修改克莱尔系列报道的《洛杉矶时报》高级编辑诺埃尔·格林伍德说，这组系列报道一发表，马上就引起了反响。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之后的第二天，洛杉矶县监督委员会便下令进行调查。接着，医院的院长就被解职。很快，州的和联邦的有关机关进行调查。联邦机构发现金氏医院的责任心太差，扬言要停拨六千万美元的资金，如果真的付诸实施，医院就得关门。

由于受到这个威胁，县里立即采取措施，改善对病人的护理，改革行政管理政策，财务、用人制度和医疗设备也都予以改进。这样一来，联邦官员便撤销了停止拨款的威胁。他们说，对病人的护理有了“彻底的改观”。

听起来象是一个记者的神话般的结局，然而实际上这却是克莱尔受到很大压力的时期。在她的系列报道登完以后不久，她和她的报纸就受到黑人社会的猛烈攻击，他们提出了种族主义的指责。“金氏医院之友”组织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扬言要把这个来自白人报纸的白人妇女炸死，因为她对这家主要由黑人管理的医院进行了充满种族偏见的恶毒诽谤。

《洛杉矶时报》的编辑们拒绝了这些指责，坚决支持克莱尔和她的报道。

“我同克莱尔共事多年，她是第一流的调查性记者，”高级编辑格林伍德说。“她有毅力，有好奇心，坚决顽强，不搞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她能够理解什么值得追踪，什么不值得。她的业务水平非常高，行文严谨流畅。她干起活儿来，不知疲倦，这是任何第一流的调查性记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她很仔细认真，做到了一丝不苟。”

格林伍德和《洛杉矶时报》的其他编辑们都是支持她的。但是，对现在已怀孕近八个月的克莱尔来说，去参加充满敌意的记者招待会，回击对她、对她的报纸进行的种种攻击，则是很困难的。

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有一个发言的人指着克莱尔，吼叫说：“写那组报道的记者，就在那里！”

她回忆说，“我被那些怒气冲冲的人们包围着。我想，感谢上帝我怀了孕。他们总不致于打死一个怀孕的人吧！”

虽然这么开玩笑，但克莱尔确实害怕由于紧张和劳累而早产。

“对我来说，那真是一个压力太大、太大的时期。我不断地想，我很可能就在现场早产”。

但是，在1989年12月6日，克莱尔惊奇地发现，她竟生出了一个完全健康的女婴莱斯利——晚产13天。

在度产假的初期，克莱尔接受了一位儿童心理学家的建议，给艾利森换个幼儿园。也许由于换了个地方和克莱尔在家度假吧，已经4岁的小艾利森很快就克服了口吃的毛病。

对于《洛杉矶时报》和克莱尔来说，她的产假是一个十字路口。报社的编辑们正把她的作品收集起来，参加普利策奖的竞赛。而克莱尔，这位几乎是单枪匹马地迫使一个医院改善对病人的服务的记者，却开始认真地考虑离开她现在的工作。

7. 新闻奖面面观

象吉姆·德怀尔的地铁专栏文章一样，克莱尔·施皮格尔揭发一家医院的文章也是约瑟夫·普利策最欣赏的那种新闻的杰出范例，当然也有两个小小的不足之处。《洛杉矶时报》习惯于发表长篇大作，而普利策则可能要求写得更短一些。此外，他可能认为该报编辑给克莱尔的一系列报道所加的标题不够味儿，应该更加耸人听闻一点。

自设立奖金以来的几十年间，这项竞赛总的来说已经实现了他的设想，而且还使它具有了一些为普利策所不曾预料到的重要意义。他的奖金成了美国舆论（特别是在新闻方面）可靠的晴雨表，也成为平息争论（特别是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避雷针。

普利策 1902 年考虑设立奖金时，他正隐居在缅因别墅里的隔音“拱顶室”中。当时他 55 岁，身体垮下来已有 15 年了，但离逝世之日还有 9 年，他的双目几乎完全失明。他叫来一位秘书，口授了一项初步计划；拿出 200 万美元作为基金，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办一所新闻研究生院，同时从中拨出一部分钱设立奖金。他之所以这么做，大概意识到自己不久于人世。然而前一年宣布的诺贝尔的首批巨额奖金无疑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普利策十分钦佩瑞典的这位火药发明家，他想效法诺贝尔奖金，也设立他自己的奖金。

但普利策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他把他的获奖人限定为美国人，而诺贝尔则不分国界。普利策遗赠作为奖金基金的钱只有 50 万美元，比诺贝尔的 900 万美元要少得多。普利策主要对新闻和文学感兴趣，而诺贝尔则更多地集中于科学。普利策希望及时表彰“当年”发表的作品，而诺贝尔表彰的对象则往往以其多年的成果获奖。

普利策的遗嘱列举了 9 种奖——新闻奖 4 种（公共服务、报道、社论写作和新闻史），文学奖 3 种（小说、传记和美国史），戏剧奖一种，他的新闻研究生院“前景、发展和改进”每年最佳论文奖一种。毫不奇怪，没有任何人参加最佳论文奖的竞赛，所以它很快就消失了。“上一年美国报界对公众的最佳服务史”新闻奖也取消了。

原先所有这些奖都冠以“最佳”字样，后来由于引起激烈的争论，在措词上改为“出色的”或“出色的范例”。

普利策的遗嘱没有要求设立诗歌或音乐奖，那是在他逝世以后加上的，此外，还增添了 10 项新闻奖，包括摄影、漫画、评论、批评以及其他一些类型的新闻报道。

普利策原先 4 项新闻奖的条件是相当简单明了的，而且没有时间限制。但是，他提出的文学艺术奖的条件则由于必须符合 1902 年美国道德高标准的要求而使这方面的竞赛受到了束缚。

例如，托马斯·沃尔夫的出色小说《向家乡看吧，安琪儿》出版后立即

得到评论界的推崇，然而却未能获得 1930 年的普利策奖。评委们一致认为沃尔夫的著作不符合普利策遗嘱中提出的道德标准，因而把那年的奖金给了奥利弗·拉法吉的《爱笑的小伙子》，其实这部小说很快就被人遗忘了。普利策的遗嘱规定，获奖的小说“应当最好地反映美国社会的整个气氛和美国道德风尚的最高标准”。虽然普利策很有远见，但他未能考虑到，随着美国清教徒式的社会逐渐成熟和进入文学复兴时期，他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价值观也将随之过时。

例如，他的遗嘱还要求，戏剧奖将颁发给“在纽约市上演的杰出的美国戏剧，它要能够在提高人们的崇高道德、崇高情趣和崇高风尚的水准方面最好地体现出教育作用和舞台力量”。他的遗嘱规定，传记奖应当授予那些“教育对人民进行爱国的无私服务的”著作。

普利策在设立奖金时还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即选择那些有权决定哪些规则过时的人选上有不当之处。他让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们和由报界头头组成的一个强大的“咨询委员会”共同管理奖金事宜。几十年来，由出版家和学界行政管理人员联合组成的这个反对改革的保守集体形成一个文质彬彬的官僚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不断作出错误的判断。

象诺贝尔一样，普利策也规定，他的奖金在他死后开始颁发，具体地说，就是在他死后开办的新闻学院至少运转 3 年以后。他在 1911 年逝世，新闻学院在 1912 年开学，第一批普利策奖金在 1917 年颁发，奖励前一年的成果。

虽然普利策口授了各类奖的许多基本要求，但他却把制定颁奖具体计划的工作留给大学董事们和咨询委员会去完成。他们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设计复杂的、多层次的评审制度，这个制度一直保留到现在。董事们和咨询委员会成员还立即着手完善普利策提出的一些原则的措词。例如，他规定获奖小说应当“最好地反映美国生活的整个气氛”，后来把“整个气氛”改为“健康气氛”。

道德方面的措词则是由自命不凡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去咬文嚼字的，咨询委员会的头 33 年掌握在他的手心。在巴特勒固步自封的领导和普利策过时的原则的束缚下，普利策奖金的权力结构在过去这些年里多次重演类似让《爱笑的小伙子》获奖那样的愚蠢做法。

那种尴尬的做法大部分记载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约翰·霍恩伯格撰写的普利策奖金史中，这部三卷力作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不幸的是，他的著作带点儿公司史的味道。霍恩伯格远不是一个中立的旁观者，此书是他担任普利策奖金管理主任和咨询委员会秘书的 26 年期间写成的。

霍恩伯格小心翼翼地避免作出自己的分析；关于普利策文学艺术奖的价值，他力求客观。他对新闻奖的基本看法是，尽管有缺点，但这些获奖作品将永远保存下去，继续“为它们所代表的职业增光”。他是对的。但是，反过来说，也是对的：新闻工作者的杰出作品将继续为普利策奖金增光，延伸开来说，也为哥伦比亚大学和已故的约瑟夫·普利策增光。的确，普利策奖

诚然使获奖人得到了一些荣耀，但授奖者获得的荣耀更多，而对设立此奖的人来说，则使他永垂不朽。

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一向主要是揭露性新闻，它们所揭露的情况是某些政党、尤其是政府所不愿意泄露的。在 1917 年至 1990 年颁发的 580 项新闻奖中，约有 40% 属于此类新闻。

另外的 40% 奖励战争、犯罪、公民自由、种族关系、政治、自然灾害、国际等方面的报道。剩下的奖励项目包括各种各样的专题报道，如吉姆·德怀尔、克莱尔·施皮格尔和塔马尔·斯蒂贝尔的报道。

纵观普利策奖的 75 年历史，它确实准确地反映了美国的主流社会和为它服务的报界情况。

例如，较早时期，民族主义猖獗一时，普利策奖便有所反映。1919 年公共服务奖颁发给《密尔沃基新闻报》，就是因为它“在外来的分子执行了一种从商业观点来看极为危险的政策选区，勇敢地大力宣传了美国主义”。1932 年普利策新闻报道奖给予《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的五位工作人员，以表彰他们有声有色地报道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游行。

当三 K 党的活动震惊全国时，普利策奖也有反映。从 1922 年开始的 30 年间，许多南方报纸就是因为勇敢地报道和评论了三 K 党的活动而获得普利策奖的。

在科学报道不受重视的时代，这种情况也反映在普利策奖的颁发上。例如，1941 年，普利策奖评委建议表彰《纽约时报》的科学记者威廉·劳伦斯，却被奖金委员会反掉了。它把报道奖给了一个名记者、《纽约世界电讯报》的专栏作家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表扬他的关于劳工丑闻的文章。默默无闻的劳伦斯先生的报道被认为不如佩格勒的文章有价值，那么，他的报道是什么内容呢？被不学无术的奖金委员会拒绝授奖的他的独家报道透露：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在 1940 年 5 月 5 日分裂原子成功——这比德国人晚了两年，但比芝加哥大学斯塔格·菲尔德实验室进行的世界第一次可控原子连锁反应早两年。

当美国参加战争，举国支持它的军事努力时，报界也表示拥护，普利策奖亦有反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战争努力有关的文字报道、新闻摄影和漫画等获得了 24 项普利策奖。全国的同仇敌忾反映在颁奖中，其中包括战区的所有美国记者获得 1941 年的“集体奖”。奖金委员会在战争期间还颁发了三项特别奖状，获得奖状的单位分别为：《纽约时报》，“它的国际新闻报道对公众起到了教育作用”；新闻检查署署长，“他创造和管理了报刊和电台使用的密码”；“美国报刊的绘图人员，他们绘制的战况图大大有助于公众明瞭和更加清楚交战陆海空军的进展情况”。

战后，在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反共迫害狂期间，普利策奖准确地反映了美国报界的成绩——实际上是无成绩。几乎所有举足轻重的报刊都保持沉

默。它们对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及其“戴红帽子”、开黑名单的党徒没有表态。

在赤色恫吓期间，《密尔沃基新闻报》记者埃德温·贝利报道了这位威斯康星参议员的崛起，后来贝利担任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系主任以后，继续写了麦卡锡当权的过程。1981年出版的贝利的著作《约·麦卡锡和新闻界》一丝不苟地详细记述了为什么美国的主流报刊未能揭露麦卡锡这个危险的煽动家。此书描绘了新闻界的丑陋形象，它们在1950年变得胆小如鼠，一言不发，此时，麦卡锡上了全国报刊的大字标题，他大放厥词，说他掌握了打入美国政府的205个共产党人的名单。事有巧合，三个以前的联邦调查局特务写的一本书《红色渠道》这时也出版了，书中列举了151位作家和艺术家的名字，说他们帮助推进了“共产党的目标”。新闻界的胆小怕事一直持续到1954年，此时，广播员爱德华·默罗鼓起勇气，在电视上同麦卡锡对抗。继默罗极有影响的“看今朝”节目之后，是连续六个星期的电视实况传播的军方——麦卡锡听证会，这些听证会揭露了麦卡锡的真面目，实际上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

到这个时候，报刊一哄而起，纷纷谴责这个迅速自我毁灭的参议员，这已成为无害而又时髦之举。但是为了什么呢？麦卡锡历时四年之久的政治迫害已经造成了损失，葬送了许多人的生命和前程。

不过，在这四年中间，少数新闻工作者勇敢地站出来，提醒公众注意麦卡锡的阴谋和他对公民自由的威胁。除了I.F.斯通和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埃尔默·戴维斯之外，在这个类型的人中还包括《华盛顿邮报》、（威斯康星州麦迪逊）《首府时报》、威斯康星州《希博伊根新闻报》、《密尔沃基新闻报》、《罗利新闻与观察报》、《坦帕论坛报》、《锡拉丘兹旗帜邮报》、《圣路易斯邮报》以及其他一些报纸的记者、社论撰稿人和漫画家。所有这些都上了麦卡锡的“左翼报纸”名单。

贝利在他的书中写道，那个时期正在为其经济问题而苦苦挣扎的《华盛顿邮报》“在反对麦卡锡的长期斗争中立下汗马功劳，至少是不逊于它在水门事件中取得的胜利”。

不幸的是，在麦卡锡猖狂的四年中，那些敢于反对他的人中，没有一人获得普利策奖。

普利策奖金管理主任罗伯特·克里斯托弗否认这个说法。他在给作者写的书面答复中提到前主任约翰·霍恩伯格写的书《普利策奖》。

事实上，在该书的第191页，约翰提到，老《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伯特·安德鲁斯由于揭露国务院不经过任何适当的手续就以危及安全的借口解雇一个职员而获得1948年全国报道奖，《西雅图时报》的埃德·格思曼由于他为一个教授洗刷了所谓他参加过一个共产党训练学校的罪名而获得同样的奖。最后，1954年，赫伯特·布洛克的漫画选（包括一幅把麦卡锡画成一个

烂苹果的漫画)获得漫画奖。

不过,克里斯托弗的辩护是文不对题的。伯特·安德鲁斯或埃德·格思曼的得奖作品只字没有提及麦卡锡。《华盛顿邮报》漫画家赫伯特·布洛克获得1954年奖,那是爱德华·默罗的“看今朝”电视节目促成麦卡锡政治生涯结束之后不久的事。而在1950年麦卡锡发表“我掌握了名单”的讲话到1954年“看今朝”电视节目使他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段时期,不管是《华盛顿邮报》的人还是其他没有被吓倒的报纸的人,他们涉及麦卡锡的新闻没有任何一篇得奖。

那四年评审委员会和奖金委员会讨论的记录将是有趣的,因为它们可能说明麦卡锡猖獗时代新闻奖的颁发情况。然而,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助手巴德·克利门特说,1950年至1955年普利策奖讨论记录莫名其妙地不见了。

麦卡锡所说的“左翼报纸”在那个时期的社论没有一篇获得普利策奖。根据其中两家报纸的记录,它们的反麦卡锡社论曾被提出来参加竞赛,即《华盛顿邮报》刊登的艾伦·巴思的长篇反麦卡锡文章和《圣路易斯邮报》刊登的欧文·迪利阿德严厉抨击麦卡锡的文章。

对迪利阿德和《圣路易斯邮报》编辑部其他作者不予重视,是特别有趣的。据贝利的著作《约·麦卡锡和新闻界》说,他们在1950—1954年期间一直保持反麦卡锡立场,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几乎经常受到发行人小约瑟夫·普利策的压力,他要求对这位参议员宽厚一些。

贝利写道:“小普利策在1950年以后的四年中,不断给迪利阿德写信,用甜言蜜语恳求或者用威严的口气要求这位编辑对麦卡锡和共和党人客气一些。”他引用了小普利策的一封这样的信,这位发行人在1954年4月,当军方—麦卡锡听证会正在进行的时候,这样劝告迪利阿德:“请、请、请不要刊登麦卡锡听证会。我认为——我相信大多数人也认为,那是最无聊乏味的东西。”

后来他又给迪利阿德写信,不经他的特别准许,不得在社论版提及麦卡锡或麦卡锡主义。

在1950年至1954年这段时期,担任普利策奖金委员会主席的,不是别人,正是小普利策。由于他和委员会中他的同事作梗,少数敢于同麦卡锡参议员作对的新闻工作者和报纸一直受不到重视。

越南战争又是一场全国危机,要求美国新闻界表现出一些勇气。这回,某些报刊以及普利策奖负责人表现得较好。

在越南战争期间,普利策奖管理当局没有向战地记者颁发“集体奖”,也没有给政府检查部门颁发特别奖状。倒是美联社的彼得·阿内特和马尔科姆·布朗、《纽约时报》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和《洛杉矶时报》的威廉·图伊写的如实的战地报道先后获奖。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军方领导人和政界决策人所不喜欢的。在美国驻西贡的记者中,他们属于少数,他们不相信五角大楼的那种冠冕堂皇的胜利之词。这四位记者冒着丢掉饭碗的危险,在某些情

况下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报道战争的真实情况。

在国内，奈特报系的约翰·奈特和《圣路易斯邮报》的罗伯特·拉希这两位社论撰稿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采取反战立场，却因此而获奖。《迈阿密新闻》的唐·赖特、《丹佛邮报》的帕特里克·奥利芬特和《洛杉矶时报》的保罗·康拉德这些漫画家也是如此。

七名通讯社工作人员由于他们在越南拍摄了使美国人的良心为之不安的战斗照片而获奖。他们之中有三名美国公民霍斯特·法斯、爱德华·亚当斯和戴夫·肯纳利；两名日本人酒井俊夫和泽天；一名德国人斯拉瓦·维德和一名越南人许贡禹。同美联社彼得·阿内特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个新西兰人，他后来来到有线电视新闻广播公司工作。这批人中包括了一些从未得过普利策奖的非美国籍人士。

在所有获奖的越南报道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西摩·赫什的作品了。此人当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业青年。他的越南报道是在身未离美国国门的情况下写出的。

这位 32 岁的芝加哥人曾担任过尤金·麦卡锡倒霉的总统竞选活动的新闻代理人，1969 年初赋闲在家。那时，理查德·尼克松刚刚入主白宫，越南战争打得正激烈，抗议战争的浪潮席卷美国大学校园。赫什正忙于找工作，但没有什么结果。这时，他听到一个骇人听闻的小道消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向他提供消息的，是他几年以前在美联社工作时认识的一位五角大楼工作人员，他对赫什讲了一个传闻，说美国军队在越共领土上的一个村庄里屠杀了许多越南平民。

赫什对这个传说半信半疑。象那样的暴行只有战犯才干得出来，纪律严明的美国军人是不会干那种事的。但赫什尊敬和信任五角大楼的这位朋友，后者认为这个骇人听闻的传说不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赫什的良心和他的新闻敏感促使他进一步调查此事。但这却非易事。他一无钱，二无工作，又没有什么身份证明，更没有什么新闻单位的支持。

不过，他听到有一个不大的基金会，即华盛顿市的菲利普·斯特恩家庭基金会，它愿意对调查性新闻报道提供少量的资助。他便向斯特恩基金会提出申请，得到了 2,000 美元的赠款来从事这项活动。

对于搞这样一项高档次的调查性报道来说，那点钱实在算不了什么。不过，赫什认为，这笔资助也足够他追踪他的消息提供者所说的那些有牵连的部队成员了。他找到了那个有关的美国师第十一旅某排的几个士兵，对他们进行了采访。他们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听后令人发指：1968 年 3 月 16 日，广义东北大约六英里处的一个名叫美莱的小村庄里，有一百多名越南平民被枪杀。美国大兵们还对赫什说，他们的排长、一个久经沙场的老战士威廉·卡利起了重要作用。

当赫什要找卡利时，他发现美军也在秘密调查这次屠杀事件，卡利已被拘留于佐治亚州本宁堡，将由军事法庭审判。

赫什的报道写成了——这是一颗惊心动魄的巨型炸弹。但是，他如何发表呢？他意识到——这是对的——代表官方的报纸肯定是不发表无名之辈的自由投稿的。

同他非常友好的邻居、24岁的戴维·奥博斯特有个主意。他们可以成立自己的报业辛迪加，通过它把美莱报道提供给全国各报。这样就可以得到自由投稿者所没有的有利条件，使他的文章在更大的范围内流传。

他们忙了一阵子，成立了自己的“电讯新闻社”。它的“办公室”就设立在奥博斯特的一间房子里，只有一名记者：西摩·赫什。

但这组系列报道引起新闻界的极大重视。从1969年年底开始，全国36家报纸刊登这组报道。赫什的文章引用卡利排的士兵的话，逐日报道了美军在美莱杀戮无辜的男女老少的情况。他的系列报道不仅使全国震惊，而且震撼了整个新闻界，它们的人力财力比赫什一间小小卧室的新闻社不知要强大多多少倍，然而竟没有任何一家报纸抓住这样的消息。

1970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被“电讯新闻社的西摩·赫什”捧走。当评委和奖金委员会就此进行表决时，全体一致通过。普利策报道奖被非主流报界的人拿走，这是罕见的。

不过，没有多久，赫什就踏进主流报界。他的获奖使他跻身于《纽约时报》的职工行列，在那里，他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第一流调查性记者的名声。他接着又揭露了美国1970年以前对柬埔寨的秘密轰炸和中央情报局至少对一万名美国人设立秘密档案的情况。1979年，他离开《纽约时报》，重新开始自由撰稿生涯。

普利策奖管理当局得了一分，因为它表彰了一组来自非主流报纸（主流报纸一向垄断着普利策奖）的出色新闻。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毕竟太少了。I.F.斯通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20世纪的新闻工作者中间，最能体现约瑟夫·普利策的揭丑精神和智慧的，莫过于斯通。他的崇拜者把他叫作“伊齐”。他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具有战斗精神的调查性记者和现代非主流报刊的创始人。由于他对麦卡锡主义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攻击而遭到主流报纸的排挤，于是，他在1953年创办了《斯通周刊》。在以后的19年中，他的周刊象普利策咄咄逼人的《世界报》一样，把矛头指向华盛顿官方、特别是五角大楼，指责他们对新闻界和人民进行了错误的导向。

在他发表的著作中，他主要以文件为根据，抨击了种族主义、麦卡锡主义、核军备竞赛、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践踏人权行为以及其他许多他认为是破坏民主的问题。斯通曾经当了一阵子社会党人，但他象约瑟夫·普利策一样，是一个成功的资本家。他的周刊一直很赚钱，在1971年停办的時候，有七万多订戶。

他的顽强精神，使他写出了许多重要的独家报道。最著名的是他在1957年透露：原子能委员会的第一次地下原子试验不仅可以在政府所说的两百英

里之内被发现，而且可以在两千六百英里的范围内被发现。政府的说法是要表明，禁止试验将使苏联有可能进行欺骗，而不必担心被发现。斯通证明，这个说法是极为错误的。

这位长期在华盛顿工作的新闻工作者由于那项调查性报道，本应获得1958年普利策奖。他的其他一些报道也同样是很有份量的。然而他以81岁高龄在1989年6月18日逝世时，始终没有得过普利策奖。

可以确有把握地说，斯通是最受冷遇的人了。他敢于破除偶像、独立思考、思想激进，自称“在出现新左派以前就已经是新左派”了。普利策奖管理当局一向是主流新闻界的一个工具，而斯通则始终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牛虻。例如，全国新闻俱乐部没有让他参加，因为在1941年为争取让非白种人也可以参加而斗争的时期，他竟带了一个黑人法官在那里吃午餐。

斯通刚生下来的时候名叫伊齐多·费因斯坦。他父亲是来自俄国的犹太人移民，因此，当他批评以色列的时候，他在他的读者群中引起巨大反响。他曾多次访问那个国家，写过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争取独立的斗争极为有利的两本书。但在1967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以后，他则要求以色列赔偿阿拉伯难民的损失，把被占领土让他们，建立一个与以色列结成联邦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以耶路撒冷作为共同的首都。

类似这样的观点使他的拥护者更加不安，然而这正是I.F.斯通的英雄本色。7月份炎热的一天，在曼哈顿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兰多姆出版公司的副发行人彼得·奥斯诺斯在讲话时说，六百人挤在这里，许多人热得受不了，“我对空调感到遗憾，但伊齐宁愿让我们大家多少有点儿不舒服。”

这听起来有点象约瑟夫·普利策给一个伟大的新闻工作者下的定义。《纽约时报》刊登的斯通的讣告也是这么写的，它称他是“揭露阴暗面的小册子作者，他不知疲倦地为和平与公民自由、为反对官方逃避责任和胡作非为而斗争”。

象斯通这样一位多年从事新闻工作、成绩卓著的新闻工作者，为什么竟然终生没有得过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呢？

普利策奖负责人、奖金委员会秘书罗伯特·克里斯托弗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但他猜想，斯通之所以未能获奖，可能是因为他出版的是一种“新闻通讯”，而不是正式报纸。奖金条例规定，只考虑“每日出版的、星期日出版的或者至少一周出版一次的美国报纸上刊登的材料”。

一个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猜想可能是：《斯通周刊》之所以从未得过普利策奖，乃因为它是左倾的非主流报纸。普利策奖对所谓的美国“地下”报刊从来就不那么慷慨。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在普利策奖的75年历史中，非主流报纸的作品从来没有得过奖。虽然全国一些最有份量的报道是它们完成的。（《乡村之声》周刊两次获得普利策奖；1981年特里萨·卡彭特的特稿和1986年朱尔斯·菲弗的漫画。有些人可能认为，如果人们仍有怀疑的话，这两项奖证明《乡村之声》已经成长为流报纸。）

斯通有许多书，本来也是可以得奖的。最主要的是《朝鲜战争秘史》。它引用政府文件，有力地证明：这场战争是美国挑起的。在 1952 年，这个指责是具有爆炸性的，因此，只有《每月报刊评论》这家小报敢登它。（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 1988 年重新出版了此书。）

不过，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里，显然并没有这样的记录：斯通曾经谋求过普利策奖，或者他被提名过。如果这个情况准确的话，那也不足以解释他的被冷落。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有权把奖金给予任何人，不管此人的作品是否被提名。多年来，奖委会不止一次这样做。奖委会还有权颁发普利策特殊奖，如《纽约先驱论坛报》已故的沃尔特·李普曼获得 1958 年奖状，前普利策奖负责人约翰·霍恩伯格获得 1976 年奖状，作家西奥多·索伊斯·盖泽尔（以索伊斯博士闻名）获得 1984 年奖状。

斯通逝世 9 个月后，普利策奖金委员会在哥伦比亚大学开会讨论 1990 年奖金事宜。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来纠正过去的错误。然而遗憾的是，在两个整天的讨论中，只字未提给斯通发个身后奖状。

委员会如果想纠正自己的错误，有的是机会。每年 4 月份在哥伦比亚大学宣布当年的普利策奖时，斯通的数以千计的崇拜者希望当局能表彰一下（仅仅这一次）这个令人讨厌的“牛虻”。其实，在许多人看来，新闻工作就应当象斯通那样来做。

既然索伊斯博士可以获得奖状，为什么斯通就不能呢？

普利策奖金管理当局也曾经弥补过自己的失误。就尼尔·希恩来说，花了 20 年时间，他才得到公正的对待。

1971 年希恩作为《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五角大楼时，得到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 1968 年美国卷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国防部机密档案。这份卷帙浩繁的报告表明，林登·约翰逊政府在美国卷入东南亚方面事实上奉行着一种欺骗、制造假象和耍花招的政策。这份报告多达 47 卷、250 多万字。在《纽约时报》开始刊登这些文件后，尼克松政府告到联邦法院，赢得了暂停发表的命令。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政府事先限制出版。

当《纽约时报》被迫停止发表后，《华盛顿邮报》得到了其中的某些文件，也开始予以发表，从而使它成为政府控告的第二个被告。其他一些报纸，主要是《波士顿环球报》，也刊登了一部分五角大楼的文件，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是政府控告的主要对象。

这些报纸把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结果打赢了，导致重大的第一修正案。奉命停止发表档案 15 天后，《纽约时报》又重新刊登五角大楼的文件。

那年春天在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公共服务奖评委一致建议把 1972 年金质奖章给予希恩和刊登这些文件的《纽约时报》。咨询委员会也一致通过，但它把希恩的名字去掉了，因为普利策的遗嘱规定，金质奖章只给报纸，不给个人。

在 1972 年，普利策奖的评审工作仍然要过三关：评委的建议需要被咨询委员会接受，而咨询委员会的建议需经哥伦比亚大学由 22 人组成的董事会最后通过并公开宣布。当董事们收到关于《纽约时报》由于发表五角大楼的文件而获奖的建议时，出现了一场反新闻界的轩然大波。有些董事们，其中许多人是著名的律师，反对表彰一家发表政府机密报告的报纸，这种行为被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认为是违法的。那年的另一项新闻奖也遭到同样的反对：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关于印度—巴基斯坦战争的调查性报道也引用了秘密文件。

在就这两项有争议的奖金进行辩论时，有两位董事弃权。一位是联邦法官弗雷德里克·冯·佩尔特·布赖恩，他之所以没有出席，是因为五角大楼文件一案是由联邦法院处理的；另一位董事是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他是《纽约时报》的发行人，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决定是由他最后作出的。

在一次特别会议上，剩下的全体董事进行了两次表决，否决了对《纽约时报》和专栏作家安德森的授奖。在这两次表决之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威廉·麦吉尔——普利策奖金咨询委员会成员——坚持要求重新考虑。他劝说董事们采取一种保持一定距离的做法：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意，另一方面发表一项措词谨慎的声明，表明“有保留意见”——“如果由董事们单独作出选择的话，某些获奖人将不会当选”，即明显地暗示《纽约时报》和杰克·安德森。

咨询委员会和大部分董事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 1975 年，那时，董事们最终把他们的权力交给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完全退出了奖金的评审工作。于是，咨询委员会成为终审者，并改名为普利策奖金委员会。

委员会的委员们还得了一分。如果大学的董事们获得胜利，拒绝奖励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话，那么由此而对普利策奖产生的压力可能使它归于毁灭。

然而把希恩的名字从奖状中去掉，是极为不公平的。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委员会反对改变普利策在本世纪初定下的规则。对希恩来说，这是他第二次眼看就要得奖，却又被拒绝了。他的许多同事认为，他在 1964 年受到的对待是不公平的。那年，美联社的马尔科姆·布朗和《纽约时报》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共同获得了普利策国际报道奖。他们之所以获奖，是因为在美国军方不断干扰的情况下，他们从越南发回了关于美国卷入吴庭艳政权的准确报道。

希恩当时是合众国际社驻西贡记者。他的同事认为，他象布朗和哈伯斯塔姆一样表现得很忠实和勇敢，理应跟他们共同得奖。遗憾的是，当吴庭艳在一次政变中被推翻的时候，希恩正在日本，因而失去了一次机会，使他写得很出色的关于吴庭艳政权的报道缺少了最后一个插曲。合众国际社提出的他的候选作品是很出色的，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这一点，结果评委们把他甩掉了。

在那次武断的评审之后过了 25 年，希恩终于得到一定的公正评价。他的著作《一个闪闪发亮的漂亮谎言：约翰·保罗·范恩和美国在越南》获得 1989 年非小说类普利策奖。

还有两位极为著名的美国记者从未获得普利策奖，其原因正如希恩个人未能获得公布五角大楼文件奖一样。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写的水门事件报道获得 1973 年普利策奖，但因为这是“公共服务”奖，金质奖章只颁发给他们的报纸《华盛顿邮报》，而不给他们个人。

这两位揭发水门事件的记者在许多著作中和银幕上大名鼎鼎，然而他们却从未得过任何普利策奖，这一点大概会使大多数人感到意外吧。

1972 年下半年，《华盛顿邮报》和它的伍德沃德—伯恩斯坦小组几乎是单独地调查了华盛顿市水门建筑群中民主党总部 6 月 17 日被窃听事件。当《华盛顿邮报》抓住水门事件不放时，其他新闻媒介对此并无很大兴趣。五名伪装人员带着大量窃听装置，深更半夜闯进水门公寓，他们被当场抓获。《华盛顿邮报》揭发了白宫和这五个人之间的联系。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还揭露，许多人，一直到白宫，都正在掩盖此事。他们发现，共和党用秘密筹集来的钱资助一项广泛的运动，来对民主党进行政治中伤。

当尼克松政府责骂《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斥之为一文不值的劣等新闻时，全国大部分报刊胆小如鼠地袖手旁观。在华盛顿以外，水门事件的报道实际上没有被人们重视，因此，对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的连任并没有构成障碍，他们俩在 1972 年 11 月以压倒多数重新当选。

在此期间，《华盛顿邮报》继续孤军作战，在新闻版和社论版上不断揭露和讨伐这个丑闻。到 1973 年，总共有七名参与水门窃听事件的阴谋分子被判刑认罪。《华盛顿邮报》把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报道提出来，作为普利策奖的候选作品。

同年 3 月初，哥伦比亚大学评审委员会只把《华盛顿邮报》列为公共服务金质奖章第三名候选者。头两名候选者是《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时报》，它们的报道同水门事件无关。

约翰·霍恩伯格在他的普利策奖金史中，援引未透露姓名的一位评委的话，解释了为什么《华盛顿邮报》未被推荐上去。这位评委说：“水门事件仅仅是大象屁股上的一个小疵点。”

这反映了美国整个中部地区的编辑们的观点。大家普遍认为《华盛顿邮报》是左倾的、孤立的、几乎是无政府主义的、控制不了的报纸。它的勇敢无畏的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当时大概感到极其孤立无援吧。不过，两个星期以后，真相大白。水门窃听的被告之一詹姆斯·麦科德给联邦法官约翰·赛里卡写信，揭露了掩盖活动。当时赛里卡给麦科德和其他几个阴谋活动分子判了重刑，同时又暗示，如果他们合作的话，他可以减刑。麦科德于是供出了前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以及总统顾问约翰·迪安、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竞选活动事务前副主任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迪安又供出了尼

克松的两名白宫高级助理 H.R. 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

当掩盖罪行引人注目地被揭发的时候，普利策奖金咨询委员会正于 4 月 12 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开会选择 1973 年的得奖者。咨委会成员一致表决，推翻了评委会的推荐名单，把公共服务金质奖章给予《华盛顿邮报》。

到那时，水门事件到了它的历史性收尾阶段，理查德·尼克松于 1974 年 8 月 9 日灰溜溜地下台了。他自己的白宫私下谈话录音证明，水门事件的掩盖活动是他下令进行的，但他从未承认这一点。一个月以后，他得到接替他的杰拉尔德·福特的无条件赦免。1976 年，选民们一有机会，就把福特拉下了总统宝座。

普利策奖的当权者总算又得了一分。他们差点儿没有表彰这项特好的新闻，自约瑟夫·普利策以来很少有发行人敢于追求这样的报道。但是，正象事态的发展证明《华盛顿邮报》是正确的一样，它的得奖也证明了给奖人的眼光。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水门报道使他们成了名记者。报刊和电视台一再讲述他们的业绩，他们已经成为百万富翁。他们几乎获得所有重要的美国新闻奖，唯独《华盛顿邮报》得到的普利策奖没有他们的份儿。最近，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找到了一种简单的方法来绕开关于公共服务金质奖章必须给报纸，而不给个人这一武断的规则。但这种创造性来得太晚了，已无法弥补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受到的委屈。

普利策奖不仅反映了象《华盛顿邮报》在水门事件上的所作所为体现出来的报界勇气，而且也反映了同一家报纸在处理珍妮特·库克丑闻上所表现出来的报界懦弱。

这个令人遗憾的插曲是围绕所谓“吉米的世界”的新闻报道展开的，它倒使美国公众熟悉了普利策奖，其效果也许为任何英雄的新闻业绩所不及。公众本来不大知道普利策奖，可是，1981 年 4 月份，当他们获悉一篇编造的新闻报道获得这种奖时，此奖的知名度陡然大增。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以捏造的新闻获奖的那家报纸竟是在水门事件中名闻遐迩的、近乎传奇般的《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丢丑的消息被全国的报刊和电视广播所采用，历时数周不衰。在普利策奖的竞争史上，虽然几乎每年都免不了有些小的风波，可是却从来没有如此众目睽睽。有趣的是，名声扫地的是那家当事的报纸，而普利策奖则安然无恙。舆论的轩然大波反而有助于提高普利策奖的知名度，使公众更加尊重它。它的地位的提高，是下列事实促成的：全国的新闻媒介要么忽略了，要么故意不提普利策奖金管理当局在对待这个骗局方面表现得并不好。

“吉米的世界”是一篇耸人听闻的报道，讲的是哥伦比亚黑人区一个 8 岁孩子的吸毒故事。《华盛顿邮报》记者珍妮特·库克写的这篇报道中，生动地描写了她亲眼目睹这个男孩的妈妈让她的情人给吉米注射海洛因的情

景。这篇报道发表后，引起轰动。华盛顿市长马里恩·巴里命令警察找到这个男孩子。警察到处搜寻，都未能找到他。巴里斥责这篇报道纯属捏造。

但《华盛顿邮报》支持库克和她的报道。几个月以后，他们把她的报道提出来，参加普利策奖的竞争。她的报道获得了新闻特写奖。

库克同其他一些人获得 1981 年奖的消息广播后，她的骗局开始暴露。首先，《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本杰明·布雷德利接到瓦萨学院的一个电话，说库克在提交给普利策奖评委的简历中自称毕业于该学院，但并无其事。库克还自称曾获得托勒多大学硕士学位，但据《华盛顿邮报》另一位编辑了解，也无此事。库克在她的编辑们的询问下，承认她夸大了她的学历。在人们焦急地搜寻“吉米”的家而毫无结果的 11 个小时以后，库克承认这个男孩是她虚构的，她的报道大部分是捏造出来的。

库克辞职了，隐姓埋名，再也不露面了。《华盛顿邮报》把奖金立即退回，发表了自我解脱的长篇致读者信，实际上把这场骗局的全部罪责推在珍妮特·库克身上。

全国许多编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要更深一些。他们认为《华盛顿邮报》对整个事情的处理是不可原谅的。那个 26 岁的记者犯了严重的报道错误，她被解雇是完全应该的。但该报的编辑们也有很大的责任：

他们没有核实她的学历，就雇佣她当记者，发表她的报道；

他们没有坚持在发表报道之前，让库克向一个编辑秘密透露她的消息来源——“吉米”的母亲；

《华盛顿邮报》的许多职工，包括一些编辑，对这篇报道的真实性越来越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仍把它提出来参加普利策奖的竞选；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该报缺乏应有的谦虚精神，而坚持要采取行动找到“吉米”，当他们听说他身体不好时，还要设法帮助他。该报的编辑们显然是相信有这么一个生命垂危的孩子的。其实，他们并没有去找“吉米”，只是在舆论哗然时，他们才做做样子。

《华盛顿邮报》至少有四位编辑对上述失误负有直接责任，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记者鲍勃·伍德沃德，他在水门报道中立功后已被提拔到经理岗位上。然而，任何一位编辑都没有受到批评。责任完全由珍妮特·库克一人承担。

然而，问题还不仅仅如此。普利策奖金管理当局也让库克一人承担了全部责任。《华盛顿邮报》得奖心切，竟把一篇连它自己的编辑们都怀疑其真实性的报道提出来参赛。对这样一家报纸，普利策奖金委员会为什么连一点义愤都没有表示呢？《华盛顿邮报》使奖金委员会丢了脸。考虑到下述事实，更是如此：据电影评论家朱迪思·克里斯特和其他几位特写评委透露，他们并没有把“吉米的世界”专题报道列入他们的推荐名单中。奖金委员会甚至

不征求克里斯特的努力工作的评委会的意见，就擅自把珍妮特·库克的报道从“地方性一般报道”类中取出，作为特写报道授奖。

当克里斯特看到这篇东西时，她十分气愤。“这显然是虚构之作，”她对《纽约》杂志的记者说。

当这个骗局被全国报刊以大字标题报道出来时，奖金委员会的成员是十分尴尬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采取低姿态、尽量摆脱这件事的原因吧。他们之所以不表态，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想给他们在《华盛顿邮报》的友人们增添烦恼，何况布雷德利这位具有魅力的朋友也在《华盛顿邮报》，他在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奖金委员会同他们共过事呢。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吧，反正奖金委员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惩罚竟把一篇连它自己的一些编辑也持怀疑态度的文章提出来参赛的《华盛顿邮报》。如果这个委员会表现得勇敢一些、不那么照顾私人情面，它本来应当至少让《华盛顿邮报》停止参赛一年，起码应该正式地发表一封公开谴责信，表示适当的义愤吧。

正象《时代》周刊的托马斯·格里菲思曾经说过的那样：“普利策奖金是一个友好俱乐部。”

8. 文学、艺术、音乐奖的 75 年

可以这么说，如果约瑟夫·普利策不另设文学艺术奖的话，他的新闻奖也决不会这么有名。首批全国性的文学戏剧奖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这主要是由于在报刊显著地发表人们争论的结果。

20 世纪初美国文学的觉醒，生不逢辰，正碰上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主宰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 33 年。他的清教徒式的风格多年来一直使获奖作品成为人们争论的对象，小说、戏剧尤其是如此，它们并不能准确地代表美国创作界的最佳作品，甚至也说不上是“杰出的范例”。

前面提到的《爱笑的小伙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爱笑的小伙子》是奥利弗·拉法吉的一部描写美国土著民族爱情故事的悲剧性小说。小说中的印第安人恪守美国白人给他们规定的许多清规戒律，他们讲的是古老的西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印第安人专用的那种僵硬呆板的语言。这部小说并非美国的经典之作，甚至也说不上是优秀作品。

在《爱笑的小伙子》获得普利策奖的 1930 年，奖金委员会不仅拒绝了托马斯·沃尔夫的《向家乡看吧，安琪儿》，而且也拒绝了威廉·福克纳的《声音与疯狂》和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后面的三部著作现在被认为是经典性作品。

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和《丧钟为谁而鸣》也未能获得普利策奖。《丧钟为谁而鸣》曾在 1941 年得到奖金评委会的推荐，但被奖金委员会拒绝而未获奖，因为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忿怒地斥责这部小说是“令人作呕的和淫荡的”。虽然 10 年以前已经从小说奖的规则中删去了“健康的”这一要求，但巴特勒仍然表示讨厌海明威，因为他描写了一个男人在睡袋里同一个女人消磨时光这样的情节。

巴特勒校长也未能发现福克纳的魅力，后者的几部最好的小说都未能获得普利策奖。除了《声音与疯狂》以外，还包括：《在我弥留之际》（它在 1931 年输给了玛格丽特·艾·巴恩斯的《仁慈的年代》）、《八月之光》（它在 1933 年输给了 T.S. 斯特里布林的《商店》和《押沙龙，押沙龙！》（它在 1937 年输给了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

巴特勒 1945 年 83 岁的时候退休，于是普利策奖金委员会补救了过去的失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他的一部不那么重要的作品）获得了 1953 年普利策奖。福克纳晚年两部不那么有价值的作品《寓言》和《掠夺者》分别获得了 1955 年和 1963 年的普利策奖。

到那时，普利策奖已经受到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不仅海明威和福克纳的最优秀的作品受到了冷遇，而且当代一些最伟大的作家被完全无视。除了托马斯·沃尔夫外，还包括：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西奥多·德莱塞和弗兰纳里·奥康纳。

与此同时，奖金却令人不解地授予了：玛格丽特·威尔逊的《能干的麦克劳克林一家人》、卡罗琳·米勒的《怀中的宝贝儿》和马丁·弗莱文的《黑暗中旅行》。

有几次普利策奖评委作出的关于小说的决定受到普遍的称赞，如 1940 年授奖予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1947 年授奖予华伦的《国王供奉的人们》。但总的来说，获奖作品有争议的较多，如，1936 年普利策奖授予哈罗德·戴维斯的《角中之蜜》，而没有授予托马斯·沃尔夫的《时间与河流》和斯坦贝克的《托蒂亚平地》。

1947 年又发生了一次小小的争论，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感情用事地进行幕后操纵，决定把“小说”奖的名称，改为“故事”奖。这完全是为了使委员会有可能把 1948 年奖授予詹姆斯·米切纳的《南太平洋的故事》，它不是一部长篇小说，而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罗曼蒂克短篇故事的集成。

过后不久，1950 年，图书出版业开始主办全国图书奖，其部分原因就是不满意普利策奖对美国文学界的不公正态度。在作家和出版家中间，全国图书奖受到普遍的尊敬，但是，对广大公众来说，普利策奖则比它有名得多，这是新闻界广为宣传的结果。

这两类奖都依靠有资格的评论家、作家和教育家作为它们的评审员。所不同的是，由新闻界负责人组成的强有力的委员会对普利策奖拥有最后决定权。这些新闻界人士有时因不听取专家评委的意见而引起公愤。下面是两个明显的例子：

——奖金评委会推荐托马斯·平钦的《万有引力之虹》获 1974 年普利策奖，但委员会认为这部受到评论界推崇的小说行文混乱，决定那一年不发故事奖。这样一来，委员会的成员们就无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一年是美国小说故事特别丰收的一年。库尔特·冯内古特、乔伊斯·卡罗尔·奥茨、约翰·奇弗、伯纳德·马拉默德、菲利普·罗斯、戈尔·维达尔、艾萨克·辛格、桑顿·怀尔德、托马斯·伯杰、斯坦利·埃尔金、阿瑟·科恩、托马斯·麦关恩和约翰·加德纳等人的新作在他们眼皮底下一扫而过。

——1977 年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评委会推荐诺曼·麦克莱恩的出色的三部曲小说《河流潺潺而过》获得故事奖。《出版者周刊》称赞这位芝加哥大学退休教授的以其故乡蒙大拿为背景的作品是一部“极好的处女作”。但奖金委员会认为这部著作没有什么价值，决定那一年不发故事奖。当时 74 岁的麦克莱恩对此一笑置之，认为大部分由东部人组成的普利策奖金委员会之所以摒弃他的作品，大概是因为“这些故事涉及到他们的老根子吧”。

普利策奖金管理当局时常被指责有种族主义倾向。这种指责的产生是因为美国最受人推崇的两个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和詹姆斯·鲍德温一直到死都没有得过普利策奖。1988 年，48 位作者联名写信给《纽约书评》双周刊，

抱怨鲍德温既没有得过普利策奖，也没有得过全国图书奖，这是不公平的。这封信还愤慨地指出，黑人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小说《被爱的人》未能获得1988年全国图书奖或全国书评奖。在这封信发表几周以后，《被爱的人》获得普利策奖。

于是，有些人指责普利策奖金委员会屈服于压力。显然，有时委员会是有口难辩的。

不过，有一回奖金委员会确实作出了一项非常好的决定，受到普遍的喝彩，产生了小小的奇迹。

这就是约翰·肯尼迪·图尔的充满酸甜苦辣的奇异经历。他获得普利策奖以及随之而来的名声，来得太晚了，对他的生活已没有什么意义了，然而却使他的母亲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图尔的小说《笨伯联盟》获得评论界的好评，在他死后于1981年获得了普利策奖。他24岁于1962年在波多黎各当兵时，开始写这部以新奥尔良为背景的关于流浪汉冒险的滑稽故事，完成于1963年。此后有一段时间，他同西蒙和舒斯特的一位编辑进行了长期的通信，这些通信现在仍然保密。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谁也不清楚。但是，在图尔多次访问之后，手稿于1965年或者1966年被退回了。以后，图尔再没有作过认真的努力来出版此书。

这位未来的作家曾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他从部队复员后，执教于新奥尔良的多米尼加学院。1968年12月，他辞去教职。三个月以后，他在他的汽车里被一氧化碳废气窒息而死。

他的母亲西尔马在他自杀后，为了使他的小说出版问世，到处奔走。她忙碌了10年之久，毫无结果。她的唯一的一本复写稿已经被弄得很脏了，每从一家出版社退回，损坏的程度就增加一分。它至少被八家出版社退稿。1976年她终于有了一线希望，她从报上看到，小说家沃克·珀西那年的新奥尔良的洛约拉大学讲学。

1976年的一天，珀西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位七十四岁的老太太推着一辆扶车，一踉一跛地走了进来，跟在她身后的司机拿着一摞破损的手稿。她自我介绍，说她是一个退休的教师，眼下孤零零地就剩她一个人了。她恳求他帮帮忙，给她已故儿子的小说找一家出版社。她向他保证，这可是“一部杰作”啊。

为了把这个老太婆打发走，珀西满口答应看看稿子，但心里却想，看不了四五页就得退稿了。然而，他看完五页之后，竟欲罢不能，又看了下去。他发现它“确是一部奇书，手笔不凡，嘻笑怒骂，自成一体，把新奥尔良的生活写活了”。珀西决定助一臂之力。他自己的出版社不肯接受此书，理由是：在今日的市场上，出版一部处女小说，而没有健在的作者参与促销，是很难成功的。但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正要出版一批“有价值的非商业性小说”，因此欣然接受此书。

1980年5月,《笨伯联盟》出版问世了。虽然此书出自堂堂学府出版社,但是最初仍然被人视之为地下读物,甚至是宣传迷信的低级玩艺儿。不久,全国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溢美之词,跃然纸上。接着,它便荣获普利策奖。

西尔马老人家代表她的儿子接受了此奖。由于得了普利策奖,她为此书的出版而含辛茹苦、奔走多年的事迹也成为全国报刊的头版新闻,从而有助于这部小说畅销不衰。她靠儿子的此书发了点小财,于1984年含笑而死。

普利策奖的评审人员挨骂不少,但在此项授奖上却值得称道,倒不是因为他们使一个悲剧故事获得一个欢乐的结局,而是因为他们挑选了一本出色的书,为文学界做了点公道的事情。

象故事奖一样,戏剧奖也总是引起争论。普利策的“过份高的”要求,再加上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的过份拘谨的价值观,使戏剧奖象小说奖一样受到了多年的束缚。大家对普利策奖的决定的不满,导致产生了另一种全国性的戏剧奖,正象它导致全国图书奖的出现一样。

在许多评论家的美国最佳戏剧选的清单上,坦内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位居前列。事实上,《时代》周刊的威廉·亨利、1990年戏剧评委会主席已经把《玻璃动物园》列为美国历史上最好的四部戏剧之一。不过,它在1945年却输给了玛丽·蔡斯的平淡乏味的《哈维》。两年以后,忿怒的美国戏剧界创办了自己的安托万内特·佩里(托尼)奖。

普利策奖导致新的戏剧奖的产生,这实际上已经是第二次了。1935年,莉莲·海尔曼的《孩子们的时间》被拒绝授予戏剧奖,因为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和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讨厌这个戏剧中的女人同性恋主题。那年的戏剧奖被佐伊·艾金斯的《老处女》捧走。百老汇的戏剧评论界一气之下,创设了自己的纽约戏剧评论奖。

海尔曼从来没有得过普利策奖。甚至她的最著名的戏剧《小狐狸》也未能获得1939年奖,此奖为罗伯特·舍伍德的《亚伯·林肯在伊利诺斯》所得。

普利策奖金评审人员值得称赞的是,他们承认尤金·奥尼尔是美国最伟大的剧作家。奥尼尔四次获得普利策奖,只有罗伯特·弗罗斯特在诗歌方面的获奖总数可以与之相比。不过,奥尼尔的最佳作品并非总是能够获得普利策奖的。他的三部比较优秀的作品都未能获奖:《清晨变成了厄勒克特拉》在1932年输给了一部音乐剧《我为你歌唱》;《在榆树下的欲望》在1925年输给了西德尼·霍华德的《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卖冰的人来了》在1947年未能获奖,是因为普利策奖金委员会认为那一年没有任何剧作值得获奖。

总的来说,普利策戏剧奖的评审工作反映了美国戏剧的最佳作品,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无疑超过了小说故事奖的评审工作。例如,1938年授奖予桑顿·怀尔德的《小城风光》;1948年授奖予坦内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1949年授奖予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1955年授奖予坦内西·威廉

斯的《热铁皮屋顶上的猫》；1957年授奖予尤金·奥尼尔的《直到夜晚的漫长一天》。

不过，偶尔仍然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决定。例如，1958年戏剧奖授予凯蒂·弗林斯改编的《向家乡看吧，安琪儿》。这部剧作是根据托马斯·沃尔夫的同名经典小说改编的。而原作则被拒绝授予1930年的故事奖。评论家们对此只能瞠目结舌。

1963年的事情则引起轩然大波，当时普利策戏剧奖评委会推荐爱德华·阿尔比的《谁怕弗吉尼亚·吴尔夫？》获奖，但遭到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拒绝，因为它认为该剧不够“高尚”。由于后来舆论哗然，委员会乃商定，从今以后，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凡是自己没有读过的书，没有看过的戏剧，都可以对之不表态。这等于无意之中承认他们不负责任，因而使评论界十分恼怒。委员会还决定从规则中删去“高尚”的字眼，然而为时已晚，对阿尔比的戏剧已无所裨益。不过，他的《微妙的平衡》倒是在1967年获奖。

普利策奖的评审人员有时也使那些对他们冷嘲热讽的批评家们受到了一定的报应。事情发生在艾尔弗雷德·于里的《给戴西小姐开车》获得1988年戏剧奖以后。他的戏剧讲的是一个脾气古怪的犹太人寡妇和她同很有耐心的黑人司机之间的友谊的故事。评论界对这部剧本普遍反应冷淡。然而，这部剧改编为电影后，却出人意料地十分叫座，赚了不少钱，获得了四项奥斯卡奖，包括最佳影片奖。

当然，得奖的多少和票房收入的高低并不能证明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但普利策奖的评审人员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向批评家们表明：究竟谁更了解公众的趣味。

同小说和戏剧奖相比，历史、传记、诗歌和非小说类图书方面的普利策奖基本上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只有传记奖有几个引人注目的例外。

1957年，传记评委会推荐了两部优秀传记作为最终候选者：艾菲厄斯·梅森的《哈伦·菲斯克·斯通：法界支柱》和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的《罗斯福：狮子和狐狸》。但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拒绝了这两项提名，把奖金授予了马萨诸塞州年轻的参议员约翰·肯尼迪的《勇敢者传略》。

由于谣传此书实际上出自肯尼迪的同事西奥多·索伦森之手，人们要求普利策奖办公室撤销这位参议员的奖金。当时担任普利策奖负责人的约翰·霍恩伯格调查了此事，得知肯尼迪1954年背部动手术后长时期休养康复期间确实写了此书。授奖是站得住脚的。

肯尼迪就是在人们围绕此书是否出自他的手笔的纷纷议论声中获得此奖的。此书基本上是把其他传记作家撰写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和丹尼尔·韦伯斯特等人物的传记加工改写而成，是一部精心设计的政治论著，有助于他竞选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纽约时报》的好朋友、1940年至1954年曾在普利策奖金委员会任职的阿瑟·克罗克大力说服曾跟他共过事的委员会委员们否决传记评委会的决定而把奖金授予肯尼迪的著作。

1962年传记奖又出了问题，成为报纸的头版新闻。当时奖金委员会一致决定把那一年的传记奖授予W.A.斯旺伯格的《公民赫斯特》，他是专写报业大王传记的能手。不过，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们仍然拥有最后决定权，他们反对给斯旺伯格授奖，据他们说，此书不符合约瑟夫·普利策的宗旨，因为后者规定获奖的传记著作必须“用显著的例子教育人民进行爱国的无私奉献”。这些条例后来被修改，删去了那种陈腐的要求。11年以后，斯旺伯格的一部虽然不那么有价值、但也颇为扎实的传记著作《卢斯和他的帝国》终于获得普利策奖。

约翰·霍恩伯格在他的普利策奖金史中写道，虽然小赫斯特对斯旺伯格写的关于他父亲的过份直言不讳的传记并不满意，但他也认为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们拒绝授奖是不公平的。但据另一些人说，小赫斯特私下则对董事们采取强制手段，威胁说，如果该校给此书授奖，他将对它进行报复。不过，这些说法从来没有得到证实。赫斯特传被拒绝授奖，是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们唯一的一次否决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决定。

多年来围绕诗歌和音乐奖，倒很少有感情激动的事。这似乎是很正常的，因为约瑟夫·普利策并没有要求设立这些奖。

普利策对诗歌不怎么感兴趣。他的遗嘱没有提到它。然而，这并没有妨碍普利策奖的管理人员增添诗歌奖。他们是在美国诗歌协会的建议下于1922年设立此奖的。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诗歌奖是普利策奖中争论最少的，这大概是因为美国公众象约瑟夫·普利策一样，对诗歌并不特别热心。

然而，早期的奖金评审人员犯了严重的疏忽错误，应该在普利策奖金的耻辱簿上写它一笔。他们从来没有给T.S.艾略特或埃兹拉·庞德授奖。

约翰·霍恩伯格在他的普利策奖金史中写道，“记录中没有提到曾经考虑过T.S.艾略特或庞德，从而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作品被评审人员认为不在授奖计划的范围之内。”把这段话翻译得明白一点，就是：这两位移居国外的人虽然是在美国出生和受教育的，但却选择了在欧洲居住，因而不是“美国”作家，而按奖金条例规定，只有美国作家，才能受奖。

霍恩伯格关于评审人员思路的推理，可能是正确的。但这位139教授应该再加一句：就这件事情来说，评审人员是错误的。这两位诗人的大部分最佳诗作是在美国写成的。艾略特的最有名的诗《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是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写成的，至少过了10年他才成为英国国民。

关于评审人员思路的一个比较真实的猜测是：他们不喜欢这两位诗人或他们的作品。艾略特有点古怪，他的诗歌是复杂的，某些人往往很难看懂。庞德是法西斯主义者，对美国诗歌协会来说，他的诗也有点晦涩。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吧，反正在美国诞生的两个最伟大的诗人从来没有得过普利策奖。

不过，说句公道话，也应当指出，许多作家的诗作确实得过普利策奖，

他们是：埃德温·阿林顿·鲁宾逊、埃德娜·文森特·米莱、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W.H.奥登、卡尔·桑德伯格、西奥多·罗思克、华莱士·史蒂文斯、罗伯特·佩恩·华伦，当然还包括四次得奖的罗伯特·弗罗斯特。

同诗歌不一样，音乐是约瑟夫·普利策最喜爱的艺术之一。他特别喜欢贝多芬、华格纳和李斯特的乐曲。这位出版家向纽约交响乐团遗赠了 50 万美元，相当于他对普利策奖金的赠款。

但他的遗嘱并没有要求设立音乐奖，而只要求为一位专修音乐的大学设立奖学金。1943 年，在普利策逝世多年以后，奖金委员会擅自把奖学金改为音乐奖。这个可疑的决定并没有经过认真的讨论，为什么这样改，理由至今不明。

普利策的意图在他的遗嘱中说得很明白：他要表彰和鼓励美国的文学艺术。得奖者必须是美国人。主题也必须是美国的。既然他那么热爱生育他的欧洲的音乐，他本应设立普利策音乐奖来表彰土生土长的美国的音乐。

在设立那个可疑的普利策音乐奖的近半个世纪来，获奖的作品大部分是美国人对欧洲音乐的模仿。黑人 W.C.汉迪的怨曲或者两位白人乔治·格什温和伦纳德·伯恩斯坦的富有怨曲色彩的曲子从来没有得过普利策奖，获奖的几乎总是来自欧洲的白人的作品，诸如《交响协奏曲》和《幻想曲》等等。1943 年奖金委员会成员撰写的音乐奖条例如下：

奖励美国人以任何较大的形式创作的、当年在美国首次上演的出色的音乐作品，包括室内乐、管弦乐、合唱、歌剧、歌曲、舞蹈音乐或者其他形式的音乐剧……

什么叫“较大的形式”呢？奖金委员会未必能选择一个比这更傲慢无礼的词来表达其含义了：美国黑人作曲家不得申请。使这个条例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因为在美国国土上创作的最具有独创性、最有持久魅力和影响的音乐都植根于美国黑人之中。唯独有个小小的例外，轮到得奖时，黑人音乐却被置之脑后。

1965 年，普利策音乐奖评委会推荐爵士乐大师杜克·埃林顿获得特别奖状，令人耳目一新，其原因就在这里。埃林顿是乐队指挥，他演奏的《请乘 A 列车》，曾使地铁名闻遐迩。后来，地铁发生事故，使调查此事的《纽约新闻日报》的专栏作家吉姆·德怀尔被提名为普利策新闻奖的候选人。

埃林顿的被推荐是一个里程碑。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创作真正具有美国特色的音乐的黑人作曲家被提名获得普利策奖。三位评审员——《新闻日报》的罗纳德·艾尔、《纽约人》周刊的温思罗普·萨金特和《圣路易斯邮报》的托马斯·谢尔曼——打开了新局面，向奖金委员会提出了由尤恩执笔撰写的下列推荐信：

我的评委同事们和我一致认为，过去一年在美国首次上演的音乐作品

中，美国作曲家没有什么重要的作品值得获得普利策奖……因此，我们谨提出给美国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爱德华·杜克·埃林顿以某种适当的奖励，他在过去 30 多年的时间里对美国音乐界作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贡献，写出了许多艺术性很高的乐曲，主要是爵士乐。……

当评委会推荐信的消息透露到新闻界时，各地爵士乐的爱好者欢欣鼓舞。约瑟夫·普利策可能喜欢华格纳，而不喜欢埃林顿，但更多的美国人可能同意马克·吐温的观点，马克·吐温曾经说：“华格纳的音乐华而不实。”

遗憾的是，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拒绝授奖予杜克·埃林顿。他的音乐不符合条例列举的标准。

象埃林顿、格什温和伯恩斯坦这样一些作曲家终其生都没有获得普利策奖，而象利奥·索尔比、弗吉尔·汤姆森和莱斯利·巴西特之类声望并不那么高的人反而得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可以满有理由地说，埃林顿不仅仅应当获得一份特别奖状，而且应当获得普利策奖本身，远在 1965 年以前就应该获得。

《我为你歌唱》这部音乐剧获得 1932 年戏剧奖，本应有格什温的一份儿。这项奖授予了音乐剧本的作者乔治·考夫曼和莫里·赖斯金德以及抒情诗人艾拉·格什温，后者是乔治·格什温的兄弟。1936 年，乔治·格什温第二次受到冷遇，他的《波吉和贝丝》未能获得戏剧奖，此奖授予罗伯特·舍伍德的《白痴的欢乐》。

伯恩斯坦的《西海岸的故事》或者较早时期的《传真》、或者《在城里寻欢作乐》、或者较晚时期的《祈祷词》本来应该在 1958 年获奖。

除了埃林顿、格什温和伯恩斯坦之外，还有许多人可以列入未能获得普利策奖的伟大的美国作曲家的名单。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当普利策奖负责人罗伯特·克里斯托弗试图解释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获奖时，他显得多少有点尴尬。

“流行音乐不行，”他说。“奖励的是现代作曲家——什么钢琴协奏曲啦、组曲啦、严肃认真的音乐。”

任何追踪和倾听过这类作品——如 1979 年的得奖作品“无限之弦外音”——的人都不得不同意克里斯托弗使用的“严肃认真”这个字眼。

他指出，条例是很具体的，奖金只限于授予“较大型的”美国音乐。音乐奖的尴尬史，其关键就在于此：这些指导思想错误的条例乃出自那些从来没有创作过任何音乐的、大部分是中年的白人。之手。

往好处说，这种奖金是愚蠢的、装腔作势的；往坏处说，则是制度化的种族主义。

普利策奖金委员会可以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颁发一系列特殊奖状，如 1976 年给爵士乐作曲家斯科特·乔普林颁发的死后奖状，他是获得普利策音乐奖的唯一黑人。但是，搞这样一个名单，是吃力不讨好的，最终也

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个较好的办法是干脆取消音乐奖。约瑟夫·普利策本来也没有要求设立此奖。没有这样的奖，美国也是可以过日子的。而设立这种奖反而把反映美国天才大师的作品排除在外。

不过，也应当为普利策文学、艺术、音乐奖说句公道话。授奖之事，从性质上讲，是主观的，带有危险性。没有任何一个颁奖机构可以不犯困扰人的错误。这也包括最伟大的奖——诺贝尔奖金。单就诺贝尔文学奖而论，它就没有表彰这样一些大师：詹姆斯·乔伊斯、马塞尔·普鲁斯特、弗朗兹·卡夫卡、托马斯·哈代、约瑟夫·康拉德、亨利·詹姆斯和D·H·劳伦斯。

普利策奖多年来固然忽略了许多名人，但也有两位作家拒绝受奖。剧作家威廉·萨罗扬的剧作《你生活中的好时光》获得1940年戏剧奖，但他加以拒绝，宣称接受此奖会损害他的作品。他认为普利策奖金的记录是“对平庸之作的表扬”，他不愿意成为它的一部分。

1926年，当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的《阿罗史密斯》获得小说奖时，他仍然对普利策奖金委员会在1920年拒绝他的《大街》愤愤不平。当时推荐刘易斯这部小说的评委会集体辞职，表示抗议奖金委员会以不够“健康”为由，拒绝此书而把奖金授予艾迪丝·华顿的《天真的时代》。刘易斯拒绝接受对他的《阿罗史密斯》的授奖，谴责所有的奖励都是“危险的”。他给奖金委员会写了下面这封信：“谋求奖金的人往往不去追求尽善尽美，而是为身外之物的奖金拚命。为了迎合一个任性的委员会的偏见，他们投其所好，而小心翼翼地避免写触犯人家的东西。”

刘易斯说，奖金是“加在作家身上的紧箍咒，使他们变得安份守己、彬彬有礼、惟命是从，结果是文思枯竭。”他说，颁奖者变成了“最高法院、枢密院，根深蒂固，神圣不可侵犯，谁敢挑战，便是亵渎神灵”。

“小说家只有不断地拒绝普利策奖，才能不让这种权力永久地凌驾于自己之上，”他写道。

对刘易斯的话如何看，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他的话也许值得钦佩，也可能是伪善的。仅仅过了四年，他便显然忘记自己的宣言而接受了193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9. 塔马尔·斯蒂贝尔： 追踪“神秘的病毒”

起初，那个妇女犹豫不决，有点不满。她看病，是她个人的事，她说。她不想讨论她的病，尤其不想在电话上同一个她从未见过面的记者谈论此事。

不过，塔马尔·斯蒂贝尔一直坚持，答应不会引用她的名字。经过多方劝说，那个妇女终于勉强地回答了几个问题。她说她患有严重的肌肉疼和背疼。这不是病毒，大夫诊断是嗜曙红细胞增多症，这是异常的血紊乱病。病因还不清楚。

塔马尔接着提出了一个大问题。

“听说你一直服用氨基丙酸，是这样吗？”

那个妇女变得不耐烦起来。她说她确实在一直服用氨基丙酸作为食品补充剂，以缓解月经前的综合症。但这同她的病没有关系。别人的病肯定也同它没有关系。

塔马尔又问：“你服用的是什么牌号的氨基丙酸？”

那个妇女一听，就气忿地挂了电话。

塔马尔叹了口气，把电话听筒轻轻地放回原处。她自言自语地说，争取提供消息的人的信任，需要耐心地做工作，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塔马尔向着圣菲商业区《阿尔伯克基日报》办事处的窗外眺望了一会儿，想了想她在宇宙中的位置。现在是1989年11月2日下午5点多钟。她肯定不想再次出击了。她觉得，她个人的生活碰到了麻烦，她担任报纸记者的年轻生涯毫无进展。在最近的一次报道中她出了一两个错误，仍然使她感到不安。她的自信心本来就不足，现在更下降了。她想，也许她不大适合搞新闻工作吧，也许她挑错了职业，应该知难而退吧。

她看了看从这次不成功的电话采访中记下的一些东西。她把那个生病的妇女的一些话潦草地记在报社驻圣菲办事处编辑主任蒂姆·科德尔半小时以前送给她的一个笔记本上，在那本子上科德尔写了“神秘的病毒”几个字。

科德尔是那天下午在办事处会议室主持一个会议时写下这几个字的。他和一些记者、特约记者正在筹划办事处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小报，这是一份必须出的广告副页。科德尔提到，本来应该参加会议的一位食品问题编辑因病未来。他临时上阵，同记者们交换关于流感的消息。一位特约记者、圣菲的自由撰稿人路易斯·威斯伯格说，他认识的一个妇女好象患了流感，痛疼异常，已经住院。他说，最值得注意的是，给这个妇女看病的医生发现她患的不是流感，而是一种罕见的病；新墨西哥州北部也有一个妇女住院，症状相同。他说，给这两个妇女看病的医生正在设法找到她们病症之间的联系。

会后，科德尔找到了塔马尔，她正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工作。他很喜欢这个34岁的新手。她虽然刚开始搞新闻业务，但却聪明能干，富有创造性。

她那股子干劲，特别受到科德尔的重视。她要努力工作，讨人喜欢。她具有新闻工作者的敏感性。给她一点点线索，只要有新闻，她就准能捞到。

“这大有搞头，”他把笔记本送给她时说。“先找路易斯·威斯伯格聊聊，然后抓住这个线索搞下去。”

虽然塔马尔缺乏经验，但她是采访这个消息的理所当然的人选。她是圣菲办事处的“医疗记者”。这就是说，当她不采访市政厅、县政府、艺术、警察或其他特别任务时，她就写关于保健方面的问题。办事处的8名记者要负责采写整个墨西哥州北部和州首府的新闻。每个人必须兼管许多方面的任务。

塔马尔便去找特约记者路易斯·威斯伯格，请他重新谈谈他的新闻线索。他在介绍情况时又加了些新东西：患怪病的两名妇女服用一种治疗失眠和月经前综合症的食物补充剂。她们的医生怀疑，这是否是她们病症的共同因素。

塔马尔突然对此发生兴趣。她问：“是否是氨基丙酸？”

“是的，”威斯伯格说。他想就是氨基丙酸。

塔马尔的脑海一下子翻滚起来。对于这种成药，她有过亲身的体验，曾经服用过整整一年，不是治月经前综合症，而是治失眠症。多年来，人们广泛推荐这种氨基酸药丸，说它是治疗月经前综合症、失眠症和肌肉疼的好成药。塔马尔1976年服用了一整年，使她的失眠症大大好转而毫无副作用。

塔马尔得到那个患病妇女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后，便精神焕发地去给她打电话。她想，这可能是一篇饶有趣味的报道。

但没想到这个妇女不愿意接受采访，她一接电话，马上就挂了。这使塔马尔多少有点震惊和泄气。当她凝神望着编辑部的窗外时，她不禁自问：“我干这个工作，够格吗？”接着，她的目光落到了科德尔送给她的笔记本上。她不想让科德尔失望。他是一位好上司。她还意识到，至少有一个妇女——也可能是两个妇女——受到了她曾经服用过的那种药的危害，这种可能性虽然还在探索，遥远得很，但却使她很感兴趣。

她看着她的笔记本，注意到：那个不友好的妇女在挂电话以前，提供了她的医生的姓名。塔马尔给这位医生打了电话。这位医生证实，她的确有个病人患有嗜曙红细胞增多肌肉风湿痛综合症。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血紊乱症，但不是病毒。其症状除了肌肉和关节剧痛外，身体出现红疹，极度虚弱，甚至发生咀嚼困难。她说，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支气管哮喘、过敏、药物反应或寄生虫感染而引起的。

这位医生还证实，她的病人服用氨基丙酸。不过，她强调说，诊所多年来一直使用这种药，并没有出过问题；她的这个病人或者第二个住院的病入的症状是否同氨基丙酸有关系，现在作出判断，还为时过早。

塔马尔打听到了住在附近的洛斯阿拉莫斯的第二个妇女的医生的名字。她给他打了电话，回答是相同的：嗜曙红细胞增多症，服用氨基丙酸；

是否有什么关系，还不能肯定。不过，第二个医生说，他知道还有一个医生，后者正在治疗一个嗜曙红细胞增多症特别严重的病人，这个患病的妇女也服用氨基丙酸，这种巧合颇为“可疑”，但是不必匆忙下结论。

塔马尔一听到这个消息，象被雷电击中了似的。这三个妇女的年龄全都在 37 岁至 43 岁之间，得的全是这个怪病，住地在 30 英里的半径范围之内。她们全都服用氨基丙酸。

这当然并不能得出什么结论。但塔马尔感到不安。是否应该让公众知道这个情况？是否应当把这三个令人担心的病例告诉其他医生和诊所？

丁梅博士是圣菲医疗中心的主任，第一个妇女就是在那里治疗的。当塔马尔向丁梅提出这些问题时，这位主任怒发冲冠。

“这不仅仅涉及到我一个人，”丁大夫说。“我同这个城市和阿尔伯克基的其他医生都谈过，他们认为把氨基丙酸和这种特殊的情况联系起来，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法。许多人都服用氨基丙酸，没有一个人有不良反应。”

丁主任怒气冲冲地威胁说，如果塔马尔引用丁主任的名字和那位医生的名字，或者把这家诊所同那位患病的妇女联系起来，丁博士就要控告她。

接着，塔马尔给新墨西哥流行病办公处的医疗调查员罗恩·沃里斯博士打了电话。他承认，他的办公处正在调查这些情况，但他说，氨基丙酸只是正在考虑的一个可能的原因。

“可能是感染，”他说。“可能是药物中的一种物质，可能是食物过敏，也可能全没关系。我所知道的是，这三人是在同一时间出现这种症状的。”

沃里斯警告塔马尔，如果《阿尔伯克基日报》发表关于氨基丙酸可能同这三个病例有联系的议论，那将是“不道德的”，那将无异于发表没有根据的“耸人听闻的新闻”。

于是，塔马尔决定把她的问题直接提交联邦政府。她给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打了电话，但那里的医生都不熟悉新墨西哥州的情况，不愿意讨论这些问题。所以她又给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打电话，它让她找区主任杰拉德·文斯。文斯说，氨基丙酸无需经过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所以它不管此事。

“氨基丙酸通常作为食物补充剂使用，”他说。“不存在安全问题。”

不存在安全问题？那天晚上，当塔马尔在一个朋友家里的地板上就寝的时候，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她的脑际。她奔波了 6 个月，仍然未能在紧张、昂贵的圣菲房屋市场上找到一套她住得起的公寓。

不存在安全问题？天哪，她想到：多么倒霉的一天啊，有人嘭地一声对她挂了电话，有人扬言要控告她，有人警告她不要搞“耸人听闻的新闻”，有人坦然地向她保证不存在安全问题。

那天夜里，塔马尔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回想着，在七十年代，为了治疗失眠症，她曾经服用过大量的氨基丙酸。不过，那已经是遥远的事了。

在开始报业生涯以前，她经历了多变的生活：结婚和离婚，当服务员，干各种收入很低的工作，在伦敦住了好几年干打杂的活儿，断断续续地上学念了点书。

她经历了漫长艰苦的道路，才到了圣菲城。她终于当了日报记者，可是才干头一年，她就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门。

那天夜里，她拚命想睡觉，可是无法入睡，许多问题在脑海里翻腾，一个比一个大：

这三个妇女病得如此严重，原因何在？这同氨基丙酸是否有关系？

明天我对我的编辑如何交待？我能完成这项报道吗？我适合这个工作吗？

什么时候我才能象个样子？

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塔马尔·斯蒂贝尔 1956 年出生于布鲁克林，比吉姆·德怀尔在几英里以外的曼哈顿开始生活道路早一年。她的父亲艾尔弗雷德·斯蒂贝尔出生于维也纳，在二十来岁的时候乘船抵达美国，避免了在捷克斯洛伐克住集中营的命运，而他的双亲正是在那里死于纳粹之手。塔马尔的母亲弗雷德尔·斯佩克特出生于纽约，那时她的双亲刚刚逃离沙皇的俄国，免遭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不久。

弗雷德尔在 5 岁以前就能歌善舞，成为纽约娱乐场所的一个儿童明星。到她成年以后，美国出现经济大萧条，她改名为弗洛伦斯。她在夜总会演唱的时候，认识了在那里当服务员的艾尔弗雷德。他们俩私奔后，移居布鲁克林，开始追求美国梦。弗洛伦斯当了教员，而艾尔弗雷德（他把名字缩写成弗雷德）不断变换工作，大部分时间是搞房地产和保险生意。

斯蒂贝尔夫妇生了 3 个女儿，塔马尔最小。当她四岁的时候，家庭移居纽约市以北罗克兰县的一个小镇子西奈亚克。

“那是一个中产阶级白人的聚居点，很偏僻，大部分是犹太人，但也有别的民族，”她回忆说。“我们是一个中产阶级偏下的家庭，正努力向上爬到中产阶级。我从来没有上过私立学校，上不起。晚餐大都是土豆、鸡蛋拌土豆、炸鸡蛋拌洋葱，全都掺和到一起。吃炸牛排，就算是盛大的宴会了。我们在罗克兰县始终是局外人，我小的时候不了解它，实际上我现在也不了解它。这正是它的特色。我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长大的。”

在她的记忆中，她十来岁的时候是个“野孩子”，好奇心多，并不淘气，在童心旺盛的日子里“什么都想试试”。

“我父亲没有男孩子，我想我就是个男孩儿。什么事，父母都让我干。晚上也不管我，啥时候回来都行。我成为大姑娘以后，对我也没有什么约束。如果不回家，打个电话，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就行了。”

塔马尔象个假小子那样尽情地玩乐，用她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女嬉皮

士。

当她 15 岁的时候，她的父母在一段时期内分开过日子。塔马尔离开家，跟一个朋友住在一起。她继续在公立学校读书，始终是个好学生。当她不上学的时候，她往往搭乘他人的便车在全区到处游逛，特别喜欢到曼哈顿参观画廊和博物馆。15 岁下半年，她去纽约市立图书馆打零工，晚上乘公共汽车回家，如果耽误了公共汽车，就搭乘别人的便车。

但搭便车，终于碰到了坏人，有一次让她乘车的那个家伙袭击了她。“我挣脱了他，”她说。那个满脸雀斑的褐色小子，劲儿大着哩，不过个头只有五英尺。后来她学了柔道，不再搭便车了。

“我在中学的时候独来独往，是个旁观者，”她说。“有些小集团，我也沾点儿边，但从来没有参加进去。”

当她 16 岁的时候，她用在图书馆打工挣的钱买了一辆旧汽车，换了一所公立中学，天天自己开车去上学。但她不喜欢那所学校。甚至专为准备考大学的学生办的速成班，也使她觉得单调无聊。她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满分。这种缺乏挑战的生活，使人感到沉闷。

她便退学而参加罗克兰社区为中学高才生办的两年制大学预备班，第二年到英国学习。“这时我的生活才真正发生了变化，”她说。

19 岁的时候，她到西伦敦学院学习。那里的思想、那里的人、那里的挑战，使她十分兴奋。在纽约州一项奖学金的资助下，她多呆了两年。然后，她又用一年时间到海外旅游，足迹遍及欧洲和中东，靠当服务员维持生活。

1977 年，她返回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但她没有上约瑟夫·普利策的新闻研究院。作为大学肄业生，她还没有资格上这个学院，更主要的是，那时她对新闻学位不感兴趣。她决定主修语言学，攻读拉丁语系语言。

塔马尔很喜欢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但生活又出了问题，”她说。

这回是爱情问题。

“那时我住在 Y 第 92 街，有一天晚上我被挡在我寝室的外面。我一看，是个门卫，我要求让我进去。他后来成了我的丈夫。他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白天上课，晚上当警卫。许多个夜晚，我们呆在一起聊天。我们彼此爱上了。”

不久，她便同这个立志当作家的年轻人住在一起。塔马尔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到书店工作，以便他能够不上夜班，专心写作。

“1979 年，我们正式结婚。他是个天主教徒，不可知论的天主教徒，我则是个不可知论的犹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在联合国的教堂举行结婚典礼的原因。我们的世界观就是无神论的、犹太教—基督教的道德文化。我们的婚礼非常大方。我母亲雇了个摄影师，作了特殊的安排，偷偷地给我们拍了照，因为所有的照片只反映了犹太人的传统，而没有反映基督教的传统。”

她现在认识到，那可能是一个不祥的兆头。这对新婚夫妇很快发现他们

之间有巨大的差异。不到一年，他们的婚姻关系就处于紧张状态。他们一致认为，生活需要有个变化，巨大的变化。

“1980年，我们认为，该是离开纽约的时候了。我们把公寓房子卖了，大部分东西处理掉，于是移居旧金山，没有朋友，没有工作，没有住的地方，没有钱。”

塔马尔的母亲曾坚决反对他们采取这个冒险行动。“别走了！你们会离婚的，”她对女儿说，然而倔强的塔马尔哪里肯听啊。

“不离婚，才怪啦，”塔马尔现在说。“一年以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这是件大好事。”

那时她在旧金山公立图书馆当管理员。靠那点微薄的收入，是无法维持生活的，所以她另谋工资较高的工作，便给美联社驻旧金山办事处当了秘书。

编辑部的气氛使她感到愉快。那里的人们聪明、工作紧张、处在当前大事的边缘，这一切很合她的心意。在以后的两年中，她常对美联社的同事说，她想当记者。对这位27岁女秘书的话，很少人认真对待。不过，也有一个人听在心里，那就是新闻编辑比尔·希夫曼。

“如果你想干这个工作，”他对她说，“你应当上大学，取得学位。”塔马尔听从了希夫曼的劝告，辞职上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她一面工作一面读书，于过三种不同的工作，同时争取一些赠款、奖学金和贷款。1985年29岁的时候，塔马尔终于大学毕业，还获得PBK联谊会的崇高荣誉。

但她获得的不是新闻、文学、政治或任何其他同新闻职业有关的学士学位，而是电影理论学位。在伯克利学习的日子里，她的注意力从新闻转移到了别的方面。接着，她参加了该校研究生课程的学习，以便获得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

“但是，钱又成了问题，我不得不休学，”她说。

所以她又去做全日工作，这回是给一家做流产和美容手术的诊所当办公室经理。象她以前的许多工作一样，她在这个岗位上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不过每周付给的五百美元工资倒是比她过去所做的任何工作都挣的多，甚至她后来终于从事新闻报道时也没有挣那么多。

塔马尔31岁，正为自己的前途而感到失望和焦虑时，关键时刻到来了：一天她浏览《旧金山纪事报》的招聘广告，发现双周刊《索诺马索引评论报》需要一名记者。她被接见了，这使她高兴。但她没有得到这份工作，这使她沮丧。

不过，塔马尔获悉，这家小报不久要增版。几个月后机会到来时，她拚命谋求这个职务。这回，该报雇佣了她，每周工资只有335美元。

虽然现在的工资比过去的年工资减少了八千美元，塔马尔还是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项工作，劲头十足地干了起来。在以后的14个月中，她过着清贫的生活，为索诺马的这家小周刊拚命地工作，报道了许多火灾、汽车

事故、学校董事会会议和养狗许可证听证会等新闻。虽然经常经济拮据，但她喜欢这种工作。她对自己说：“这正是我爱干的工作！”她开始幻想到全国最大城市（它碰巧是她的出生地）的最大报纸《纽约时报》那里去工作。

塔马尔终于听到有一个较好的机会：《瓦莱乔时代先驱报》这家不错的报纸需要一个记者。它是家小报，只发行两万六千份，工资也多不了多少，每周 385 美元，但怎能从索诺马一下子跳到《纽约时报》呢？她这么想，是对的。

她得到瓦莱乔的工作，在那里干了 6 个月，主要是报道犯罪消息和政府会议。后来，她又发现一个机会，《阿尔伯克基日报》驻圣菲办事处需要一名记者，最初的周工资是 484 美元。她想，这倒不错。关于圣菲，她听到不少好话：环境优美、城市吸引人、气温宜人、适宜居住，还是个跑步的好地方。圣菲肯定比瓦莱乔要好，她想。最主要的是，每周 484 美元的工资比现在的工资提高了 25% 以上。

她申请了。同时申请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一百名其他记者，其中多数人具有比她更丰富的经验。看了她在索诺马和瓦莱乔写的新闻报道的剪报，圣菲办事处编辑主任蒂姆·科德尔和报社地方新闻编辑霍华德·霍顿决定让她乘飞机来新墨西哥州见见面。

“在头几次谈话中，她的聪明机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副编辑主任罗德·德克尔特说。“她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女人。她的谈吐正确，认为干事要具有进取精神。她表示，如果有机会，她愿意搞调查性新闻。据我的记忆，她胸怀大志。她说，有朝一日，她希望能够到一家全国性大报工作，去当驻外记者。她说她搞新闻工作，开始得晚了。我觉得，她想要弥补失去的时间。”

虽然塔马尔的经验不多，德克尔特说，但她身上有一股闯劲儿，所以报社的编辑们决定给她一个机会。报纸果然录用她。她在事业上迈出了最大的一步，调到了一家中型都市报纸，其发行额超过 10 万份。在她的生命史上，她的搬迁费第一次由公司付给。不过，由于她的家当很少，塞到她的汽车里就行，所以费用有限。

1989 年 5 月，在阿尔伯克基东北 60 英里处的一个最古老的美国移民区圣菲城，塔马尔重打锣鼓另开张了。圣菲城的旧大陆的风光，使塔马尔着迷：一排排古朴典雅的房舍，屋顶铺着整齐的瓦片，庭院有棚子遮阴；蜿蜒狭窄的街道两侧林立着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店铺；到处都有画家和手艺人；整个城市散发着一一种旅游胜地的轻松气氛。在这里，她将继续报道警察局新闻和公众集会，偶尔也写写医疗方面的报道，正是这方面的报道使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变。

1989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五的黎明，塔马尔在度过了一个漫长的自我怀疑的不眠之夜后，知道了她的关于嗜曙红细胞增多症的文章还需要什么：更多的报道。

她一清早就去编辑室，开始打电话。她需要知道：全国最大的嗜曙红细胞增多症权威是谁。她给州和联邦的保健官员打了几十次电话，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她应当同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的梅奥医疗学院免疫系、门诊部和基金会的负责人杰拉尔德·格莱克博士谈谈。

“给梅奥门诊部打电话，有点象跟联邦的官僚机关打交道，”塔马尔说。“拨了电话号码，并不能马上找到梅奥的医生。首先要通过接待人员、公关人员层层关口。”

她几乎花了8个小时才找到格莱克博士来接电话。她幸运的是，那天格莱克正好在医院，但他的日程已经排得满满的，圣菲时间下午七八点钟他才给她回电话。他实在没有时间，他对她说，但他认为他有责任谈谈。他说，他的女儿也是记者。

当谈话结束的时候，塔马尔感到欢欣鼓舞。格莱克博士实际上给她的报道加了个漂亮的装璜包装。他把三起嗜曙红细胞增多症病例称作“大同盟”。他说，他认为氨基丙酸可能有关系。

“闪电可以响一次，但不能响两次，”格莱克博士说。“这也可能是不相干的事，但三个病人身上发生的情况都不相干吗？我不相信。我接受的训练使我必须寻找意想不到的联系。第一次，可能是偶然的；第二次，就值得注意了；第三次，我就要全力以赴地赶快进行调查。”

塔马尔挂上电话时，高兴得跳了起来，立即奔向科德尔的办公室。

“是氨基丙酸吗？”他问。

塔马尔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她概述了在过去两天深入挖掘中所听的一切情况。科德尔马上兴奋起来。那时已经快午夜了。

科德尔给阿尔伯克基编辑室打了个电话，提醒他的上司、总社副编辑主任德克尔特说，圣菲办事处有一条敏感的最新报道，当地和州的医疗界施加压力，不让发表。科德尔说，这条报道的材料是扎实的。他希望在圣菲地区版的头版发表。但他认为，德克尔特应当首先看看。

德克尔特在他的电脑终端机上调来这条报道看了看，给科德尔回电话说，这条报道不能给圣菲版，而应当放在报纸的头版上。

不过，德克尔特首先给塔马尔提了几个问题。他让他的上司、主编助理肯特·沃尔兹过一下目。因为如果这个爆炸性新闻引起巨大反响的话，沃尔兹将首当其冲。

于是把这条报道给沃尔兹看了。他说，好极了。改动一两个地方后，照原样发表吧。沃尔兹最关切的是，没有征求一下氨基丙酸生产厂家的意见。

塔马尔和她的编辑们都同意这个看法，认为沃尔兹提得好。老实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想到采访一下药品生产厂家。为了公正起见，应当听听他们的看法。但现在已是星期五深夜。在下星期一以前，是无法采访医药公司的。

这样，《阿尔伯克基日报》便让塔马尔的报道度过了周末。她实际上感

到松了一口气，因为她正想花更多的时间来对稿子加以推敲润色，以免给人以耸人听闻的感觉，而且她确信在两三天之内别的报纸是无法同她竞争的。

11月6日星期一，塔马尔采访了氨基丙酸生产厂家，对她的报道作了修改。果如她所料，她从医药公司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新信息。所有的公司都不认为它们的产品同三起嗜曙红细胞增多症有关。有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建议医生更仔细地研究一下病人的食谱。还有一家公司的发言人说，如果发现病情同氨基丙酸有关的话，那么，罪魁祸首不会是药本身，而很可能是往胶囊填药的工人和包装工。

塔马尔的报道在11月7日星期二上午出版的《阿尔伯克基日报》头版上刊登出来，占了25英寸的专栏版面，放在折页的下面，文章的大标题占了6栏，措词谨慎。

这篇报道修改了多少次，连塔马尔也记不清了。至少有6位负责不同版面的编辑轮流为它绞过脑汁，提出问题和修改方案，一直到付印前的最后几个小时。塔马尔把最后定稿通读了一遍，文字严谨，无懈可击，便签字了。

遗憾的是，在她发稿以后，她的文章出现了一个印刷错误。《阿尔伯克基日报》地方新闻编辑部在给塔马尔·斯蒂贝尔写的这篇最重要的文章署名时，把“斯蒂贝尔”错误地写成“斯泰贝尔”。

不过，在以后的几个小时里，塔马尔没有时间去为这件小事而恼火。她的报道引起的连锁反应之大，是报社的任何人没有料想到的。

科德尔、德克尔特和沃尔兹硬着头皮顶住曾经警告不要发表“耸人听闻新闻”的、极度敏感的医药界的怒潮。编辑们事先已经考虑到会引起反响，但没有料想到会这么大。塔马尔的报道触发许多新的报道：墨西哥州又发现不少嗜曙红细胞增多症病例，都出现在服用氨基丙酸的病人中。

11月8日星期三上午出版的《阿尔伯克基日报》上，塔马尔·斯蒂贝尔的署名报道刊登在头版头条的位置，6栏大字标题写着：“又发现9起病因不明的综合症”。在前一天的报道发表后，州保健官员听到了新墨西哥州各地医生的意见。大量新病例的报道促使州的流行病专家米利森特·艾德森博士要求人们自愿停售氨基丙酸。在一次紧急新闻发布会上，她还要求：

服用氨基丙酸的人们立即停用此药，直到保健官员把问题调查清楚为止。

这类病人如果肌肉十分疼痛，应立即找医生看看。

有嗜曙红细胞增多症病人的医生立即通报流行病办公处。

11月9日，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7名调查人员分赴新墨西哥州各地，从洛萨拉莫斯到拉斯克鲁塞斯，收集受害病人的氨基丙酸。与此同时，塔马尔在她的连续第三篇头版报道中，又谈到了四个相同的病例。这回的一个受害病人是阿尔伯克基的38岁的妇女朱迪·科迪·保尔森，她的病情公开发表

了。她在飞往梅奥门诊部治疗她的嗜曙红细胞增多症时，看到了前一天《阿尔伯克基日报》登载的塔马尔的报道，大吃一惊。保尔森从盐湖城机场给塔马尔打电话，描述她的病情，她过去 18 个月来一直大剂量服用氨基丙酸，根本没有想到此药会同嗜曙红细胞增多症有关系。她的医生也没有一个人谈到这一点。

对保尔森的采访是惊人的。美联社把这条报道转发美国全国的报纸。

这一下，可炸窝了。

嗜曙红细胞增多症病人开始在其他一些州也被发现，其中不少人服用氨基丙酸。首先是密苏里，接着是亚利桑那，然后是俄勒冈和密西西比，都纷纷发现这样的病例。到 11 月 12 日星期日，这种病例总数已达 55 个。现在塔马尔的报道已成了全国性新闻。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立即着手调查。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告诫消费者暂时停用氨基丙酸。

此时，塔马尔已经精疲力竭。她为这个报道苦战一周有余。她现在需要的是，休息一天，或者至少美美地睡一两个晚上的好觉。过去这些天，她简直是以汽车为家，那里放着她的衣服，她碰到可以暂时借住一下的人家，便把车停在那里。在 11 月份她采写氨基丙酸报道的那些日子里，她在四个不同的人家睡过，地板、沙发、小小的儿童床都可以凑合一夜。

她心里想的个人问题，不止这些。她的汽车上保的那家保险公司正在考虑取消对她的保险，因为她不断接到超速通知单，其中有一些是采写新闻时超速的。“我承认超速了。我喜欢开车，有时集中思想考虑问题，不知不觉就超速了，”她说。

她有两个姐姐，她同其中的一个姐姐最近发生不和，这也使她苦恼。塔马尔和沙伦姐妹俩相差两岁，她们几周以前吵了架，打那以后，姐儿俩就不说话了。

“我们的关系糟透了，”塔马尔说。“其实都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事，太糟糕了。”

内疚、忿怒、悔恨和爱这许许多多情感在她心中激荡了好几周。每天，甚至在氨基丙酸报道引起巨大反响的时日里，塔马尔也在思念沙伦，考虑显然已经无法挽回的感情破裂。

她的报道发表第一周结束以后，塔马尔终于有可能安安稳稳地休息一整夜了。然而，她却难以入睡。她的神经绷得太紧。她试着用沉思、音乐、作体操、看电视等方法来催眠，都没有效果。她买了一瓶加利福尼亚红葡萄酒，想借酒使自己镇静下来。她生动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我的酒量不大，在圣菲这个海拔七千英尺的地方，饮酒尤其应当小心。我却把瓶子里四分之三的酒都灌下去了。酒劲儿发作，我立刻昏昏入睡。然而，第二天的后遗症却够呛。”

圣菲办事处的编辑们科德尔和霍顿看到塔马尔精疲力竭的样子，想让她休息一下，缓缓劲儿。他们建议让别人代替她搞一两天报道，她坚决反对。

在这项报道成为全国性头版重要新闻以后，塔马尔隐隐约约感到，阿尔伯克基总社鉴于这个报道十分重大，想让有经验的老手抓过去，最可能的是，交给专门搞医疗问题的记者。没有任何编辑直截了当地说过这样的话，她说。她承认，过度的疲乏可能加重了她的自大狂。但是，她的担心是有充分根据的，所以她事先提醒她的上司们：要想叫她把这报道任务撒手，没有门儿。

“在圣菲办事处，要搞一项报道，有时需要力争才行，”她说。“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同阿尔伯克基总社的编辑部相比，我们这里是后娘养的、败将之兵、二等公民。我们仍然被视为叛徒集团，好象我们是坐在暖气管道上，吸着可卡因，喝着烈性酒，至少这是人们对圣菲办事处的看法。

“在阿尔伯克基，集体气氛非常之浓。编辑部的墙上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桌子上只准放某些东西。没有人在编辑部大吼大叫。我们办事处使我喜欢的地方是，一篇稿子出来，人人关心，都可以出点力。没有那么多你我之分，大家通力合作。我认为，这可以使稿子写得更好。我喜欢这种气氛。我不相信在阿尔伯克基也会是这样。那里的气氛是安静肃穆的，跟圣菲完全不同。”

塔马尔牢牢抓住这项报道任务。在以后的16天里，她连续奋战，每晚睡觉的时间不超过四个小时。

她的编辑们说，他们理解塔马尔的心情，她担心更有经验的记者会抢走这项报道任务。但他们一致认为，决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主张。事实上，助理主编沃尔兹也表示反对这样做。他不认识塔马尔，当她的报道最初发表时，对她的作品了解不深。但是，几天之内，她就赢得了他的充分信任。

“她很讨人喜欢，富有幽默感，很好共事，”他说。“如果要找出一个词儿来形容她的话，那就是坚持性。她办事，一往直前，不会轻易退缩。如果她认为有不同答案的话，她就不会持否定态度。”

关于嗜曙红细胞增多症的病例的报道不断增加。到11月14日为止，18个州的病例总数达81个。单单是新墨西哥州，就有30例。这个数字迫使州的保健官员——其中有些人几天以前还指责塔马尔故意发表“耸人听闻的新闻”——禁止出售或陈列氨基丙酸，违者将被罚款一百美元和监禁六个月。

四天以后，即11月18日——科德尔把那本写着“神秘的病毒”几个字的笔记本交给塔马尔的16天之后，这个报道成为全国报纸的头版重要新闻。促成这一点的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它发表了一份全国性通告，要求收回以氨基丙酸作为主要成份的所有产品。此时，37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报道的嗜曙红细胞增多症病例总数已达287个。俄勒冈一位服用氨基丙酸的妇女已经死亡。

不到五个月，全美国报道的病例总数超过1500个。其中63人死亡。大部分患者为服用这种食物补充剂的妇女。

12月初，在塔马尔发表其重要报道一个月以后，她的生活渐趋正常。氨

基丙酸问题在新墨西哥州开始平静下来，实际上转移到了全国性报纸上。她终于找到了一套不大的公寓，月租金为 325 美元。她的汽车的保险单也恢复，这使她大大松了一口气。同她姐姐沙伦的不和依然如故。但塔马尔不再失眠，也无需借酒镇静了。

为了表扬塔马尔的杰出工作成绩，《阿尔伯克基日报》的发行人汤普森·兰让她乘他的私人专机到基韦斯特旅游度假一次，费用由公司承担，作为对她的奖励。她接受了这次旅游，但却说了一些不知感恩的话。她说，她并不特别欣赏这样的旅游，因为它有点不对头：

“象这样的奖励对旅游代理人和房地产经纪人来说很适合，但对记者来说就不见得恰当了。我们写报道，并不是为了得到奖励。”

当塔马尔旅游后，回到圣菲时，她又碰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阿尔伯克基日报》把她的关于氨基丙酸的报道提出来参加普利策奖金的竞选，还附了一封由报社主编杰拉尔德·克劳福德签署的（实际上是由手下的工作人员罗德·德克尔特执笔写成的）正式推荐信。这封信概述了塔马尔采访嗜嗜红细胞增多症的情况，最后说：

这个疑难病症的重要部分仍然没有解决——医务调查人员仍然不了解氨基丙酸为什么会致病以及它是如何致病的。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没有塔马尔·斯蒂贝尔的报道，数以百计的患有这种危及生命之病的人会继续服用这种食物补充剂（医生们现在确信，正是这种补充剂导致他们生病），还有许多人会不知不觉地感染上这种病。

新闻工作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就是，新闻报道造成的旋风会使记者的生活发生巨变。在这个重大的关头，塔马尔突然不知不觉地被卷进了同吉姆·德怀尔和克莱尔·施皮格尔争夺 1990 年普利策奖金的旋涡。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自然界的一场大风向塔马尔刮来。在圣菲和阿尔伯克基之间的荒芜平原上，一阵冬季狂风骤起，把已经枯死的苜草连根卷起，随风飘荡，变成了所谓的风滚草。它象一个体积很大、但重量很轻的球一样，飘行几周、数月之久，把种子撒在广袤的平原上，直到 4 月份为止。4 月的一个夜晚，另一场突然刮起的暴风把风滚草吹向州际第二十五号公路，打到塔马尔·斯蒂贝尔驾驶的风驰电掣的汽车的前灯上。

10. 评审委员会的 女士们和先生们

1990年3月5日上午6 30

曼哈顿的温度接近于零度，已经够冷的了，百老汇和阿姆斯特丹大街上报摊的小贩子们都已戴上了两指手套，但对于纷纷扬扬的小雪花来说，气温又显得太暖和了，它们飘落在—擦擦还散发着油墨气的小报上，一下子就融化了。

身上裹得严严实实的职工们陆续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其中一些人走到校门口停下来，到报摊买份儿报纸。在这么潮湿寒冷的隆冬早晨，报贩们的生意居然还不错，这要感谢美国的这个大天主教堂了。昨天，在第五大街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作弥撒时，约翰·奥康纳红衣主教为星期一上午出版的小报提供了一条相当富有刺激性的新闻。他在讲道坛上抨击摇滚乐，把这种喧闹的音乐同撒旦联系起来，说它导致了最近的一些邪恶。因此，今天上午的报纸在头版出现了这样一些大字标题：

奥康纳：摇滚乐是魔鬼的工具（《新闻日报》）。

红衣主教同魔鬼作对（《每日新闻》）。

撒旦的歌曲（《邮报》）。

这位红衣主教是纽约报纸的宝库，因为他在每周新闻最轻松的星期日差不多总是说些这样的话。

附近就是新闻学院，它便是靠街头叫卖的那些大字标题积累起来的钱建造的，这时，一个看门的人打开“世界”大厅的大门，让两个食品服务员进去了。

上午7 05

在那间没有灯光的昏暗房子里，包办伙食的人开始安放煮咖啡器、杯子和盛放早点的盘子，准备的食物足以对付即将到来的65位客人而绰绰有余。他们是普利策新闻奖评审委员会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其中大多数是美国报纸的编辑记者们，也有少数教育家和自由撰稿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全都是应邀自费（通常由他们的老板出钱）作为光荣的评审委员来这里工作两三天。他们可以尽情享用这些精美的早点，还有两顿免费午餐；另外，当过普利策奖金评委，也值得自豪。他们是会自我吹嘘一番的，其中许多人会这样做，因为在同普利策奖金有关的荣誉表上，评委所占的地位是很高的：

1. 普利策奖金委员会主席；
2. 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成员；

3. 普利策奖金获得者；
4. 普利策奖金评委；
5. 普利策奖金最终候选人（被提名者）；
6. 普利策奖金获得者的编辑；
7. 普利策奖金竞选参加者。

这个武断的划分是否适当，是可以争论的。它象李氏震级表一样，各个档次之间有 10 个刻度之差。最低的档次“奖金竞选参加者”声望是很低的，所以这类人求职时含糊其词地说自己“曾被提名接受普利策奖金”，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参加了竞选而已。任何人只要填一张表，付 20 美元手续费，都可以参加普利策奖金的竞选。即便老板把一个记者的作品提出来参加竞选，那也不能说他就是“被提名者”。真正的被提名者是那些被评委们确定为最终候选者的人。这些人今天将在“世界”大厅露面。

上午 7 48

一名食品服务员拿了一箱玻璃烟灰缸，在房子的每张桌子上放两个。今天“世界”大厅没有无烟区，不过许多抽烟的人——显然是少数——是会到室外吸烟的。

克利门特在那些拿着烟灰缸的女服务员身后忙个不停。他在每张桌子上摆放笔记本、铅笔和奖金条例文件。这个任务可不轻松，因为他必须设法在那一大堆参赛作品中间找到空隙。每张桌子上堆放了近二百件参赛作品。几乎所有这些作品都精心地装订成册，封面讲究，装订内行。奖金条例规定：“剪报本的尺寸不得超过 12×17 英寸，必要时可附上整版报纸，以了解参赛作品的规模 and 影响。”可以料想到，许多参赛作品是整版报纸，厚达一英寸或一英寸以上，重量超过 20 磅。

今天，14 项新闻奖的总共 1,770 份参赛作品等待评委们评审。这大约等于 10 年多以前的参赛作品的两倍。这种增加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条例的尺度最近放宽了，允许一份参赛作品可以竞争两种不同类型的奖金。但是，记录表明，更主要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报纸谋求获奖，竞相提出大量参赛作品。

不过，奖金管理主任克里斯托弗不同意这个观点。

“我认为，不会有人故意提出大量参赛作品，”他说。“象《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显然会提出较多的参赛作品。它是大报，有许多第一流的人才。我认为，他们在提出多少参赛作品时，是有所控制的。所以我认为，没有人故意向我们提出大量参赛作品。”

然而，看一看今天堆放在桌子上的参赛作品的数字，却说明了不同的情况：

五家报纸提出了参加所有 14 项新闻奖的参赛作品。它们是：《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费城问询报》、《芝加哥论坛报》和《圣路易斯邮报》。这五家报纸总共提出了 178 份参赛作品，它们的编辑显然认为这些作品应当获得普利策奖金。这个数字占 1990 年参赛作品总数的 10%。

1,770 份参赛作品的三分之一来自 20 家报纸。

《纽约时报》提出了 35 份参赛作品，在 14 项新闻奖中占了 13 项。

《新闻日报》提出的参赛作品最多，共有 41 份；其次是《华盛顿邮报》，它提出了 40 份。

美联社提出了 40 份参赛作品，可能空手而归，从而有助于证明对获奖采取随便马虎的态度是不行的。

奈特—里德报业托拉斯对待这个竞赛非常认真。它总共提出 180 份参赛作品，占 1990 年新闻奖参赛作品总数的 10% 略多一点。180 篇中有半数来自三家报纸：《底特律自由新闻报》24 份，《迈阿密先驱报》32 份，《费城问询报》34 份。由于参赛作品多，再加上质量好，这个报系得到好处，总共得了四项奖，占 1990 年新闻奖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上午 8 02

第一位评委到来的时间比克利门特预料的早了点儿。当海伦·托马斯脱掉大衣的时候，他有些慌乱，因为他还没有把姓名卡放好。

托马斯是合众国际社驻白宫办事处主任。她文质彬彬地对她来得太早表示歉意。托马斯穿一件鲜红色的衣服，同她的闪闪发光的红头发融为一体。今天，她在其他方面也显得很突出。在 65 位评委中，只有她和其他少数几位勇敢的妇女没有穿细条子衣服或庄重的深色礼服。

评委会的工作是很伤脑筋的，托马斯说，所以她来得早一些，以便喝点咖啡，看看上午出版的《纽约时报》，它把奥康纳红衣主教抨击摇滚乐的讲话刊登在第二版。

托马斯已经担任过几次评委，她很喜欢这个工作，不过，她说她是给“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打杂的”。今年，她评审的是“国内报道”。

新闻奖的每个评委会各有 5 名成员。虽然共有 14 项新闻奖，然而却只有 13 个评委会，因为有一个评委会兼管“现场摄影”和“特写摄影”两项任务。

上午 8 30

更多的评委陆续到来，克利门特已经准备停当。他站在门口的一张桌子旁，桌上放满了整齐地写明各个人职务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姓名卡。

继托马斯之后到来的头 7 位人士全是身穿礼服的男士。他们没有理她，因为她正在埋头独自看报。

预定今天要来的 65 位评委中，只有 10 位女评委。不可否认，太偏重男

性了。报纸工作一向是男性为主的阵地，而且是白人男性占主要地位。在评委中，只有 8 位非白人评委。

在评委中，有 8 人以前曾经得过普利策奖金。

7 位评委来自奈特—里德报系，占评委总数的百分之十以上。

没有来自周刊（它们只占少数）和非主流报纸的评委。

象往常一样，评委会的成员中大部分是东部各州的人。65 位成员中，只有 15 人来自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城市。

上午 9 00

来的人越来越多。仅仅几分钟以前还象图书馆一样安静的气氛，一下子变得人声嘈杂。人们互相问候致意，彼此向老朋友介绍新相识的人，纷纷去拿果子冻饼圈吃。

象美国工商会议上的代表一样，评审委员也可以分成三类：（一）一小部分是董事之类的大人物，他们在一些共同参加的全国性会议上早已认识；（二）多数人是正在上升的明星，他们勤奋工作，有些人简直是拚着命干，以求有朝一日也可以跻身于大人物之列；（三）还有少数人是真正实干的新闻工作者——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和编辑，他们在这个场合显然有点局促不安，不如在报社编辑部卷起袖子干活儿时那么自在。他们之所以被请到这里，是因为他们曾经得过普利策奖金，或者接近于得奖，或者受到奖金管理当局的注意。不管怎么说吧，他们正在向第二类迈进。

第一类大人物中，包括一些衣冠楚楚的高级负责人，如：《波士顿环球报》的主编约翰·德里斯科尔，《圣彼得斯堡时报》的主编、总裁、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巴恩斯，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董事长、发行人、首席执行官兼《今日美国》编辑部主任约翰·塞根撒尔。

第二类正在上升的明星，人数最多，有数十名高级编辑，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大的如芝加哥，小的如蒙大拿州的比灵斯。

第三类实干的新闻工作者中，包括最近的普利策奖金获得者，如《匹兹堡新闻》的安德鲁·施奈德、《华盛顿邮报》的比尔·戴德曼、《夏洛特观察家报》的查尔斯·谢泼德、《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的曼尼·克里索斯托莫、《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和以前曾在圣迪戈《论坛报》工作的乔纳森·弗里德曼。

有一些评委放在这三个类型中的任何一类都不合适。他们是名记者，名声超出新闻界，远扬全国：受人尊敬的合众国际社记者海伦·托马斯，获得普利策奖金的《迈阿密先驱报》专栏作家戴夫·巴里，《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主任。小伦纳德·唐尼（他是该报总编辑、报道水门事件的传奇性人物本·布雷德利的法定继承人）。

当上普利策奖金评委的道路，有点象被选入一个神秘的精英社团一样，既神秘莫测，又有点碰运气。

首先从奖金管理主任克里斯托弗开始，他有一个秘密的评委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是根据他的上司、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其他 17 位成员的意见拟定的。这个强有力的委员会几乎完全是由新闻单位的高级负责人组成的，它有点象最高法院，对评委会的选择有取舍权。奖金委员会差不多每年至少否决一个评委会的选择。今年又发生这样的事情，漫画奖的三个最终候选人由于不符合奖金委员会的要求而被否决了。

每年 11 月举行业务年会时，克里斯托弗把评委会候选人的正式名单交给奖金委员会成员考虑。这个名单通常总是大约包括半数上一个年度的评委，以保持连续性。评委很少连续任职两年以上的。

人们是怎么当上评委的呢？一个可靠的方法，当然是同奖金委员会的某个成员搞好关系。不过，一个比较实际的方法是获得普利策奖金。这就是为什么今年施奈德、谢泼德、戴德曼、克里索斯托莫、托马斯·弗里德曼和乔纳森·弗里德曼应邀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原因。

克里斯托弗说，越来越多的曾经获得普利策奖金的人被聘请担任评委，因为相信他们是最有资格当评委的人。1990 年的评委之一、两次获得普利策奖金的安德鲁·施奈德听到这个说法时，大笑了起来，认为这简直是“有点儿乱伦”。

另外一些人被邀请当评委，不是由于他们的新闻作品获奖，而是因为他们多年来在新闻界精心树立起来的名声。这就是说，他们参加了适当的协会，出席了一些全国性会议，当选担任适当的职务，在新闻报刊上经常发表文章。

克里斯托弗说，他经常注意物色杰出的妇女或非白种人士，或者非白人妇女。每年他还要确保各个评委会中有相当数目的来自西部各州和较小报纸的代表。

上午 9 15

克里斯托弗终于来到“世界”大厅，同评委们寒暄，主要是同大人物周旋。其中许多人，他都认得。一些人，是他负责管理奖金十年来认识的；另一些人，是他多年办新闻刊物认得的。

克里斯托弗除了在《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担任过高级职务外，还在《地理》杂志当了两年的编辑主任。《地理》杂志停刊后，他到《纽约每日新闻》编委会任职一段时期，然后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并兼任普利策奖金管理主任和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秘书。克里斯托弗除了编过杂志外，他还是一位日本经济和贸易专家。在这方面，他出版过两本书，正在撰写第三本书。他有广泛的联系，受过良好的教育（耶鲁大学毕业）。他的言谈举止，雅俗兼容，既能运用高雅讲究的语言，也会讲粗俗大众化的话，这倒很有点象普利策。人们认为，即便普利策在世，他也会赞成使用克里斯托弗这样的人来充当目前的角色，尽管他是办杂志出身的，而不是办报起家的。克里斯托弗

挑这个担子的能力绰绰有余，不过，他也略感尴尬，特别是当人们要求捍卫普利策奖金的传统（如保密）时，尤其如此，因为这类做法看来同他个人的价值观是相矛盾的。

上午 9 45

克里斯托弗走到房间的最前面，敲了敲桌子，让大家安静下来。当大家不再喧哗的时候，他作了自我介绍，对评委们表示欢迎，说他们“对保证普利策奖金制度的成功运转是必不可少的”。

接着，他概述了每个评委会的基本职责：“在各位收到的表格上，向奖金委员会提供获奖候选人，每类新闻奖不多不少，正好三人。”他把这个要求重复一遍，说：“硬性规定”。

克里斯托弗接着宣布，每个评委会“按字母顺序提出候选人，评委会不负责排列名次”。换句话说，不要指出自己所偏爱的人选，那是奖金委员会的事。

上午 9 55

气氛活跃起来，评委们开始找自己的座位：六个评委会在“世界”大厅，“评论”评委会在楼上第四层的一间房子里，“漫画”评委会在第五层，“摄影”评委会在第七层，等等。

许多人开始挂自己的大衣，松开领带，卷起袖子。他们意识到这将是紧张的两天，如果到星期二的晚上还完不成任务的话，可能要干三天。他们既没有工资，也没有酬金，完全是义务劳动，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占用本单位的时间，作为与本职工作有关的任务来完成的。

普利策文学、艺术、音乐奖的评委们今天没有来哥伦比亚大学。这些评委会同新闻奖评委会是分开工作的。图书奖评委会已经完成了今年的工作。

五个图书奖评委会各有三名成员，每人可以得到一千美元的津贴。他们的这点津贴是领之无愧的，即使能把参赛图书读完一半也就不错了。1990年的参赛图书共有590种。阅读量是相当大的：非小说类图书181种，诗歌123种，小说115种，传记92种，历史79种。

象某些报纸一样，某些图书出版公司提出的参赛作品太多。艾尔弗雷德·诺夫公司提出的参赛图书达58种，每一个项目它都参加了，约占所有出版公司提出的参赛图书总数的10%。

在1990年的角逐中，其他出版公司提出的参赛作品也不少。威廉·莫罗和W.W.诺顿两家出版公司各提出26种图书，象诺夫公司一样，它们参加了所有的项目。哈珀—罗公司提出了22种；法拉尔—斯特劳斯—吉鲁公司提出了20种；利特尔—布朗公司提出了16种；瓦伊金公司提出了14种；兰多姆·豪斯公司提出了12种；霍顿·米夫林、道布尔戴、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三家出版公司各提出了11种。还有一百多家其他出版公司，

大部分是较小的出版公司和大学的出版社，各提出了 10 种图书或者 10 种以下。

出版公司必须在 12 月 31 日以前把参赛图书寄给哥伦比亚大学，每种交 4 美元手续费，各四册（或四套长条校样）。普利策奖金办公室把其中的三册寄给有关的评委，给奖金委员会留一册，以备此书成为最终候选者之需。评委给各类图书评出三个最终候选者（被提名者）。各评委会主席必须在 1 月初给普利策奖金办公室提出正式的书面报告，按字母顺序排出被提名者的姓名，无需表明自己的偏爱。

每年被提名争取普利策奖金的图书共 15 册（每类各三册）。普利策奖金办公室把被提名的图书各寄一册给有关的奖金委员会成员，即担任该类奖金小组委员会主席的成员。有趣的是，如果其他 17 位奖金委员会成员中的任何一人想在 4 月份终审以前读到该书，他们就必须自己设法弄一本，甚至是自己掏腰包去买一本。

1983 年普利策奖金委员会规定的 20 美元注册费在作者中间引起巨大的不满，他们抗议说，这个做法歧视了较小的出版商。奖金委员会否认在图书的竞赛中有任何偏见。它说，只要是好书，即使没有参赛，评委也是会考虑的。不过，自那年以来，获得普利策奖金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书。

对诺夫公司来说，它的 58 册图书的注册费共计 1,160 美元，而它赠送给所有评委的图书价值比上述那笔钱要多得多。如果其中的一本书获得普利策奖金，由此而增加版税，上面那点破费又算得了什么呢？诺夫公司的编辑们显然认为，这个战略是行得通的。其它出版单位便群起而效法。

出版商一贯认为，获得普利策奖，有助于推销图书。克里斯托弗说：“自从我们在 1980 年开始宣布每类奖的两名亚军以来，出版商已经在护封上说明该书在普利策奖金的竞赛中获得第二名。”诗歌类同其他四类图书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条例规定，诗歌奖只授予“美国作者写的杰出的诗歌集”。图书出版商对大部分项目都提出了参赛图书。诗歌同其他几类图书的一个巨大不同之处是，大部分获奖诗歌是选集，所以从理论上说，诗歌得奖的机会要多一些。某年未能获奖的诗歌可以放在新的选集中出版，而这部新选集也许会在将来的某一年获奖。

普利策图书奖的评委们要读数以百计的图书，人们认为，他们或许只能泛读一下，从 590 种图书中筛选出 15 种供奖金委员会考虑。

图书奖评委的选拔同新闻奖评委的选拔完全一样。克里斯托弗有一份机密的档案，每年从中拟定一个名单，供奖金委员会考虑。1990 年的 15 位图书评委中，有 10 位是大学教授，其余的五位是作家、编辑和评论家。15 人中只有五人来自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各州，只有四位女性。

非小说类图书评委会就是一个很好的缩影。它的成员是：《华尔街日报》文艺版编辑雷蒙德·索科洛夫、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蒂莫西·费里斯和作家、普林斯敦大学教授乔伊斯·卡罗尔·奥茨。三人中有两人是男

性，两人是教授、两人是东部人。不过，他们三人也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在看完非小说类的 181 册参赛图书以后，全都两眼昏花。

下午 12 30

当新闻奖评委们向堆积如山的参赛作品打完第一仗以后吃午饭时，他们也昏昏沉沉。

在“世界”大厅，多年的评审做法使大厅变得乱七八糟：六个评委会花了一整个上午淘汰那些欠佳的参赛作品，用评委的行话来说，就是把它们“推下桌面”。所以每一张工作桌的地板上都堆满了筛选下来的作品。那景象真叫人沮丧：许多记者想获得普利策奖金的梦想幻灭了。

65 位评委开始穿上大衣，前往朝霞路的哥伦比亚大学职工食堂吃午饭。在那里，新闻学院院长、奖金委员会成员琼·康纳致欢迎词后，便开始吃午餐。用评委安德鲁·施奈德的话来说，这顿午餐是温和型的圆形肉馅水饺和花椰菜，上面还撒了一层白色的东西。他的上司、评委同仁、《匹兹堡新闻》编辑主任马德琳·罗斯说，多年来她第一次看到如此多的注意健康的人去拿细孔盐瓶。

吃午饭的时候，评委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谈及上午的工作情况。后来，他们离开哥伦比亚大学以后，许多人畅谈了评审工作的内部情况。不过，现在，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别的方面。对职工食堂的厨师来说很遗憾，饭菜的质量太差了，自然成为人们的话题，尽管纽约的这顿饭，评委们是白吃的。不过，所有的客人都活了下来，他们回到原来的地方，还要再进行几个小时的审读。

下午 5 25

“世界”大厅的评委们揉揉疲乏的眼睛，打个呵欠，伸个懒腰，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有一些人已经离开这里，去参加楼下过厅即将开始的“葡萄酒和奶酪招待会”了。

早上堆放在桌上的大批参赛作品不见了，它们被乱放在地板上。经过一天的评审，1,770 项参赛新闻作品中的大部分被“推下桌面”。整个大楼里今天进行评审工作的房间，情况都是如此。不过，“世界”大厅显得特别突出罢了，那里的地毯上全是淘汰下来的新闻作品。

大部分桌面上还留有少数参赛作品。

在大厅的南端，审阅 159 项“公共服务”参赛作品的评委的桌上保留着大约 10 项篇幅大小不等的参赛作品。其他近 150 项作品堆放到了桌下和桌子周围的地毯上。地毯上有一件作品是来自《洛杉矶时报》，那是它的记者克莱尔·施皮格尔揭露瓦茨公立医院管理不善、医疗事故迭出的系列报道。地板上另一件作品来自《阿尔伯克基日报》，即塔马尔·斯蒂贝尔揭示嗜嗜

红细胞增多症和氨基丙酸之间关系的报道。

克莱尔和塔马尔得普利策公共服务奖已经无望了。

在附近另一个评委会的桌子上，仍然保留着十来件参赛作品，其余的一百二十来件作品被放到了地板上，其中包括《纽约新闻日报》吉姆·德怀尔的专栏文章剪报集，他揭露了地铁事故和工人疲劳之间的关系。吉姆被拒绝授予普利策“一般报道”奖。

但是吉姆、克莱尔和塔马尔还没有脱离竞赛的轨道。这三家报纸的编辑们知道条例规定，一件作品可以竞争两种不同类型的奖。因此，这三位记者的作品还被列入专题报道类。

在“世界”大厅的北端，在专稿评委的桌下凄凉地堆放着一百来件参赛作品。专题报道奖的对象是体育、工商业、科学、教育、宗教等方面的专题报道。

在这张桌子上仍然保留着约 50 件参赛作品，其中就有吉姆、克莱尔和塔马尔的剪报集。他们在评委们第一天无情的审阅中生存下来了。

明天的审阅将更加严酷。

下午 5 45

在楼下休息室，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举行了招待会，与会的大约有 75 人，他们一边喝着塑料杯中的葡萄酒，一边海阔天空地闲聊。

来宾中，大部分是普利策奖金评委们，也有少数他们的夫人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师生们。评委中间，主要是两类人：正在上升的明星和在职的新闻工作者。新闻界的大人物很少有人留下来参加这个小小的晚会。

葡萄酒并不很多，不会使任何节酒的人士感到威胁。然而有一位评委却把酒洒到了绿色大理石地板上。一位同事赶忙蹲下去用纸餐巾把酒吸干，扔在地板上，几英寸远处就是一块铜镶嵌板，上面刻着约瑟夫·普利策的遗嘱：新闻大厦是为纪念爱女露西尔而建。露西尔 17 岁死于伤寒。

不过，同图书评委不一样的是，三位戏剧评委不领津贴。但据克里斯托弗说，如果他们到纽约市以外的地方去看演出，可以得到为数不多的旅费补贴。1990 年的两位戏剧评委——《时代》周刊的戏剧评论家威廉·亨利三世和《新闻日报》的林达·瓦因纳——来自纽约，第三位评委是《波士顿环球报》的戏剧评论家凯文·凯利。

奖金委员会早就抛弃了约瑟夫·普利策的规定，即获奖的戏剧必须是在纽约上演的，它要能“提高人们的崇高道德、崇高情趣和崇高风尚”。今天的条例则规定，获奖戏剧必须是“由美国作家写成的，构思独特，以美国生活为内容”。

在各类普利策奖中，只有戏剧奖不要求注册费，不需正式提出。克里斯托弗说：“我们的设想是，戏剧评委熟悉每年参赛的所有戏剧。如果送去两百部剧本，但评委不去阅读，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另外，如果接受注册

费，那就必须使评委去看看这个戏剧。没有办法让评委们乘飞机到爱达荷去看看在波卡特洛社区剧院上演的某个新剧作家写的处女作。老实说，如果某个剧本不在纽约或一个重要的地区剧院上演，他们甚至连手稿都不想看。

参赛的戏剧必须是在每年3月截止的那一年之内上演的。在参赛的作品中，除了诗歌外，只有戏剧拥有更多的得奖机会。例如，奥古斯特·威尔逊的《钢琴课》是1989年的最终候选者，但未能得奖。此后，在1990年该剧继续上演，它仍有资格参赛，这次终于获奖。

大约一周以前，在3月1日，戏剧评委林达·瓦伊纳在《时代》周刊办公室访问了评委会主席威廉·亨利。他们跟波士顿的评委凯利通了电话，相谈90分钟，提出了他们三人选定的最终候选者名单：《钢琴课》（亨利的第一个选择），玛丽亚·艾琳·福恩斯的《夜间结局如何？》（瓦伊纳和凯利的选择），A.R.格尼的《情书》（三位评委的第三个选择）。

亨利曾获得1980年普利策“文艺批评”奖。他给普利策奖金委员会写了一封一千字的报告，叙述了评委会对这三部被提名的戏剧的看法，以及为什么这三部戏剧中的任何一部都有资格获奖。

这三位评委在许多地区剧院观看戏剧，作为他们评论工作的一部分，这一点在普利策奖评审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每个人在其他评委的建议下还多看一些戏剧，不是去欣赏，而是去评论。例如，凯利通常是不看克利夫兰的戏剧的。但是亨利受《时代》周刊（它报道全国的戏剧）的委托去那里观看了一部戏剧，觉得不错，凯利便去那里也观看了这部戏，以便作出评审。

在大部分年代里，戏剧评委会是由两个纽约人和一个外地人（通常是评论家）组成的。这是由于有人指责对地区抱有偏见，才吸收一个外地人的。

“如果一个评委是来自芝加哥的，他更有可能推荐芝加哥的作品，”曾经两次担任评委的亨利说。“事实上，看一看过去五年至十年的情况，就可以发现，几乎每年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最终候选者或一个得奖者，他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谁是评委、他的工作地点在哪里。”

他说，一个比较公平的办法应当是，建立“一个人数较多的评委会，可能是五人，其中三人不在纽约，而在全国不同的地方。”

音乐评委会也只有三位成员，不拿工资。不过，有一个秘书，他可得两千美元的津贴，他负责管理参赛作品，1990年的参赛作品有129件。

音乐评委会一向是由作曲家、评论家和音乐教育家组成。1990年的评委就是如此：主席唐纳德·马蒂诺是作曲家、哈佛大学音乐教授。另外两位是：《民族》周刊的音乐评论家戴维·汉密尔顿和作曲家、圣迭戈的加利福尼亚大学音乐教授罗杰·雷诺兹。马蒂诺和雷诺兹都曾经得过普利策奖金。奖金委员会鼓励以前的普利策奖金获得者担任评委，认为这样做可以保持它的标准。

如果方便的话，音乐评委出席参赛作品的现场演奏。1990年只提出了两名最终候选者。至少有一位评委出席欣赏了他们的演奏。这些参赛作品是：

梅尔·鲍威尔的《二重奏；两架钢琴和管弦乐队的协奏曲》，由洛杉矶交响乐团于1990年1月26日首次上演；拉尔夫·夏佩的《大提琴、钢琴和弦乐队的协奏曲》，它1989年7月31日在坦格尔伍德音乐中心首次上演。

不过，评委们对绝大部分参赛作品是听它们的录音的。作曲家必须提交一份声谱、录音带和20美元注册费。象戏剧类一样，音乐作品也必须是在以3月为止的那一年内上演的。

每年的文学、艺术、音乐评委的姓名一直是保密的，直到奖金宣布为止。据克里斯托弗说，这样做，可以免除出版商、作家组织、戏剧演出单位和其他利益集团向评委们游说。评委们叙述他们提名理由的正式书面报告密封三年，以保护评委们，免得引起争议。

1990年3月6日上午7:30

评审工作的第二天，有几位评委很早就到了“世界”大厅和新闻大厦的其他房间。大部分评委将在九点钟、甚至九点半才来。所以早来的人是真正热心于工作的。

其中大部分人是那些阅读任务最重的、各个报道奖评委会的委员们。许多参赛作品长得惊人，系列报道往往长达数千字。约瑟夫·普利策生前在他的编辑室墙上贴着“简练”的警句。他如果看到如此冗长的报道，该会吃惊的。“压缩、再压缩！”他经常对他的记者这样大声说。据传记作家斯旺伯格说，普利策的风格就是“简短、清新”。他的遗嘱规定，普利策新闻报道奖授予那些符合“准确、简练、为公共服务”之要求的作品。

但过去二十年来，普利策新闻奖评委脱离了“简练”的要求，实际上助长了越来越长的新闻报道，让它们得奖。表彰冗长之风在1984年达到了高潮。那年，《洛杉矶时报》的共27部分的、篇幅象图书一样长的系列报道《拉丁美洲人》获得了公共服务金质奖章。那年获奖的还有《波士顿环球报》的占10版篇幅的关于种族歧视的报道和《西雅图时报》占16版篇幅的关于一种新型飞机研制过程的系列报道。

奇怪的是，在宣布这些授奖名单后，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发言人克里斯托弗曾公开批评参赛新闻作品有一种“越来越冗长的令人不安的倾向”。他没有解释，既然奖金委员会对这种倾向感到不安，为什么还继续助长此风，把奖金授予那些象书一样长的新闻作品呢？

自那时以来，奖金委员会对参赛作品的字数作了一些限制。然而，报纸继续提出冗长得吓人的作品参赛，而普利策奖金委员会也照奖不误。

上午8:05

老实说，任务最轻的要算是新闻照片和漫画的评委了。这些参赛作品安全地锁在楼上单独的房间。它们的评委没有一个来得这么早。

奖金委员会根据它自己有趣的逻辑，在129件参赛漫画的评委会中没有

安排任何一位漫画家。克里斯托弗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在漫画评委会中没有安排漫画家，其理由基本上同于我们在评论评委会中没有安排参加辛迪加的专栏作家。这是因为在这两个领域活动的人数较少，他们彼此都认识或者了解彼此的情况，因此，彼此之间难免有先入之见。”

他说，让漫画家和专栏作家对其直接对手的作品作出评判，是不适宜的。

所以今年漫画评委会的组成是：两位新闻单位负责人、两位新闻教育家和一位专栏作家——《迈阿密先驱报》的戴夫·巴里。根据奖金委员会的想法，他评审漫画家比评审专栏作家更适合。

根据略有不同的理由，奖金委员会也避免在两种摄影奖的评委会中安排过多的摄影家。克里斯托弗说，编辑们评判照片可以更少偏见。正因为如此，所以今年的五位摄影评委中只有一人是摄影家，即《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的曼尼·克里索斯托莫。另外四人则全是新闻单位的负责人。

“我们认为，”克里斯托弗说，“选用图片和漫画的编辑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顾客，他们可能就是你所要找的不带偏见的评审员。”

奖金委员会对其他类型的专题，如国际报道，则采用相反的原则。参加这个评委会的，没有任何一人来自地方性小报，因为担心他们不大了解国际报道。因此，今年国际报道评委全都来自《纽约时报》、《新闻日报》、《纽约每日新闻》、《巴尔的摩太阳报》和波士顿大学这些大单位。

而密执安州克利门斯山的一家小报的主编兼发行人本杰明·伯恩则参加了特写评委会。

上午9：30

现在，专题报道的五位评委正在“世界”大厅紧张地工作。昨天，他们从164件参赛作品中筛选出了大约50篇。今天，他们将压缩到最终的三篇。

评委会主席、《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主任小伦纳德·唐尼高效率地完成了昨天庞大的工作量。他以前担任过评委，懂得一些窍门儿。昨天，他和他的同事们把164件参赛作品大体上分成五堆，每人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读一堆。每件参赛作品上附一张纸，评委读过后打上“要”或者“不要”的记号，表明这件作品是否值得保留在桌子上。如果一件作品有了三个“不要”的记号，即使其他两位评委还没有读，它就被推下桌面。

唐尼的四位同事是：《华尔街日报》记者沃尔特·博格丹尼奇、哈肯萨克《记录报》主编兼副总裁戴维·霍尔、加里《论坛邮报》副总裁兼总编辑艾尔·约翰逊和《得梅因纪事报》体育主编戴维·威特克。

这是一个有经验的评委会。唐尼、约翰逊和威特克去年当过评委。博格丹尼奇另有经验：他的保健报道曾获得1988年的专题报道奖。

克莱尔·施皮格尔和塔马尔·斯蒂贝尔的同医疗有关的作品显然是适合

这一类型的。吉姆·德怀尔的地铁问题专栏文章似乎也适合，不过，有些评委仍然怀疑他的作品是否属于专题报道。

正如某些批评家所说，如果评审中偏见起作用的话，吉姆似乎比克莱尔或塔马尔更处于有利的地位。五个评委都是男性，其中四人来自密西西比以东的地方。此外，吉姆曾经在评委霍尔的《记录报》工作过。

不过，克莱尔和塔马尔也可能有一个同盟者，那就是博格丹尼奇。他的专业是医疗报道。他关于美国医疗实验室试验缺陷的报道获得 1988 年专题报道奖。如果有哪个评委欣赏这两位女记者有关保健的报道的话，那就是博格丹尼奇。

下午 12 : 15

劳作了一个上午之后，唐尼的评委会的桌上仍然保留着八件参赛作品。

总的来说，迄今为止，评委会并没有觉得这个任务特别伤脑筋。中午饭以后将面临真正困难的选择。除了发生一两次短暂的争论外，在过去一天半的时间里，特别是今天上午，相当顺利、迅速地把 164 件参赛作品中的 156 件“推下桌面”。有两位评委想把《纽约时报》的参赛作品——记者琳达·格林豪斯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报道保留在桌子上。但是，多数人还是决定把它推下桌面。《沃思堡明星电讯报》记者的参赛作品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该报对沃思堡市的范·克莱本国际钢琴赛的报道还是不错的。该报记者的巨大剪报本现在也躺在地板上了。

评委们到此刻已经发现了一些显然高超的参赛作品，可以用它们作为标准，来淘汰其他作品。在许多情况下，评委们只要读完一份作品的头一二十段，就可以决定它是否够格了。参赛作品的推荐信虽然经过仔细推敲润色、充满了诸如“饶有趣味”、“富有吸引力”之类的吹捧之词，但却很少引起评委们的注意。他们对精美昂贵的包装也丝毫不感兴趣。从昨天开始，已经有许多精心炮制的参赛作品被堆在地板上了。

现在剩下的八份参赛作品逐渐成为一种标准，用来衡量其他作品。唐尼和他的评委们正在对这八份作品重新从头到尾读一遍。今天下午，他们将把这八份作品淘汰到只剩下三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八份作品中，有两份是《华盛顿邮报》提出来的，一份是体育记者比尔·布鲁贝克的作品，另一份是该报撰稿人辛西娅·戈尔尼的作品。《华尔街日报》提出的两份参赛作品分别出自记者加里·普特卡和记者约翰尼·罗伯茨之手。《阿尔伯克基论坛报》提出的一份参赛作品是艾琳·韦尔索、马克·泰勒和肖恩达·诺瓦克合写的报道。

以上共五份。另外三份剪报本便是吉姆·德怀尔、克莱尔·施皮格尔和塔马尔·斯蒂贝尔的作品了。

下午 12 : 30

今天的午餐还是在职工食堂，烹调技术略有改进。担任奖金委员会成员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迈克尔·索维恩热烈致词。他对评委们说，在审查参赛作品他们发挥着有价值的作用；普利策奖金对哥伦比亚大学和新闻研究院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索维恩低估了它的重要性。应该说，普利策奖金对哥伦比亚大学是极其重要的。每年4月份宣布普利策奖的时候，全国所有的日报、新闻刊物、出版行业杂志以及每一家大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引人注目地提到哥伦比亚大学。虽然普利策奖有争议，但哥伦比亚大学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形象，这个受人尊敬的高等学府每年颁发美国最有威望的奖。对这所大学和它的新闻学院来说，这些奖在促进公共关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在吃午餐时，人们听到一些评委谈论新闻学院的威信正在不断下降。谈话的某些内容是持否定态度的：

“那里的教职员都是废物……”

“那里的教师在《时报》没人要……”

“别的地方有许多更好的学校……”

接着，人们竞相提名“更好的学校”：北卡罗来纳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印第安纳大学、俄勒冈大学、南卡罗来纳大学、西北大学和密苏里大学。

有一位编辑说：“我认为，哥伦比亚大学更需要普利策奖，而不是普利策奖需要哥伦比亚大学。”他的话当然不是说给迈克尔·索维恩听的。

下午2：30

所有的评委回到新闻大厦，又开始工作，竭力想在今天下午完成任务，免得明日再干一天。对其中的大部分人来说，两天绞脑汁的选择，已经够他们呛了。

“专题报道”评委会准备就剩下的八份参赛作品进行投票表决。

每次表决的问题是：“我们将取消它吗？”每次作出决定，评委们都认真地讨论，有时是直率地辩论这份参赛作品的优缺点。

塔马尔·斯蒂贝尔的《阿尔伯克基日报》参赛作品轻而易举地就过关了，没有什么争论。评委们一致同意保留它。主席唐尼对它给予最高的评价，说它是“扭转乾坤的调查性新闻”。“如果没有这位记者的报道，就不会揭示氨基丙酸和嗜曙红细胞增多症之间的联系，”他说，“这是一家比较小的报纸的记者，缺少巨大的支持系统，基本上是单枪匹马地干。”

唐尼希望至少保留一份《华盛顿邮报》的参赛作品。当其他评委讨论比尔·布鲁贝克的出色体育报道和辛西娅·戈尔尼关于家庭法问题的复杂报道时，唐尼离开会场，暂时回避一下。这两份作品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在唐尼回避时，受到了许多称赞。但当他重新回到桌旁时，这两份作品已被放在地板上。

接着讨论《阿尔伯克基论坛报》的参赛作品。这是一篇有分量的作品，它论及一些经济力量威胁到新墨西哥州的野生动物，如有人为了取得鹿角而偷猎和圈养麋。这篇报道配有效果很好的彩色图片。不止一位评委表示，他可能已经初步被这篇东西迷住了。但没有一个人直截了当地说。评委们似乎不大喜欢让三名最终候选者中有两名被阿尔伯克基报纸占去，尽管这两份报纸是直接的竞争对手。唐尼说，两份阿尔伯克基报纸都强有力地竞争普利策新闻奖，这是新墨西哥新闻界的光荣。不过，评委们一致决定淘汰《论坛报》的作品。

现在轮到了讨论吉姆·德怀尔的地铁专栏文章。他揭示工人疲劳这一点，给评委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评委艾尔·约翰逊特别热心，对其他评委们说，吉姆的调查得花多少精力和时间啊。没有一个评委不这样认为。

不过，出现了一个麻烦。有两个评委提出这样的问题：吉姆的专栏文章是否适合“专题报道类”。也许他的文章更适合“评论类”。唐尼巧妙地使评委们不去那么想。他指出，把这样一篇好的参赛作品转换类别，已经太晚了。如果那样做，很可能使它落选。那将是可耻的，唐尼说，因为吉姆生动的“牛仔式”写作风格和深入报道使他的作品成为“典范的小报新闻——扭转乾坤的佳作”。评委们一致同意把吉姆的文章保留在桌面上。

然后该讨论《华尔街日报》的两篇参赛作品了，所以该报记者沃尔特·博格丹尼奇必须回避。博格丹尼奇对他的报纸的两篇作品抱有很大希望，特别是记者约翰尼·罗伯茨关于邓恩—布雷兹特里特公司这家未节制的垄断组织滥用它的信誉评价权力的报道。当博格丹尼奇离开会场的时候，评委们都称赞罗伯茨和他的同事加里·普特卡的作品。后者的教育报道是十分出色的，关于各大学在学术成就的决定上互相矛盾的报道尤有特点。不过，当博格丹尼奇回到桌旁时，他失望地发现这两篇作品都推到地板上了。

克莱尔·施皮格爾的参赛作品起初有毁名誉。约翰逊和博格丹尼奇这两位评委对它赞不绝口，但是别的评委则并不那么热心。在一段短时间内，有人谈到从地板上拿回一两件作品重新加以考虑，同克莱尔的作品加以比较。博格丹尼奇肯定认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又有可能重新考虑他的报纸的参赛作品了，不过他不想玩那样的政治花招。他极力支持克莱尔揭露小马丁·路德·金—德鲁医疗中心问题的报道。他尽力劝告其他评委说，他根据自身的经历，知道这样的报道是多么不容易。他说他正在研究一本关于医院工作的书。他从来没有见过比克莱尔关于这个医院的调查性报道更出色、更顽强的例子了。由于博格丹尼奇对她的参赛作品的热情推荐，评委会一致同意把它保留在桌面上。

这样，就保留了三名最终候选者：克莱尔、吉姆和塔马尔都被提名争夺普利策奖。

下午 4 : 45

担任主席的唐尼开始填写一页纸的表格，作为评委会给奖金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其他评委们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他依照条例的规定，用整齐的大写手写体，按字母顺序，提出了下列被提名者：

吉姆·德怀尔，《新闻日报》专题撰稿人，被提名作品是他关于纽约地铁的安全问题、管理不善、乘客愤慨和官方不负责任的系列报道和专栏文章。地铁系统失职，是所有纽约人啧有烦言但很少有记者报道的一个问题，而吉姆则多年来一直就此事进行了生动的专题报道。他的风格是非正统的，从一个愤慨的地铁乘客的观点看问题，但他的报道是详尽彻底的。例如，他的参赛作品揭露了交通管理局的工人由于加班加点、过度疲劳而导致严重的、有致命后果的安全问题。

克莱尔·施皮格尔，《洛杉矶时报》的保健问题撰稿人，她的参赛作品报道了洛杉矶急救保健系统对病人的服务极其不合格、管理不善、职业道德大成问题。她除了谈到公立急救保健系统过于拥挤、经费不足之外，还通过出色的调查研究，说明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官方对物力财力的管理不善和医生们滥用自己在这个系统的职权去增加收入。她关于小马丁·路德·金—德鲁医疗中心的系列报道，导致地方、州、联邦的调查，从而使政策和保健事业得到很大改进。

塔马尔·斯蒂贝尔，《阿尔伯克基日报》记者，她被提名，是因为她的坚持不懈的、有进取精神的报道解决了一个医疗难题。她把当地一些妇女所患的嗜曙红细胞增多肌痛综合症这一罕见的血液紊乱病同一种治疗月经前综合症常用的饮食补充剂成药氨基丙酸联系起来。由于她的报道，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收回氨基丙酸，并对这一严重危及妇女的成药进行全国性调查。如果没有她的报道，这个问题可能还发现不了。

下午 5：30

当五位评委在报告结尾处签名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正飘落着小雪。

结束工作后，他们互相告别，开始打点行李。到次日凌晨雪花凝结在一起时，他们都将回到得梅因、哈肯萨克、加里、华盛顿和曼哈顿闹市区各自的编辑部。

这五位评委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时，都无愧于他们的职责。他们各自报纸的共 20 篇参赛作品都被他们打入冷宫。他们提名的三位最终候选人不仅有两位女性，而且全都是西部人。

所谓东部男性垄断奖金的说法，可以休矣。

11. 哥伦比亚、奖金和《时报》

现在进入争夺普利策奖金决战阶段的吉姆·德怀尔、克莱尔·施皮格尔和塔马尔·斯蒂贝尔三人可以说是最各不相同的了。

一个是已婚男人，一个是已婚女人，一个是单身女人。

一个是扬基棒球爱好者，一个是芭蕾舞迷，一个是跑步爱好者。

一个是天主教徒，一个是新教徒，一个是犹太教徒。

他们之间的差异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但是竞争专题报道奖的三位最终候选人也有一个共同之处：有点巧合，他们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过。

在七十年代，吉姆和克莱尔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获得硕士学位。大学生活给他们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段要求严格的学习经历对他们事业的起步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塔马尔学习的专业是语言学和拉丁语系语言，她从未涉足新闻学院，但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新闻学院享有的崇高威望，也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毫无疑问，哥大新闻学院是严肃新闻院校之父。它是最古老的新闻学府之一，自1912年起就开办了，离密苏里大学开办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之后不久。多年来，哥大新闻学院，同密苏里新闻学院和西北大学新闻学院一起，被普遍地认为是最好的三所新闻学府。

哥大新闻学院享有地理上的优势，位于被认为是美国新闻之都、传播业中心的纽约。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许多毕业生后来都成为出色的作家、编辑和出版家。哥大每年颁发数种有威望的奖金，包括普利策奖、全国杂志奖和艾尔弗雷德·杜邦—哥伦比亚大学广播新闻奖。哥伦比亚大学长期受益于同被许多人称为美国最佳报纸的《纽约时报》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普利策奖金和《纽约时报》这三个新闻机构数十年来已经融合为新闻界的神圣的三合一。它们密不可分地结合成了一种奇特的相得益彰的关系。每个机构由于同另外两个机构关系密切而年复一年地不断增加其神圣色彩：

哥伦比亚为奖金增加威望，

奖金使《纽约时报》增光，

《纽约时报》雇佣哥伦比亚的毕业生，

哥伦比亚获得更大的威望。

但是，这种关系终于被中断了。普利策奖金评委们在职工食堂午餐时对它的新闻课程进行了抨击。

发生了什么事呢？在八十年代，普利策的新闻学院自己毁坏了它一度赢得的好名声。

七八十年代新闻教育发生了觉醒。许多教育家和新闻界人士认为，美国大众传播媒介面临的挑战要求大学新闻课程不要仅仅是培养一些到实际生

活中学习写新闻的年轻人。许多人推动新闻院校离开了那种经过时间考验的重视实践的做法，而更加强调学术性，要求进行研究，发表对大众媒介和社会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的辩论文章。

面对这种观点的冲突，以重视实际采访教学闻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我行我素。全国其他许多新闻院校都在革新，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同主流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了。

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行政领导在八十年代努力使该校师生完成更多的研究工作，并发表关于新闻评论的文章和图书。该校领导还更加强调科学和外交等方面的专业化，要求在新闻职业道德等理论问题方面开设更多的课程。但是，这种压力遭到全体教职人员的坚决抵制，他们极力反对压缩该校关于报道、编辑基本技能方面的严格训练。

在那些保守的教职人员看来，校方领导的大力改革，乃是那些对新闻业务知之甚少的人天真无知、导向错误的想法，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把学生培养成为编辑、记者。

而在校方领导人看来，大学的主要目的是进行教育和研究，而不是职业培训。不完全接受这个观点的教职人员被视之为因循守旧、不学无术的人。

甚至到今天，新闻学院 22 名专职教授中，大多数都没有博士学位。大部分人是以其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经验，而不是以其学术、研究成果，于多年以前就任教职的。该校的 60 名副教授中，至少有四人是被纽约报纸开除的编辑、记者，此事无人不晓。

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教职人员同行政领导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终于在 80 年代公开爆发出来。

1981 年，美国新闻教育委员会提醒人们注意教职人员和行政领导之间的“鸿沟”，认为该校已陷入“盲目的飘浮”之中。

1983 年，《纽约时报》援引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以前的一位教的话说，该校“思想上令人窒息”，只能提供就业培训，而毫无新闻工作者的远见。以前曾在该校任职的这位教授劳伦斯·平卡姆还说，报界对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感到失望，但“不愿意批评它，因为它管理着最著名、最令人羡慕的奖金”——普利策奖金。

也是在 1983 年，该校副院长卡罗林·刘易斯在同教职人员发生激烈的争论后辞职，她指责他们想要“完全把持学校”。这些教职人员要求她辞职。

1986 年，由于行政领导和教职人员之间的关系长期紧张不和，该校院长奥斯本·埃利奥特也挂冠而去。

1987 年，公开透露北卡罗来纳大学受人尊敬的新闻教授菲利普·迈耶是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第一个接替埃利奥特担任院长的人选。但几天以后，梅耶拒绝了校方的聘请。

一年以后，院长的位置仍然空着。当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庆祝它的 75 周年时，该院的名声已经扫地了。报界问题分析家亚历克斯·琼斯在《纽约时

报》撰文谈这次冷清的校庆时指出，今后靠在哥伦比亚新闻学院获得的新闻学位，“再也不能自动地打开进入美国较好的新闻单位的大门了”。

在五六十年代，这所新闻学院实际上是各大报特别是《纽约时报》的附属培训机构，《纽约时报》的记者新手通常都是来自该校。当时该校的做法对报界极富吸引力。许多编辑今天实际上仍然赞成该校的做法：重视职业培训，不把课程扩大到包括广告和公共关系，而其他大多数新闻院校则增添了这些内容。

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为报纸、广播和杂志三个专业的 180 名研究生提供了一年硕士学位学制。这个学制是以这样的设想为前提：大学生应该得到扎实的人文学科知识，然后在九个月的强化训练中学习新闻的基本知识。这种强化训练往往被说成是“新闻新兵训练营”。该校利用纽约市这个有利的条件，作为它的实习园地，每天把学生派到联合国、《时报》广场、市政厅或南布朗克斯去实地采访。

学生必须接受报道、写作、编辑和广播的基本训练，然后写一篇硕士论文，如克莱尔·施皮格尔关于在斯塔腾岛储存液化天然气的计划的论文（后来被《每日新闻》采用发表）。学生还可以听到广播、报纸、有线电视和杂志各界著名人士的许多报告。这些人士通常是不接受纽约以外的新闻院校的邀请去讲演的。到他们毕业的时候，哥伦比亚的优秀学生一踏进大多数编辑部的门，就可以立即投入工作，拿出作品来。

但是到 1980 年，由于新闻工作变得更加普及，新闻单位收到大批训练有素、有经验的人的求职申请，因此，凭哥伦比亚的新闻学位，再也不能很快地找到职业了。例如，象吉姆·德怀尔这样一个有为的年轻毕业生在 1980 年是不可能凭他的毕业文凭到第 43 街为《纽约时报》工作的。他不得不到河对岸赫德森县的《电讯报》谋职，周工资为 147.5 美元。

许多大报的主编们改变了用人的标准，往往喜欢那些在科学、政治、艺术、国际关系、工商业和法律等方面有特殊训练的人。许多报纸开始从更大的范围内雇佣人，在某些情况下物色聪明好学、有广泛的人文学科知识的人，象塔马尔·斯蒂贝尔那样的新手，而不要那些仅仅接受过正规的新闻业务训练的人。某些主编说，“我们将录用那些最聪明、最有教养、非常敏感、善于思考的人，从他们中间培养出的优秀新闻工作者将为任何新闻院校所不及。”

80 年代到来以后，哥伦比亚行政当局同新闻专业教职人员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这使普利策的新闻学院更加失去光泽。

普利策如果在世，也会对这种冲突痛心疾首的。他既是务实的，又是重智力的。他要求他的新闻学院具备这两种品质。他在遗嘱中规定它提供“智力训练”。今天，他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既保持哥伦比亚的最优秀的实践教育，又增添一些增长智力的课程，进一步强调发表著作和进行研究工作，以扩大关于大众传播学的知识呢？

看来，1988年，当哥伦比亚大学物色的第二任新闻学院院长琼·康纳走马上任的时候，这正是该校所要达到的目的。最初，康纳的任命引起批评者的不满，他们认为新闻学院需要外来的血液。康纳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新闻学院的毕业生。从自己的教职人员中选拔领导人，未必是好征兆。此外，她没有从事新闻教育的背景。她的职业经历不是文字新闻，而是广播，这一点使许多报纸的主编皱眉头。康纳是公共事务电视台的总裁。这家独立的电视节目生产公司同广播记者比尔·莫耶斯有联系。她还是作家、导演和制片人，曾在全国广播公司从事纪录片工作12年之久，多次获得有名的广播奖。

虽然康纳没有什么学术上的成就，但她在筹措资金方面颇有经验，而这正是新闻学院院长工作的重要内容。该校的问题在极大的程度上同经费有关，缺乏资金来开拓事业，既保持传统的训练特点，又扩大课程和鼓励研究工作与发表著作。康纳担任院长时，答应想办法为学校筹措更多的资金，要把弄来的首批经费用于粉刷整修破烂不堪的校舍。

她言必信，行必果，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她又进行了其他一些改革，对此毁誉参半。对康纳有利的一点是，专职教职人员不多，而且其中许多人已接近退休年龄。当他们被更换的时候，她可以有机会进一步塑造学院的方向。这种人事上的摩擦现在已经开始了。

校舍外观焕然一新、课程更新、教授更换，光这些还是不够的。康纳承认，要改造这个学院，仍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缺乏经费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作为一个投资家，约瑟夫·普利策的确是个能手。他很会弄钱。如果他不是如此热心于新闻事业的话，他作为一个金融家无疑会发更大的财。他显然认为，哥伦比亚会妥善管理他的捐款，始终会是够用的了。按照1912年的标准来说，他捐的钱是不少的：建设新闻学院100万美元，管理经费50万美元，设立普利策奖金的基金50万美元。按照1990年币值计算，约合2600万美元以上。

但是在本世纪上半叶，哥伦比亚从普利策遗赠的基金中花得太多了，而没有给以充分的补充，以抵销通货膨胀的影响。随着学院的发展，开支增加，行政领导未能筹措足够资金来支持原来的基金，以应付将来的需要。到70年代，学院和奖金管理当局都有了亏空。

在管理原有基金上的短视做法，并非只有哥伦比亚一家如此。其他一些大学也同样是这样的，由于校方行政当局几十年前在财政决策上的不当而陷入经济拮据的困境。但这一事实并不会使约瑟夫·普利策感到安慰，当他看到他的新闻学院的院长竟然为粉刷校舍而四处奔走弄钱的时候，他会吃惊的。

新闻学院经费十分困难，名声日益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普利策奖金的管理对哥伦比亚大学就显得比过去更加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校方越来越维护奖金的原因，这一点反映在新闻学院出版的《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一些编辑部决定上。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被《纽约时报》认为是“美国最有名的新闻批评杂志”。它无情地在美国大众媒介上挑毛病找刺儿——差劲的标题、不痛不痒的图片、不道德的新闻、性感的语言、有偏见的报道、利益的冲突，等等。报纸、报业托拉斯、广播、电视、杂志、甚至新闻俱乐部和新闻协会等，都在它的进攻之列。

不过，《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从来没有批评过普利策奖金。当别人批评普利策奖金的时候，它从来不发表只言片语。

该刊在《标枪和桂冠》这个栏目中偶尔也由于同普利策奖金有关的小事而对某家报纸或某个人批评一两句，例如：

标枪：《圣迭戈联合报》在关于 1985 年普利策奖金获奖名单的 23 段报道中删去了涉及其他加利福尼亚报纸的两个获奖者，这是值得玩味的。这两个获奖者是：《洛杉矶时报》，它的电视专栏作家霍华德·罗森堡的批评文章获奖；奥兰奇县《纪事报》，它的工作人员获现场新闻摄影奖。

标枪：《芝加哥论坛报》本来提名新闻评论家加里·迪布竞争普利策奖金，后来由于这位专栏作家宣布要去一家同它竞争的报纸《太阳时报》那里工作，乃忿而撤销了这项提名。

不过，《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读者从来没有看到《标枪》指向普利策奖金评选或管理的任何方面，其实，这样的机会是很多的。该刊从来也没有刊登过任何可能被认为对奖金委员会成员有所触犯的文章。

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发行人就是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她也是新闻学院的最高领导人——琼·康纳院长。这就是为什么《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标枪和桂冠》栏目绝不会出现这样的文字：

标枪：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成员们坚持把 1988 年奖金授予委员会主席的《费城问询报》关于五角大楼“黑预算”的报道，而这篇报道基本上是《国民新闻》杂志已经发表的报道的翻版。

标枪：普利策奖金的整个评审系统竟然把 1988 年奖授予《劳伦斯鹰评论报》散布恐怖的、极端片面的关于威利·霍顿和监狱休假的报道。

读者如果想看到对普利策奖金采取老实态度的新闻评论，最好去订阅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出版的《华盛顿新闻评论》。它有时对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颁奖决定提出批评，而《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则始终保持沉默。

当然，指望这家哥伦比亚杂志去批评它自己的发行人和她在奖金委员会

中的同事们，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对普利策奖金的不同意见都不能公正地加以报道的话，那未免有点压制新闻的味道吧。《哥伦比亚新闻评论》至少应当在它的新闻简讯中承认奖金的这些不足之处，在以前的行政领导下该刊就有时这样做过。如果做得更好一些，这位院长应当让出发行人的位置，叫一位同普利策奖金没有关系的在职教授去挑担子，使这份杂志放手地干工作。

在 1990 年向订户推销自己时，该刊自称是“美国最受人尊敬的新闻监督者”。可是，它却没有监督美国最受人尊敬的新闻奖，这太糟糕了。

哥伦比亚同《纽约时报》的关系也很密切。

《纽约时报》每年在自我推销的整版广告中反复提到它获得的普利策奖金越来越多。1990 年这个数字共达 63 项，为其他报纸的三倍。

这个数字的一半是同《纽约时报》的地位有关的——它是全国最好的报纸之一。许多记者认为它是唯一的最佳报纸。不少读者认为，它的文章太冗长，编排有时显得惊人地松散，但是，它的深度和广度、准确性、可靠的新闻判断力、勇气、责任感、信誉和灵通等品质，却是任何其他报纸无法相比的。由于这一切，新闻批评家戴维·肖认为，某些普利策奖金评委“慑服于《纽约时报》的质量、威望和神秘感；相信对这样一份庄严、出色的报纸投一票，别人是不会找碴子的”；便可能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这家报纸的参赛作品。

但那是 63 项普利策奖啊！

其中的另一半必然同《纽约时报》在哥伦比亚和普利策奖金管理机构中所占的特殊优越的地位有关系。

虽然有点冒险，但并非完全不可能列举一些事例，说明在过去几十年普利策奖金当局的决定中对《纽约时报》的特殊照顾。下面是一些数字：

普利策奖金委员会对整个奖金评审系统拥有绝对权力，在它成立的 75 年中，除了七年以外，在所有其他的年代里都有《纽约时报》的代表参加。除了约瑟夫·普利策的后裔主办的《圣路易斯邮报》以外，任何其他报纸都没有享受如此特殊的照顾。

在 1970 至 1990 年的 20 年间，在新闻奖评委中，《纽约时报》先后总共有 38 人，这是别的报纸无法相比的。

据戴维·肖在他的著作《新闻观察》中所作的调查，奖金委员会多次否决评委会的提名，《纽约时报》从中受益的多于任何其他报纸。

《纽约时报》还从奖金委员会某些非常友好的决定中受益，如 1951 年奖金授予委员会成员、《纽约时报》的阿瑟·克罗克，表彰其“对杜鲁门总统的独家采访”。

上述事例并不能证明任何东西。不过，当一家报纸所得的普利策奖金为

其他报纸三倍之多时，这种特殊照顾肯定给这样的荣誉蒙上了一层云雾。考虑到下面的情况，尤其会产生这样的印象。

《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是哥伦比亚大学 1951 年的毕业生。

苏兹贝格还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会。

苏兹贝格在 1982 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最高荣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奖章。他的父亲、前《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在 1953 年获得了这种奖章。

苏兹贝格和《纽约时报》对哥伦比亚大学慷慨捐款，最近又宣布提供 25,000 美元的文字记者法学奖学金。

苏兹贝格的父亲也对哥伦比亚大学慷慨解囊。新闻学院图书馆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在《纽约时报》工作的哥伦比亚毕业生多于任何其他报纸。

《纽约时报》职工获得普利策奖金的人数多于任何其他报纸。甚至新闻批评家亚历克斯·琼斯也获得普利策奖。

尽管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存在种种问题，但三驾马车继续运转：《纽约时报》获得普利策奖金，新闻学院得到赠款，普利策奖金赢得名声。

这种过份密切的关系究竟有什么毛病呢？也许没有。不过，一味追求奖金，并不是件好事。那会不知不觉对美国最高水平的新闻单位、对美国最令人敬佩的报纸的机体产生腐蚀作用，并进而对所有其他报纸的灵魂产生影响。

虽然就这个问题发表的研究著作不多，但是确实已有人提出必须注意此事。例如，内华达大学雷诺兹新闻学院研究生主任戴维·库尔森在 1988 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发现，被调查的美国报纸、特别是一些大报都采取鼓励追求奖金的政策。

这就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这种做法会对记者行为、新闻决定、编辑道德和编辑部人力的分配产生什么影响呢？

新闻奖会不会由于使记者有个人得失的考虑（本来是不应当有个人动机的）而对报道过程产生微妙的影响呢？奖金是否会使记者受到不健康的压力，不惜牺牲诚实和公正而去找捷径呢？

塔马尔·斯蒂贝尔曾说，象让她免费到基韦斯特旅行一趟这样的奖励对旅行代理商和房地产经纪人是适合的，而对记者则不恰当了，她的这番话是否接近于真理的边缘呢？

编辑们为了追求奖金，是否会热衷于搞一些可能得到社会重视的冠冕堂皇的事情，而不惜牺牲一些日常的、但为社区所需要的重要新闻呢？追求奖金的气氛是否会助长不道德的做法，导致《华盛顿邮报》捏造八岁的孩子吸毒的报道呢？

报业托拉斯追求奖金，是为了造成一种印象，仿佛它们是在为社会公益做好事，而实际上它们的报纸由于谋求高额利润，新闻内容大大减少，质量也降低了。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这些忧虑表明了约瑟夫·普利策遗赠的新闻学院仍然面临着挑战。

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由于有很有威望的普利策奖金而被人称作“新闻新兵训练营”。现在看来，这个叫法不恰当，倒不如改名为研究颁发新闻奖所造成的影响的大学。

12. 权力极大的奖金委员会

1990年4月9日上午7 25

旭日的的光芒照射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东区建筑物的顶端，新闻学院的东大门沐浴在淡淡的黄色光辉中。在这座建筑物入口处不远的地方，矗立着托马斯·杰斐逊的塑像，这是根据约瑟夫·普利策的指示，作为宗教自由的象征而建立的。两位穆斯林正面向东方，在杰斐逊塑像旁做着晨祷。

在室内，这位出版家的遗嘱的另一侧面正在被执行。巴德·克利门特正收拾“世界”大厅，以便接待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18位成员，他们即将来到这里评审1990年的最终候选人。

这个官僚系统还有一个秘密的层次：委员会的三人小组委员会。共有七个小组委员会，文学、戏剧、音乐奖等各有一个。这些小组委员会的成员是保密的，即使在奖金颁发以后也不公开。

上午8 30

在第116街的百老汇外面，报摊今晨的生意满不错。小报头版绘声绘影地描写了唐纳德·特朗普开业的情况。特朗普昨天在大西洋城开办了塔杰·马哈尔赌场，开张丢丑，成为管理不善的杰作：数千台自动取款机由于钱款告罄而关闭，原来工作人员没有装进足够的现钞。特朗普一怒之下，大批解雇职员，倒霉的赌博者怨声载道。这倒为星期一的晨报提供了生动的素材。《纽约每日新闻》的标题最有意思：“塔杰开张不利，赌徒怒气冲天！”

这家小报的发行人小詹姆斯·霍格是最早来到哥伦比亚大学门口的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成员之一。与他同时到达的还有：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总裁迈克尔·加特纳；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论坛报》主编兼发行人罗伯特·梅纳德；《罗阿诺克时代与世界新闻》总裁兼发行人沃尔特·鲁加伯和时代明镜公司总裁戴维·拉文索尔。

前来的委员会成员中，有五人是普利策奖金获得者：《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拉塞尔·贝克、《华盛顿邮报》社论版主编梅格·格林菲尔德、《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彼得·卡恩、斯坦福大学奈特基金会主任詹姆斯·里赛和北卡罗来纳州罗利《新闻观察家报》主编克劳德·西顿。

代表哥伦比亚大学的有三位：校长迈克尔·索维恩、新闻学院院长琼·康纳和奖金管理主任兼奖金委员会秘书罗伯特·克里斯托弗。

有一个成员西塞拉·博克是布兰戴斯大学教授。有两位女委员：《得梅因纪事报》主编吉尼瓦·奥弗霍尔泽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前华盛顿办事处主任查洛特·赛科夫斯基。

最晚到的是：委员会主席、《费城问询报》总编辑兼总裁尤金·罗伯茨。

第十八位委员、《达拉斯晨报》主编兼总裁伯恩·奥斯本今天来不了。他仍在得克萨斯，要为一个案子出庭作证。

65 位奖金评委会委员一个月以前来哥伦比亚大学时，是乘出租汽车、甚至乘地铁来的。而奖金委员会委员则不同，其中许多人是乘高级轿车来的。身份的象征是如此明显：“修道士”坐出租汽车，“主教们”乘高级轿车。在美国新闻界最高的地位莫过于担任普利策奖金委员会委员了。

在普利策奖金设立 75 年来，担任过奖金委员会委员的，不超过 100 人。它始终是一个自我调节的机构，委员们都是它自己选择的。在头 65 年里，委员虽然换来换去，但都是白人、男性、高级新闻工作者。在普利策奖金历史上的所有事实和数字中，最令人吃惊的是，在 1980 年以前的奖金委员会委员中从来没有女性、非白人和非新闻工作者。

今天上午在哥伦比亚集会的奖金委员会，其构成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模式。象过去一样，大部分成员来自美国的东半部。女委员只有五人，黑人委员一人（梅纳德），非新闻工作者一人（博克），来自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委员五人。

除博克外，索维恩也是一位非新闻工作者，但他不是象博克教授那样被推选到委员会的，他是这个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因为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他在委员会的事务上有表决权，而其他两位哥伦比亚代表康纳和克里斯托弗则是没有表决权的委员。

在最初的几十年中，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们想干多久，就可以干多久。1954 年委员会决定把委员的任期限制为三届，每届四年。1979 年又把每届的期限缩短为三年。

原先，这个机构叫作新闻研究生院咨询委员会，其部分任务是监督哥伦比亚大学按照约瑟夫·普利策的遗嘱管理新闻学院。实际上，这个委员会把学术方面的事务完全交给哥伦比亚大学，而集中力量管理奖金事宜。

为了反映这个现实，委员会于 1950 年易名为普利策奖金咨询委员会。后来，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们撤出，把他们的职权交给始终参加委员会的哥大校长，于是，委员会于 1975 年简称为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扼要地说来，现在这个“新闻教士集团”的工作程序如下：

底层的竞争者把他们的作品交给奖金评委们审查。

评委们把提名名单交给委员会的秘密的小组委员会审议。

小组委员会向全体委员会提出获奖者名单。

全体委员会向大学校长“推荐”最终获奖者。

校长向公众宣布获奖者。

每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正式公告宣布，奖金是“根据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建议颁发的”，其实，这是客套。大权掌握在奖金委员会的手里。自 1975 年以来，哥伦比亚大学的作用不过是盖盖橡皮图章而已。

委员会安全地同外界隔绝开来，开始了历时两天的艰苦工作，挑选 1990 年普利策奖的最终获得者。

委员会过去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这项工作。但是，在 1981 年它把普利策奖授予珍妮特·库克关于根本不存在的八岁孩子吸毒的捏造报道而受到批评后，它把评审工作延长到两天。委员会秘书克里斯托弗当时说，增加一天，有助于委员会“比过去更加仔细地审议提名人选”。这个宣布无异于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承认犯了错误。

在一定程度上说，很难指责委员会成员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用各个委员投票的办法来秘密作出决定。如非绝对必要，为什么要作第二次考虑呢？

“挣的工资不值得那么做，”克里斯托弗开玩笑说。

他的意思当然是说，在委员会的服务是不拿钱的。甚至连旅费都是由委员自己或他们的公司承担。委员们唯一的报酬就是享有声望和权力。他们的权力是极大的，所以与之俱来的工作量也很大。

对委员会成员来说，评审普利策奖金的工作，远远不止每年 4 月在哥伦比亚大学这两天的考虑。他们的工作实际上在 1 月份就开始了，那时五个图书奖评委会各提出了三名最终候选人名单。加在一起，就是 15 本书，所有奖金委员会成员（那是最理想的）应当在 4 月份以前的 90 天中阅读完毕。

不过，在 4 月份以前，戏剧和音乐两个评委会在 3 月 1 日提出它们的最终候选人名单。这就是说，奖金委员会成员除了必须审阅的图书以外，还有三个戏剧要看（或者至少读读剧本）、三盘录音带要听。

在这些评委会提交报告一周以后，14 个新闻评委会提出它们的被提名人选，总共 42 名最终候选人。奖金办公室把 42 人的参赛作品影印件寄交奖金委员会的每一位委员，他们应当在 4 月份来哥伦比亚大学进行最后评审以前阅读完毕。

显然，重任在肩的头头们很少有人能够抽出时间啃完那么多的同奖金有关的材料。这就是为什么设立小组委员会的原因。委员会分成七个各由三人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分别评审图书、戏剧和音乐作品。有些人参加不止一个小组委员会。

例如，传记小组委员会的所有三名成员负责阅读被提出的所有三本候选图书，然后向全体委员会作出推荐。音乐小组委员会成员在听了三名最终候选人的作品录音后，也作出自己的推荐。戏剧小组委员听了三名最终候选人的作品后，推荐一部戏剧。

根据委员式的规定，凡是委员们没有读过的图书或没有看过的戏剧们进行评审时，他们可以弃权。这条规定是 1964 年作出，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由于拒绝授奖予爱德华·阿尔比的《吉尼亚·伍尔夫？》而遭到攻击。至少有一个委员后来本没有看过这部戏剧，只是听说它的某些语言令人作呕而投了反对票。

据罗伯茨说，由于这条规定，委员会通常总是接受小组委员会的建议。

但在小说和戏剧奖方面则经常发生例外，因为在评审这两类奖时，许多委员虽然没有参加有关的小组委员会，但他们往往熟悉这些最终候选人，因而可能有不同意见。

新闻奖没有小组委员会。所有委员会成员都应当阅读 42 件参赛作品，有准备地参与投票。在“世界”大厅评审期间，参赛作品原件陈列在那里，以备委员们不时翻阅或查看。

下午 12 30

吃午饭的时候，罗伯茨透露，委员会把上午的时间用于图书、戏剧和音乐奖。

“我们已经解决了大部分，”他用带点北卡罗来纳的口音说。

如果换一个人说这样的话，承认到吃午饭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对美国文化的大部分的评审工作，那会显得不策略，甚至令人讨厌。然而，出自罗伯茨之口，这话便似乎是合理的了。此君有超凡的魅力和感染力，使你觉得十分钟的评审就足够了，如果他想使你这么想的话。

他的语言明快，颇具吸引力，只是偶尔流露一点南方的口音。他毕业于查佩尔希尔的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新闻专业，1956 年在附近的《戈尔兹博罗新闻守卫报》当农业记者，开始了他的报业生涯。他在诺福克《弗吉尼亚向导报》、北卡罗来纳州罗利《新闻观察家报》和《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工作一段时间后，到《纽约时报》任职，负责报道南方的人权斗争和越南战争。

罗伯茨认为自己是一个职业报人，而不是艺术评论家，这是正确的。委员会很快就处理完文学艺术奖，其速度之快，他似乎感到遗憾。发生的事情确实有点令人吃惊：一批新闻界负责人在一位大学校长和一位教授的帮助下，完成了挑选 1990 年美国文化最优秀作品的工作。

自以为是吗？罗伯茨也认为，的确是由一批非专家的人对全国的文学、戏剧和音乐进行评审的。不过，他指出，委员会这样做，仅仅是贯彻执行约瑟夫·普利策在遗嘱中表达的愿望而已。他还强调说，在非新闻奖、特别是音乐奖方面，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倚重专家评委会的推荐。

“在这方面，我们努力建立一个够格的评委会，”罗伯茨说。

这令人感到欣慰。不需要进行出色的调查性采访，就可以发现，奖金委员会的音乐小组委员会成员——詹姆斯·霍格、沃尔特·鲁加伯和夏洛特·赛科夫斯基所受的正规音乐教育不过是儿童时代的钢琴课和学校管弦乐队的经历而已。

在委员会开会以前，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三位成员听了音乐最终候选人的作品录音，然后便通过了评委会的推荐，把奖金授予梅尔·鲍威尔的《二重奏：两架钢琴和管弦乐队的协奏曲》。从程序上来讲，评委会是没有责任推荐得奖人的，而只是按字母顺序提出最终候选人。然而，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和音乐评委会都把最终候选人排列了名次，这使奖金委员会成

员十分高兴，因为他们之中谁都没有写过协奏曲。

全体委员会没有听任何录音，就接受了这个小组委员会的推荐。为什么还要做做样子呢？这个普利策奖事实上是由评委会决定的。

今天上午在图书奖和戏剧奖方面，以不同的手法玩弄了同样的把戏。不过，这方面的过程比较费脑筋，需要更多的考虑，因为委员会成员的确读了这些书（有些书甚至出自某些委员的手笔），有些人还看了有关的戏剧。这些情况使其中的许多委员认为自己有资格对文学和戏剧作品作出评价。

除了音乐奖外，到吃午饭的时候，委员会还初步通过了其他一些奖。例如，历史奖授予斯坦利·卡诺的《我们的形象：美国在菲律宾的帝国》，传记奖授予塞巴斯蒂安·德格雷齐亚的《马基雅弗利在地狱》，诗歌奖授予查尔斯·西米克的《世界没有完蛋》，非小说奖授予戴尔·马哈里奇和迈克尔·威廉逊合写的《他们身后的子女》。

具有魅力的小说和戏剧奖留待以后决定。

下午 2 30

哥伦比亚大学对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成员的招待显然比对评委们的招待要好。委员们从校长官邸回去的时候，都高兴地谈论着他提供的蟹肉和填馅甲鱼肉的丰盛午餐。这批人没有吃多少洒着一层白色东西的花椰菜。

现在，委员会着手于他们最拿手的事情，处理新闻奖。

天灾人祸的报道在今年新闻奖获得者中占有显著地位。委员会决定把一般新闻报道奖授予《圣何塞信使新闻》工作人员对 1989 年 10 月 17 日湾区地震的报道。奥克兰《论坛报》的摄影记者对这次地震的摄影报道获得了现场新闻摄影奖。《西雅图时报》的四位记者——罗斯·安德森、比尔·迪特里希、马里·安·格温和埃里克·纳尔德——对“埃克森·瓦德兹号”油轮漏油及其后果的报道获得全国报道奖。

海外的政治动荡也是一个主题。委员会把国际报道奖授予《纽约时报》的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和谢里尔·伍邓对中国民主运动及其被镇压的报道。《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的戴维·特恩利对中国和东欧政治动荡所拍摄的图片获得特写摄影奖。

象往常一样，揭丑新闻获得一些奖。委员会把调查性报道奖授予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明星论坛报》的卢·基尔泽和克里斯·艾森，他们的报道揭露了一些公民组成关系网，同圣保罗的消防队串同一气，从火灾中谋利，其中有些火灾被消防部门认为起火原因是可疑的。解释性新闻奖授予《华盛顿邮报》的戴维·瓦伊斯和史蒂夫·科尔，他们的报道研究了证券和交易委员会的工作及其前主席约翰·谢德的政策对它的影响。

特写报道奖授予《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电讯报》的戴夫·柯廷，他的报道讲述了一家人在一次爆炸中房屋被毁、家人被烧伤后如何努力奋斗、重兴家业的。

宾夕法尼亚州波茨敦《信使报》的托马斯·希尔顿获得社论奖，表彰他就发行地方公债以保护宾夕法尼亚农村地区的农田和其他空地而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旧金山纪事报》的建筑批评家阿伦·坦科获得批评奖。《洛杉矶时报》70岁的体育专栏作家吉姆·默里获得评论奖，其实他早该获得此奖。

在进行这些讨论的过程中，当涉及委员会成员的报纸时，他们便轮流到过道回避一下。根据一项书面规定，他们必须暂时离开“世界”大厅。这项规定说，“当讨论或评审一项稍有涉及本身利益的参赛作品时，委员会成员都不能参与”。

当委员会成员可以返回座位时，普利策奖金助理克劳迪娅·斯通便到过道里，招呼他们一声。斯通的作用颇象法警。

在此后的一天半时间里，拉克尔·贝克必须三次离开房间，因为他的报纸《纽约时报》在三个不同类型奖里都有最终候选人。《华盛顿邮报》的梅格·格林菲尔德超过了他，必须回避四次。

但是有一个委员超过了他们两人，那就是罗伯茨。他回避达七次之多，因为他的费城报纸属于奈特—里德报系，而这个报系在七个不同类型奖里有最终候选人。在涉及这个报系的讨论时，他在场显然不合适，所以在评审新闻奖时，相当多的时间他是在过道里度过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一件事变得很清楚：有些表决按照措词严格的回避政策，本来是禁止某些委员参加的，然而他们却无一人回避。

例如，在讨论图书奖时，委员们无一人离开大厅回避。事实上，有两位委员同参赛图书的出版商在经济上有关系。兰多姆出版公司和它的子公司万神殿图书公司为委员会成员西塞拉·博克出版了四本书。他参加的讨论导致兰多姆公司的一本书《我们的形象：美国在菲律宾的帝国》获得历史奖，万神殿公司的一本书《他们身后的子女》获得非小说类奖。委员会秘书罗伯特·克里斯托弗的出版商是艾尔弗雷德·诺夫出版公司，它的一本书列入传记最终候选人之中。（应当指出的是，诺夫出版公司的书没有得奖，克里斯托弗是一个没有表决权的成员。）

为许多出版公司写过十几本书的拉塞尔·贝克在1990年参赛图书中没有明显的牵连。不过，在他1985年参加委员会以来的前些年中，他的一些出版商的图书曾经列入过最终候选者。

当被问到回避的问题时，贝克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罗伯茨和克里斯托弗也是这个态度。他们说，从来没有人提到这一点。

但是，任何同出版商订有合同或者正在谋求这种合同的作者都不应当处于可以帮助出版商获得图书奖的地位。那对它将是在经济上的巨大支持，从而违反了委员会自己的规定，即委员不得参与同自己有利害关系的参赛作品的评审工作。

某些有辛迪加专栏的委员也参与评审涉及其报业辛迪加的参赛作品。例

如，罗伯特·梅纳德在讨论漫画家托姆·托尔斯的参赛作品时，就没有回避。托尔斯的作品是由宇宙新闻辛迪加转发的，这家新闻辛迪加也转发梅纳德每周两次的专栏文章。这难道不是照顾自己的报业辛迪加吗？获得普利策奖，肯定对宇宙新闻辛迪加是有益无害的。（梅纳德后来拒绝谈论他的投票，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克里斯托弗。）

委员们也参加竞争对手参赛作品的评审工作，有时投赞成票，但往往投反对票。这显然涉及到利害关系。

下午 4 15

这条线也许可以划在纽约街头为生存而斗争的竞争对手之间吧。当讨论专题报道奖时，时代明镜公司的总裁戴维·拉文索尔离开了房间，因为两位最终候选人是来自他的报系——《纽约新闻日报》的吉姆·德怀尔和《洛杉矶时报》的克莱尔·施皮格尔。不过，再没有别人回避，其中包括《纽约每日新闻》发行人詹姆斯·霍格。虽然他的小报是拉文索尔报纸的死对头，但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他都在场，只是没有发言罢了，然而他坐在会场的本身就会对结局产生微妙的影响。

这个类型的奖决定的速度出乎意料地快，还不到十分钟。在讨论时，他一直保持沉默，他的偏爱并没有影响讨论的结果。然而，在投票时，他却支持把专题报道奖给予同吉姆·德怀尔竞争的一位专栏作家，后者曾经拒绝过霍格希望他离开《新闻日报》而到《每日新闻》工作的表示。

后来，霍格多次拒绝说明他为什么不加以回避或其他一些投票情况的动机。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评审期间有人要求就这个问题进行采访，还有人通过电话和写信表示这样的愿望，都被他一一搪塞过去。最后一次企图同他讨论这个问题的努力带来的结果是：他的秘书贝蒂·博德基安在电话中简短地回答说：“霍格先生建议你把这些阿题向哥伦比亚大学的克里斯托弗先生提出。”

1990年4月10日上午9 30

第二天被用来最后完成昨天剩下的工作，并批准所有21项奖的决定。

委员会还附带处理了一些次要问题，如一些财务事宜和任免事项。出人意外的是，委员会采取了一项新政策：关于今年评奖事宜的询问，一律通过罗伯茨和克里斯托弗作出回答。任何其他委员都无权处理记者的问题。作出这个决策的原因是，一部分委员对一个来访的记者在走廊里的纠缠感到不耐烦，他不断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向每个委员散发他个人的信件，说他正在写一本书，要求给予合作。

后来，克里斯托弗说，这个政策是“一位比较重视新闻报道的委员促成的，我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关心这件事。”他不肯说出这位委员的名字。

罗伯茨说，这个政策不是一个委员的主意，而是“许多委员的主意，实

实际上是全体委员的主意”。

委员们忠实地执行了新政策，把所有的提问都交给罗伯茨和克里斯托弗处理。

据克里斯托弗说，他奉命把会议的书面记录严格保密。这些记录并没有记载各个委员的投票情况，但却反映了财务和人事讨论情况。他说，委员会“不想把这些情况传播出去”。

克里斯托弗说：“他们之所以举行秘密会议，是因为他们想畅所欲言地讨论问题，如果举行公开会议，在众目睽睽之下，就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例如，他们讨论了补缺人选问题、将来采取的一些行动，有时谈及政策措施，有时谈及预算问题。他们不想公开这些问题，否则，讨论起来就会有顾虑。”

既不准参加委员会的会议，又不能翻阅会议记录，甚至也不能在走廊里采访任何委员，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很难设想委员会这二天的讨论情况。不过，据克里斯托弗和罗伯茨说，这一天作出决议很顺利，分歧比较少，这是近几年来普利策奖金评审工作中最和谐的一天。

小说奖授予奥斯卡·希于洛斯的《马姆博王演奏爱情歌曲》。今年的评委——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主席乔尔·科纳罗、旧金山作家和批评家黛安·约翰逊和俄亥俄的鲍林·格林州立大学教授菲利普·奥康纳——只提出了两个最终候选人，另一个是E.L.多克托罗的《比利·巴思盖特》。有一些委员喜欢多克托罗的小说。另一些委员说两部小说都可以。但大多数委员支持希于洛斯。

戏剧奖授予奥古斯特·威尔逊的《钢琴课》。不过，委员会成员很少看过这个戏剧，因为它迄今为止还没有在纽约上演过。委员们也很少看过评委会推荐的另一个主要竞争者玛丽亚·艾琳·福恩斯的《夜间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它也是在外地上演，当委员会收到评委会的报告时，它已经停演了。委员们被评委会的热情的报告感动了，这个报告是《时代》周刊的曾得过普利策奖的批评家威廉·亨利写的。他盛赞《钢琴课》，说它“可能是我成年时期看过的最好的美国戏剧”，说奥古斯特·威尔逊无疑是过去十年（如果不是更长时期的话）最重要的美国戏剧家。这样，威尔逊就成为普利策奖金的两次获得者，因为他的《篱笆》曾获得1987年普利策奖。

在文学艺术奖的评选工作结束后，委员会便着手来完成新闻奖的评选工作。

象往常一样，新闻奖的评选工作免不了遇到一两个难题。

委员会对漫画评委会提名的三位最终候选人不满意。（但是，委员会能指望什么呢？评委会中没有一个漫画家呀。）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太阳哨兵报》的钱洛和《迈阿密先驱报》的吉姆·莫林这两位最终候选人的新闻漫画未能获得足够的票数。第三名最终候选人、“杜内斯伯里”漫画家加里·特鲁多的参赛作品受到一些委员的称赞，但是大多数人对他的作品不感兴趣，

不想让他再次获奖。他在 1975 年曾经得过普利策奖。

到这个时候，已经看得很明显，委员会通不过今年的漫画奖，除非评委会另选作品。所以克里斯托弗赶忙到他的办公室，给漫画评委会主席、马克特大学新闻教授理查德·伦纳德打电话。在同他讨论了这个僵持局面后，克里斯托弗回到会场。委员会通过了把奖金授予另一个人选、《布法罗新闻》的托姆·托尔斯，表彰他的系列作品。他的这组以《第一修正案》为题的漫画嘲笑了有人想通过禁止污辱美国国旗的办法来限制言论自由。

在摄影奖方面，委员会也耍了点花招。委员们非常想把现场新闻摄影奖授予委员会的另一成员罗伯特·梅纳德的《论坛报》，以表彰该报对湾区地震的摄影报道。《论坛报》四十年来还从来没有得过普利策奖。如果失去这次机会，这家经济拮据的报纸再过若干年（如果梅纳德能继续维持下去的话）也未见得会再次碰到这样的机遇。但是最佳现场新闻摄影参赛作品是戴维·特恩利在中国和欧洲拍摄的充满感情的、活灵活现的照片。他的作品显然优越于今年提出的任何其他摄影作品。

不过，这没有关系。委员会有权把最终候选人挪到其他类型的奖中。他们很方便地就把特恩利的现场新闻摄影说成是“特写摄影”，放到特写摄影类获奖。对委员会来说，特恩利的照片是否是真正的“现场新闻”之作，那是无所谓的。

后来，克里斯托弗坚决否认，在这次照顾一个委员的报纸利益的摄影奖花招中，有任何朋友情面。但正是这种幕后玩弄的把戏，给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投上了一层疑云。

在普利策奖中，公共服务奖被普遍认为是最有威信的。对这方面参赛作品评审工作也导致不寻常的决定。两家报纸共同分享了这个奖，这是 75 年中第五次出现这种情况。

究竟是把这枚金质奖章授予委员会主席的《费城问询报》，还是授予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小报《华盛顿每日新闻》，委员们的意见发生分歧。

有些委员喜欢《费城问询报》吉尔伯特·高尔的报道，他揭露了美国血液业是在政府很少规章制度、很少监督下经营的。高尔的报道曾获得过 1979 年普利策奖。他这次的系列报道提出了 40 条新闻自由问题，从而导致国会血液业的调查。

委员会另一些成员主张把金质奖章授予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家庭办的小报。该报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揭发该报所在城市的饮水被致癌物质污染，在八年之久的时期里当地政府既没有透露，也没有纠正这个问题。《每日新闻》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报道了这个问题，从而促使环境保护署对这个小城市的饮水系统制定了新的条例，并要求全国作出更严格的测试。

两家报纸都有同样有说服力的获奖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决定让它们共同分享这个奖。

委员会秘书克里斯托弗颇有点畏缩。他知道，分享这个奖，并不意味着

两家报纸分享一枚镀金奖章。它们将各得一枚。这样就使得克里斯托弗本来就不多的经费更加紧张，因为根据当前的金价和银价，一枚这样的奖章约需1700美元。奖章的一面刻着本杰明·富兰克林像，另一面则是：一个印刷工人正在操作一台平版印刷机。每年这样的奖章都是由康涅狄格州丹伯里金属艺术制品厂铸造的，上面有获奖日期和获奖报纸的名称。

对于关心经费的克里斯托弗来说，多一枚奖章，当然就得多花一份儿钱，但也说不上是财政上的灾难。他说，奖金管理当局在财政上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10年以前却不是这样。在70年代，约瑟夫·普利策原先捐赠的五十万美元的收入，再加上一个啤酒厂的10万美元，就是继续维持奖金的全部资产了。

“在我接手以前，他们靠这点收入，每年的经费多少有点不够，”克里斯托弗说。“情况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必须吃221老本。基金开始减少。如果长此以往，就要破产了。”

在普利策逝世的1911年，他当初提供的奖金基金是不少的，按1990年的币值计算，约合610万美元略多一点。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普利策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哥伦比亚大学缺乏远见，没有每年从这笔基金中拿出足够资金进行再投资，从而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使基金得以保值。

在设立奖金的头60年中，奖金委员会和哥伦比亚大学都没有发起重大的筹款运动，来增加原来的基金，以便赶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委员会和校方为了摆脱管理奖金的具体事务，建立了一个行政办公室，它现在每年的经费约为20万美元，还不算现金奖金。

在过去几十年中，委员会把约瑟夫·普利策原来设立的九项奖增加到21项，从而遭到某些人士的批评，说这种增加降低了普利策奖的威信。相比之下，诺贝尔原来的五项奖只增加了一项，即经济奖，而普利策奖则增加了很多。除了音乐奖和诗歌奖之外，增加的奖金项目全是新闻方面的，约瑟夫·普利策并没有要求这样做。

普利策在遗嘱中原定每项奖金各1000美元，只有历史奖金为2000美元，其原因他未加说明。

如果委员会和校方按照普利策所希望的方式管理他的基金，并恪守他在遗嘱中所希望的奖金数额的话，今天的普利策奖金，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将是13,290美元，历史奖金为26,580美元。

然而，普利策奖金在1988年以前一直没有增加，到1988年才增加到3000美元。许多其他威信低得多的新闻奖，其奖金额却大得多。

在65年中，普利策基金唯一的一次大幅度增加，是施利茨啤酒公司1950

年捐赠的 10 万美元。当时该公司在美国广播公司主办了一次时间不长的电视节目，名叫“普利策奖金剧场”。

1970 年，普利策奖金委员会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但当时正逢经济不景气，所以就停止了，”克里斯托弗说。“1983 年，我走马上任后，经济重新回升，我们又恢复了筹集资金的活动，弄到了不少钱，现在可以用这笔钱来满足开支的需要了。”

他说，在那次活动中募捐了大约 300 万美元。（需要募捐两倍这样的数字，才能把奖金现金的标准恢复到普利策原定的水平。）所有这些捐款都是来自报纸企业——独立的报纸和报系。

“我们限定各个单位的捐款不得超过 15 万美元，”克里斯托弗说。“这是我们在捐款运动中接受一个单位资金的最高限额，主要是为了避免造成某人拿钱买影响的印象。有许多报纸和报系按最高限额捐了款。”

他说，捐款者的名称是保密的。

1990 年募捐的款额也是如此。“我能做的最大限度，”克里斯托弗说，“是告诉你几百万美元这个数字。”

一个内行的估计是 400 万美元。

1987 年，新闻学院从一位捐款人那里得到了 100 万美元，他希望用这笔钱款的一部分来提高普利策奖金数额，次年就提高到 3000 美元。克里斯托弗和罗伯茨都没有透露捐款者的姓名，因为 223 他坚持不要声张。克里斯托弗只是说，捐款者不是报纸。

“这并没有什么恶意，”罗伯茨说。“有的人非常谦逊，他们认为，做慈善事业是发自内心的，并不是为了让人家知道。”

这当然是对的。但是，用不能透露来源的钱作为美国最出色的调查性新闻的奖金，是否有点不合适呢？

“我不认为普利策奖金里面有任何有问题的捐款者，”罗伯茨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校方在支配这笔钱时实际上攫为己有，我简直不知道这些钱是来自哪里。”这就是说，捐款者根本无法在这方面施加影响。

只要有时间，一个优秀的记者是能够查明捐款的来源的。但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谁捐了多少钱”，而是“为什么要保密”。这样做，就是对获奖者说：“由于你的出色工作，请接受普利策奖和 3000 美元支票。遗憾的是，这笔钱不是来自普利策捐赠的基金，而是来自靠别人的捐款赚的收入，最近捐款人的姓名是不能透露的。但是，相信我们吧。大部分捐款者是报纸公司。我们不能透露究竟是哪些报纸，不过你也可能猜得出来。至于非报纸捐款者，我们可以向你保证，我们绝不会接受可能使你的道德受到损害的钱。”

还没有这样的记录：有哪位记者先要问问普利策奖金支票的来源，然后才装进口袋。不过，他们实际上被要求在信仰上有个飞跃。只要有一点点想象力，委员会就可以消除这样的问题。例如，委员会可以让奖金管理机构靠不愿公布自己姓名的捐款者的钱来维持日常开销，奖金款项则由普利策原来

的捐款和参赛注册费来出。

当委员会抓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可以提高大的都市报纸的收费标准。为什么北卡罗来纳州的小小的《华盛顿每日新闻》要象《费城问询报》一样付同样多的注册费呢？《费城问询报》很有钱，提出的参赛作品达 34 项之多，它认为这些都有资格获得普利策奖金。

1990 年参赛作品各交 20 美元注册费，新闻 1,770 件，图书 590 件，音乐 129 件，共收费约 50,000 美元，尚不足以满足奖金费和金质奖章费用所需的 63,400 美元这个数字。如果把发行量超过二十五万份的报纸的注册费提高到 50 美元的话，初步估算，全部注册费将接近 9 万美元，足以不仅消除人们对资金来源的疑窦，而且还可以提高奖金数额。

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如果把注册费提高到 50 美元，一些大报也许就不会提出那么多的参赛作品了。这是极不可能的。如果真的发生那样的情况，干着大部分累活的 65 位评委只会额手称庆、鼓掌欢呼。

下午 4：45

委员会的工作完成了。

现在，奖金办公室和哥伦比亚大学必须把所有这些决定再保密两天，直到 4 月 12 日星期四为止。星期四是普利策奖金日，那天下午 3 时将宣布 1990 年得奖人名单。

为了取得最大的宣传效果，委员会必须把它的决定再保密 48 小时。不过，实际上，有些委员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悦心情而向好友吐露真情，而这些好友又告诉别人。

“如果把不住门儿的舌头可以沉船的话，我们都会死在这里，”克里斯托弗嘟嘟啾啾地说。

委员们互相告别，各奔全国各地自己的工作岗位。当获奖名单宣布的时候会发什么事，他们得有所准备。

尽管委员们费了不少劲儿，他们的一两项选择通常总是会引起非议的。什么奖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奖的威望越高，抱怨就越大，常常被人指责搞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尖子主义、地区主义和人情主义。

在所有这些“主义”中，最后一个“主义”可能沾点边，其他那些指责都站不住脚，至少今年是如此。1990 年奖金的记录看起来是体面的。

种族主义吗？一位黑人剧作家获得戏剧奖，一位拉丁美洲裔小说家获得小说奖。

性别主义吗？在有女性最终候选人的五类新闻奖中，有四类是女性得奖的。

尖子主义吗？最有威望的奖——公共服务金质奖章——是由北卡罗来纳州波弗特县的一家发行量只有一万份的小报《华盛顿每日新闻》共同分享的。

地区主义吗？在普利策奖金史上第一次有半数新闻奖为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报纸所得。

人情主义吗？在这一点上，委员会可有点理亏。14项新闻奖中有8项为委员会成员所代表的报纸获得。这八家报纸的获奖作品当然是十分出色的，但它们同掌握实权的委员会的密切联系，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提出抗议：这是大报的自我祝贺的俱乐部，彼此瓜分了大部分奖，剩下的才给予少数圈外报纸。

委员会成员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弱点：对调查性报道秘密颁奖，是虚伪的；认为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有资格对美国的文学、戏剧和音乐作出最后的评判，这是傲慢的；委员们在回避问题上随随便便，太粗心大意了。

说句公道话，应当强调的是，评奖过程那么戒备森严、保守秘密，这并非1990年委员会成员的创造。由委员会成员作为美国文化的评判员这种做法迟早会使他们陷入左右为难的道德利益冲突中，从而可能大大损害奖金的光辉，不过，这也不是他们的发明。

委员会成员只是照老规矩办事，继承老传统而已。

不过，他们也象以前的委员会一样拥有同样强有力的武器，即改变错误传统的权力。1980年，委员会曾把女性和少数民族成员吸收到自己行列里来。

13 . 再度访问普利策奖金日

1990 年 4 月 12 日东部时间下午 3 : 05

美联社新闻稿开始出现在吉姆·德怀尔家里电脑的屏幕上，他的电脑通过调制解调器同曼哈顿闹市区的《纽约新闻日报》联结在一起。象往常一样，每年普利策奖一宣布，美联社就开始一段一段传发得奖人的消息：

美联社纽约电——报道旧金山海湾地区地震、“埃克森·瓦尔德兹号”油轮漏油事件和中国民主运动被镇压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主宰了今天的普利策新闻奖。……

吉姆看到了另一条报道戏剧奖的新闻稿。第二次获得普利策戏剧奖的奥古斯特·威尔逊被当作一条大新闻。关于图书奖的一条单独新闻是以美籍古巴人奥斯卡·希于洛斯获得小说奖开头的，他显然是获得此类普利策奖的第一个拉丁美洲裔人士。

14 项新闻奖，每一项作为一条单独新闻，连续出现在屏幕上。这种叫作“又讯”的短消息只有一两段：

《圣何塞信使新闻》对 10 月 17 日地震的报道获得一般新闻报道奖，而奥克兰《论坛报》关于地震造成的破坏情况的图片获得现场新闻摄影奖。

《论坛报》兴高采烈的工作人员给该报的头头们和编辑们喷洒香槟酒……

当吉姆把电传纸卷起来的时候，他觉得他是否可能成为新闻界的受虐狂者。他知道他没有得奖。正如同 3 月份他被告知他成为最终候选者一样，昨天他又被告知他落选了。他的编辑唐纳德·福斯特打电话，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吉姆的妻子卡西。

不过，吉姆并不知道，奖金委员会没有怎么讨论，便就专题报道奖作出了决定。据罗伯茨和克里斯托弗说，主要是因为一些委员们遗憾地认为，吉姆的专栏文章应当挪到评论奖类。但是，一谈到把他的作品放到评论奖类，又受阻于这一事实；委员会已经决定把今年的评论奖授予《洛杉矶时报》的吉姆·默里。罗伯茨和克里斯托弗都说，这次表决是举手一致通过的，没有人弃权。

吉姆此时还不知道，究竟是谁得奖。这就是为什么当他盯着美联社的新闻时有点发抖的原因。他希望得奖者，不管他是谁，一定有了不起的作品，实际上是难以置信的好作品。只有这样的消息，才能使他过去 24 小时产生的极大沮丧情绪有所减轻。

东部时间下午 12 : 05

当克莱尔·施皮格尔在曼哈顿海滩她的家坐在电视机前时，她感到极为失望，因为有线新闻电视广播公司只字未提普利策奖金的事。她知道，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文字新闻奖，而不是广播奖。有线新闻电视广播公司今天晚些时候将报道普利策文学艺术奖，但是，新闻奖则受冷遇了。

克莱尔不断地调换频道，想在别的新闻节目中找到关于普利策奖金的消息，但是，没有什么结果。

她感到失望，便关了电视。不过，克莱尔已经知道她的参赛作品的命运。正象她在 3 月份得知她成为最终候选人一样，昨天《洛杉矶时报》的编辑谢尔比·科菲已经告诉她落选的消息。

如同吉姆·德怀尔一样，克莱尔也在找关于谁得奖的消息。

再没有比“象筛子一样泄露消息”更坏的话了。然而，描写普利策奖金系统漏洞之多，则没有比这句话更切贴的了。作者询问了 28 位新闻奖最终候选人，其中 21 人表示，在普利策奖金日正式宣布以前，他们已经得到消息了。这 21 人中，甚至包括奖金委员会主席的记者——《费城问询报》的吉尔伯特·高尔，他承认，当他成为最终候选人时，他的编辑就告诉了他这个消息，而当他的作品被选定授予公共服务奖时，他又得到了消息。

这 21 人中的另一人克莱尔·施皮格尔今天晚些时候必须带她的女儿莱斯利去医生那里治肚子里的病。当她开着汽车，听车里的无线电时，她听到一则关于普利策奖的消息，终于发现谁得奖，这正是她过去一个月来一直希望的。克莱尔后来告诉人们，当她听到这个消息时，她的情绪立刻好起来。

东部时间下午 1 : 05

塔马尔·斯蒂贝尔在她的圣菲公寓里吃着犹太人逾越节的传统午餐填馅炖鱼和未发酵的面包，想起车祸，仍然不寒而栗。她努力只考虑工作，把思想集中于今晚她要去报道的县里养狗许可证听证会。但四天以前在 25 号州际公路上发生的车祸，或者说险些发生的车祸，依然萦绕脑际，不能不想。她竭力想把那件事挤出脑外，然而，当时可怕的情景总是顽固地跳回来。每次想到这里，她就不由得打颤。

上个星期天，在逾越节以前的一个狂风呼啸、没有月光的夜晚，塔马尔在高速公路上驱车急奔阿尔伯克基，以便在机场接一位朋友。据她回忆，当时她的车速快了一点儿，思想上又在考虑同她姐姐沙伦的不和，几天以后她的另一个姐姐卡里要切除肿块，也使她担心。

塔马尔正在走神儿，突然一大堆鬼怪似的风滚草朝着她的汽车前灯袭来。大部分南方人对风滚草已经习以为常，朝它直接开过去就是了。但塔马尔是纽约人，别人曾对她讲过如何对付风滚草，她一慌，想不起了。惊恐之中，她本能地躲闪起来。汽车失去了控制，左右摇晃三次，玻璃碎了，金属弯了，发出了揪心的咯吱声。

汽车毁坏了，停在高速公路的中线上。幸而没有同别的汽车相撞。塔马尔解开安全带，从被毁的汽车中走出来。她居然连块皮都没有划破。

然而今天，每当她想到星期日晚上发生的事，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她拚命想恢复心情的平静，因此，决定过逾越节，虽然她认为她的信仰介于“不可知论和无神论之间”。在过去几天里，她在宗教的传统中找到了慰藉。她发誓本周绝不吃发酵的面包。

当不谈车祸的时候，塔马尔又开始为她的两个姐姐发愁。沙伦仍然不跟她说话。卡里预定今天下午切除胸部的肿块。塔马尔又打颤了，她开始默默地祈祷。

电话响了。她跳起来，神经开始紧张。

“祝贺你，”打电话的人说。塔马尔听出这是埃德·马雷诺的声音，他是美联社驻圣菲的记者。

“多谢，”她回答说，多少有点不高兴。塔马尔认为，埃德打电话，大概是嘲笑她的车祸吧。

“现在我想你在报社将有自己的停车场了，”他开玩笑说。

“太有趣了，埃德，”她说，并没有认真地考虑到他是具有幽默感的。

“你还没有听到？”他问。“你得了普利策奖。”

他说，这是新墨西哥州的报纸第一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要写一篇报道，请她讲几句话。塔马尔认为，埃德是在开玩笑，她生气了。她要去上班了。但他坚持说，这是真的，并开始把美联社的新闻稿念给她听。她仍然认为，他是在残酷地作弄她。这时，电话机上等待呼叫的装置响了。

这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打来的电话，一位记者要她谈谈她是如何写出获得普利策奖的关于氨基丙酸的报道的。

现在，塔马尔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她感到吃惊。她对记者说，她还没想好，便又拨回同埃德谈话。

“埃德，现在我不可能同你谈。我要去了解一下，是否我应当先同我自己的报纸谈，”她说，就挂了电话。

后来她认识到，这样的反应是愚蠢的，她得向埃德·马雷诺赔礼道歉。但此刻，她的头脑不是按通常的方式处理信息的。

晕头转向的塔马尔冲出门外，奔向办公室。途中，她在邮局停留了一会儿，汇一笔早就该汇的钱。在邮局时，她发现自己的裙子上有污渍。“天哪，”她自言自语道。“如果人家给我拍照，这象什么话？”

她又回家，换一身比较整齐干净的衣服——一条较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件有腰带的白色丝衬衫。当她正要迈出房门时，电话接连不断地响了起来。

第一位来电话的是塔马尔的地方新闻编辑主任霍华德·霍顿，他高兴的不得了，使塔马尔感到好笑。霍顿这位编辑主任平常是一个热情不外露的人。

接着打来电话的是办事处的主编蒂姆·科德尔，他在氨基丙酸的报道中

起了关键作用。

“不错嘛，”他没有说出“普利策奖”几个字。

“天哪，”塔马尔说，“你会相信吗？”

“当然啦，”科德尔回答说。他是一位非常冷静的主编，几乎变成了耶稣会教士。

还有一些电话：一位好朋友的、一位记者同事的，还有报社的一位摄影记者尼尔·雅各布斯。

“该死的，快来这儿，”雅各布斯说。“大家都等着你呢！”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塔马尔决定给纽约的父母亲打电话，以便让他们直接从她的口里听到这个消息。她的母亲在帕特南县皮克斯基尔家中接的电话，听到此事后尖叫了起来。她的父亲在曼哈顿办公室听到电话后，感情颇为激动，亲切地对她说：“这足以弥补你过去给我们造成的许多 tsuris（意第绪语：烦恼）了。”

塔马尔停了一会儿，使自己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然后出去坐进她本周一直使用的租来的汽车，直奔办公室。这一英里半的行程，使她可以利用这段短暂的宝贵时间深深地呼口气。

下午 2：15

当镇静自若的塔马尔·斯蒂贝尔踏进圣菲闹市区《阿尔伯克基日报》办事处的大门时，编辑部的全体人员鼓掌欢迎。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甚至地方新闻编辑主任霍顿也到场，他通常是 4 点钟才来。

有人带来了几瓶香槟酒和一些塑料杯。人们拥抱塔马尔，向她表示祝贺。与此同时，香槟酒的软木塞子砰砰地打开，充满泡沫的酒汨汨流淌出来。象大多数现代报纸一样，《阿尔伯克基日报》也是严格禁止在上班时间饮酒的。希尔迪·约翰逊和《前方报》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现在，一个职工在午餐时喝啤酒，就可能被解雇。但是，普利策奖金日则例外，这一天编辑、记者可以公开地在编辑部开怀畅饮，而不必担心失去工作。

此时此刻，全国另外 13 家报纸的编辑部也在举行类似的普利策奖金庆祝会。最狂欢的恐怕要数奥克兰和圣何塞的两家报纸了，它们的全体员工共同分享了报道地震所获得的奖。但是，当湾区记者饮酒庆祝自己发往全世界的地震图片获奖时，别人却怀疑如此欣喜若狂的庆功是否适宜，因为这种奖是以两千多人丧生的巨大天灾为背景的。

不过，《阿尔伯克基日报》的庆功则不那么残忍。氨基丙酸的报道拯救了人的生命。这的确值得庆贺。

然而，塔马尔却没有喝酒。她正在吃药，医生说，这种药不能同酒混在一起。

在只有 12 人的这个小小办事处里，庆祝会开得热热闹闹、真心诚意。他们当然是为塔马尔而高兴。但他们也为这个办事处、为他们自称的“北方

日报”而兴高采烈。

“在我报道氨基酸期间，有四人在不同的时间内帮我顶班，”塔马尔后来说。“这就是办事处的风格。你工作时间很长，写很多报道，绞尽脑汁；但如果需要帮助别人，也会欣然去做。所以获得此奖，实际上造成了全体工作人员‘大家共同完成’的气氛。”

办事处职工觉得，总社把他们这些在前哨基地工作的人当作二等公民。他们说，由于很难说清楚的原因，办事处的地位比总社编辑部要低。所以荣获普利策奖，对他们这些在“北方日报”工作的人来说，特别感到幸福。

正当圣菲浸沉在高高兴兴的欢庆气氛中时，阿尔伯克基总社来了电话。高级领导人希望普利策奖金获得者立即到总社编辑部。

下午 3：20

摄影记者尼尔·雅各布斯驱车 60 英里，把塔马尔从圣菲送到阿尔伯克基。途中，他们在汽车里接了个电话。这是新墨西哥州长加雷·卡拉瑟斯打来的。他祝贺塔马尔成为新墨西哥州的第一位普利策奖金获得者。他对她开玩笑说：

“现在，你该要求他们大大提高你的工资呀，是不是？”

“是啊，州长，”她回敬说，“我觉得，如果你要求他们给我大大提高工资，那会更有份量得多。”

他笑了。“你告诉他们，加雷·卡拉瑟斯说，他们应当把你的工资增加一倍。”

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不过，公司把塔马尔的 3000 美元奖金翻了一番，增加到 6000 美元。这已经成为报界的一种普遍传统，这是对下述看法的一种反应：普利策奖金的票面价值未能完全跟上多年来通货膨胀幅度。

下午 3：45

塔马尔和雅各布斯把汽车停在《阿尔伯克基日报》停车场，从汽车里走出来时，她感到有点紧张。两位摄影记者等在那里，她走向办公大楼时，给她拍了照片。其中一人拿着摄像机追踪她。她笑了，觉得有点好笑。

不过，对她如此注意，反而使她不自在。她喜欢参加聚会，同人们聊聊。但她讨厌成为注意的中心。一想到要当众讲话，她就发愣。那简直是活受罪。

塔马尔走进编辑部时，全场起立，欢呼鼓掌。这里的人比圣菲要多得多。阿尔伯克基有一百多人。塔马尔几乎全都不认得他们。

许多人走到塔马尔跟前，轮流拥抱她。其中包括主编杰拉尔德·克劳福德、副主编肯特·沃尔兹、编辑主任罗德·德克尔特，以及其他一些人。拥抱之后，是一阵尴尬的沉默。

“你们是不是等我讲话？”塔马尔问。

当然是啦。她最害怕的事情终于来到了。

她深深地吸口气，然后轻声轻语地说，这个奖实际上至少有一半归功于主编蒂姆·科德尔，首先是他把氨基酸的报道任务交给她，在工作中给了她很多帮助。

“这是两个人完成的任务，”她对大家说。“我将把奖金的一半给蒂姆。如果不接受，我将把它捐献给他喜欢的慈善事业或类似的事业”

正当她讲话的时候，科德尔走了进来。她一看到他，她的声音开始发抖，她不得不停下来。

她和科德尔拥抱在一起。此时无言胜有言。

有人用餐车推进一块大蛋糕和葡萄汁。一个小小的聚会就这样开始了。许多工作人员走过去向塔马尔表示祝贺，然后拿些蛋糕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当塔马尔认识到这并不是一次真正的庆祝会时，她更加不安了。这里的工作人员很少有人同她讲过话。他们不认识她。他们并不真正为她而高兴。他们可能甚至有几分妒意呢。不管他们怎么想吧，反正塔马尔在这里感受不到她在圣菲同事中间那种欢快的情绪。

总社所选择的饮料就鲜明地显示了阿尔伯克基和圣菲之间的差别。总社的庆祝，用的是葡萄汁。圣菲的欢庆，饮的是香槟。阿尔伯克基严格遵守公司的规定，感情是有节制的。圣菲为获得普利策奖而狂欢起来，办公室的一些规章制度，全然不顾了。

塔马尔向阿尔伯克基的编辑们表示歉意，她不能吃蛋糕，她解释说，因为那是发过酵的。听到此话，该报的艺术记者戴维·斯坦伯格朝塔马尔走过来。

“喂，”他说，“我在犹太教法典中看到，逾越节不能吃发酵的东西。但获得普利策奖，是可以例外的，你可以吃。”

阿尔伯克基三家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来了，都想现场采访塔马尔。

当她接受采访时，她的头脑简直发呆。三家电视台的记者都问她，在获得令人羡慕的普利策奖以后，将来有什么打算。

“这个嘛，”她说，“今晚我要去报道县里的养狗许可证听证会。但是，有朝一日，我希望能够成为《纽约时报》的驻外记者。”

过后，塔马尔责备自己不该提《纽约时报》的事。她的上司听了，该有何想法？然而，那是她的真实思想。而她一贯是努力讲真话的。

《阿尔伯克基日报》自己也派了一位记者采访塔马尔，给该报写一篇关于获奖的报道。这篇报道在第二天上午见报，刊登在头版上方，占四栏篇幅，带花边。文字报道配有一张彩色图片，画面上塔马尔和蒂姆·科德尔互相帮助打开一瓶葡萄汁。画面的前面是一块大蛋糕和几瓶葡萄汁，瓶面贴的“韦尔奇造”标签精心地对准镜头。大标题的文字直截了当：“本报记者获得普利策奖”。

该市另一家报纸《阿尔伯克基论坛报》今晚出报，报道的调子低沉得多，也极不显眼。这类报道说明了新闻奖的一个普遍真理：得奖者当作大事来报

道，落选者一笔带过。

每年这一天，那些通常满嘴职业道德的报纸头头们在 24 小时内暂时停止了他们的客观评判力。

塔马尔又熬过了两次采访，其中的一次是美联社记者埃德·马雷诺的采访。塔马尔对早些时候给他吃闭门羹，表示道歉。接着，报社请她把明天在头版刊出的《阿尔伯克基日报》记者的报道过一下目。这次，塔马尔表示满意，“斯蒂贝尔”拼写正确。

下午 6：15

阿尔伯克基的头头们没有说今晚有宴请活动，这倒使塔马尔大大松了一口气。她急切地想回圣菲休息一下，然后晚上去县里采访听证会。

尼尔·雅各布斯等着，同样急于回家。他也意识到，普利策奖金庆祝活动，至少在阿尔伯克基，算是正式结束了。

下午 7：15

当塔马尔回到圣菲办事处的办公室时，她惊奇地发现有一大堆鲜花，有许多是全国各地的朋友送来的，还有许多是来自商界和专业公司。在这些鲜花中有 24 支长茎玫瑰花，那是《阿尔伯克基日报》的发行人汤普森·兰送来的。

等待着她的，还有几十个电话祝贺以及一些礼品。例如，阿尔伯克基的工作人员送给她一种叫作“健身熊”的玩艺儿，让塔马尔在适当的时候捏捏。艺术批评家戴维·斯坦伯格送给她一些未发酵的面包和一本关于燔祭的著作。

塔马尔在参加听证会以前还有一些时间，所以她尽量做一些在忙乱的日子里堆集起来的工作。办事处的地方新闻编辑主任霍华德·霍顿看见她，走了过来。

“你在做什么？”

“在参加今晚的听证会以前，至少完成一篇报道，”她回答说。

“不，不必了，”他说。

霍顿让她忘了养狗许可证听证会吧。“这类新闻以后有的是，”他说，“但是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获得一次普利策奖呢？”他叫她穿好上衣。他们一块出去接受他所说的“饮酒治疗”去。

“我不能喝酒，”她说。

“我能，”他回答说。

一些记者和朋友跟着他们去闹市区的一个名叫“桃红庵”的酒吧间。

东部时间下午 9：15

此时，吉姆和卡西·德怀尔正在曼哈顿索霍的斯普林街上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同一位朋友安静地共进晚餐。

吉姆本来差一点儿就得到了普利策奖金的荣誉，然而竟落选，因此，心情略有不快。吃顿意大利美餐，总是可以提精神的，尤其在这个闹中取静的地方，更是如此。

意想不到，他的母亲今晚也帮助他振作起来。当他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是谁击败了他时，他的当护士的母亲玛丽·德怀尔惊叫了起来：“噢，氨基丙酸。那个报道了不起啊！”

东部时间下午 6：15

但是，在加利福尼亚沿海城镇曼哈顿海滩，克莱尔·施皮格尔今晚却未能象吉姆·德怀尔那样成功地克服自己的失望情绪。

当塔马尔去接受“饮酒治疗”、吉姆用索霍的锥形奶油面卷治疗心灵创伤的时候，克莱尔正在家里轮番地给她的丈夫布雷德和房地产经纪人打电话。克莱尔和布雷德正出价想在帕萨迪纳购买一幢房子。

克莱尔拚死拚活地想弄到那个住处。那是一幢古老、宽敞的英国式庄园，占地一英亩，离洛杉矶商业区只有 15 分钟的路程，比她目前的乘车时间少三分之一。住在那里有很大的优越性，可以做到工作和照顾家务两不误。

“哎呀，”她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我在普利策奖金上输了；今晚，我在我们非常想得到的房子上可能也要输。”

克莱尔还从来没有如此情绪低沉过。

1990 年 4 月 13 日东部时间上午 3：30

4 月 13 日星期五，即普利策奖金日的第二天，塔马尔·斯蒂贝尔终于上床睡觉。她和她的报社同事们结束了在“桃红庵”的饮酒，把这个聚会挪到一个私人家庭继续举行。早些时候在圣菲办事处的办公室还有一些值得纪念的余兴，但那不是为了塔马尔·斯蒂贝尔。她仅仅喝了一些矿泉水。

在今后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塔马尔变得精疲力竭。她发现她难以入睡。

她躺在黑暗中，凝视着天花板，感到她的身体在经历了她一生中最难以置信的一天后象腾云驾雾似的。过去二十四小时的种种事情、形象和情绪，象电影般地一幕幕闪现在她的脑海里。

埃德·马雷诺的电话，她母亲的尖叫，她父亲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姐姐卡里的电话，阿尔伯克基紧张的聚会，圣菲的热烈场面，风滚草，汽车的摇晃，逾越节，同她不说话的姐姐沙伦再也没有音信。

塔马尔又浑身起鸡皮疙瘩。她努力克制自己的烦闷情绪。“我哪儿出毛病了？”她问自己。塔马尔现在还说不清楚。她正在经历着普利策奖金以后的初期忧郁症。象其他得这种病症的人一样，她感觉不到幸福，她哭不出来，她弄不清自己的情绪。

她不断想起沙伦。毛病就出在这里，塔马尔想。她需要同沙伦谈谈，但

她不知如何同她谈。如果沙伦愿意谈，她该说些什么。

塔马尔在黑暗中想象着电话的刺耳声音。电话线的另一端响起了熟悉的声音：“来吧，塔马尔。我一向知道你是与众不同的。我爱你。”

这想象中的声音就是沙伦的声音。然后，在塔马尔的想象中，她终于让这个声音消失了。

尾 声

当 1990 年结束的时候，普利策奖金委员会主席尤金·罗伯茨离开报纸行业。

他辞去《费城问讯报》主编兼总经理职务。报界传说，他的旨在得奖的办报方针，同该报臭名远扬的一心想赚钱的发行人奈特—里德的发财欲望发生矛盾。不过，罗伯茨多次否认他的辞职是由于同这个报系发生冲突所致。他只是说，他想换换工作，他改行教书。

罗伯茨到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担任专职教授，这个学院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最好的新闻学府之一。它同普利策奖金当局没有关系，罗伯茨从 1991 年 4 月起也同后者不再有联系了。他在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任期已经届满，接替他担任主席的是詹姆斯霍格。霍格的《纽约每日新闻》在新的一年里陷入恶性罢工的浪潮中，这种罢工使这家小报的继续生存受到威胁。

五个月的罢工，使《纽约每日新闻》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它的 110 万发行份数下降了一半，广告收入也损失了大部分。英国发行人罗伯特·马克斯韦尔从《论坛报》公司收购了这家报纸，在九家罢工的工会同意牺牲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后，继续办下去。该报的前途仍然是岌岌可危的。

如果纽约失去了《纽约每日新闻》，这个都市就无可挽回地又丧失了一份普利策式的新闻报纸。

吉姆·德怀尔没有花多少时间去考虑普利策奖的落选。他立刻就认识到塔马尔·斯蒂贝尔关于氨基丙酸的报道的价值：这是新闻报道上很少有的惊人的闪电之一。如果象塔马尔·斯蒂贝尔这样有才华、有干劲的记者抓到这样的报道，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她获得普利策奖金。

“这是一项大有作为的报道，她完成得非常之好，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吉姆说。

普利策奖金日过后不久，他就结束休假，作为一个普遍性专栏作者回到《纽约新闻日报》。他关于地铁的专著预定在 1991 年秋季出版问世。

吉姆发现，他的具有普遍兴趣的新专栏的优势之一，是有更多的机会去开拓新领域。例如，1990 年 11 月 5 日纽约犹太人迈尔·卡事先生被一个阿拉伯青年刺杀后，报社派他去以色列报道葬礼。

虽然他不再是地铁专栏作者，但在一名 22 岁的犹他州旅游者被杀死以后，他又写这方面的文章了。当时他和他的家人在曼哈顿地铁站台上遭到一帮持刀青年的袭击。后来，《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封面文章，题为《大苹果正在腐烂》。吉姆针对该刊，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专栏文章，列举了 9 月 2 日纽约发生的许多好事，但该刊对此视而不见。吉姆写道：

“他们（《时代》周刊的头头们）坐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塔楼里或装有空调、镶着茶色玻璃的汽车里，哪里知道纽约的地铁随着移民情绪的变化而颤

抖，他们的希望并不正直、并不总是干净、真实的，但仍然在高翔。”

吉姆夫妇热切希望再生几个子女，他们购买了较大的公寓，准备着这一天的到来。

克莱尔·施皮格尔在普利策奖金方面是决赛的失败者，然而在购买帕萨迪纳的房子方面则胜利了。她和布雷德在投标战中打赢了。他们在 1990 年夏末，同艾利森、莱斯利和女儿们的保姆艾米·卡菲一起迁入新居。

《洛杉矶时报》同意她一周工作三天，这使她大大松了一口气。1991 年初，她回到报社，重新抓起保健报道。在她休产假期间，一位记者代替她做了这项工作，现在，她同他共同挑起这个担子。

她怀着极大的抱负投入工作。从帕萨迪纳上班，乘车的时间减少了，比从曼哈顿海滩上班，大大改善了。艾利森和莱斯利也很好地适应了妈妈每周上三天班的新安排。对克莱尔来说，又能回去做报道工作，真是太棒了。

克莱尔对朋友们说，这回，任何工作她都要出色地完成。

塔马尔·斯蒂贝尔在获得普利策奖的几天之内听到一个颇有启示的故事：一位年轻的摄影记者在 70 年代获得普利策奖以后，受到人们的奉承吹捧、被提拔、给以待遇优厚的新工作；世人对他的期望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给这个只有 20 来岁的青年造成很大的压力；再加上其他情绪方面的问题，这种压力不断增加，终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他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精神垮下来了，这是不幸的，然而却是真实的。这个故事说明一个事实：获得普利策奖并不总是使生活向好的方面变化。

塔马尔很快就亲身感受到普利策奖带来的心理上的惩罚。在她得意洋洋的心境过去以后，各种各样的问题象那天晚上的风滚草一样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她下一步怎么办？回去继续报道污水会议和养狗许可证听证会吗？

她是否应当要求提高工资？要求换一个更好的工种？

如果今后的工作不符合她给自己确定的新标准，又怎么办？

她是否应当利用获奖的机会，去更大的报纸谋求工资更高的工作？如果她继续留在圣菲，又会怎么样？人们会认为她失败了吗？

塔马尔获奖以后有八天未能睡个安稳觉。在此以前，她已经从过去的普利策奖金获得者口中听到所谓获得普利策奖金以后的忧郁症。据说一些得奖人情绪十分低沉，突然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在普利策奖金日以后的许多应酬期间，塔马尔的忧郁特别加剧了。她参加了发行人、主编以及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的庆祝宴会。一位同事也宴请了她。办公室的同仁还为她举行了晚会。有数不清的祝贺电话和全国各地报纸的采访。《阿尔伯克基日报》让她在印刷机旁边摆好姿势，照了一些促销报纸的照片。这些活动，大部分是无聊的，但是，它们加在一起，却对塔马尔

产生了难以克制的影响。

“我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但我晓得，除了我的其他危机外，这的确使我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塔马尔说。“我的所有朋友都对我说，‘大门为你敞开了，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写你自己的门票了。’我有点象《毕业生》中的主角达斯廷·霍夫曼。每个人都对我说，‘塑料，塑料，塑料。’在精神上，我开始垮了，象一架飞机往下坠落。”

不过，塔马尔毕竟比较成熟。她多年时而工作，时而读书，做过服务员，当过没有前途的办事员，她对生活道路上的变迁和浮沉并不陌生。她在获得普利策奖以后，听任自己过了八个没有方向的白天和睡不着觉的夜晚，接着她便来了个“心理健康日”。她恢复了早晨跑四英里路的习惯（这一段时间她荒疏了），然后便整天独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问题，看了一会儿电视，读了一些书，没有接任何电话。

第二天，她便作出决定：“我不能因为得了个什么普利策奖，就抛弃我的报纸。”

她是这样想的：《阿尔伯克基日报》给了她这个苦苦挣扎的、34岁才开始当记者的人一个机会，使她争取到了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她不会去要求给她提高工资、提升职务、换个工种或多给一个休息天。

虽然她没有要求，但报社确实给她安排了一个吸引人的新差事，即机动特派记者，专门写新墨西哥州北部的重要的、有趣的报道。她欣然接受了。

一个月以后，5月份，塔马尔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招待1990年得奖人的普利策奖金午餐会。陪同她去的有杰拉尔德·克劳福德、肯特·沃尔兹和蒂姆·科德尔等负责人。塔马尔的双亲也去了。当塔马尔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迈克·索维恩手中接过获奖证书时，她父母的脸上露出自豪的神色。

她在纽约逗留期间，她的父母在皮克斯基尔湖的俱乐部为塔马尔举行了晚会。她的姐姐卡里已经切除了良性肿瘤，那晚也参加了。从各方面来说，这都是一次欢乐的聚会，唯一的缺憾是，大家原希望她的另一个姐姐沙伦也会来，然而到最后一分钟她来电话说不能出席了。

塔马尔有点失望，不过，她也想开了：

“大约来了80人，都是多年不见面的亲友，大多数来自纽约，太好了。妈妈讲了一番话，接着父亲也讲了。他很有风趣。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他们赠送我一块纪念牌，上面写着：‘过去你是弗雷德和弗洛伦斯·斯蒂贝尔的女儿，现在我们是塔马尔·斯蒂贝尔的父母。’”

“他们还送我一个用木化石做的钢笔架，并刻上了我的名字塔马尔·普·斯蒂贝尔。我没有中间名字，所以他们用了一个首字母。他们知道我一向希望有一个中间名字，因此，他们请雕刻师傅刻上了‘普’，代表‘普利策’。”

在1990年剩下的几个月中，并没有许多人登门引诱塔马尔离开圣菲。不过，她的确收到了其他一些报纸的主编寄来的要求“见见面”的邀请，她

都拒绝了。

秋天，她接到了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秘书罗伯特·克里斯托弗的一封信，请她担任 1991 年奖金评委会成员。她回绝了。“我绝不干这种事。我觉得太可笑了。我干新闻这一行，时间不长，没有资格去评审别人。”

当塔马尔得奖一周年过去的时候，她说，她仍然在《阿尔伯克基日报》工作，仍然住在小小的公寓房子里，仍然负债很多，但她生活得很幸福。不过，由于获得普利策奖金，她一生中第一次有了存款。

她仍然梦想有朝一日为美国的大报工作，当驻外记者。自从《纽约时报》发表了她的 15 岁时写给该报编辑的一封信（她的第一件新闻作品）以来，她就有了这个想法。她从来没有忘记当时的激动心情。然而，又过了 15 年，她才当了记者。

她说，她再积累一些经验之后，也许要去试试这样的工作。她认识到，她当记者的工龄不长，但是，她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而且在世界上走了许多地方。她会讲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日语，流利的程度各有不同。她为雇主服务的记录不错，她认为这对她是会有帮助的。

看来，她获得普利策奖并没有坏处。

1917年——1991年
普利策奖金获得者
全部名单

文学、艺术和音乐

小 说

- 1917年 无奖。
1918年 欧内斯特·普尔的《他的家庭》。
1919年 布思·塔金顿的《高尚的安伯森一家人》。
1920年 无奖。
1921年 艾迪丝·华顿的《天真的时代》。
1922年 布思·塔金顿的《艾丽斯·亚当斯》。
1923年 维拉·凯瑟的《我们中间的一个》。
1924年 玛格丽特·威尔逊的《能干的麦克劳克林一家人》。
1925年 埃德纳·费伯的《如此之大》。
1926年 辛克莱·刘易斯的《阿罗史密斯》。
1927年 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的《初秋》。
1928年 桑顿·怀尔德的《圣路易·莱之桥》。
1925年 朱莉娅·彼得金的《红妹玛丽》。
1930年 奥利弗·拉法吉的《爱笑的小伙子》。
1931年 玛格丽特·艾尔·巴恩斯的《仁慈的年代》。
1932年 赛珍珠的《大地》。
1933年 T·S.斯特里布林的《商店》。
1934年 卡罗琳·米勒的《怀中的宝贝儿》。
1935年 约瑟芬·温斯洛·约翰逊的《现在是11月》。
1936年 哈罗德·L·戴维斯的《角中之蜜》。
1937年 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
1938年 约翰·菲利普斯·马昆德的《已故的乔治·阿普利》。
1939年 马乔里·金南·罗林斯的《一岁崽》。
1940年 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
1941年 无奖。
1942年 埃伦·格拉斯哥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1943年 厄普顿·辛克莱的《龙之牙》。
1944年 马丁·弗莱文的《黑暗中旅行》。
1945年 约翰·赫西的《给亚达诺镇的钟》。
1946年 无奖。
1947年 罗伯特·佩恩·华伦的《国王供奉的人们》。

(注：次年这个奖的名称改名为故事奖。)

故事奖

- 1948年 詹姆斯·米切纳的《南太平洋的故事》。
- 1949年 詹姆斯·古尔德·科普斯的《光荣的守卫者》。
- 1950年 A·B·小格思里的《西去之路》。
- 1951年 康拉德·里克特的《城镇》。
- 1952年 赫尔曼·沃克的《凯恩兵变》。
- 1953年 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 1954年 无奖。
- 1955年 威廉·福克纳的《寓言》。
- 1956年 麦克金莱·坎特的《安德森城》。
- 1957年 无奖。
- 1958年 詹姆斯·艾吉的《家庭中的一次死亡事件》。
- 1959年 罗伯特·刘易斯·泰勒的《贾米·麦克菲特斯的旅游》。
- 1960年 艾伦·德鲁里的《忠告和同意》。
- 1961年 哈珀·李的《杀死一只模仿鸟》。
- 1962年 埃德温·奥康纳的《悲哀的边缘》。
- 1963年 威廉·福克纳的《掠夺者》。
- 1964年 无奖。
- 1965年 雪莉·安·格劳的《管家们》。
- 1966年 凯瑟琳·安妮·波特的《短篇小说集》。
- 1967年 伯纳德·马拉默特的《修配工》。
- 1968年 威廉·斯蒂伦的《纳特·特纳的忏悔》。
- 1969年 N·斯科特·莫马戴的《黎明之屋》。
- 1970年 琼·斯塔福德的《短篇小说集》。
- 1971年 无奖。
- 1972年 华莱士·斯特格纳的《休息之角》。
- 1973年 尤多拉·韦尔蒂的《乐观者的女儿》。
- 1974年 无奖。
- 1975年 迈克尔·沙拉的《杀人的安琪儿》。
- 1976年 索尔·贝洛的《洪堡的礼物》。
- 1977年 无奖。
- 1978年 詹姆斯·艾伦·麦克弗森的《行动自由》。
- 1979年 约翰·奇弗的《约翰·奇弗短篇故事集》。
- 1980年 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
- 1981年 约翰·肯尼迪·图尔的《笨伯联盟》。
- 1982年 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是富有的》。

- 1983年 艾丽斯·沃克的《紫色》。
1984年 威廉·肯尼迪的《铁草》。
1985年 艾莉森·卢里的《对外事务》。
1986年 拉里·麦克默特里的《孤单的鸽子》。
1987年 彼得·泰勒的《孟菲斯的召唤》。
1988年 托尼·莫里森的《被爱的人》。
1989年 安妮·泰勒的《休息课》。
1990年 奥斯卡·希于洛斯的《马姆博王演奏爱情歌曲》。
1991年 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

戏 剧

- 1917年 无奖。
1918年 杰西·林奇·威廉斯的《为什么结婚？》。
1919年 无奖。
1920年 尤金·奥尼尔的《天边外》。
1921年 佐纳·盖尔的《卢卢·贝特小姐》。
1922年 尤金·奥尼尔的《安娜·克里斯蒂》。
1923年 欧文·戴维斯的《冰封》。
1924年 哈彻·休斯的《一心向往天国》。
1925年 西德尼·霍华德的《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1926年 乔治·凯利的《克雷格的妻子》。
1927年 保罗·格林的《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
1928年 尤金·奥尼尔的《奇妙的插曲》。
1929年 埃尔默·L·赖斯的《街景》。
1930年 马克·康内利的《绿色牧场》。
1931年 苏珊·格拉斯佩尔的《艾莉森的房子》。
1932年 乔治·考夫曼、莫里·赖斯金和艾拉·格什温的《我为你歌唱》。
1933年 马克斯韦尔·安德森的《你的两幢房子》。
1934年 西德尼·金斯利的《穿着白衣的人们》。
1935年 佐伊·艾金斯的《老处女》。
1936年 罗伯特·舍伍德的《白痴的欢乐》。
1937年 莫斯·哈特和乔治·考夫曼的《你不能带走它》。
1938年 桑顿·怀尔德的《小城风光》。
1939年 罗伯特·舍伍德的《亚伯·林肯在伊利诺斯》。
1940年 威廉·萨罗扬的《你生活中的好时光》。
1941年 罗伯特·舍伍德的《不会有夜晚》。
1942年 无奖。
1943年 桑顿·怀尔德的《千钧一发》。

- 1944年 无奖。
- 1945年 玛丽·蔡斯的《哈维》。
- 1946年 拉塞尔·克劳斯和霍华德·林赛的《国情》。
- 1947年 无奖。
- 1948年 坦内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
- 1949年 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
- 1950年 理查德·罗杰斯、奥斯卡·哈默斯坦二世和乔舒亚·洛根的《南太平洋》。
- 1951年 无奖。
- 1952年 约瑟夫·克拉姆的《伯劳鸟》。
- 1953年 威廉·英奇的《郊游野餐》。
- 1954年 约翰·帕特里的《八月茶馆》。
- 1955年 坦内西·威廉斯的《热铁皮屋顶上的猫》。
- 1956年 艾伯特·哈克特和弗朗西丝·古德里奇的《安妮·弗兰克日记》。
- 1957年 尤金·奥尼尔的《直到夜晚的漫长一天》。
- 1958年 凯蒂·弗林斯的《向家乡看吧，安琪儿》。
- 1959年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的《J.B.》。
- 1960年 《菲奥雷洛！》：杰罗姆·韦德曼和乔治·艾博特写剧本，杰里·博克谱写音乐，谢尔登·哈尼克写抒情诗。
- 1961年 塔德·莫塞尔的《回家》。
- 1962年 弗兰克·莱塞和阿贝·伯罗斯的《不受磨难、成就事业的道路》。
- 1963年 无奖。
- 1964年 无奖。
- 1965年 弗兰克·吉尔罗伊的《主题是玫瑰花》。
- 1966年 无奖。
- 1967年 爱德华·阿尔比的《微妙的平衡》。
- 1968年 无奖。
- 1969年 霍华德·萨克勒的《极有前途的人》。
- 1970年 查尔斯·戈登的《庸碌无能》。
- 1971年 保罗·津德尔的《伽马射线对月球人马里戈尔兹的影响》。
- 1972年 无奖。
- 1973年 贾森·米勒的《锦标赛》。
- 1974年 无奖。
- 1975年 爱德华·阿尔比的《海景》。
- 1976年 迈克尔·贝内特、詹姆斯·柯克伍德、尼古拉斯·丹特、马文·哈姆利施和爱德华·克莱班合写的《一个合乐谱》
- 1977年 迈克尔·克里斯托弗的《与假想对手作拳击练习》。
- 1978年 多纳尔·科伯恩的《喝酒比赛》。

- 1979年 萨姆·谢泼德的《被埋葬的儿童》。
1980年 兰福德·威尔逊的《塔利的弗利》。
1981年 贝思·亨利的《心灵的犯罪》。
1982年 查尔斯·富勒的《一个士兵的戏剧》。
1983年 马沙·诺曼的《妈妈，今晚》。
1984年 戴维·马梅特的《格伦加里·格伦·罗斯》。
1985年 《星期日与乔治在公园》：斯蒂芬·桑德海姆谱音乐和写抒情诗，詹姆斯·莱平写剧本。
1986年 无奖。
1987年 奥古斯特·威尔逊的《篱笆》。
1988年 艾尔弗雷德·于里的《给戴西小姐开车》。
1989年 温迪·沃塞斯坦的《海迪纪事》。
1990年 奥古斯特·威尔逊的《钢琴课》。
1991年 尼尔·西蒙的《在扬克斯迷路》。

历史

- 1917年 J.J.贾塞兰德的《美国人的过去和现在》。
1918年 詹姆斯·福特·罗兹的《1861—1865年内战史》。
1919年 无奖。
1920年 贾斯廷·史密斯的《对墨西哥的战争》（两卷）。
1921年 威廉·索登·西姆斯与伯顿·亨德里克合作写的《海上胜利》。
1922年 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的《新英格兰的建立》。
1923年 查尔斯·沃伦的《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法院》。
1924年 查尔斯·霍华德·麦基尔文的《美国革命——从宪法观点的解释》。
1925年 弗雷德里克·帕克森的《美国边疆史》。
1926年 爱德华·钱宁的《美国史》。
1927年 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的《平克尼条约》。
1928年 弗农·路易斯·帕林顿的《美国思想的主流》（两卷）。
1929年 弗雷德·艾伯特·香农的《1861—1865年联邦军的组织和管
理》。
1930年 克劳德·范·泰恩的《独立战争》。
1931年 伯纳多特·施米特的《战争的到来：1914年》。
1932年 约翰·潘兴的《我在世界大战中的经历》。
1933年 弗雷德里克·特纳的《地区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1934年 赫伯特·艾加的《人民的选择》。
1935年 查尔斯·麦克莱恩，安德鲁斯的《殖民时期美国史》。
1936年 安德鲁·麦克劳克林的《美国宪法史》。

- 1937年 范·威克·布鲁克斯的《新英格兰的繁荣》。
- 1938年 保罗·赫尔曼·巴克的《1856—1900年重新联合之路》。
- 1939年 弗兰克·卢瑟·莫特的《美国杂志史》。
- 1940年 卡尔·桑德伯格的《亚伯拉罕·林肯：战争年代》。
- 1941年 马库斯·李·汉森的《1607—1860年大西洋移民》。
- 1942年 玛格丽特·利奇的《华盛顿的起床号》。
- 1943年 埃丝特·福布斯的《保罗·里维尔和他生活的世界》。
- 1944年 默尔·柯蒂的《美国思想的发展》。
- 1945年 斯蒂芬·邦萨尔的《未完成的事业》。
- 1946年 小阿瑟·迈耶·施莱辛格的《杰克逊的时代》。
- 1947年 詹姆斯·菲尼·巴克斯特三世的《与时间赛跑的科学家》。
- 1948年 伯纳德·德沃特的《横跨宽阔的密西西比》。
- 1949年 罗伊·富兰克林·尼科尔斯的《美国民主的破坏》。
- 1950年 奥利弗·拉金的《美国的生活和艺术》。
- 1951年 卡莱尔·布利的《1815—1840年开拓时期的老西北》。
- 1952年 奥斯卡·汉德林的《连根拔》。
- 1953年 乔治·丹杰菲尔德的《美好感情的时代》。
- 1954年 布鲁斯·卡顿的《阿波马托克斯平静无事》。
- 1955年 保罗·霍根的《大河：北美历史上的格朗德河》。
- 1956年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改革的时代》。
- 1957年 乔治·凯南的《俄国脱离战争：苏美关系，1917—1920年》。
- 1958年 布雷·哈蒙德的《美国的银行和政治》。
- 1959年 伦纳德·怀特和琼·施奈德的《共和党时代：1869—1901年》。
- 1960年 玛格丽特·李奇的《麦金利时代》。
- 1961年 赫伯特·菲斯的《战争与和平之间：波茨坦会议》。
- 1962年 劳伦斯·吉普森的《胜利的帝国：西方浓云密布》。
- 1963年 康斯坦斯·麦克劳克林·格林的《华盛顿：乡村和首都，1800—1878年》。
- 1964年 萨姆纳·奇尔顿·鲍威尔的《清教徒的乡村：一个新英格兰镇子的形成》。
- 1965年 欧文·昂格尔的《美钞时代》。
- 1966年 佩里·米勒的《美国知识分子生活》。
- 1967年 威廉·戈茨曼的《探险和帝国：征服美国西部的探险家和科学家》。
- 1968年 伯纳德·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渊源》。
- 1969年 伦纳德·利维的《第五修正案渊源》。
- 1970年 迪安·艾奇逊的《参与创造世界：我在国务院的岁月》。
- 1971年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的《罗斯福：自由战士》。

- 1972年 卡尔·德格勒的《既非黑也非白》。
- 1973年 迈克尔·坎曼的《自相矛盾的人民：关于美国文明渊源的探讨》。
- 1974年 丹尼尔·布尔斯廷的《美国人的民主经验》。
- 1975年 杜马·马隆的《杰斐逊和他的时代》（第一卷至第五卷）。
- 1976年 保罗·霍根的《圣菲的拉米》。
- 1977年 戴维·波特的《即将到来的危机》（作者死后出版问世的，手稿是由唐·费伦巴克完成的。）
- 1978年 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美国实业界的管理革命》。
- 1979年 唐·费伦巴克的《德雷德·斯科特案件》。
- 1980年 利昂·利特瓦克的《长期处于风暴中：奴隶制的余波》。
- 1981年 劳伦斯·克雷明的《美国教育：全国的经验，1783—1876年》。
- 1982年 范·伍德沃德编辑的《玛丽·切斯纳特的内战》。
- 1983年 里斯·艾萨克的《弗吉尼亚的改造，1740—1790年》。
- 1984年 无奖。
- 1985年 托马斯·麦克劳的《规章制度的先知》。
- 1986年 沃尔特·麦克杜格尔的《天上和地球：空间时代的政治史》。
- 1987年 伯纳德·贝林的《走向西方的人：革命前夕美国移民的一段历史》。
- 1988年 罗伯特·布鲁斯的《1846—1876年美国现代科学的开始》。
- 1989年 泰勒·布兰奇的《分水岭：1954—1963年金氏年代的美国》和詹姆斯·麦克弗森的《为自由而呐喊：内战时代》。
- 1990年 斯坦利·卡诺的《我们的形象：美国在菲律宾的帝国》。
- 1991年 劳雷尔·撒切尔·乌尔里克的《一位助产士的故事：马撒·巴拉德平生，根据她1785—1812年的日记》。

传记

- 1917年 劳拉·理查兹、莫德·豪·埃利奥特和弗洛伦斯·豪·霍尔合写的《朱莉娅·沃尔德·豪》。
- 1918年 威廉·卡贝尔·布鲁斯写的《本杰明·畜兰克林的自我透露》。
- 1919年 亨利·亚当斯的《亨利·亚当斯的教育》。
- 1920年 艾伯特·贝弗里奇的《约翰·马歇尔平生》（四卷）。
- 1921年 爱德华·博克的《爱德华·博克的美国化》。
- 1922年 哈姆林·加兰的《一个中间边界的女儿》。
- 1923年 伯顿·亨德里克的《沃尔特·佩奇的平生和文学》。
- 1924年 迈克尔·伊德沃尔斯基·普平的《从移民到发明家》。
- 1925年 德沃尔夫·豪的《巴雷特·温德尔和他的文学》。

- 1926年 哈维·库欣的《威廉·奥斯勒爵士的平生》（两卷）。
- 1927年 埃默里·霍洛韦的《惠特曼》。
- 1928年 查尔斯·爱德华·拉塞尔的《美国的管弦乐队和西奥多·托马斯》。
- 1929年 伯顿·亨德里克的《一个美国人的训练：沃尔特·佩奇的早期生活和文学》。
- 1930年 马奎斯·詹姆斯的《掠夺者》。
- 1931年 亨利·詹姆斯的《查尔斯·埃利奥特》。
- 1932年 亨利·普林格尔的《西奥多·罗斯福》。
- 1933年 艾伦·内文斯的《格罗弗·克利夫兰》。
- 1934年 泰勒·丹尼特的《海·约翰》。
- 1935年 道格拉斯·弗里曼的《R. E.李》。
- 1936年 拉尔夫·巴顿·佩里的《威廉·詹姆斯的思想和性格》。
- 1937年 艾伦·内文斯的《汉密尔顿·菲什》。
- 1938年 奥德尔·谢泼德的《小贩的进步》和马奎斯·詹姆斯的《安德鲁·杰克逊》（两卷）。
- 1939年 卡尔·范多伦的《本杰明·富兰克林》。
- 1940年 雷·斯坦纳德·贝克的《伍德罗·威尔逊：平生和文学》（第七卷和第八卷）
- 1941年 奥拉·伊丽莎白·温斯洛的《乔纳森·爱德华兹》。
- 1942年 福雷斯特·威尔逊的《水雷防御网的参加者》。
- 1943年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海洋元帅》。
- 1944年 卡尔顿·马比的《美国的莱奥纳多：塞缪尔·莫尔斯平生》。
- 1945年 拉塞尔·奈的《乔治·班克罗夫特：布拉明反叛者》。
- 1946年 林尼·马什·沃尔夫的《荒野之子》。
- 1947年 《威廉·艾伦·怀特自传》。
- 1948年 玛格丽特·克拉普的《被遗忘了的一等公民：约翰·比奇洛》。
- 1949年 罗伯特·舍伍德的《罗斯福和霍普金斯》。
- 1950年 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 1951年 玛格丽特·路易丝·科伊特的《约翰·卡尔霍恩：美国画像》。
- 1952年 默洛·普西的《查尔斯·埃文斯·休斯》。
- 1953年 戴维·梅斯的《埃德蒙·彭德尔顿 1721—1803年》。
- 1954年 查尔斯·林德伯格的《圣路易斯的精神》。
- 1955年 威廉·怀特的《塔夫脱的故事》。
- 1956年 塔尔博特·福克纳·哈姆林的《本杰明·亨利·拉特罗布》。
- 1957年 约翰·F.肯尼迪的《勇敢者传略》。
- 1958年 《乔治·华盛顿》，一至六卷为道格拉斯·索撒尔·弗里曼所

写，七卷为约翰·亚历山大·卡罗尔和玛丽·韦尔斯·阿什沃思所写。

- 1959年 阿瑟·沃尔沃思的《伍德罗·威尔逊：美国的先知》。
- 1960年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约翰·保罗·琼斯》。
- 1961年 戴维·唐纳德的《查尔斯·萨姆纳和内战的来临》。
- 1962年 无奖。
- 1963年 利昂·伊德尔的《亨利·詹姆斯》。
- 1964年 沃尔特·杰克逊·巴特的《约翰·济慈》。
- 1965年 欧内斯特·塞缪尔斯的《亨利·亚当斯》（三卷）
- 1966年 小阿瑟·M.施莱辛格的《一千日》。
- 1967年 贾斯廷·卡普兰的《克莱门斯先生和马克·吐温》。
- 1968年 乔治·凯南的《回忆录》。
- 1969年 本杰明·劳伦斯·里德的《纽约人：约翰·奎因和他的朋友们》。
- 1970年 T.哈里·威廉斯的《休伊·朗》。
- 1971年 劳伦斯·汤普森的《罗伯特·弗罗斯特：胜利的年代，1915—1938年》。
- 1972年 约瑟夫·拉什的《埃莉诺和富兰克林》。
- 1973年 W.A.斯旺伯格的《卢斯和他的帝国》。
- 1974年 路易斯·谢弗的《奥尼尔：儿子和艺术家》。
- 1975年 罗伯特·卡罗的《权力的掮客：罗伯特·摩西和纽约的丧失》。
- 1976年 R.W.B.刘易斯的《伊迪丝·沃顿传》。
- 1977年 约翰·E.麦克的《乱世枭雄：T.E.劳伦斯平生》。
- 1978年 沃尔特·杰克逊·巴特的《塞缪尔·约翰逊》。
- 1979年 伦纳德·贝克的《悲伤和痛苦的岁月：利奥·贝克和柏林犹太人》。
- 1980年 埃德蒙·莫里斯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崛起》。
- 1981年 罗伯特·K.梅西的《彼得大帝：他的平生和世界》。
- 1982年 威廉·S.麦克菲利的《格兰特》。
- 1983年 拉塞尔·贝克的《长大成人》。
- 1984年 路易斯·R.哈伦的《布克·T.华盛顿：塔斯基吉的奇才，1901—1915年》。
- 1985年 肯尼思·西尔弗曼的《科顿·马瑟的平生和时代》。
- 1986年 伊丽莎白·弗兰克的《路易斯·博根画像》。
- 1987年 戴维·J.加罗的《受苦受难：小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
- 1988年 戴维·赫伯特·唐纳德的《望着家乡：托马斯·沃尔夫平生》。
- 1989年 理查德·埃尔曼的《奥斯卡·王尔德》。
- 1990年 塞巴斯蒂安·德格雷齐亚的《马基雅弗利在地狱》。

1991年 斯蒂文·奈菲和格雷格里·怀特·史密斯写的《杰克逊·波洛克：美国传奇人物》。

非小说类纪实文学著作

1962年 西奥多·H.怀特的《1960年总统的形成》。

1963年 巴巴拉·W.塔奇曼的《八月的枪声》。

1964年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理智现象》。

1965年 霍华德·芒福德·琼斯的《奇怪的新世界》。

1966年 埃德温·韦·蒂尔的《冬天漫步》。

1967年 戴维·布里翁·戴维斯的《西方文化中的奴隶制度问题》。

1968年 威尔和艾里尔·杜兰特的《卢梭和革命》。

1969年 雷内·朱尔斯·杜博斯的《一个有人性的动物》和诺曼·梅勒的《夜间军队》。

1970年 埃里克·H.埃里克森的《甘地的真理》。

1971年 约翰·托兰德的《正在升起的太阳》。

1972年 巴巴拉·W.塔奇曼的《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历,1911—1945年》。

1973年 罗伯特·科尔斯的《危机中的儿童》(第二卷和第三卷)和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的《湖中之火：越南人和在越南的美国人》。

1974年 欧内斯特·贝克尔的《拒绝死亡》。

1975年 安妮·迪拉德的《廷克溪的历程》。

1976年 罗伯特·N·巴特勒的《为什么生存下去？美国的老人》。

1977年 威廉·W.沃纳的《漂亮的游泳者》。

1978年 卡尔·萨根的《伊甸之龙》。

1979年 爱德华·奥·威尔逊的《论人性》。

1980年 道格拉斯·R.霍夫施塔特的《哥德尔、埃歇尔、巴赫：永恒的金色之辫》。

1981年 卡尔·E.肖尔斯克的《十九世纪末期的维也纳：政治和文化》。

1982年 特拉西·基德尔的《一种新机器的灵魂》。

1983年 苏珊·希恩的《在地球上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吗？》

1984年 保罗·斯塔尔的《美国医药的社会改造》。

1985年 斯塔茨·特克尔的《美好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口头历史》。

1986年 约瑟夫·莱利维尔德的《挪开你的影子：南非，黑人和白人》和J.安东尼·卢卡斯的《共同基础：三个美国家庭生活中的动荡十年》。

1987年 戴维·K.希普勒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天堂里受伤的精灵》。

1988年 理查德·罗兹的《原子弹的制造》。

- 1989年 尼尔·希恩的《一个闪闪发光的漂亮谎言：约翰·保罗·范恩和美国在越南》。
- 1990年 戴尔·马哈里奇和迈克尔·威廉逊的《他们身的后子女》。
- 1991年 伯特·霍尔多布勒和爱德华·O.威尔逊的《蚂蚁》。

诗 歌

- 1922年 埃德温·阿林顿·鲁宾逊的《诗集》。
- 1923年 埃德娜·St.文森特·米莱的《竖琴制造师民歌》、《荆棘之果》、《美国诗歌》中八首十四行诗（1922年）、《杂录》。
- 1924年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新汉普郡：一首有音调和装饰音的诗》。
- 1925年 埃德温·阿林顿·鲁宾逊的《死过两次的人》。
- 1926年 艾米·洛厄尔的《现在几点钟》。
- 1927年 利奥诺拉·斯佩尔的《小提琴家的告别》。
- 1928年 埃德温·阿林顿·鲁宾逊的《特里斯丹》。
- 1929年 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的《约翰·布朗的遗体》。
- 1930年 康拉德·艾肯的《诗选》。
- 1931年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集》。
- 1932年 乔治·狄龙的《开花的石头》。
- 1933年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的《征服者》。
- 1934年 罗伯特·希利尔的《诗集》。
- 1935年 奥德丽·沃德曼的《巧妙的伏击》。
- 1936年 罗伯特·P.特里斯特拉姆·科芬的《奇怪的圣洁》。
- 1937年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更远的距离》。
- 1938年 马里雅·朱图伦斯卡的《寒冷的晨空》。
- 1939年 约翰·古尔德·弗莱彻的《诗选》。
- 1940年 马克·范多伦的《诗集》。
- 1941年 伦纳德·培根的《夺取桑德兰》。
- 1942年 威廉·罗斯·贝尼特的《上帝之土》。
- 1943年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见证树》。
- 1944年 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的《西方的明星》。
- 1945年 卡尔·夏皮罗的《通报胜利的信件及其他诗》。
- 1946年 无奖。
- 1947年 罗伯特·洛厄尔的《威里勋爵的城堡》。
- 1948年 W.H.奥登的《忧虑的时代》。
- 1949年 彼得·维雷克的《恐怖与礼貌》。
- 1950年 格温多林·布鲁克斯的《安妮·艾伦》。
- 1951年 卡尔·桑德伯格的《诗歌全集》。
- 1952年 玛丽安·穆尔的《诗集》。

- 1953年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的《诗集，1917—1952年》。
- 1954年 西奥多·罗思克的《觉醒》。
- 1955年 华莱士·斯蒂文斯的《诗集》。
- 1956年 伊丽莎白·毕晓普的《诗——北方和南方》。
- 1957年 理查德·威尔伯的《这个世界的事情》。
- 1958年 罗伯特·佩恩·华伦的《诺言：1954—1956年的诗》。
- 1959年 斯坦利·库尼茨的《1928—1958年诗选》。
- 1960年 W.D.斯诺德格拉斯的《心之针》。
- 1961年 菲利斯·麦金利的《乘3：三十年诗选》。
- 1962年 阿伦·杜根的《诗》。
- 1963年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来自布吕格勒的图画》。
- 1964年 路易斯·辛普森的《大路的尽头》。
- 1965年 约翰·贝里曼的《77首梦之歌》。
- 1966年 理查德·埃伯哈德的《诗选》。
- 1967年 安妮·塞克斯顿的《生或死》。
- 1968年 安东尼·赫克特的《艰难时光》。
- 1969年 乔治·奥彭的《人数众多》。
- 1976年 理查德·霍华德的《无头衔的国民》。
- 1971年 威廉·S.默文的《梯子托架》。
- 1972年 詹姆斯·赖特的《诗集》。
- 1973年 麦克辛·库明的《内地》。
- 1974年 罗伯特·洛厄尔的《海豚》。
- 1975年 加里·斯奈德的《龟岛》。
- 1976年 约翰·阿什伯里的《凸面镜中的自画像》。
- 1977年 约翰·梅里尔的《神圣的喜剧》。
- 1978年 霍华德·内默罗夫的《诗集》。
- 1979年 罗伯特·佩恩·华伦的《时常》。
- 1980年 唐纳德·罗德尼·贾斯蒂斯的《诗选》。
- 1981年 詹姆斯·舒伊勒的《诗歌之晨》。
- 1982年 西尔维亚·普拉思的《诗集》。
- 1983年 高尔韦·金内尔的《诗选》。
- 1984年 玛丽·奥利弗的《美国的原始》。
- 1985年 卡罗林·凯泽的《一个》。
- 1986年 亨利·泰勒的《飞速的变化》。
- 1987年 里塔·达夫的《托马斯和比尤拉》。
- 1988年 威廉·梅雷迪思的《部分汇报：新诗和诗选》。
- 1989年 理查德·威尔伯的《新诗和诗选》。
- 1990年 查尔斯·西米克的《世界没有完蛋》。

1991年 莫纳·范杜因的《变化临近》。

音 乐

- 1943年 威廉·舒曼的《第二世俗大合唱》。
1944年 霍华德·汉森的《第四交响曲第34号》。
1945年 艾伦·科普兰的《阿巴拉契亚之春》。
1946年 科奥·索尔比的《太阳赞歌》。
1947年 查尔斯·艾夫斯的《第三交响曲》。
1948年 沃尔特·皮斯顿的《第三交响曲》。
1949年 弗吉尔·汤姆森的《路易斯安那故事》。
1950年 贾恩·卡洛·门诺蒂的《领事》。
1951年 道格拉斯·S.穆尔的《地球的巨人》。
1952年 盖尔·库比克的《适宜于发挥高度技巧的交响曲》。
1953年 无奖。
1954年 昆西·波特的《两台钢琴和管弦乐队的协奏曲》。
1955年 贾恩·卡洛·门诺蒂的《布利克街上的圣者》。
1956年 欧内斯特·托克的《第三交响曲》。
1957年 诺曼·德洛·乔伊奥的《传道书默想》。
1958年 塞缪尔·巴伯和贾恩·卡洛·门诺蒂的《蛱蝶》。
1959年 约翰·拉蒙坦的《钢琴和管弦乐队的协奏曲》。
1960年 埃利奥特·卡特的《第二号弦乐四重奏》。
1961年 沃尔特·皮斯顿的《第七交响曲》。
1962年 罗伯特·沃德和伯纳德·斯坦布勒的《考验》。
1963年 塞缪尔·巴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1964年 无奖。
1965年 无奖。
1966年 莱斯利·巴西特的《管弦乐变奏曲》。
1967年 利昂·基尔赫纳的《第三号四重奏》。
1968年 乔治·克拉姆的《时间和河流的回声》。
1969年 卡雷尔·胡萨的《弦乐四重奏》。
1970年 查尔斯·伍奥里南的《时间颂歌》。
1971年 马里奥·达维多夫斯基的《第六号钢琴和电子乐同步曲》。
1972年 雅各布·德鲁克曼的《窗》。
1973年 埃利奥特·卡特的《第三号弦乐四重奏》。
1974年 唐纳德·马蒂诺的《诺土尔诺》。
1975年 多米尼克·阿根托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
1976年 内德·罗雷姆的《空中音乐》。
1977年 理查德·沃尼克的《恐怖和奇迹的想象》。

- 1978年 迈克尔·科尔格拉斯的《打击乐四重奏和管弦乐的幻想曲》。
1979年 约瑟夫·施万特纳的《无限之弦外音》。
1980年 戴维·德尔·特雷迪西的《夏日纪念》。
1981年 无奖。
1982年 罗杰·塞欣斯的《管弦乐协奏曲》。
1983年 埃伦·塔弗·兹维利克的《第一交响曲（管弦乐三乐章）》。
1984年 伯纳德·兰兹的《男高音和管弦乐的独唱曲》。
1985年 斯蒂芬·艾伯特的《交响曲》。
1986年 乔治·珀尔的《第四吹奏乐五重奏》。
1987年 约翰·哈比森的《逃往埃及》。
1988年 威廉·博尔科姆的《12首新钢琴练习曲》。
1989年 罗杰·雷诺兹的《时间呼啸》。
1990年 梅尔·鲍威尔的《二重奏：两架钢琴和管弦乐队的协奏曲》。
1991年 舒拉米特·兰恩的《交响曲》。

特别表扬奖

- 1944年 理查德·罗杰斯和奥斯卡·哈默斯坦二世的《俄克拉何马！》。
1957年 历史学家肯尼思·罗伯特。
1960年 加勒特·马丁利的《舰队》。
1961年 《美国内战传统画史》。
1973年 詹姆斯·托马斯·弗莱克斯纳的《乔治·华盛顿》，一至四卷。
1974年 作曲家罗杰·塞欣斯。
1976年 作曲家斯科特·乔普林。
1977年 著作家亚历克斯·哈利。
1978年 散文家和著作家 E.B. 怀特。
1982年 作曲家米尔顿·巴比特。
1984年 著作家西奥多·索伊斯·盖泽尔（索伊斯博士）。
1985年 作曲家威廉·舒曼。

新 闻

公共服务功勋

- 1917年 无奖。
1918年 《纽约时报》，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和进展发表了许多官方报告、文件和欧洲政治家的演说。
1919年 《密尔沃基新闻报》，宣传美国主义。
1920年 无奖。
1921年 《波士顿邮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查尔斯·庞齐的活

动，导致他的被逮捕。

- 1922 年 《纽约世界报》，揭露三 K 党的活动。
- 1923 年 田纳西州孟菲斯《商业呼声报》，发表了许多关于三 K 党的新闻和漫画。
- 1924 年 《纽约世界报》，揭露佛罗里达州滥雇日工。
- 1925 年 无奖。
- 1926 年 《哥伦布问询太阳报》，谴责三 K 党、私刑、腐化官员和禁止讲授进化论的法律。
- 1927 年 俄亥俄州《坎顿每日新闻》，对城市官员和犯罪分子的互相勾结进行了抨击，为此，该报主编唐·R.梅利特遭到暗杀。
- 1928 年 《印第安纳波利斯时报》，对印第安纳的政治腐败进行了揭露。
- 1929 年 《纽约世界晚报》，发动许多宣传攻势，来纠正司法方面滥用职权的现象。
- 1930 年 无奖。
- 1931 年 《亚特兰大宪法报》，揭露市政当局的贪污。
- 1932 年 《印第安纳波利斯新闻报》，宣传消灭城市管理方面的浪费现象和减少税收。
- 1933 年 《纽约世界电讯报》，就救济退伍军人、滥发房地产债券、彩券阴谋和市政当局为约瑟夫·V.麦基写信竞选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 1934 年 俄勒冈州《梅德福论坛邮报》，谴责俄勒冈州杰克逊县的肆无忌惮的政客们。
- 1935 年 《萨克拉门托蜜蜂报》，谴责内华达州以联邦法官的名义捞取政治影响。
- 1936 年 衣阿华州《塞达拉皮兹新闻报》，谴责衣阿华州政府贪污腐化、管理不善。
- 1937 年 《圣路易斯邮报》，揭露圣路易斯选民登记弄虚作假。
- 1938 年 北达科他州《俾斯麦论坛报》，以“干旱尘暴地区的自助”为题，发表了一系列新闻和社论。
- 1939 年 《迈阿密每日新闻》，发动宣传攻势，要求取消迈阿密市政委员会。
- 1940 年 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美国共和主义者报》，揭露市政当局的贪污。
- 1941 年 《圣路易斯邮报》，发动宣传攻势，反对吸烟污染城市的空气。
- 1942 年 《洛杉矶时报》，宣传维护新闻自由。
- 1943 年 《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在全州范围内开展活动，宣传收集废弃金属，支援战争。
- 1944 年 《纽约时报》，调查美国历史教学情况。

- 1945 年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调查密执安州兰辛市议会贪污腐化情况。
- 1946 年 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时报》，调查美国一个区法院的司法情况，结果导致一个区法官的免职和另外一些人的被控告。
- 1947 年 《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表了霍华德·M. 诺顿就马里兰的失业补偿问题写的一系列文章，结果导致对 93 人的判刑。
- 1948 年 《圣路易斯邮报》，报道了伊利诺斯州森特雷利亚的矿区事故和后果，导致矿区安全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改革。
- 1949 年 《内布拉斯加州新闻报》，宣传建立内布拉斯加总统初选制。
- 1950 年 《芝加哥每日新闻》和《圣路易斯邮报》的乔治·蒂姆和罗伊·J·哈里斯分别揭露了伊利诺斯的 37 名新闻工作者领取州政府的津贴。
- 1951 年 《迈阿密先驱报》和《布鲁克林鹰报》对犯罪的报道。
- 1952 年 《圣路易斯邮报》，揭露国内岁入局和其他政府机构的腐化行为。
- 1953 年 北卡罗来纳州的两家周刊《怀特威尔新闻报道》和《塔博尔市论坛报》，对三 K 党发动宣传攻势，导致一百多人被捕。
- 1954 年 《新闻日报》，揭露跑道丑闻和劳工诈骗活动，导致纽约劳工诈骗犯威廉·C. 德科宁被捕入狱。
- 1955 年 佐治亚州《哥伦布纪事报》和《星期日纪事问询报》，揭露亚拉巴马州菲尼克斯市广泛的腐化现象。
- 1956 年 加利福尼亚州《沃森维尔纪事报》，揭露公职机关的腐化现象。
- 1957 年 《芝加哥每日新闻》，揭露 250 万美元的欺骗案，导致伊利诺斯州审计长的定罪和州审计程序的改组。
- 1958 年 《阿肯色新闻报》，在小石城学校种族隔离危机期间作了客观的新闻报道，进行了冷静的社论导向。
- 1959 年 纽约州尤蒂卡市《观察家电讯报》和《尤蒂卡每日新闻》，在尤蒂卡市发起了一场反腐化、反赌博、反犯罪活动的宣传运动，推动了全面的市政改革。
- 1960 年 《洛杉矶时报》，就墨西哥的非法毒品贸易流入美国边界各州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和吉恩·谢尔曼的报道。
- 1961 年 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环球时报》，揭露地方司法部门执法不严，导致改选改革候选人。
- 1962 年 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新闻先驱报》，发动反对当地政府腐化行为的宣传攻势。
- 1963 年 《芝加哥每日新闻》，呼吁注意将生育控制服务列入公共卫生计划。
- 1964 年 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时报》，揭露佛罗里达州路税局普遍的不

- 法行为，导致该州公路项目的重新制定。
- 1965 年 堪萨斯州《哈钦森新闻报》，极力主张比较公平地重新分配堪萨斯州议会席位。
- 1966 年 《波士顿环球报》，发动宣传攻势，制止批准弗朗西斯·莫里西为联邦法官。
- 1967 年 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宣传控制露天开矿。《密尔沃基新闻报》，极力主张制定更有力的防止水污染法。
- 1968 年 加利福尼亚州里弗赛德《新闻企业报》，揭露法院在处理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部落的财产和房地产方面的腐化行为。
- 1969 年 《洛杉矶时报》，揭露市政官员的胡作非为，导致一些人的解职和广泛的改革。
- 1970 年 《新闻日报》，揭露长岛东部的秘密土地交易，导致一些人的判刑、一些官员的解职和辞职。
- 1971 年 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哨兵日报》，报道了环境保护问题，制止了北卡罗来纳州露天开矿行动。
- 1972 年 《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
- 1973 年 《华盛顿邮报》，调查水门事件。
- 1974 年 《新闻日报》，报道了非法的毒品交易。
- 1975 年 《波士顿环球报》，对该市学校的取消种族隔离运动引起的危机进行了报道。
- 1976 年 《安克雷奇每日新闻》，披露卡车司机工会对阿拉斯加州的经济和政治的影响。
- 1977 年 得克萨斯州《勒夫金新闻报》，刊登了当地一名在海军陆战队训练营死亡的士兵的讣告，导致对海军陆战队训练的调查和改革。
- 1978 年 《费城问询报》，揭露费城警察滥用职权。
- 1979 年 加利福尼亚州《雷耶斯角之光》，调查赛纳依这个有争议的戒毒康复中心。
- 1980 年 甘尼特新闻社，揭露保罗教堂神父对捐款管理不善。
- 1981 年 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观察家报》，对棉花加工厂引起的“褐色肺”病作了系列报道。
- 1982 年 《底特律新闻》，揭露美国海军掩盖水兵在舰上死亡的情况。
- 1983 年 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号角纪事报》，揭露密西西比州公立学校设备太差。
- 1984 年 《洛杉矶时报》，对拉丁美洲移民作了系列报道。
- 1985 年 得克萨斯州《沃思堡明星电讯报》马克·J.汤普森报道了贝尔直升飞机设计上的缺点，这是造成 250 名美国士兵死亡的原因。

- 1986年 《丹佛邮报》，揭露了筹款寻找失踪儿童组织的估计有点夸大。
- 1987年 《匹兹堡新闻》，揭露由于联邦航空管理局对飞行员的医疗检查不充分而对航班乘客安全造成的威胁。
- 1988年 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观察家报》查尔斯·谢泼德关于吉姆·巴克的报道。
- 1989年 《安克雷奇每日新闻》，报道了美国阿拉斯加本地人酗酒和自杀率很高。
- 1990年 《费城问询报》吉尔伯特·M.高尔对美国血液业的报道。北卡罗来纳州《华盛顿每日新闻》揭露当地饮水的污染。
- 1991年 《得梅因纪事报》简·肖勒，对强奸及其后果的报道。

报 道

- 1917年 《纽约世界报》赫伯特·贝亚德·斯沃普，以“日尔曼帝国内幕”为题，写了许多文章。
- 1918年 《纽约晚邮报》哈罗德·A.利特代尔，揭露新泽西州监狱滥用职权。
- 1919年 无奖。
- 1920年 《纽约世界报》小约翰·J.利里，报道全国煤矿大罢工。
- 1921年 《纽约世界报》路易斯·塞博尔特，采访威尔逊总统。
- 1922年 美联社柯克·L.辛普森，报道“无名战士”的葬礼。
- 1923年 《纽约时报》阿尔瓦·约翰斯顿，报道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举行的一次科学大会。
- 1924年 《圣迭戈太阳报》马格纳·怀特，报道日食。
- 1925年 《芝加哥每日新闻》詹姆斯·马尔罗伊和阿尔文·戈尔茨坦，他们的报道帮助查明了小罗伯特·弗兰克斯被谋杀案，导致内森·F.利奥波德和理查德·洛布的定罪。
- 1926年 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威廉·B.米勒，报道一个人陷在肯塔基州的沙洞里。
- 1927年 《圣路易斯邮报》约翰·T.罗杰斯，他的报道使美国一个区法庭法官受到弹劾。
- 1928年 无奖。
- 1929年 《圣路易斯邮报》保罗·Y.安德森，揭露大陆贸易公司购买的自由债券同海军石油的租借有关系。
- 1930年 《纽约时报》拉塞尔·D.欧文，报道伯德的南极探险。
- 1931年 《堪萨斯城明星报》A.B.麦克唐纳，报道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的一起谋杀案。
- 1932年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W.C.理查兹、D.D.马丁、J.S.普勒、F.D.韦布和J.N.W.斯隆，报道美国军团的一次游行。

- 1933 年 美联社弗朗西斯·A.贾米森，报道查尔斯·林白的婴儿被绑票。
- 1934 年《旧金山纪事报》罗伊斯·布赖尔，报道两个绑架者把一个商人的儿子私刑处死。
- 1935 年 《纽约先驱论坛报》威廉·H.泰勒，报道国际快艇比赛。
- 1936 年 《纽约时报》劳伦·D.莱曼，透露查尔斯·林白全家将移居英国。
- 1937 年 《纽约先驱论坛报》约翰·J.奥尼尔、《纽约时报》威廉·L.劳伦斯、美联社霍华德·W.布莱克斯利、宇宙通讯社戈宾德·贝哈里·拉尔和斯克里普斯—华德报系戴维·迪茨，报道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科学成就。
- 1938 年 《匹兹堡新闻邮报》雷蒙德·斯普里格勒，揭露法官雨果·L.布莱克一度参加过三K党。
- 1939 年 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托马斯·L.斯托克斯，报道宾夕法尼亚和肯塔基的工程进度管理局工作人员受到所谓恫吓。
- 1940 年 《纽约世界电讯报》S.伯顿·希思，揭露一名联邦法官的欺骗。
- 1941 年 《纽约世界电讯报》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报道有组织的劳工的丑闻。
- 1942 年 《旧金山纪事报》斯坦顿·德拉普兰，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的一些县要求分离出来，组成新州的动向。
- 1943 年 《芝加哥每日新闻》乔治·韦勒，报道在敌方水域的一艘潜艇上进行阑尾切除。
- 1944 年 《纽约美国人日报》保罗·舍恩斯坦，他的报道帮助挽救了一个需要盘尼西林的女子的生命。
- 1945 年 《旧金山新闻呼声报》杰克·S.麦克道尔，宣传献血。
- 1946 年《纽约时报》威廉·L.劳伦斯，报道长崎原子弹爆炸时亲眼目睹的情况。
- 1947 年 《纽约世界电讯报》弗雷德里克·沃尔特曼，报道共产主义对美国的渗透。
- 1948 年 《亚特兰大日报》乔治·F.古德温，报道县选举作弊。
- 1949 年 《纽约太阳报》马尔科姆·约翰逊，以“水边犯罪”为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 1950 年 《纽约时报》迈耶·伯杰，报道新泽西州坎登大批人被谋杀。
- 1951 年 《旧金山考察家报》爱德华·S.蒙哥马利，报道偷税漏税。
- 1952 年 《旧金山纪事报》乔治·德·卡瓦尔霍，报道对美籍华人进行敲诈勒索。（注：从次年起，这类报道分为两类——地方一般报道和地方专题报道。）

地方一般报道

- 1953 年 罗得岛普罗维登斯《新闻报》工作人员，报道一个银行被抢劫案。
- 1954 年 密西西比州《维克斯堡星期先驱邮报》工作人员，报道龙卷风。
- 1955 年 得克萨斯州《艾利斯每日回声报》卡罗·布朗，报道附近一个县独裁统治被推翻。
- 1956 年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李·希尔斯，报道汽车工人联合会同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谈判。
- 1957 年 《盐湖论坛报》工作人员，报道两架班机在大峡谷上空相撞。
- 1958 年 北达科他州《法戈论坛报》工作人员，报道龙卷风。
- 1959 年 《华盛顿明星晚报》玛丽·卢·沃纳，报道弗吉尼亚的取消种族隔离危机。
- 1960 年 《亚特兰大宪法报》杰克·纳尔逊，关于佐治亚州精神病院的文章。
- 1961 年 《纽约先驱论坛报》桑切·德·格拉蒙特，关于伦纳德·沃伦在大都市歌剧院舞台上死去的文章。
- 1962 年 盐湖城《犹他新闻》罗伯特·德·马林斯，报道犹他州死马角一起绑架谋杀事件。
- 1963 年《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西尔万·福克斯、安东尼·香农和威廉·朗古德，报道在牙买加湾一架飞机失事。
- 1964 年《华尔街日报》小诺曼·米勒，报道新泽西州一起植物油诈骗案。
- 1965 年 蒙大拿州哥伦比亚福尔斯市《饿马新闻》梅尔文·H·鲁德，报道水灾。
- 1966 年 《洛杉矶时报》工作人员，报道瓦茨骚乱。
- 1967 年 宾夕法尼亚州钱伯斯堡《舆论报》罗伯特·V.科克斯，报道追捕一名精神失常的枪手。
- 1968 年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工作人员，报道底特律骚乱。
- 1969 年 《路易斯维尔时报》和《信使日报》约翰·费特曼，报道一名在越南阵亡的士兵的葬礼。
- 1970 年 《芝加哥太阳时报》托马斯·菲茨帕特里克，报道芝加哥激进青年的暴力行动。
- 1971 年 俄亥俄州阿克伦《灯塔报》工作人员，报道肯特大学惨案。
- 1972 年 纽约州罗彻斯特《联合时报》理查德·库珀和约翰·麦克塞克，报道阿蒂克监狱暴动。
- 1973 年 《芝加哥论坛报》工作人员，揭露初选中违反选举程序。
- 1974 年 《芝加哥太阳时报》阿瑟·M.佩塔克和休·F.霍夫，披露新证据，导致对
- 1966 年瓦西里·珀西谋杀案重新审理。
- 1975 年 俄亥俄《齐尼亚每日公报》工作人员，报道龙卷风。

- 1976 年 《迈阿密先驱报》吉恩·米勒，他的报道使两名以所谓谋杀罪判刑的无辜者得到平反昭雪。
- 1977 年 《密尔沃基新闻报》马戈·休斯顿，报道老年人问题和年龄老化情况。
- 1978 年 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理查德·惠特，报道贝弗利·希尔超级夜总会的火灾。
- 1979 年 《圣迭戈论坛报》工作人员，报道一架客机和一架小飞机在该市上空相撞。
- 1980 年 《费城问询报》工作人员，报道三里岛核电站事故。
- 1981 年 华盛顿州朗维尤《每日新闻》工作人员，报道圣海伦斯火山爆发。
- 1982 年 《堪萨斯城明星报》和《堪萨斯城时报》工作人员，报道海厄特·雷根西饭店高架人行道坍塌。
- 1983 年 印第安纳州韦恩堡《新闻哨兵报》工作人员，报道该市水灾。
- 1984 年 《新闻日报》工作人员，报道婴儿简·多伊案件及其社会、政治影响。
- 1985 年 《弗吉尼亚向导报》托马斯·特科尔和《纪事明星报》，揭露一名地方经济发展官员的腐化。
- 1986 年 《迈阿密先驱报》埃德娜·布坎南，对警察情况的报道。
- 1987 年 俄亥俄州阿克伦《灯塔报》工作人员，报道一位欧洲金融家企图接管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
- 1988 年 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亚拉巴马新闻报》工作人员，报道亚拉巴马州婴儿死亡率异常高。马萨诸塞州《劳伦斯鹰论坛报》工作人员，报道马萨诸塞州监狱休假制度。
- 1989 年 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工作人员，报道死亡 27 人的公共汽车车祸。
- 1990 年 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信使新闻》工作人员，报道
- 1989 年 10 月 17 日湾区地震及其后果。
- 1991 年 《迈阿密先驱报》工作人员，报道搞个人迷信的地方领导人本雅韦的起落。

（注：“地方一般报道”1992 年改为“现场新闻报道”。）

地方专题报道

- 1953 年 《纽约世界电讯报》爱德华·J.莫厄里，他的报道使一起被错误判刑的人得到平反。
- 1954 年 《堪萨斯城明星报》阿尔文·斯科特·麦科伊，他的报道促使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辞职。
- 1955 年 得克萨斯州《丘罗记录报》罗兰·肯尼思·托尔里，揭露得克

萨斯州退伍军人土地计划丑闻。

- 1956 年 《纽约时报》阿瑟·戴利，体育报道。
- 1957 年 《奥勒冈人报》华莱士·特纳和威廉·兰伯特，揭露波特兰市政官员和工会人士的腐化堕落行为。
- 1958 年 《华盛顿明星晚报》乔治·贝弗里奇，以“明天的地铁和城市”为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 1959 年 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论坛报》和《斯克兰顿人报》约翰·哈罗德·布里斯林，大力宣传制止劳工暴力行动。
- 1960 年 《华盛顿明星晚报》米里亚姆·奥顿伯格，揭露一起旧车欺骗案。
- 1961 年 纽约州《布法罗晚报》埃德加·梅，报道纽约州的公共福利事业。
- 1962 年 《芝加哥论坛报》乔治·布利斯，揭露芝加哥市卫生区的丑闻。
- 1963 年 得克萨斯州《佩科斯独立企业报》小奥斯卡·格里芬，揭露比利·索尔·埃斯蒂斯丑闻。
- 1964 年 《费城公报》詹姆斯·马吉、艾伯特·高迪奥西和弗雷德里克·迈耶，揭露了一系列诈骗案。
- 1965 年 《休斯敦邮报》吉恩·戈尔茨，揭露得克萨斯州帕萨迪纳政府腐化。
- 1966 年 佛罗里达州《坦帕论坛报》约翰·安东尼·弗雷斯卡，他的报道使一位被错误地指控参与两起抢劫案的无辜者获释。
- 1967 年 《迈阿密先驱报》吉恩·米勒，他的报道使佛罗里达州的一名男子和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女子在分别审判中被误判犯有谋杀罪的冤案得到平反。
- 1968 年 《纽约时报》J. 安东尼·卢卡斯，报道琳达·菲茨帕特里克谋杀案。
- 1969 年 《圣路易斯环球民主报》艾伯特·德卢加赫和丹尼·沃尔什，对圣路易斯汽管装配工工会的欺诈和滥用权力行为进行了揭露和谴责。
- 1970 年 《蒙哥马利广告报》和《亚拉巴马新闻报》哈罗德·尤金·马丁，揭露一项利用州监狱犯人进行药物试验的商业阴谋。
- 1971 年 《芝加哥论坛报》威廉·琼斯，揭露警察和私人救护车公司互相勾结。
- 1972 年 《波士顿环球报》蒂莫西·利兰、杰勒德·奥尼尔、斯蒂芬·柯克吉安和安·德桑蒂斯，揭露马萨诸塞州索默维尔的普遍腐化现象。
- 1973 年 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太阳报》工作人员，披露内布拉斯加州孤儿院的巨大财政来源。

- 1974 年 《纽约每日新闻》威廉·谢尔曼，揭露纽约医疗计划中的弊端。
- 1975 年 《印第安纳波利斯明星报》工作人员，揭露地方警察腐化和执法不严。
- 1976 年 《芝加哥论坛报》工作人员，揭露芝加哥联邦住房计划中滥用职权和芝加哥两个私立医院的条件恶劣。
- 1977 年 《费城问询报》阿塞尔·穆尔和小文德尔·罗尔斯，报道一家精神病医院的情况。
- 1978 年 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鼓动报》安东尼·R.多兰，就市政当局的腐化发表了一系列报道。
- 1979 年 宾夕法尼亚州《波茨维尔共和主义者报》吉尔伯特·M·高尔和埃利奥特·G.贾斯平，报道蓝色煤矿公司被同犯罪集团有联系的人破坏。
- 1980 年 《波士顿环球报》斯蒂芬·柯克吉安、小亚历山大·霍斯、尼尔斯·布鲁泽留斯和琼·韦诺奇，揭露波士顿交通系统管理不善。
- 1981 年 亚利桑那州塔克森《亚利桑那明星日报》克拉克·哈拉斯和罗伯特·B.洛，对亚利桑那大学体育部的调查。
- 1982 年 《西雅图时报》保罗·亨德森，他的报道帮助一个被误判犯有强奸罪的人得到平反。
- 1983 年 《华盛顿邮报》洛雷塔·托范尼，他的报道揭露了马里兰一个拘留中心的不人道情况。
- 1984 年 《波士顿环球报》工作人员，对波士顿的种族关系作了一系列报道。
- 1985 年 佐治亚州《梅肯电讯新闻报》兰德尔·萨维奇和杰基·克罗斯比，报道佐治亚大学和佐治亚工学院的学术活动和体育运动。
- 1986 年 《匹兹堡新闻》安德鲁·施奈德和玛丽·帕特·弗莱厄蒂，报道美国器官移植系统违反条例和失败的情况。
- 1987 年 《纽约时报》亚历克斯·S.琼斯，报道宾厄姆报业家族的不和以及由此导致这个报业帝国的售出。
- 1988 年 《华尔街日报》沃尔特·博格丹尼奇，报道美国医疗实验室试验的缺陷。
- 1989 年 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奥林奇县纪事报》爱德华·休姆斯，报道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军事设施。
- 1990 年《阿尔伯克基日报》塔马尔·斯蒂贝尔，她的报道把一种罕见的血液病同氨基丙酸药剂联系起来。
- 1991 年 《纽约时报》纳塔利·安吉尔，就许多科学问题作了报道，主要是就人体细胞循环作了复杂的报道。（注：这类新闻
- 1992 年改为“独家报道”。）

通 讯

- 1929年 《芝加哥每日新闻》保罗·斯科特·莫勒，报道法英海军条约和德国力主修改道斯计划。
- 1930年 《纽约先驱论坛报》利兰·斯托，报道赔款会议和建立国际银行。
- 1931年 《费城大众纪事报》和《纽约晚邮报》H·R.尼克博克，报道苏联五年计划。
- 1932年 《纽约时报》沃尔特·杜兰蒂，报道苏联问题。《圣路易斯邮报》查尔斯·G.罗斯，报道美国经济。
- 1933年 《芝加哥每日新闻》埃德加·安塞尔·莫勒，报道德国政治危机。
- 1934年 《纽约时报》弗雷德里克·T.伯查尔，欧洲通讯。
- 1935年 《纽约时报》阿瑟·克罗克，华盛顿通讯。
- 1936年 《芝加哥论坛报》威尔弗雷德·C.巴伯，报道埃塞俄比亚战争。
- 1937年 《纽约时报》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欧洲报道。
- 1938年 《纽约时报》阿瑟·克罗克，采访罗斯福总统。
- 1939年 美联社路易斯·P.洛克纳，柏林通讯。
- 1940年 《纽约时报》奥托·D.托利舒斯，柏林通讯。
- 1941年 美国战地记者们从欧洲、亚洲和非洲战区发回的报道获得集体奖。
- 1942年 《菲律宾先驱报》卡洛斯·P.罗默洛，报道远东事态的发展。
- 1943年 《纽约时报》汉森·W.鲍德温，南太平洋战时旅游通讯。
- 1944年 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欧内斯特·泰勒·派尔，战地通讯。
- 1945年 美联社哈罗德·V.博伊尔，战地通讯。
- 1946年 《纽约时报》阿纳尔多·科特西，阿根廷通讯。
- 1947年 《纽约时报》布鲁克斯·阿特金森，苏联通讯。

电讯（全国）

- 1942年 《纽约时报》路易斯·斯塔克，劳工报道。
- 1943年 无奖。
- 1944年 《巴尔的摩太阳报》杜威·L.弗莱明，1943年的报道。
- 1945年 《纽约时报》詹姆斯·赖斯顿，关于敦巴顿橡树园安全会议的报道。
- 1946年 《圣路易斯邮报》爱德华·A.哈里斯，关于沿海低洼地区石油的报道。
- 1947年 《华盛顿邮报》爱德华·T.福利亚德，关于哥伦比亚人公司的报道。

全国报道

- 1948 年 《纽约先驱论坛报》伯特·安德鲁斯，以“国务院安全问题”为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纳特·S·芬尼，报道联邦计划对文职机构实施保密条例。
- 1949 年 《纽约时报》C·P.特拉塞尔，表彰他 1948 年的工作。
- 1950 年 《西雅图时报》埃德温·奥·格思曼，他的一系列报道消除了一位教授被指控为共产党人的罪名。
- 1951 年 无奖。
- 1952 年 《纽约时报》安东尼·莱维罗，透露了杜鲁门总统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1950 年在威克岛的谈话记录。
- 1953 年 美联社唐·怀特黑德，报道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从纽约至朝鲜途中的安全保卫工作。
- 1954 年 科尔斯报系理查德·威尔逊，发表联邦调查局在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案件上的报告。
- 1955 年 《华盛顿每日新闻》安东尼·刘易斯，他的一系列文章使一位被作为危及安全的危险分子而解职的海军职员得到平反。
- 1956 年 《查塔努加时报》查尔斯·L.巴利特，他的揭露性报道促成空军秘书的辞职。
- 1957 年 《纽约时报》詹姆斯·赖斯顿，他在 1956 年分析了艾森豪威尔生病对政府的运转产生的影响。
- 1958 年 美联社雷尔曼·莫林，报道小石城学校种族隔离危机中的暴力行动。《得梅因纪事论坛报》克拉克·莫伦霍夫，对劳工诈骗案作了调查性报道。
- 1959 年 《迈阿密新闻》霍华德·范·史密斯，报道佛罗里达州移民劳动营的恶劣条件。
- 1960 年 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万斯·特林布尔，揭露美国国会的裙带关系。
- 1961 年 《华尔街日报》爱德华·科尼，分析一笔木材交易，引起对商业道德的注意。
- 1962 年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内森·考德威尔和吉恩·格雷厄姆，揭露煤炭部门资方与工会领导人的私下交易。
- 1963 年 《纽约时报》安东尼·路易斯，报道 1962 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工作。
- 1964 年 合众国际社梅里曼·史密斯，报道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刺。
- 1965 年 《华尔街日报》路易斯·M.科尔梅尔，报道林顿·约翰逊总统的财产日益增多。
- 1966 年 《华盛顿明星晚报》海恩斯·约翰逊，报道阿拉斯加州塞尔马

的民权运动冲突。

- 1967 年 《华尔街日报》斯坦利·佩恩和门罗·卡明，报道巴哈马群岛上的赌博和美国犯罪活动之间的关系。
- 1968 年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霍华德·詹姆斯，发表题为“法庭危机”的系列报道。《得梅因纪事报》和《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内森·科茨，报道许多肉食加工厂的卫生条件极差。
- 1969 年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罗伯特·卡恩，报道美国国家公园的前途。
- 1970 年 《芝加哥每日新闻》威廉·J.伊顿，揭露提名克莱门特·F.海恩斯沃恩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背景。
- 1971 年 合众国际社露辛达·弗兰克斯和托马斯·鲍尔斯，报道革命家黛安娜·奥登的平生和死亡。
- 1972 年 辛迪加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报道印巴战争期间美国的决策。
- 1973 年 奈特报系罗伯特·博伊德和克拉克·霍伊特，揭露副总统候选人托马斯·伊格尔顿的精神病史。
- 1974 年 《华盛顿明星新闻报》詹姆斯·波尔党，揭露尼克松总统竞选连任的经济来源。《普罗维登斯日报》和《晚报》杰克·怀特，披露尼克松总统缴纳联邦所得税的情况。
- 1975 年 《费城问询报》唐纳德·L.巴利特和詹姆斯·B.斯蒂尔，揭露联邦纳税法实施不公。
- 1976 年 《得梅因纪事报》詹姆斯·里塞，揭露谷物出口贸易中的贪污。
- 1977 年 美联社沃尔特·米尔斯，报道 1976 年总统选举。
- 1978 年 《洛杉矶时报》盖洛德·D.肖，报道美国大水坝工程结构不安全。
- 1979 年 《得梅因纪事报》詹姆斯·里塞，对农业给环境带来的损失作了一系列报道。
- 1980 年 《圣彼得堡时报》贝特·史文森·奥西尼和查尔斯·斯塔福德，报道基督教科学派教会。
- 1981 年 《纽约时报》约翰·M.克鲁森，报道非法外侨和移民问题。
- 1982 年 《堪萨斯城时报》里克·阿特金森，对许多问题作了报道。
- 1983 年 《波士顿环球报》工作人员，对核武器竞赛作了报道。
- 1984 年 《纽约时报》约翰·诺布尔·威尔福德，对许多具有全国性意义的科学问题作了报道。
- 1985 年 《得梅因纪事报》托马斯·J.努森，报道农业作为职业的危险性。
- 1986 年 《达拉斯晨报》克雷格·弗劳尼和乔治·罗德里格，揭露公家住房中的种族偏见和种族隔离。《费城问询报》阿瑟·豪，披露国内岁收局对税收的处理没有效率。

- 1987 年 《迈阿密先驱报》工作人员，报道美国反伊朗派的联系。《纽约时报》工作人员，报道“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爆炸。
- 1988 年 《费城问询报》蒂姆·韦纳，报道政府利用五角大楼的一笔秘密预算来进行防务研究和扩充军备。
- 1989 年 《费城问询报》唐纳德·L.巴利特和詹姆斯·B.斯蒂尔，揭露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的情况。
- 1990 年 《西雅图时报》罗斯·安德森、比尔·迪特里希、马里·安·格温和埃里克·纳尔德，报道“埃克森·瓦尔德里兹号”油轮漏油事件及其后果。
- 1991 年 甘尼特通讯社马吉·伦德斯特罗姆和罗切尔·夏普，报道由于凌辱儿童而造成的死亡。

电讯（国际）

- 1942 年 美联社劳伦斯·埃德蒙·艾伦，报道英国地中海舰队。
- 1943 年 北美报业联盟艾拉·沃尔弗特，报道所罗门群岛的第五次战斗。
- 1944 年 美联社丹尼尔·德·卢斯，表彰他1943年的工作。
- 1945 年 《巴尔的摩太阳报》马克·S.沃森，华盛顿、伦敦，以及意大利、英国前线的报道。
- 1946 年 《纽约先驱论坛报》霍默·威廉·比加特，太平洋战地报道。
- 1947 年 美联社埃迪·吉尔摩，莫斯科报道。

国际报道

- 1948 年 《巴尔的摩太阳报》保罗·W.沃德，发表了题为“苏联的生活”的系列报道。
- 1949 年 《巴尔的摩太阳报》普赖斯·戴伊，就印度独立的第一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 1950 年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埃德蒙·史蒂文斯，关于苏联生活的许多报道。
- 1951 年 《芝加哥每日新闻》凯斯·比奇和弗雷德·斯帕克斯，《纽约先驱论坛报》玛格丽特·希金斯和霍默·威廉·比加特，美联社雷尔曼·莫林和唐·怀特黑德，关于朝鲜战争报道。
- 1952 年 美联社约翰逊·M.海托华，表彰他1951年的大量工作。
- 1953 年 《密尔沃基新闻报》奥斯汀·韦尔温，对加拿大的报道。
- 1954 年 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吉姆·G.卢卡斯，对朝鲜战争报道。
- 1955 年 《纽约时报》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对苏联的报道。
- 1956 年 国际新闻社小威廉·伦道夫·赫斯特、金斯伯里·史密斯和弗兰克·康尼夫，对苏联领导人的独家采访。
- 1957 年 美联社拉塞尔·琼斯，报道匈牙利叛乱。

- 1958年 《纽约时报》工作人员，表彰他们1957年的工作。
- 1959年 《纽约每日新闻》约瑟夫·马丁和菲利普·桑托拉，揭露古巴的巴蒂斯塔政权的残暴。
- 1960年 《纽约时报》A·M.罗森塔尔，对波兰的报道。
- 1961年 美联社林恩·海因策林，对刚果危机的报道。
- 1962年 《纽约先驱论坛报》沃尔特·李普曼，对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采访以及其他许多报道。
- 1963年 《迈阿密新闻》哈尔·赫德里克斯，透露苏联在古巴设置导弹发射架。
- 1964年 美联社马尔科姆·W.布朗和《纽约时报》戴维·哈伯斯塔姆，对越南战争报道。
- 1965年 《费城公报》J·A.利文斯顿，报道东欧的苏联卫星国经济。
- 1966年 美联社彼得·阿内特，报道越南战争。
- 1967年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R.约翰·休斯，报道共产党图谋在印度尼西亚发动政变。
- 1968年 《华盛顿邮报》艾尔弗雷德·弗兰德利，报道1967年中东战争。
- 1969年 《洛杉矶时报》威廉·图伊，报道越南战争。
- 1970年 电讯新闻社西摩·赫希，揭露美军在越南美莱村大屠杀。
- 1971年 《华盛顿邮报》吉米·李·霍格兰，报道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斗争。
- 1972年 《华尔街日报》彼得·R.卡恩，报道印度—巴基斯坦战争。
- 1973年 《纽约时报》马克斯·弗兰克尔，报道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
- 1974年 《纽约时报》赫德里克·史密斯，报道苏联及其东欧盟国。
- 1975年 《芝加哥论坛报》威廉·马伦和奥维·卡特，报道非洲和印度的饥荒。
- 1976年 《纽约时报》西德尼·H·香伯格，报道共产党接管柬埔寨。
- 1977年 无奖。
- 1978年 《纽约时报》亨利·卡姆，报道印度支那的“船民”难民。
- 1979年 《费城问询报》理查德·本·克雷默，中东报道。
- 1980年 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乔尔·布林克利和杰伊·马瑟，报道柬埔寨难民营。
- 1981年 《迈阿密先驱报》雪莉·克里斯琴，报道中美洲的动荡局势。
- 1982年 《纽约时报》约翰·达恩顿，关于波兰的报道。
- 1983年 《纽约时报》托马斯·L.弗里德曼和《华盛顿邮报》洛伦·詹金斯，报道以色列入侵贝鲁特及其后果。
- 1984年 《华尔街日报》卡伦·埃利奥特·豪斯，采访约旦国王侯赛因。
- 1985年 《新闻日报》乔斯·弗里德曼、丹尼斯·贝尔和奥齐尔·马哈

马德，关于非洲饥荒饿死人的系列报道。

- 1986 年 《圣何塞信使新闻》刘易斯·M. 西蒙斯、彼得·凯里和凯瑟琳·埃利森，对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及其亲信向国外转移财产作了一系列报道。
- 1987 年 《洛杉矶时报》迈克尔·帕克斯，关于南非的报道。
- 1988 年 《纽约时报》托马斯·L. 弗里德曼，关于以色列的报道。
- 1989 年 《华盛顿邮报》格伦·弗兰克尔，关于以色列和中东的报道。
《纽约时报》比尔·凯勒，关于苏联的报道。
- 1990 年 《纽约时报》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和谢里尔·伍邓，对中国民主运动及其被镇压的报道。
- 1991 年 《华盛顿邮报》卡里尔·墨菲，报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纽约时报》塞奇·施梅曼，报道东德的崩溃及其并入联邦共和国。

调查性报道

- 1985 年 《费城问询报》威廉·K. 马里莫，披露过份热衷于利用城市警犬。《圣彼得堡时报》卢西·摩根和杰克·里德，揭露一个县长的腐化。
- 1986 年 《列克星敦先驱导报》杰弗里·马克斯和迈克尔·约克，他们的系列报道揭露了肯塔基大学篮球运动员接受津贴。
- 1987 年 《费城问询报》丹尼尔·R. 比德尔、H·G. 比辛格和弗雷德里克·N. 图尔斯基，他们的系列报道揭露了费城法院侵权。另，《费城问询报》约翰·沃斯坦迪克的监狱报道也单独获奖。
- 1988 年 《芝加哥论坛报》迪安·巴奎特、威廉·盖恩斯和安·马里·利平斯基，报道芝加哥市政委员会的自私自利和浪费。
- 1989 年 《亚特兰大宪法日报》比尔·戴德曼，调查领导机构的种族歧视。
- 1990 年 《明星论坛报》卢·基尔泽和克里斯·艾森，揭露当地一些公民同圣保罗消防队员串通一气，从火灾中谋利，其中有些火灾起因可疑。
- 1991 年 《印第安纳波利斯明星报》约瑟夫·T. 哈利南和苏珊·M. 黑登，报道印第安纳州的医疗事故。

解释性新闻

- 1985 年 《巴尔的摩太阳晚报》乔恩·富兰克林，关于分子精神病学的系列报道。
- 1986 年 《纽约时报》工作人员，关于空间导弹防御系统（即“星球大战”）的报道。
- 1987 年 《芝加哥论坛报》杰弗里·R. 莱昂和彼得·戈纳，关于基因疗

法的前景的报道。

- 1988年 《华尔街日报》丹尼尔·赫茨伯格和詹姆斯·B.斯图尔特，报道一位投资银行家被指控进行内部交易。
- 1989年 《达拉斯晨报》戴维·汉纳斯·威廉·斯奈德和卡伦·布莱森，报道一架飞机失事。
- 1990年 《华盛顿邮报》戴维·A.瓦伊斯和史蒂夫·科尔，调查证券和交易委员会。
- 1991年 《华尔街日报》苏珊·C.法卢迪，撰写文章，分析1986年融资购买塞夫韦商店公司及其对塞夫韦雇员的灾难性后果。

社论

- 1917年 《纽约论坛报》，发表纪念卢西塔尼亚号班轮被击沉一周年的社论。
- 1918年 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亨利·沃特森，发表社论《败者活该！》和《战争有自己的伴侣》。
- 1919年 无奖。
- 1920年 《奥马哈世界先驱晚报》哈维·E.纽布兰奇，发表社论《法律和弱肉强食》。
- 1921年 无奖。
- 1922年 《纽约先驱报》弗兰克·M.奥布赖恩，发表文章《无名战士》。
- 1923年 堪萨斯《恩波里亚日报》，发表社论《致一位焦急的朋友》。
- 1924年 《波士顿先驱报》，发表社论《柯立芝是谁造就的？》。《纽约世界报》弗兰克·I.科布，表彰他的大量工作。
- 1925年 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新闻信使报》，发表社论《南方的困境》。
- 1926年 《纽约时报》爱德华·M.金斯伯里，发表社论《百哀之家》。
- 1927年 《波士顿先驱报》F.劳里斯顿·布拉德，发表社论《我们忍受》。
- 1928年 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广告报》格罗弗·C.霍尔，发表社论，反对强盗行径、强迫、种族偏狭和宗教偏狭。
- 1929年 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弗吉尼亚向导报》路易斯·艾萨克·贾菲，发表社论，谴责私刑。
- 1930年 无奖。
- 1931年 内布拉斯加州《弗里蒙特论坛报》查尔斯·S.里克曼，发表社论《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先生们》。
- 1932年 无奖。
- 1933年 《堪萨斯城明星报》，发表一系列出色的社论。
- 1934年 衣阿华州《大西洋城新闻电讯报》E·P.蔡斯，发表社论《我们的钱在哪里？》。

- 1935 年 无奖。
- 1936 年 《华盛顿邮报》费利克斯·莫利和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乔治·B.帕克，在 1935 年发表了一系列出色的社论。
- 1937 年 《巴尔的摩太阳报》约翰·W.欧文斯，表彰他 1936 年的工作。
- 1938 年 《得梅因纪事论坛报》威廉·韦斯利·韦马克，表彰他 1937 年的工作。
- 1939 年 波特兰《俄勒冈人报》罗纳德·G.卡尔弗特，表彰他 1938 年的工作。
- 1940 年 《圣路易斯邮报》巴特·霍华德，表彰他 1939 年的工作。
- 1941 年 《纽约每日新闻》鲁本·莫里，表彰他 1940 年的工作。
- 1942 年 《纽约先驱论坛报》杰弗里·帕森斯，表彰他 1941 年的工作。
- 1943 年 《得梅因纪事论坛报》福雷斯特·W.西摩，表彰他 1942 年的工作。
- 1944 年 《堪萨斯城明星报》亨利·J.哈斯克尔，表彰他 1943 年的工作。
- 1945 年 《新闻公报》乔治·W.波特，表彰他 1944 年发表的一些社论，特别是关于新闻自由的社论。
- 1946 年 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德尔塔民主时报》霍丁·卡特，就种族、宗教和经济方面的偏狭情绪发表了一系列社论。
- 1947 年 为《华尔街日报》威廉·格兰姆斯本年度的工作。
- 1948 年 《里士满时代快报》的弗吉尼厄斯·达布尼因本年度的工作而获奖。
- 1949 年 《波士顿先驱报》约翰·H.克赖德和《华盛顿邮报》赫伯特·埃利森，表彰他们 1948 年的工作。
- 1950 年 密执安州《杰克逊爱国公民报》卡尔·M.桑德斯，表彰他 1949 年的工作。
- 1951 年 《新奥尔良报》威廉·H.菲茨帕特里克，就宪法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社论。
- 1952 年 《圣路易斯环球民主报》路易斯·拉科斯，发表社论《公共道德低落。》
- 1953 年 《华尔街日报》弗蒙特·康内克蒂卡特·罗伊斯特，表彰他 1952 年发表的社论。
- 1954 年 《波士顿先驱报》唐·默里，就美国军事政策的变化发表了一系列社论。
- 1955 年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罗伊斯·豪斯，发表社论，评论汽车工人对克莱斯勒公司发动的罢工。
- 1956 年 《得梅因纪事论坛报》劳伦·K.索思，发表社论，邀请苏联工人访问衣阿华。
- 1957 年 亚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新闻》布福德·布恩，就社区的种族

隔离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社论。

- 1958年 阿肯色州小石城《阿肯色新闻报》哈里·S.阿什莫尔，就学校种族隔离冲突发表了一系列社论。
- 1959年 《亚特兰大宪法报》拉尔夫·麦吉尔，
1958年撰写了许多出色的社论，如《一个教堂，一所学校》。
- 1960年 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弗吉尼亚向导》勒努瓦·钱伯斯，就弗吉尼亚州学校种族隔离问题写了许多社论。
- 1961年 波多黎各《圣胡安明星报》威廉·J.多维里尔，就1960年牧师干预波多黎各地方长官选举发表了一些社论。
- 1962年 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新闻》托马斯·M.斯托克，发表社论，谴责约翰·伯奇学会。
- 1963年 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纪事报》小艾拉·B.哈基，就密西西比州消除种族隔离引起的危机发表了一系列社论。
- 1964年 密西西比州《莱克星顿广告报》赫兹尔·布兰农·史密斯，就种族关系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社论。
- 1965年 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太阳报》约翰·R.哈里逊，运用社论，推动改善社区的居住条件。
- 1966年 《圣路易斯邮报》罗伯特·拉希，1965年撰写了许多出色的社论。
- 1967年 《亚特兰大宪法报》尤金·帕特森，1966年撰写了一系列出色的社论。
- 1968年 奈特报系约翰·S.奈特，在1967年发表了许多出色的社论。
- 1969年 阿肯色州《派因布拉夫商业报》保罗·格林伯格，在1968年撰写了不少出色的社论。
- 1970年 《华盛顿邮报》菲利普·L.盖林，在1969年发表了一系列出色的社论。
- 1971年 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太阳报》霍兰斯·G.戴维斯，发表社论，支持学校和平消除种族隔离。
- 1972年 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环球时报》约翰·斯特罗迈耶，发表社论，呼吁缓和社区紧张的种族关系。
- 1973年 马萨诸塞州皮茨菲尔德市《伯克郡邮报》罗杰·B.林斯科特，
在
1972年撰写了不少出色的社论。
- 1974年 新泽西州特伦顿市《特伦顿人》F·吉尔曼·斯潘塞，呼吁公众注意新泽西州政府的丑闻。
- 1975年 西弗吉尼亚《查尔斯顿每日邮报》约翰·丹尼尔·莫里斯，就县教科书争执发表社论。
- 1976年 《洛杉矶时报》菲利普·P.克尔比，发表社论，反对政府的保密

和新闻检查制度。

- 1977年 内华达州《雷诺晚报》和《内华达州新闻报》沃伦·L.莱鲁德、福斯特·丘奇和诺曼·F.卡多扎，发表社论，谴责当地一个妓院老板。
- 1978年 《华盛顿邮报》梅格·格林菲尔德，在1977年发表了许多出色社论。
- 1979年 《华盛顿明星报》小埃德温·M.约德，1978年发表了不少出色社论。
- 1980年 《华尔街日报》罗伯特·L.巴特利，1979年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
- 1981年 无奖。
- 1982年 《纽约时报》杰克·罗森塔尔，就许多问题撰文。
- 1983年 《迈阿密先驱报》社论委员会，撰文反对里根政府拘留非法海地移民的政策。
- 1984年 佐治亚州萨凡纳《佐治亚新闻》艾伯特·斯卡迪诺，就地方和州的事务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 1985年 《费城每日新闻》理查德·阿雷古德，表彰他1984年的大量工作。
- 1986年 《芝加哥论坛报》杰克·富勒，就宪法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社论。
- 1987年 《圣迭戈论坛报》乔纳森·弗里德曼，发表社论，敦促通过三十四年来第一项重大的移民改革法。
- 1988年 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哨兵报》简·希利，发表社论，反对佛罗里达州奥兰奇县的过份发展。
- 1989年 《芝加哥论坛报》洛伊斯·威尔，就地方上的许多问题发表社论。
- 1990年 宾夕法尼亚州波茨敦《信使报》托马斯·J.希尔顿，就为维护宾夕法尼亚农村地区农田和其他空间发行债券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社论。
- 1991年 亚拉巴马州《伯明翰新闻报》罗恩·凯西、哈罗德·杰克森和乔耶·肯尼迪，就亚拉巴马州税收结构不平等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社论。

(注：1991年此类型改称“社论写作”。)

漫 画

- 1922年 《纽约世界报》罗林·柯尔比的漫画《在走向莫斯科的道路上》。
- 1923年 无奖。
- 1924年 《纽约论坛报》杰伊·N.达林的漫画《在当年美好的美国》。
- 1925年 《纽约世界报》罗林·柯尔比的漫画《来自外界的消息》。

- 1926年 《圣路易斯邮报》D.R.菲茨帕特里的漫画《摩西戒律和今天的法律》。
- 1927年 《布鲁克林鹰报》纳尔森·哈丁的漫画《推翻偶像》。
- 1928年 《布鲁克林鹰报》纳尔森·哈丁的漫画《愿他的影子永远不会变小》。
- 1929年 《纽约世界报》罗林·柯尔比的漫画《坦慕尼协会》。
- 1930年 《布鲁克林鹰报》查尔斯·R.麦考利的漫画《为死马付钱》。
- 1931年 《巴尔的摩太阳报》埃德蒙·达菲的漫画《仍然在奋斗》。
- 1932年 《芝加哥论坛报》约翰·T.麦卡琴的漫画《聪明的经济学家提出一个问题》。
- 1933年 《华盛顿每日新闻》H·M.塔尔伯特的漫画《亚洲之光》。
- 1934年 《巴尔的摩太阳报》埃德蒙·达菲的《加利福尼亚骄傲地指出！》。
- 1935年 《密尔沃基新闻报》罗斯·A.刘易斯的漫画《我当然要为双方工作》。
- 1936年 无奖。
- 1937年 《纽约每日新闻》C.D.巴切勒的漫画《来吧,我将好好对待你》。
- 1938年 《芝加哥每日新闻》沃恩·休梅克的漫画《回路》等。
- 1939年 俄克拉何马城《俄克拉何马人日报》查尔斯·G.沃纳的漫画《1938年提名》等。
- 1940年 《巴尔的摩太阳报》埃德蒙·达菲的漫画《手伸得太长了》等。
- 1941年 《芝加哥时报》雅各布·伯克的漫画《如果我醒来以前就死去》等。
- 1942年 报联社赫伯特·L.布洛克的漫画《英国飞机》以及1941年他的其他作品。
- 1943年 《纽约先驱论坛报》杰伊·达林的漫画《珍惜废纸运动该有一席之地》以及1942年他的其他作品。
- 1944年 《华盛顿明星晚报》克利福德·K.贝里曼的漫画《船去哪儿?》以及1943年他的其他作品。
- 1945年 联合特稿辛迪加的比尔·莫尔丁的系列漫画《同莫尔丁去前方》以及1944年他的其他作品。
- 1946年 《洛杉矶时报》布鲁斯·A.拉塞尔的漫画《是沟通那个峡谷的时候了》以及1945年他的其他作品。
- 1947年 《芝加哥每日新闻》沃恩·休梅克的漫画《他的影子仍然在跑》。
- 1948年 《纽约太阳报》鲁木·L.戈德堡的漫画《今日平安无事》。
- 1949年 《纽瓦克新闻晚报》卢特·皮斯的漫画《谁,我?》。
- 1950年 《华盛顿明星晚报》詹姆斯·T.贝里曼的漫画《一切为了华盛顿的超级秘密会议》。

- 1951年 菲尼克斯《亚利桑那共和国》雷金纳德·W.曼宁的漫画《帽子》。
- 1952年 《纽约镜报》弗雷德·L.帕克的漫画《你们的编辑们应当不仅仅刊登我说的话，而且要有更多的理智！》。
- 1953年 《克利夫兰实话报》爱德华·D.库克斯的漫画《后果》。
- 1954年 《华盛顿邮报》赫伯特·L.布洛克的谴责约瑟夫·斯大林的漫画。
- 1955年 《圣路易斯邮报》D.R.菲茨帕特里克反对美国军事干涉印度支那的漫画。
- 1956年 《路易斯维尔时报》罗伯特·约克的批评农产品价格太低的漫画。
- 1957年 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托姆·利特尔的鼓励小儿麻痹症预防接种疫苗的漫画。
- 1958年 纽约州《布法罗晚报》布鲁斯·M·香克斯的谴责劳工诈骗案的漫画。
- 1959年 《圣路易斯邮报》比尔·莫尔丁的漫画《我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你有什么罪？》
- 1960年 无奖。
- 1961年 《芝加哥论坛报》凯里·奥尔的漫画《和蔼可亲的老虎》以及其他许多作品。
- 1962年 《哈特福德时报》埃德蒙·S.瓦尔特曼的漫画《你需要什么，好汉？需要我这样的革命吗？》以及1961年他的其他漫画。
- 1963年 《得梅因纪事报》弗兰克·米勒的漫画《我讲过，我们肯定会解决这场争端，对吧！》以及1962年他的其他漫画。
- 1964年 《丹佛邮报》保罗·康拉德1963年的漫画。
- 1965年 无奖。
- 1966年 《迈阿密新闻》唐·赖特的漫画《你是要虚张声势吧？》以及1965年他的其他漫画。
- 1967年 《丹佛邮报》帕特里克·B.奥利芬特的漫画《他们不会让我们参加会议，对吧？》以及1966年他的其他漫画。
- 1968年 《夏洛特观察家报》尤金·格雷·佩恩1967年的漫画。
- 1969年 《芝加哥每日新闻》约翰·菲希蒂1968年的漫画。
- 1970年 《新闻日报》托马斯·F.达西1969年的漫画。
- 1971年 《洛杉矶时报》保罗·康拉德1970年的漫画。
- 1972年 《里士满新闻导报》杰弗里·K.麦克内利1971年的漫画。
- 1973年 无奖。
- 1974年 《波士顿环球报》保罗·泽普1973年的漫画。
- 1975年 宇宙新闻辛迪加的加利·特鲁多的连环漫画《杜内斯伯里》。

- 1976年 《费城问询报》托尼·奥思 1975年的漫画，主要是《多美呀，广阔的天空，金色的麦浪！》。
- 1977年 《波士顿环球报》保罗·泽普 1976年的漫画。
- 1978年 《里士满新闻导报》杰弗里·麦克内利 1977年的漫画。
- 1979年 《华盛顿邮报》赫伯特·布洛克 1978年的作品以及他一生的其他作品。
- 1980年 《迈阿密新闻报》唐·赖特 1979年的作品。
- 1981年 俄亥俄州《戴顿每日新闻》迈克·彼得斯的一幅谴责手枪引起的暴乱的漫画。
- 1982年 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美国政治家报》本·萨金特 1981年的大量漫画。
- 1983年 《芝加哥论坛报》理查德·洛赫尔 1982年的漫画。
- 1984年 《洛杉矶时报》保罗·康拉德 1983年的作品。
- 1985年 《芝加哥论坛报》杰弗里·麦克内利 1984年的作品。
- 1986年 《乡村之声》朱尔斯·菲弗 1985年的作品。
- 1987年 《华盛顿邮报》作者集团的伯克·布雷思德的连环漫画《兴旺之县》。
- 1988年 《亚特兰大宪法报》杜格·马利特 1987年的作品。
- 1989年 《芝加哥太阳时报》杰克·希金斯 1988年的作品。
- 1990年 纽约州《布法罗新闻》托姆·托尔斯 1989年的作品，主要是他的漫画《第一修正案》。
- 1991年 《辛辛那提问询报》吉姆·博格曼 1990年的作品。

摄影

- 1942年 《底特律新闻》米尔顿·布鲁克斯的照片《福特公司罢工骚乱》。
- 1943年 美联社弗兰克·诺埃尔的照片《水！》。
- 1944年 美联社弗兰克·菲兰的照片《塔拉瓦岛》。《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厄尔·L.邦克的照片《回家》。
- 1945年 美联社乔耶·罗森塔尔的关于海军陆战队把美国国旗插在伊尾岛的磨钵山上的照片。
- 1946年 无奖。
- 1947年 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业余摄影爱好者阿诺德·哈迪关于一家饭店发生火灾的照片，由美联社转发。
- 1948年 《波士顿旅行家报》弗兰克·库欣的照片《青年枪手和人质》。
- 1949年 《纽约先驱论坛报》纳撒尼尔·法国的照片《巴布·鲁思婉辞》。
- 1950年 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论坛报》比尔·克劳奇的照片《航空展览会上险些儿相撞》。
- 1951年 美联社马克斯·戴斯福尔报道朝鲜战争的照片。

- 1952年 《得梅因纪事论坛报》约翰·鲁宾逊和唐·乌尔坦关于一次大学足球赛中体育道德很差的一组照片。
- 1953年 密执安州《弗林特日报》威廉·M.加拉格尔的照片，画面上显示总统候选人艾德莱·史蒂文森的鞋上有个洞。
- 1954年 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塞尔莫的业余摄影爱好者弗吉尼亚·绍关于救人的一张照片，由美联社转发。
- 1955年 《洛杉矶时报》小约翰·G.冈特关于海岸边溺水的一张照片。
- 1956年 《纽约每日新闻》
- 1955年的摄影报道，主要是图片《轰炸机在街头坠毁》。
- 1957年 《波士顿旅行家报》哈里·A.特拉斯克关于安德里亚·多里亚号班轮沉没的照片。
- 1958年 《华盛顿每日新闻》威廉·C.比尔关于警察同一个小女孩谈话的照片。
- 1959年 《明尼阿波利斯明星报》威廉·西曼关于一个儿童在街头死去的照片。
- 1960年 合众国际社安德鲁·洛珀兹关于卡斯特罗行刑队在古巴处死巴蒂斯塔的一名军官的一组照片。
- 1961年 合众国际社转发的东京《每日新闻报》安永生的照片《东京的刺杀》。
- 1962年 美联社保罗·瓦西斯的照片《严重的步骤》。
- 1963年 美联社转发的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共和报》赫克托·朗登的照片，画面上是一位神父在暴乱中搀扶着一名受伤的士兵。
- 1964年 《达拉斯先驱时报》罗伯特·H.杰克逊关于杰克·鲁比谋杀李·奥斯瓦德的照片。
- 1965年 美联社霍斯特·法斯在越南战争中拍摄的战地照片。
- 1966年 合众国际社享一沃田拍摄的越南战地照片。
- 1967年 美联社杰克·R.索内尔关于詹姆斯·梅雷迪思在密西西比州被人枪杀的照片。
- (注：次年，这个类型分为两部分：现场新闻摄影和特写摄影。)

现场新闻摄影

- 1968年 《杰克逊维尔日报》罗科·莫拉比托的照片《生命之吻》。
- 1969年 美联社爱德华·T.亚当斯的照片《西贡刑场》。
- 1970年 美联社史蒂夫·斯塔尔的照片《校园枪声》。
- 1971年 《瓦利每日新闻》和《每日快讯报》约翰·保罗·菲洛关于肯特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的照片。
- 1972年 美联社霍斯特·法斯和迈克尔·劳伦特的系列照片《死于达

- 卡》。
- 1973 年 美联社许贡禹拍摄的关于一群越南儿童在凝固汽油弹袭击时逃跑的照片。
- 1974 年 加利福尼亚州贝弗利希尔斯市自由投稿摄影者安东尼·罗伯茨关于一名绑架者被人打死的系列照片。
- 1975 年 《西雅图时报》杰拉尔德·H.盖伊关于四名精疲力竭的消防队员的照片。
- 1976 年 《波士顿美国人先驱报》斯坦利·福尔曼关于波士顿一场火灾的系列照片。
- 1977 年 美联社尼尔·乌列维奇关于曼谷街头混乱和暴行的一组照片。
《波士顿美国人先驱报》斯坦利·福尔曼关于一名青年在街头骚乱中把旗杆当作长矛用的照片。
- 1978 年 合众国际社约翰·H.布莱尔关于一名印第安纳波利斯经纪人在枪口的威逼下扣作人质的照片。
- 1979 年 宾夕法尼亚州波茨敦《信使报》托马斯·J.凯利三世的系列照片《桑那托加公路上的悲剧》。
- 1980 年 合众国际社记者（姓名未公布）的照片《伊朗行刑队处决库尔德叛乱分子》。
- 1981 年 得克萨斯州《沃思堡明星电讯报》拉里·C.普赖斯关于利比亚军事政变的照片。
- 1982 年 美联社罗恩·埃德蒙兹关于里根总统遇刺未遂的照片。
- 1983 年 美联社比尔·弗利关于西贝鲁特萨布拉难民营大屠杀的照片。
- 1984 年 《波士顿环球报》斯坦·格罗斯费尔德关于人们被黎巴嫩战火所困的照片。
- 1985 年 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奥林奇县纪事报》工作人员关于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照片。
- 1986 年 《迈阿密先驱报》卡罗尔·古齐和迈克尔·杜奇尔，报道哥伦比亚鲁伊斯火山爆发。
- 1987 年 《旧金山考察家报》金·科默尼奇，报道菲律宾马科斯的垮台。
- 1988 年 得克萨斯州《奥德萨美国人报》斯科特·肖关于救援落入井下的儿童杰西卡·麦克卢尔的照片。
- 1989 年 《圣路易斯邮报》刊登的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业余摄影爱好者罗恩·奥尔什旺格关于消防人员力图救活一个儿童的照片。
- 1990 年 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论坛报》工作人员报道 1989 年 10 月 17 日湾区地震的照片。
- 1991 年 美联社格雷格·马里诺维奇关于南非索韦托这个黑人城镇的系列照片。

特写摄影

- 1968年 合众国际社智雄荣井关于越南战争的照片《梦想美好的时代》。
- 1969年 《黑檀》月刊小莫内塔·斯利特关于小马丁·路德·金博士葬礼的照片。
- 1970年 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邮报》达拉斯·金尼关于佛罗里达州移民工人的一组照片。
- 1971年 《芝加哥太阳时报》杰克·戴金加关于伊利诺斯州弱智儿童学校的系列照片。
- 1972年 合众国际社戴夫·肯纳利关于越南战争的照片。
- 1973年 堪萨斯州《托皮卡首府新闻报》布赖恩·兰克关于一个儿童诞生过程的系列报道。
- 1974年 美联社斯拉瓦·维德关于在北越的美国战俘遣返回国的照片。
- 1975年 《华盛顿邮报》马修·刘易斯 1974年拍摄的照片。
- 1976年 《信使日报》和《路易斯维尔时报》工作人员关于路易斯维尔学校用校车接送学生的图片报道。
- 1977年 《查塔努加自由新闻报》罗宾·胡德的照片：军队节游行队伍中一位残废军人抱着他的孩子。
- 1978年 美联社 J. 罗斯·鲍曼从罗得西亚游击区发回的照片。
- 1979年 《波士顿美国人先驱报》工作人员对一场暴风雪的摄影报道。
- 1980年 《达拉斯时代先驱报》欧文·H. 哈格勒关于得克萨斯现代牛仔的系列照片。
- 1981年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山崎太郎在南密执安州监狱拍摄的照片。
- 1982年 《芝加哥太阳时报》约翰·H. 怀特关于许多主题的照片。
- 1983年 《达拉斯时代先驱报》詹姆斯·B. 迪克曼关于萨尔瓦多生死斗争的照片。
- 1984年 《丹佛邮报》安东尼·萨奥关于埃塞俄比亚饥荒的照片。
- 1985年 《波士顿环球报》斯坦·格罗斯费尔德关于埃塞俄比亚饥荒灾民和美墨边界非法外侨的照片。《费城问询报》拉里·普赖斯发自安哥拉和萨尔瓦多的战地照片。
- 1986年 《费城问询报》托姆·格拉利什关于费城无家可归的人的摄影报道。
- 1987年 《得梅因纪事报》戴维·彼得森反映美国农民的梦想破灭的照片。
- 1988年 《迈阿密先驱报》米歇尔·杜西尔反映一项被贩毒破坏的住房建设项目从衰落到复兴的照片。
- 1989年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曼尼·克里索斯托莫反映底特律西南中

学学生生活的照片。

1990年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戴维·C.特恩利反映中国和东欧政治动荡的照片。

1991年 《达拉斯晨报》威廉·斯奈德反映罗马尼亚生病孤儿情况的照片。

评 论

1970年 《圣路易斯邮报》马奎斯·W·蔡尔兹 1969年的评论。

1971年 新泽西州哈肯萨克市《记录报》威廉·A.考德尔 1970年的每日专栏文章。

1972年 《芝加哥每日新闻》麦克·罗伊科 1971年的专栏文章。

1973年 《华盛顿邮报》戴维·布罗德 1972年的专栏文章。

1974年 《全国观察家》埃德温·A.罗伯茨 1973年关于公共事务的评论。

1975年 《华盛顿明星报》玛丽·麦格罗里 1974年关于公共事务的评论。

1976年 《纽约时报》沃尔特·韦尔斯利·史密斯 1975年以及其他许多年代的体育评论。

1977年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治·F.威尔 1976年关于各种问题的评论。

1978年 《纽约时报》威廉·萨菲尔关于伯特·兰斯事件的评论。

1979年 《纽约时报》拉塞尔·贝克 1978年的许多评论。

1980年 《波士顿环球报》埃伦·H.古德曼 1979年的许多评论。

1981年 《纽约时报》戴夫·安德森 1980年的大量评论。

1982年 《洛杉矶时报》辛迪加，阿尔特·巴克沃尔德 1981年的大量评论。

1983年 北卡罗来纳州罗利《新闻观察家报》克劳德·西顿 1982年的大量评论。

1984年 《华尔街日报》弗蒙特·罗伊斯特的每周专栏《思考思考吧》。

1985年 《新闻日报》默里·肯普顿 1984年的评论。

1986年 《纽约每日新闻》吉米·布雷斯林 1985年的大量评论。

1987年 《华盛顿邮报》作者集团查尔斯·克劳萨默 1986年关于全国性问题的专栏。

1988年 《迈阿密先驱报》戴夫·巴里 1987年的幽默专栏。

1989年 《芝加哥论坛报》克拉伦斯·佩奇关于地方和全国性事务的专栏。

1990年 《洛杉矶时报》吉姆·默里的体育专栏。

1991年 《华盛顿邮报》吉姆·霍格兰的国际问题专栏。

文艺批评

- 1970年 《纽约时报》艾达·路易斯·赫克斯泰布尔 1969年的许多文艺评论。
- 1971年 《纽约时报》哈罗德·C.舍恩伯格 1970年的音乐评论。
- 1972年 《圣路易斯邮报》小弗兰克·彼得斯 1971年的音乐评论。
- 1973年 《芝加哥太阳时报》罗纳德·鲍尔斯 1972年的电视评论。
- 1974年 《新闻日报》埃米莉·格瑙尔 1973年的文艺评论。
- 1975年 《芝加哥太阳时报》罗杰·埃伯特 1974年的电影评论。
- 1976年 《华盛顿邮报》艾伦·M.克里格斯曼 1975年的舞蹈评论。
- 1977年 《华盛顿邮报》威廉·麦克弗森为“书籍天地”专栏撰写的文章。
- 1978年 《纽约时报》沃尔特·克尔 1977年以及其他许多年代的戏剧评论。
- 1979年 《芝加哥论坛报》保罗·加普的建筑评论。
- 1980年 《波士顿环球报》威廉·A.亨利的电视评论。
- 1981年 《华盛顿明星报》乔纳森·亚德利的书评。
- 1982年 《洛杉矶时报》马丁·伯恩海默的音乐评论。
- 1983年 《华尔街日报》曼纽埃拉·霍尔特霍夫就许多主题发表的评论。
- 1984年 《纽约时报》保罗·戈德伯格的建筑评论。
- 1985年 《洛杉矶时报》霍华德·罗森堡的电视评论。
- 1986年 《纽约时报》多纳尔·J.赫纳汉的音乐评论。
- 1987年 《洛杉矶时报》理查德·埃德的书评。
- 1988年 《华盛顿邮报》托姆·谢尔斯的电视评论。
- 1989年 《新闻观察家报》迈克尔·斯卡布的书评和其他文学评论。
- 1990年 《旧金山纪事报》阿伦·坦科的建筑评论。
- 1991年 《洛杉矶时报》戴维·肖的新闻评论。

特 写

- 1979年 《巴尔的摩太阳晚报》乔恩·富兰克林关于一次脑手术的报道。
- 1980年 《迈阿密先驱报》马德林·布莱斯 1979年的许多报道。
- 1981年 纽约州《乡村之声》周刊特里萨·卡彭特报道一个精神病患者杀人事件。
- 1982年 美联社索尔·佩特对美国政府的特写。
- 1983年 《纽约时报》南·罗伯逊讲述她自己患中毒综合症的经历。
- 1984年 《西雅图时报》彼得·马克·赖尼尔逊关于研制波音 757 的系列报道。
- 1985年 《巴尔的摩太阳报》艾丽斯·斯坦巴克关于一个盲童生活的报

道。

- 1986年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先锋邮报》约翰·坎普关于明尼苏达州一家农户的系列报道。
- 1987年 《费城问讯报》史蒂夫·通米关于航空母舰上的生活的特写。
- 1988年 《圣保罗先锋邮报》雅奎·巴纳津斯基关于乡村农业社区一个艾滋病患者生死搏斗的系列报道。
- 1989年 《费城问讯报》戴维·朱齐诺的系列报道《南非黑人的滋味》。
- 1990年 《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电讯报》戴夫·柯廷报道一个家庭在一场爆炸中房子被毁、家人被严重烧伤后苦苦挣扎奋斗的经历。
- 1991年 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时报》谢里尔·詹姆斯关于一个母亲弃婴受审的报道。

特殊奖和表扬

- 1938年 《埃德蒙顿新闻报》维护加拿大的新闻自由。
- 1941年 《纽约时报》国际新闻报道质量高。
- 1944年 新闻检查署署长拜伦·普赖斯创造和管理报纸和电台使用的密码。威廉·艾伦·怀特在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服务卓有成绩。
- 1945年 美国报纸绘图人员绘制战区地图卓有成绩。
- 1947年 哥伦比亚大学及其新闻研究生院推动普利策奖有功。《圣路易斯邮报》坚持约瑟夫·普利策的理想。
- 1948年 弗兰克·迪尔·法肯索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成员成绩卓著。
- 1951年 《纽约时报》C.L.苏兹贝格独家采访斯特皮纳克大主教。《纽约时报》阿瑟·克罗克独家采访杜鲁门总统。
- 1952年 《纽约美国人日报》马克斯·卡斯揭露大学篮球队腐化。《堪萨斯城明星报》报道一个地区的水灾。
- 1953年 《纽约时报》星期日版《一周述评》。
- 1958年 《纽约先驱论坛报》沃尔特·李普曼作为专栏作家成绩卓著。
- 1964年 甘尼特报系《通往种族平等之路》的系列报道。
- 1976年 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恩伯格多年主持普利策奖金事务，成绩卓著。
- 1978年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理查德·李·斯特劳特作为专栏作家和华盛顿记者成绩卓著。
- 1987年 《圣路易斯邮报》小约瑟夫·普利策多年在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服务，成绩卓著。

报业史奖

- 1918年 明纳·卢因森和亨利·比特尔·霍夫的报业史。这是颁发此奖

的唯一年份。

